

马列著作毛泽东著作选读

(党的学说部分)

人 民 出 版 社

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

马列著作毛泽东著作选读

(党的学说部分)

中共中央党校编

人民出版社

马列著作毛泽东著作选读

(党的学说部分)

中共中央党校编

人民出版社出版 新华书店发行

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

850×1168毫米32开本 16.5印张 299,000字
1978年11月第1版 1978年11月北京第1次印刷

书号 1001·1158 定价 1.10元

(内部发行)

说 明

为了便于党校学员学习，我们按照我校教学计划规定的阅读书目，编印了这部马列和毛主席著作选读本。选读本分哲学、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和党的学说四个部分，分册印出。

选读本中马列著作的大部分译文，由中共中央马恩列斯著作编译局重新作了校订，校内外一些同志也参加了这一工作。

由于缺乏经验，这部选读本，不论在著作的选编或译文的校订方面，都难免有缺点，先作为试行本出版，供内部学习使用。希望同志们多提供改进意见。

中共中央党校

一九七八年八月



目 录

马克思 国际工人协会共同章程	1—6
列 宁 怎么办?(我们运动中的迫切问题)(节选).....	7—78
序言.....	7
一 教条主义和“批评自由”?.....	11
(一)什么是“批评自由”?.....	11
(二)“批评自由”的新拥护者	15
(三)俄国的批评	22
(四)恩格斯论理论斗争的意义	31
二 群众的自发性和社会民主党的自觉性	38
(一)自发高潮的开始	39
(二)对自发性的崇拜。《工人思想报》.....	44
(三)“自我解放社”和《工人事业》杂志	56
列 宁 进一步,退两步(我们党内的危机)(节选).....	79—159
(九)党章第一条	79
(十七)新《火星报》。组织问题上的机会主义	108
(十八)稍微谈谈辩证法。两个变革	146
列 宁 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节选)	
.....	160—185
二 布尔什维克成功的基本条件之一	160

四	布尔什维主义是在反对工人运动内部哪些敌人的斗争中成长、壮大和得到锻炼的？	164
五	德国“左派”共产党人。领袖、政党、阶级、群众间的相互关系	173
斯大林	无产阶级和无产阶级政党(论党章第一条)	186—196
斯大林	略论党内意见分歧	197—239
斯大林	关于德国共产党的前途和布尔什维克化(和德国共产党党员海尔佐克的谈话)	240—246
毛泽东	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	247—259
	关于单纯军事观点	248
	关于极端民主化	250
	关于非组织观点	252
	关于绝对平均主义	253
	关于主观主义	254
	关于个人主义	255
	关于流寇思想	257
	关于盲动主义残余	258
毛泽东	反对自由主义	260—263
毛泽东	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	264—284
	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	265
	共产党员在民族战争中的模范作用	266

团结全民族和反对民族中的奸细分子	268
扩大共产党和防止奸细混入	269
坚持统一战线和坚持党的独立性	270
照顾全局,照顾多数及和同盟者一道工作	271
干部政策	272
党的纪律	274
党的民主	275
我们的党已经从两条战线斗争中巩固和壮大 起来	276
当前的两条战线斗争	278
学习	279
团结和胜利	282
毛泽东 《共产党人》发刊词	285—300
毛泽东 纪念白求恩	301—303
毛泽东 整顿党的作风	304—324
毛泽东 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	325—360
引言	325
结论	331
毛泽东 学习和时局	361—376
毛泽东 论联合政府(节选)	377—384
全党团结起来,为实现党的任务而斗争	377
毛泽东 关于健全党委制	385—386
毛泽东 党委会的工作方法	387—392

毛泽东 反对官僚主义、命令主义和违法乱纪	393—395
毛泽东 反对党内的资产阶级思想	396—405
毛泽东 在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上的讲话	406—426
开幕词	406
结论	411
一 关于这次代表会议的评价	412
二 关于第一个五年计划	414
三 关于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	415
四 关于目前形势	422
五 为胜利召开党的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而斗争	423
毛泽东 增强党的团结,继承党的传统	427—440
毛泽东 坚持艰苦奋斗,密切联系群众	441—445
毛泽东 打退资产阶级右派的进攻	446—463
毛泽东 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464—492
毛泽东 加强相互学习,克服固步自封、骄傲自满	493—495
共产主义者同盟章程	496—503
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	504—519
结束语	504

马 克 思

国际工人协会共同章程⁽¹⁾

鉴于：

工人阶级的解放应该由工人阶级自己去争取；工人阶级的解放斗争不是要争取阶级特权和垄断权，而是要争取平等的权利和义务，并消灭任何阶级统治；

劳动者在经济上受劳动资料即生活源泉的垄断者的支配，是一切形式的奴役即一切社会贫困、精神屈辱和政治依附的基础；

因而工人阶级的经济解放是一切政治运动都应该作为手段服从于它的伟大目标；

为达到这个伟大目标所做的一切努力至今没有收到效果，是由于每个国家里各个不同劳动部门的工人彼此间不够团结，由于各国工人阶级彼此间缺乏亲密的联合；

劳动的解放既不是一个地方的问题，也不是一个民族的问题，而是涉及存在有现代社会的一切国家的社会问题，它的解决有赖于最先进各国在实践上和理论上的合作；

目前欧洲各个最发达的工业国工人阶级运动的新高

涨，在鼓起新的希望的同时，也郑重地警告不要重犯过去的错误，要求立刻把各个仍然分散的运动联合起来；

鉴于上述理由，创立了国际工人协会。

协会宣布：

加入协会的一切团体和个人，承认真理、正义和道德是他们彼此间和对一切人的关系的基础，而不分肤色、信仰或民族；

协会认为：**没有无义务的权利，也没有无权利的义务**^{〔2〕}。

根据这种精神，定出章程如下：

第一条 本协会设立的目的，是要成为追求共同目标即追求工人阶级的保护、发展和彻底解放的各国工人团体进行联络和合作^①的中心。

第二条 本会定名为“国际工人协会”。

第三条 每年召开由协会各分部选派代表组成的全协会工人代表大会。代表大会宣布工人阶级共同的愿望，采取使国际协会顺利进行活动的必要办法，并任命协会的总委员会。

第四条 每次代表大会规定下次代表大会召开的时间和地点。代表按规定的时间在规定的地点集会，无须另行通知。总委员会有权在必要时改变集会地点，但无权推迟集会时间。代表大会每年确定总委员会驻在地，并选举

^① 在德文版中，在“合作”的前面加有：“有计划的”。——编者注

总委员会委员。这样选出的总委员会有权增加新的委员。

全协会代表大会在年会上听取总委员会关于过去一年的活动的公开报告。在紧急情况下，总委员会可以早于规定的一年期限召开全协会代表大会。

第五条 总委员会由参加国际协会的各国工人组成。总委员会从其委员中选出为进行各种事务所必需的负责人员，即财务委员、总书记、各国通讯书记等等。

第六条 总委员会是沟通协会各国的全国性组织和地方性组织之间联系的国际机关，它应该使一国工人能经常知悉其他各国工人阶级运动的情况；使欧洲各国中的社会状况调查工作能同时并在共同领导下进行；使一个团体中提出的但具有普遍意义的问题能由一切团体加以讨论，并且在需要立刻采取实际行动时，例如在发生国际冲突时，使加入协会的团体能同时和一致行动。在一切适当场合，总委员会应主动向各国的全国性团体或地方性团体提出建议。为了加强联系，总委员会发表定期报告。

第七条 既然每个国家的工人运动的成功只能靠团结和联合的力量来保证，而国际总委员会活动的成效又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它是同少数全国性的工人协会中心还是同许多细小而分散的地方性团体联系，所以，国际协会的会员应该竭力使他们本国的分散的工人团体联合成由全国性中央机关来代表的全国性组织。但是，不言而喻，章程中这一条的运用要取决于每一国家法律的特点，

同时不管是否存在法律造成的障碍，并不排斥独立的
地方性团体同总委员会发生直接的联系。

第七条 (a) 工人阶级在反对有产阶级联合权力的
斗争中，只有组织成为与有产阶级建立的一切旧政党对
立的独立政党，才能作为一个阶级来行动。

工人阶级这样组织成为政党是必要的，为的是要保
证社会革命获得胜利和实现这一革命的最终目标——消
灭阶级。

工人阶级由于经济斗争而已经达到的力量的团结，
同样应该成为它在反对它的剥削者的政权的斗争中的杠
杆。

由于土地巨头和资本巨头总是要利用他们的政治特
权来维护和永久保持他们的经济垄断，来奴役劳动，所
以，夺取政权已成为无产阶级的伟大使命。⁽³⁾

第八条 每一个支部均有权任命一个和总委员会通
讯的书记。

第九条 每一个承认并维护国际工人协会原则的
人，都可成为国际工人协会的会员。每一个支部对它所
接受的会员的品质纯洁负责。

第十条 国际协会的每个会员，在由一个国家迁居
另一国家时，应该从加入协会的工人方面得到兄弟般的
帮助。

第十一条 加入国际协会的工人团体，在彼此结成
亲密合作的永久联盟的同时，完全保存自己原有的组织。

第十二条 本章程可以在每次代表大会上进行修改,但须有出席代表的三分之二赞成修改。

第十三条 凡本章程规定未尽之处,将另由可在每次代表大会上进行修改的条例来补充。

1871年11—12月分别用英文和法文,1872年2月用德文印成小册子

原文是英文

选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17卷第475—478页

注 释

〔1〕国际工人协会章程的最初文本是由马克思在1864年10月用英文写的,同年11月1日经中央委员会批准为临时章程(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6卷第15—18页)。在1866年日内瓦代表大会上,章程经过某些补充和修改,同附在章程后面的组织条例(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7卷第478—485页)一起由大会批准。1866年秋,章程和组织条例由马克思和拉法格译成法文,于11月底在伦敦出版单行本,出版这个单行本时考虑了日内瓦代表大会上所做的主要修改(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6卷第599—603页)。但是这个版本没有流传开来。1867年章程和组织条例的英文本在伦敦出版了,出版英文本时考虑了1864年临时章程通过以后日内瓦代表大会和洛桑代表大会对章程所做的修改。国际后来的两次代表大会——布鲁塞尔代表大会(1868年)和巴塞尔代表大会(1869年)——通过了一系列决定,这些决定是对章程的补充。但是流传的章程文本中都没有反映这些补充和修改。日内瓦代表大会和洛桑代表大会以后出版的英文本中也有许多很不确切的地方。此外,由于章程没有各种文字的正式版本,以致在好多国家出现了不准确的章程译文。1866年出版的右派蒲鲁东主义者托伦的法文译本就把关于为工人阶级的解放而进行的政治斗争的作用这一最重要的论点歪曲了。鉴于所有这一切情况,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准备伦敦代表会议的时候就拟了一项关于颁布新版的国际工人协会章程的决议草案(见《马

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7卷第439页)。伦敦代表会议通过了马克思所提出的关于用英文、德文和法文颁布新的标准版章程和组织条例的决议案，同时还决定，所有别种文字的译文也都应该经过总委员会的批准。

1871年9月底至10月，马克思和恩格斯参照国际所有各次代表大会以及伦敦代表会议的决议重新修订章程和组织条例，准备了新版文本，同时删除了章程和条例中已经失效的提法。章程和条例的德译本和法译本是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直接监督下翻译的。共同章程和组织条例的正式版本(«General Rules and Administrative Regulations of the International Working Men's Association»)在伦敦以单行本形式出版，1871年11月上半月出版了英文本，12月出版了法文本。章程和条例的德译文是在莱比锡以单行本发表的，另外还发表于1872年2月10日《人民国家报》第12号。在恩格斯参与下翻译的章程和条例的意大利文正式版本，由于总委员会缺乏资金而没有出版。《人民报》出版社和《平等》周报出版社出版了章程和条例的意大利文节译本。

〔2〕1864年的临时章程在“没有无义务的权利，也没有无权利的义务”这句话的前面还有下面这样一句话：“他们认为，一个人有责任不仅为自己本人，而且为每一个履行自己义务的人要求人权和公民权。”这段话和前面紧接着的那段话都带有宣言性质。由于1864年中央委员会为起草国际的纲领性文件而选出的委员会其他委员的坚持，马克思把这两段话加进了1864年临时章程的引言部分(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6卷第16页)。马克思在准备共同章程的1871年版的时候把“他们认为，一个人有责任……”这句话删去了，并在章程的附录里作了说明(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7卷第488页)。

〔3〕第七条(a)是根据1872年海牙代表大会的决议(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8卷第165页)补入本章程的，它是对1871年伦敦代表会议第九项决议(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7卷第454—456页)的简要概括。

列 宁

怎 么 办？

（我们运动中的迫切问题）〔1〕（节选）

“……党内斗争给党以力量和生气，而党本身模糊不清，界限不明，则是党的软弱的最大明证；党是靠清洗自己而巩固的……”

（摘自拉萨尔 1852 年 6 月 24 日
给马克思的信）

序 言

照作者的原定计划，这本小册子要详细发挥《从何着手？》（1901 年 5 月《火星报》〔2〕第 4 号）一文①中所谈的那些思想。我们应当首先向读者致歉，在那篇文章中所许的诺言（这个诺言在答复许多私人询问和信件时也一再重复过）履行得太迟了。这样迟缓的原因之一，是去年

① 见《列宁全集》第 5 卷第 1—10 页。——编者注

(1901年)6月间曾经试图把所有的社会民主党人国外组织统一起来〔3〕。当时自然要等待这次尝试的结果，因为这次尝试如果成功，我们也许就要从稍微不同的角度来说明《火星报》的组织观点；无论如何，这次尝试成功就有希望很快消除俄国社会民主党内存在两个派别的现象。读者知道，这次尝试结果失败了，而且，正象我们在下面将要设法证明的那样，《工人事业》杂志〔4〕在第十期上重新转向经济主义以后，这次尝试也不能不失败。同这个模糊不清，缺乏明确性，因而也就更为顽固并能通过各种形式复活起来的派别作坚决的斗争，已经是绝对必要的事情了。根据这一情况，本书的原定计划也就有所改变并且大大地扩充了。

本书的主题，本来应当是《从何着手？》一文中所提出的三个问题，即我们的政治鼓动的性质和主要内容问题，我们的组织任务问题，以及在各地同时着手建立全俄的战斗组织的计划问题。作者早就关心这些问题，准备在《工人报》〔5〕复刊时在报上提出来，不过这次复刊的尝试也没有成功（见第五章）。原来设想在本书中只分析这三个问题，并尽可能正面叙述自己的观点，而不采用或者几乎不采用论战方式，但是由于下面两个原因，这就根本无法实现了。一方面，经济主义比我们设想的要顽强得多（我们用经济主义这个词是广义的，在1901年12月《火星报》第十二号上发表的《同经济主义的拥护者商榷》一文已经说明了这一点，那篇文章可以说是定出了本书的

大纲^①)。现在已经很明显,对于解决这三个问题所以存在着各种不同的观点,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俄国社会民主党内两个派别的根本对立,而不是由于局部的意见分歧。另一方面,经济派对于《火星报》实际宣传我们的观点表示茫然不解,这显然表明:我们往往简直是各讲各的话;如果我们不从头讲起,就不可能谈出什么结果;必须作一次尝试,用尽可能通俗的方式,用大量具体的例证,来就我们之间的意见分歧的一切根本之点,向所有的经济派作系统的“讲解”。于是我就决定作这样一次“讲解”的尝试,虽然我明明知道,这会使本书的篇幅大大增加,并且使出版日期推迟,但是除此之外,我看不出有什么别的办法来履行我在《从何着手?》一文中所许的诺言。除了为出版迟缓致歉之外,还要为本书文字修饰方面的很多缺点致歉,因为我不得不非常匆忙地写作,而且经常被其他各种工作所打断。

对上述三个问题的分析,仍然是本书的主题,但是我不得不从两个比较一般的问题谈起:为什么象“批评自由”这样一个“无害的”和“正常的”口号,对我们竟会成为一个真正的战斗的信号?为什么我们甚至在社会民主党对自发的群众运动的作用这个基本问题上都谈不拢?其次,本来是要谈谈我们对政治鼓动的性质和内容的观点,现在则变成了说明工联主义政治和社会民主主义政治之

① 见《列宁全集》第5卷第280—287页。——编者注

间的区别；本来是要谈谈我们对组织任务的观点，现在则变成了说明经济派感到满意的手工业方式和我们认为必须建立的革命家组织之间的区别。再次，人们反对全俄政治报“计划”的意见越没有根据，越不从实质上回答我在《从何着手？》一文中提出的我们怎样才能在地同时着手建立我们所需要的组织的问题，我就越要坚持这个“计划”。最后，在本书的结尾部分，我希望指明以下几点：我们已经做了我们所能做到的一切来防止同经济派完全决裂，但是这一决裂毕竟是不可避免的了；《工人事业》杂志已经具有一种特别的、甚至可以说是“历史的”作用，因为它最充分和最突出地表现出来的并不是彻底的经济主义，而是那种构成俄国社会民主党历史上**整整一个时期**的特点的混乱和动摇；所以我们同《工人事业》杂志进行的初看起来似乎是过分详细的论战也是有意义的，因为不彻底结束这个时期，我们就不能前进。

尼·列宁

1902年2月

教条主义和“批评自由”

(一)什么是“批评自由”？

“批评自由”——这无疑是目前最时髦的口号，是各国社会主义者同民主主义者在争论中最常用的口号。争论的一方一再郑重其事地援引批评自由，初看起来，简直难以想象还有什么比这更奇怪的事情。难道在先进政党中，有人声言反对欧洲大多数国家用来保障科学自由和科学研究自由的宪法条文吗？凡是在街头巷尾一再听到这个时髦的口号而还没有深入了解争论双方意见分歧的实质的局外人，一定会想：“这里恐怕有问题吧！”“这个口号显然是一种特定用语，象代号一样，用成了习惯，几乎成为一种普通名词了。”

其实，谁都知道，现代国际^①社会民主党中已经形成

① 顺便指出：社会主义运动内部不同派别之间的争执，第一次从一国的现象变成了国际的现象，这在现代社会主义运动史上恐怕是唯一的而且也是非常令人欣慰的现象。从前，拉萨尔派和爱森纳赫派〔6〕之间，盖得派和可能派〔7〕之间，费边派和社会民主党人〔8〕之间，民意党人〔9〕和社会民主党人之间的争论，始终纯粹是一国内的争论，所反映出来的，纯粹是各国的特征，这些争论可以说是在不同的侧面进行的。而目前（这一点现在已经看得很清

了两个派别，这两个派别之间的斗争，有时炽烈起来，火焰腾腾；有时又静息下去，在动人的“休战决议”的灰烬下面阴燃着。对“旧的、教条式的”马克思主义采取“批评”态度的那个“新”派别究竟是怎么一回事，这一点已经相当明确地由伯恩斯坦**讲出来了**，由米勒兰**做出样子了**。

社会民主党应当从主张社会革命的政党，变成主张社会改良的民主党。伯恩斯坦提出了一大套颇为头头是道的“新”论据和“新”理由，来为这个政治要求辩护。他否认有可能科学地论证社会主义和根据唯物主义历史观证明社会主义的必要性和必然性；他否认大众日益贫困、日益无产阶级化以及资本主义矛盾日益尖锐化的事实；他宣称“**最终目的**”这个概念本身就不能成立，并绝对否定无产阶级专政的思想；他否认自由主义和社会主义在原则上的对立；他否认**阶级斗争理论**，认为这个理论好象不适用于按照多数人意志进行管理的严格意义上的民主的社会，等等。

可见，要求从革命的社会民主主义坚决转向资产阶级的社会改良主义，就免不了会同样坚决地转向用资产阶级观点来批评马克思主义的一切基本思想。既然很久

楚)，英国的费边派，法国的内阁派〔10〕，德国的伯恩斯坦派，俄国的批评派，都成了一家弟兄，他们互相吹捧，彼此学习，一起攻击“教条式的”马克思主义。国际革命社会民主党在这场第一次同社会主义运动内的机会主义进行的真正国际性的搏斗中，也许会大大加强起来，足以结束早已笼罩于欧洲的政治反动局面吧？

以来，无论在政治讲台上或在大学讲坛上，无论在大量小册子中或在许多学术论文里，都一直在对马克思主义进行这样的批评，既然几十年来，有教养阶级的一代青年，都经常在受这种批评的熏陶，那么，社会民主党中的“新的批评”派一出世就非常完备，好象密纳发从丘必特脑袋里钻出来^[11]一样，就毫不奇怪了。这个思潮，按其内容来说，并不需要什么发展和形成，因为它是直接从资产阶级的书刊上搬到社会主义的书刊上来的。

其次，如果说伯恩施坦的理论批评和政治欲望还有什么人不明白，那么法国人已经设法为“新方法”做示范了。法国在这一次也没有辜负它历来的名声，即它是“这样一个国家，在那里历史上的阶级斗争，比起其他国家来每一次都达到更加彻底的结局”（见恩格斯为马克思的《雾月十八日》一书写的序言^①）。法国社会党人并不谈什么理论，而是直接行动起来；法国那种民主发展程度较高的政治条件，使他们能够立刻转到带来种种后果的“实践的伯恩施坦主义”上去。米勒兰做出了这种实践的伯恩施坦主义的绝好榜样，难怪伯恩施坦和福尔马尔都来竭力为米勒兰辩护，对他大加赞赏！的确，既然社会民主党实质上不过是个主张改良的党，并且应当有公开承认这一点的勇气，那么社会党人也就不仅有权加入资产阶级内阁，而且甚至应当时时刻刻力求做到这一点。既然民

① 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601页。——编者注

主制实质上就是消灭阶级统治，那么社会党人部长为什么不可以用阶级合作的言词来博得整个资产阶级世界的欢心呢？他为什么不可以甚至在宪兵屠杀工人的行为已经千百次地表明了各阶级民主合作的真谛之后，仍然留在内阁中呢？他又为什么不可以亲自参加欢迎那个目前被法国社会党人恰好叫作绞刑专家、鞭笞专家和流放专家（knouteur, pendeur et déportateur）的沙皇呢？而以社会主义在全世界面前这样备受屈辱和名誉扫地为代价，以败坏工人群众的社会主义意识（这是保障我们获得胜利的唯一基础）为代价，换得的却是一些实行微小改良的冠冕堂皇的**草案**，这种改良微小到了极点，甚至比从资产阶级政府那里争取到的还要少！

只要不是故意闭起眼睛，就不会看不到，社会主义运动中的新的“批评”派无非是**机会主义**的一个新的变种。假使判断人们的时候，不是看他们给自己穿上的漂亮礼服，不是看他们给自己取的动听的名字，而是看他们的行为怎样，看他们在实际上宣传的是什么，那就可以明白：“批评自由”就是机会主义派在社会民主党内的自由，就是把社会民主党变为主张改良的民主党的自由，就是把资产阶级思想和资产阶级因素灌输到社会主义运动中来的自由。

自由是个伟大的字眼，但正是在工业自由的旗帜下进行最富有掠夺性的战争，在劳动自由的旗帜下掠夺劳动者。现在使用“批评自由”一词，同样也包含着这种内

在的虚伪性。假如人们真正确信自己把科学向前推进了，那他们就不会要求新观点同旧观点并列的自由，而会要求用新观点代替旧观点了。而现在这种“批评自由万岁！”的叫嚷却太象那个关于空桶的寓言〔12〕了。

我们紧紧靠在一起，循着崎岖险阻的道路紧拉着手前进。我们被敌人四面包围，我们几乎随时都得冒着敌人的炮火行进。我们根据自由通过的决议联合起来，正是为了要同敌人斗争，并且不致失足落入旁边的泥潭里。那些呆在泥潭里的人，一开始就责备我们独树一帜，责备我们选定了斗争的道路，而不是调和的道路。现在我们中间有些人竟叫喊起来：我们都到这个泥潭里去吧！当人们开始耻笑他们的时候，他们反驳说：你们这些人多么落后啊！你们怎么好意思否认我们有号召你们走上比较好的道路去的自由！是啊，先生们，你们不仅可以自由地号召，而且可以自由地走到随便什么地方去，哪怕是走到泥潭里去也可以；我们甚至认为你们应有的位置正是在泥潭里，而且我们愿意竭力帮助你们搬到那里去。不过，请你们放开我们的手，不要拉住我们，不要玷污自由这个伟大的字眼，因为我们也可以“自由地”走到我们愿意去的地方，我们不但可以自由地同泥潭作斗争，而且还可以自由地同那些转向泥潭里去的人作斗争！

（二）“批评自由”的新拥护者

国外“俄国社会民主党人联合会”〔13〕的机关刊物《工

人事业》杂志，最近(第10期)郑重其事地提出的正是这个口号(“批评自由”)，并且不是把它当作理论原则，而是当作政治要求提出来的，即在回答“能不能把那些在国外活动的社会民主党人组织统一起来”这一问题时提出：“要达到牢固的统一，就必须有批评自由”(第36页)。

从这个声明中可以得出两个十分明确的结论：1.《工人事业》杂志维护整个国际社会民主党中的机会主义派；2.《工人事业》杂志要求机会主义在俄国社会民主党内的自由。现在来考察一下这两个结论。

《工人事业》杂志“特别”不高兴的，是“《火星报》和《曙光》杂志^[14]喜欢预言国际社会民主党中的**山岳派**和**吉伦特派**^[15]必将决裂”^①。

《工人事业》杂志编辑波·克里切夫斯基写道：“我们觉得，关于社会民主党队伍中有**山岳派**和**吉伦特派**的说法，根本就是一种肤浅的历史类比，出自马克思主义者的笔下是很奇怪的，因为**山岳派**和**吉伦特派**并不是象思想史学家可能认为的那样，代表着不同的气质或思潮，而是代表着不同的阶级或阶层：一方面是中等资产阶级，另一方面是小市民阶层和无产阶级。而现代社会主义

① 把革命无产阶级中的两个派别(革命派和机会主义派)比作十八世纪革命资产阶级中的两个派别(雅各宾派即“**山岳派**”，和**吉伦特派**)的提法，见《火星报》第2号(1901年2月)的社论。这篇社论的作者是普列汉诺夫。无论立宪民主党人、“无题派”^[16]或孟什维克，至今都很爱谈俄国社会民主党中的“雅各宾派”。至于普列汉诺夫第一次提出这个概念来反对社会民主党右翼的事实，现在人们却宁愿默不作声或者……把它忘掉。(这是作者为1907年版加的注释。——编者注)

运动中却没有阶级利益的冲突，这整个运动，它的一切〈着重号是波·克里切夫斯基加的〉^①派别，包括最坏的伯恩斯坦派在内，都是站在维护无产阶级的阶级利益的立场上，站在无产阶级争取政治和经济解放的阶级斗争的立场上的。”（第32—33页）

好一个大胆的断语！波·克里切夫斯基是否听见过早已有人指出的那件事实，即正是由于近年来有“学士”阶层广泛参加社会主义运动，伯恩斯坦主义才非常迅速地传布开来呢？而主要的是，我们的这位作者究竟根据什么断定说“最坏的伯恩斯坦派”也站在无产阶级争取政治和经济解放的阶级斗争的立场上呢？这是不得而知的。他这种坚决维护最坏的伯恩斯坦派的说法，是没有拿出任何论据和理由来加以证明的。作者显然以为，他既然是在重复最坏的伯恩斯坦派谈到自己时所讲的话，那么他的断语也就无须证明了。但是，判断整个派别，竟以该派代表人物谈到自己时所讲的话为根据，这难道不是再“肤浅”不过的吗？紧接着的关于党的发展有两种不同的、甚至绝对相反的类型或道路的“说教”（《工人事业》杂志第34—35页），难道不也是再肤浅不过的吗？你看，德国社会民主党人承认充分的批评自由，可是法国人却不承认，而正是法国人的例子充分表明那种“不肯容忍态度的害处”。

我们对此回答说，正是波·克里切夫斯基的例子表明，那些简直是“按伊洛瓦伊斯基〔17〕方式”来观察历史的

① 凡引文中〈 〉内的文字或标点符号都是列宁加的。——编者注

人，有时也自称为马克思主义者。要解释德国社会党为什么统一和法国社会党为什么涣散，完全不必去考察两国历史的特点，不必把军事的半专制制度和共和的议会制的条件加以对比，不必分析巴黎公社和反社会党人非常法^[18]的后果，不必把两国的经济生活和经济发展加以比较，不必回顾在“德国社会民主党空前发展”的同时进行了社会主义运动史上空前努力的斗争，不仅反对理论上的错误(米尔柏格、杜林^①、讲坛社会主义者^[20])，而且反对策略上的错误(拉萨尔)的斗争，如此等等。所有这一切都没有必要！法国人所以争吵是因为他们不肯容忍，德国人所以统一是因为他们都是些好孩子。

你看，用这种无比深奥的议论就“避开了”事实，“避开了”把维护伯恩斯坦派的言论完全推翻的事实。伯恩斯坦派是否**站在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的立场上**，对于这个问题只有历史经验才能给予最后的彻底的解答。因

① 当恩格斯抨击杜林的时候，德国社会民主党中有相当多的人都是倾向杜林的观点的，他们甚至公开在党代表大会上纷纷责备恩格斯，说他态度激烈，不肯容忍，用非同志态度进行争辩等等。莫斯特及其同伙提议（在1877年的代表大会上）在《前进报》^[19]上不再登载恩格斯的论文，认为这些论文“绝大多数读者都不感兴趣”；而瓦耳泰希(Vahlteich)则说登载这些论文使党受到了很大的损害，说杜林对社会民主党也是出了力的，“我们应当为党的利益而利用所有的人。假如大学教授们要争论，那么《前进报》决不是进行这种争论的场所”（1877年6月6日《前进报》第65号）。你们看，这也是维护“批评自由”的例子，我国那些非常喜欢援引德国人的例子的合法的批评派和不合法的机会主义者，不妨考虑一下这个例子！

此，在这一点上有最重要意义的正是法国的例子，因为只有法国一个国家的伯恩施坦派曾经在自己的德国同道们的热烈赞助下（而且有几分是在俄国机会主义者的热烈赞助下——参看《工人事业》杂志第2—3期合刊第83—84页），试图自立。拿法国人“不肯调和”当借口的做法，除了有其“历史的”（诺兹德烈夫^[21]式的）意义之外，就不过是企图用气话来掩盖很不愉快的事实罢了。

而且，就连德国人我们也还根本不打算奉送给波·克里切夫斯基及其他许许多多“批评自由”的拥护者。“最坏的伯恩施坦派”所以还能见容于德国党内，只是因为他们服从那个坚决摒弃伯恩施坦的种种“修正”的汉诺威决议^[22]，以及那个尽管态度婉转、但对伯恩施坦提出了直接警告的卢卑克决议^[23]。至于从德国党的利益来看，这种婉转的态度究竟适当到什么程度，在这种场合下坏的和平是否胜过好的争执，这还是可以争论的，简而言之，在衡量用哪种方法拒绝伯恩施坦主义才妥当时，可以有不同的意见，但是德国党曾经两次拒绝伯恩施坦主义却是不能否认的事实。所以，认为德国人的例子证实了“最坏的伯恩施坦派是站在无产阶级争取经济和政治解放的阶级斗争的立场上的”这一说法，就是完全不了解有目共睹的现实情况^①。

① 必须指出，《工人事业》杂志在谈到德国党中的伯恩施坦主义问题时，始终只限于单纯转述事实，完全“不肯”说出自己对这些事实的评价。例如，在第二、三期合刊第六十六页上讲到斯图加特代表大

不仅如此。正如我们已经讲过的，《工人事业》杂志还向俄国社会民主党要求“批评自由”，并且为伯恩施坦主义辩护。显然它是认为我们这里有人冤枉了我们的“批评派”和伯恩施坦派。究竟是冤枉了什么人呢？是谁冤枉的？在什么地方？什么时候？究竟冤枉的是什么呢？关于这些问题，《工人事业》杂志始终避而不谈，没有一次提起任何一个俄国的批评派和伯恩施坦派！这里我们只能假定，二者必居其一：或者被人冤枉的不是别人，正是《工人事业》杂志自己（可以证明这一点的是，《工人事业》杂志第十期上的两篇文章都只讲《曙光》杂志和《火星报》冤枉了《工人事业》杂志）。如果是这样，那么始终坚决否认自己同伯恩施坦主义有任何一致之处的《工人事业》杂志，不替“最坏的伯恩施坦派”和批评自由讲点好话，就不能为自己辩护，这种怪事应当怎样解释呢？或者

会〔24〕时，竟把一切意见分歧都归结为“策略”，并且只是指出绝大多数忠于原先的革命策略。又如在第四、五期合刊第二十五页及以下各页上，也只不过是把汉诺威代表大会上的发言转述一遍，并把倍倍尔的决议摘引一下；这里又是（也象在第二、三期合刊上一样）把对于伯恩施坦观点的叙述和批评留待“专文”去谈。可笑的是，在第四、五期合刊第三十三页上说道：“……倍倍尔所申述的观点赢得了代表大会绝大多数的赞同”，而稍后一点却又说“……大卫发言拥护伯恩施坦的观点……他首先就竭力说明，说……伯恩施坦和他的朋友们毕竟是〈原文如此！〉站在阶级斗争的立场上的”……这是1899年12月间写的；到1901年9月的时候，《工人事业》杂志大概已经不再相信倍倍尔正确，而把大卫的观点当作自己的观点来重复了！

被人冤枉的是某个第三者。那为什么又不肯说出这第三者究竟是谁呢？

由此可见，《工人事业》杂志还在继续玩那种它从创立起就开始的（这一点我们下面再讲）捉迷藏游戏。其次，请注意这**第一次**实际运用大受吹捧的“批评自由”的情况吧。实际上，“批评自由”立刻表现为没有任何批评，甚至根本没有独立的见解。正是这个把俄国伯恩施坦主义当作暗疾（照旧教徒的中肯的说法〔25〕）隐瞒起来的《工人事业》杂志现在却主张，为了治这种病，只要**简单地照抄**一张专治德国型的这种病的最新德国药方就行了！这不是什么批评自由，而是奴隶式的模仿……甚至更坏，是猴子式的模仿！现代国际机会主义的同一的社会和政治内容，依各国的民族特点而表现为各种不同的形式。在某一个国家里，一批机会主义者早已独树一帜；在另一个国家里，机会主义者忽视理论，而在实践中推行激进社会党人的政策；在第三个国家里，革命政党的一些党员投奔到机会主义营垒中去，他们不是进行维护原则和维护新的策略的公开斗争，而是采取渐渐地、悄悄地、可以说是不受处分地败坏自己的党的办法，来力求达到自己的目的；在第四个国家里，同样的倒戈分子，在黑暗的政治奴役之下，在“合法”活动和“不合法”活动的相互关系非常独特的情况下，运用着同样的方法等等。说什么批评自由和伯恩施坦主义自由是**俄国**社会民主党人统一起来的条件，又不分析**俄国**伯恩施坦主义究竟表现在什么地方和

产生了怎样特殊的结果，这就等于是，说话是为了什么也不说。

那我们就自己来试试，把《工人事业》杂志不愿说出来的（或许是它无法理解的）东西哪怕是简单地说明一下。

（三）俄国的批评

在我们要考察的这一方面，俄国的基本特点，就是在自发的工人运动**一开始**产生和先进舆论**一开始**转向马克思主义时，就有各种显然不同的分子在共同的旗帜下联合起来，反对共同的敌人（陈腐的社会政治世界观）。我们说的是“合法马克思主义”〔26〕的蜜月时期。一般讲来，这是一种非常独特的现象，要是在八十年代或九十年代初，谁也不会相信会有发生这种现象的可能。在一个完全没有出版自由的专制制度国家里，在凶恶的政治反动势力对于稍有一点政治上的不满和反抗的苗头都横加迫害的时代，革命的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忽然在**检查核准**的书刊上找到了一条出路，虽然说明这个理论的语言是伊索寓言式的，但一切“感兴趣的人”都可以理解。政府只惯于把（革命的）民意主义的理论当作危险的理论，照例没有发觉这一理论的内部演变过程，而欢迎一切对这个理论的批评。等到政府醒悟过来的时候，等到书报检查官和宪兵这支笨重的队伍侦察到新的敌人而猛扑过来的时候，已经过去不少的（照我们俄国的尺度来计算）时间了。

在这段时间里，马克思主义的书籍一本又一本地出版，马克思主义的杂志和报纸相继创办起来，大家都纷纷变成了马克思主义者，都来奉承马克思主义者，向马克思主义者献殷勤，出版商因为马克思主义书籍的畅销而兴高采烈。于是，在为这种气氛所迷惑的新起的马克思主义者中间，自然也就出现了不少“趾高气扬的作家”〔27〕……

现在，可以平心静气地谈论这个已经过去的时期了。谁都知道，马克思主义所以在我国的书刊上盛行了一个短暂的时期，是因为激进分子同十分温和的分子实行了联盟。实质上，这些温和分子是资产阶级民主派，而这个结论（由他们后来的“批评”发展过程所显然证实了的这个结论）早在“联盟”还完整的时候，就已经有人意识到了①。

既然如此，那么后来出现那种“混乱”，是否应当由那些同后来的“批评派”实行过联盟的革命社会民主党人来承担最大的责任呢？从过分死板地观察问题的人那里，有时可以听到这样的问题以及对它的肯定回答。可是这些人是完全不对的。只有那些不信赖自己的人，才会害怕即使是同不可靠的分子实行的暂时联盟，而不实行这样的联盟，无论哪一个政党都是不能存在的。可是，同合

① 这是指克·士林的一篇反对司徒卢威的文章，该文是根据题目为《马克思主义在资产阶级著作中的反映》的学术讲演写成的。（这是作者为1907年版加的注释。见《列宁全集》第1卷第311—481页。——编者注）

法马克思主义者的联合，是俄国社会民主党初次实行的某种真正的政治联盟。由于实行了这个联盟，我们才极为迅速地战胜了民粹主义并且使马克思主义思想（虽然是在庸俗化的形式下）广泛传播开来。同时，缔结这个联盟并不是完全没有任何“条件”的。证据就是1895年被书报检查机关烧掉的马克思主义文集《俄国经济发展问题的资料》〔28〕。假使同合法马克思主义者在书刊方面的协议可以比作政治联盟，那么这本书也就可以比作政治协定了。

破裂之所以发生，当然不是因为“同盟者”是资产阶级民主派。恰恰相反，这一派正是社会民主党天然的、合适的同盟者，因为这里涉及的是社会民主党的民主任务，而俄国的现状把这方面的任务提到了首要地位。但是这种联盟的必要条件，就是社会党人完全有可能向工人阶级揭示工人阶级利益同资产阶级利益的敌对性。现在大多数合法马克思主义者纷纷倒向的伯恩斯坦主义和“批评”派，却要剥夺这种可能性，腐蚀社会主义的意识，把马克思主义庸俗化，宣传社会矛盾缓和论，硬说社会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思想是荒谬的思想，把工人运动和阶级斗争缩小为狭隘的工联主义运动，缩小为争取细小的、渐进的改良的“现实主义”斗争。这就完全等于资产阶级民主派否认社会主义运动的独立自主权，从而也就否认它的生存权；这在实践上就是想把刚刚开始的工作运动变成自由派的尾巴。

在这种情况下，破裂自然是不可避免的。可是，俄国的“独特”之处就在于，这个破裂不过是使社会民主党人从大家最容易看到的、传布最广的“合法”书刊上消失。在这种书刊上，“前马克思主义者”巩固了自己的地位，树起了“批评的旗帜”，几乎取得了“谴责”马克思主义的垄断权。“反对正统”、“批评自由万岁”的口号（现在《工人事业》杂志所不断重复的口号），立刻成了时髦的字眼。这种时髦的东西连书报检查官和宪兵也抵挡不了，这有事实为证，例如有名的（有赫罗斯特拉特〔29〕名声的）伯恩施坦的一本书①就有三种俄文版本出现，又如祖巴托夫也推荐伯恩施坦和普罗柯波维奇先生的著作（《火星报》第10号）。现在社会民主党人担负着一个本来就很困难、又因纯粹外部的阻碍而变得非常艰巨的任务，这就是同新的思潮作斗争的任务。可是，这个思潮不仅表现在书刊上。在人们转向“批评”的时候，社会民主党的实际工作者则倾心于“经济主义”。

合法的批评和不合法的经济主义之间的联系和互相依赖关系是怎样产生和发展起来的，这是个很有意思的问题，值得专门写一篇文章来分析。这里我们只要指出无疑存在着这种联系就够了。赫赫有名的《信条》〔30〕所以博得了那种应有的名声，也正是因为它坦白地表述了这种联系，吐露了“经济主义”的基本政治倾向：让工人去

① 指《社会主义的前提和社会民主党的任务》。——编者注

作经济斗争（更确切些说，去作工联主义的斗争，因为工联主义的斗争也包括一种特殊的工人政治），而让马克思主义的知识分子去同自由派结合起来作政治“斗争”。“在人民中”进行的工联主义工作，看来是执行这个任务的前半部，而合法的批评则是执行这个任务的后半部。这种声明成了反对经济主义的极好武器，所以，如果没有《信条》，也值得编造出一篇《信条》来。

《信条》并不是编造出来的，但它的公布没有照顾它的作者们的意愿，也许，甚至是违反它的作者们的意愿的。至少参加过把新“纲领”公布于世^①的本书作者已经听到一些怨言和责难，说不应该把发言者概述自己观点的草稿复制散发，冠以《信条》的名称，甚至还同一份抗议书一起刊印出来！我们所以要讲到这段情节，是因为它揭示了我们的经济主义的那种耐人寻味的特点：害怕公开。这正是整个经济主义的特点，而不只是《信条》的作者们的特点，因为表现出这种特点的，有最坦白最真诚地拥护经济主义的《工人思想报》^[32]，有《工人事业》杂志（它因“经济主义的”文件在《指南》^[33]中发表出来而表示愤慨），有基辅委员会（它在两年以前也不愿意让人把它

① 指反对《信条》的**十七人抗议书**。本书作者参加过起草这个抗议书的工作（1899年底）。1900年春，抗议书曾同《信条》一起在国外刊印出来。现在从库斯柯娃女士的文章中（仿佛是登在《往事》杂志[31]上）已经知道：《信条》的作者就是她，而当时在国外的“经济派”中起重要作用的是普罗柯波维奇先生。（这是作者为1907年版加的注释。——编者注）

的《宣言》⁽³⁴⁾ 连同那篇反驳它的论文一起登载出来^①), 还有许许多多单个的经济主义分子。

拥护批评自由的人有这种害怕批评的表现, 不能单单用狡猾来解释 (虽然毫无疑问, 他们有时也非狡猾不可, 因为把还没有巩固的新派别的萌芽暴露出来让敌人攻击是不合算的!)。不, 大多数经济派确实打心眼里憎恶 (并且按经济主义的实质来说, 他们也应当这样) 一切理论上的争论、派别的分歧、广泛的政治问题、把革命家组织起来的方案等等。“让侨居国外的人去干这些事情吧!”——一个相当彻底的经济派有一次这样对我说过, 而他这句话是代表一种非常流行的 (而且又是纯粹工联主义的) 观点的: 我们的事情就是管我们这个地方的工人运动、工人组织; 至于其余的事情, 都是学理主义者虚构出来的, 正象《火星报》第十二号上发表的那封信的作者们和《工人事业》杂志第十期异口同声地所说的那样, 都是“夸大思想体系的作用”。

试问, 既然俄国的“批评”和俄国的伯恩斯坦主义有这样的特点, 那么凡是在实际上而不是仅仅在口头上愿意反对机会主义的人, 应当担负起什么样的任务呢? 第一, 应当设法恢复在合法马克思主义时代刚刚开始, 而现在又落到不合法的活动家肩上的理论工作; 如果没有这样的工作, 运动就不能顺利发展。第二, 必须积极地同严

① 据我们所知, 基辅委员会的成员从那时起发生了变化。

重腐蚀人们意识的合法“批评”作斗争。第三，应当积极反对实际运动中的混乱和动摇，要揭穿并且驳斥一切自觉或不自觉地降低我们的纲领和我们的策略的行为。

无论是第一件事、第二件事或第三件事，《工人事业》杂志都没有做过，这是大家都知道的；下面我们要从各方面来详细地说明这个尽人皆知的真实情况。现在我们只想指出，“批评自由”这个要求同我们俄国的批评以及俄国的经济主义的特点，处于怎样一种极端矛盾的状况。其实，看一看“俄国社会民主党人国外联合会”肯定《工人事业》杂志观点的那个决议就行了：

“为了促进社会民主党今后思想上的发展，我们认为在党的书刊上有批评社会民主主义理论的自由是绝对必要的，只要这种批评不同这个理论的阶级性和革命性相抵触。”（《两个代表大会》第10页）

理由就是：决议的“第一部分同卢卑克党代表大会关于伯恩施坦问题的决议是一致的”……“联合会派”由于头脑简单，竟未觉察到他们这样抄袭正好证明他们自己的思想贫乏到了极点！……“但是……决议的第二部分却比卢卑克党代表大会更严格地限制了批评自由”。

这样，“联合会”的决议就是针对俄国伯恩施坦派的了？否则，提卢卑克党代表大会岂不十分荒谬！然而，要说这个决议“严格地限制了批评自由”，那是不正确的。德国人用自己的汉诺威决议逐条拒绝了，正是伯恩施坦所作的那些修正；而在卢卑克决议中，则对伯恩施坦本

人指名提出了警告。而我们的“自由的”仿效者，却对俄国的“批评”和俄国的经济主义所特有的任何一种表现都只字不提；既然对这一切闭口不谈，那么空空洞洞地说什么理论的阶级性和革命性，就会给曲解留下更大的余地，何况“联合会”还不愿把“所谓经济主义”看作是机会主义（《两个代表大会》第8页第一条）。但这还只是顺便说说而已。而主要的是，机会主义者和革命社会民主党人的立场，在德国和在俄国是完全相反的。大家知道，在德国，革命社会民主党人主张保存现有的东西，即大家都熟悉的、已经由几十年的经验详细阐明了的原有的纲领和策略。而“批评派”则想加以改变，但由于这个批评派只是一个微不足道的少数，他们的修正主义企图又很怯懦，那就可以理解，为什么多数派只是把“革新主张”干脆否决了事。而在我们俄国，却是批评派和经济派主张保存现有的东西。“批评派”希望大家继续把他们看作马克思主义者，并且保证他们所滥用过的“批评自由”（因为他们实际上从来没有承认过任何党的联系^①，并且我们也没有一个能够“限制”、哪怕是用规劝的方法来“限制”批评

① 单是缺少公开的党的联系和党的传统这一事实，就构成了俄国和德国的根本差别，这种差别必定会提醒每一个明智的社会党人不要盲目地模仿他人。从下面这个典型例子可以看出“批评自由”在俄国达到了怎样的地步。俄国的批评派布尔加柯夫先生竟谴责奥地利的批评派赫兹说：“赫兹作的结论虽然很有独立精神，但是他在这个问题〈合作社问题〉上，看来毕竟是大受自己党的意见的束缚了，他虽然在细节方面持有分歧意见，但始终不敢离开总的

自由的为大家公认的党的机关)；经济派要革命者承认“现时运动的正当性”(《工人事业》杂志第10期第25页)，即承认现存的东西的“合理性”；要“思想家”不要企图使运动“脱离”那条“由各种物质因素和物质环境的相互作用所决定”的道路(《火星报》第12号上所载的《一封来信》)；要大家承认只有进行“工人在当前条件下唯一可能进行的”斗争才是适当的，要大家承认只有“工人们目前实际进行的”斗争才是可能的(《工人思想报》附刊〔35〕第14页)。相反，我们革命的社会民主党人对于这种崇拜自发性，即崇拜“目前”现有的东西的态度表示不满；我们要求改变近年来所流行的策略，我们声明说，“在统一以前，并且为了统一，首先必须坚决而明确地划清界限”(《火星报》出版声明)②。总之，德国人坚持现有的东西，拒绝改变，而我们却要求改变现有的东西，反对崇拜这个现有的东西以及同它调和的态度。

这一个“小小的”区别，我们的“自由的”、抄袭德国人决议的专家们就没有觉察到！

原则。”(《资本主义和农业》第2卷第287页)一个政治上备受奴役的国家，千分之九百九十九的人口都由于政治上的奴性和完全不懂党的荣誉和党的联系而堕落到了极点，这样的国家里的臣民，竟傲然地责备一个宪制国家里的公民过于“受党的意见的束缚”！那么，我们的不合法组织就只好去拟订关于批评自由的决议了……

② 参看《列宁全集》第4卷第316页。——编者注

(四)恩格斯论理论斗争的意义

“教条主义、学理主义”、“党的僵化(由于强制束缚思想而必然受到的惩罚)”，就是《工人事业》杂志的那些捍卫“批评自由”的骑士们所拚命攻击的敌人。把这个问题提到日程上来，我们当然极表欢迎，不过我们还主张再补充一个问题：

谁当公断人呢？

我们面前有两个书刊出版声明：一个是《俄国社会民主党人联合会的定期机关刊物〈工人事业〉杂志的纲领》（《工人事业》杂志第1期单张），另一个是《关于恢复“劳动解放社”⁽³⁶⁾出版物的声明》。两个声明都标明是在1899年发表的，当时“马克思主义的危机”早已显现出来了。而我们看到的又是些什么呢？在第一个声明中，你们休想找到指出这个现象的地方，也找不到哪里有确切说明新的机关刊物对这个问题打算采取的立场。关于理论工作及其在目前的迫切任务问题，无论在这个纲领中，或在1901年“联合会”第三次代表大会通过的对这个纲领的补充条文中（《两个代表大会》第15—18页），都只字未提。在这整个时期内，《工人事业》杂志编辑部始终都把理论问题搁在一边，虽然这些问题是全世界一切社会民主党人都很关心的问题。

与此相反，另一个声明首先就指出了近年来人们对理论的兴趣减弱的事实，坚决要求“密切注意无产阶级革

命运动的理论方面”，并号召大家“无情地批评”我们运动中的“伯恩斯坦主义的倾向以及其他反对革命的倾向”。已经出版的几期《曙光》杂志，表明了这个纲领的执行情况。

由此可见，所谓反对思想僵化等等的响亮词句，只不过是用来掩饰人们对理论思想发展的冷淡和无能。俄国社会民主党人的例子非常明显地说明了全欧洲的普遍现象（这是德国马克思主义者也早已指出现象）：赫赫有名的批评自由，并不是用一种理论来代替另一种理论，而是自由地抛弃任何完整的和周密的理论，是折中主义和无原则性。凡是稍微了解我国运动的实际情况的人，都不能不看到，随着马克思主义的广泛传播，理论水平有了某种程度的降低。有不少理论修养很差甚至毫无理论修养的人，由于看见运动有实际意义和实际成效而加入了运动。由此可见，《工人事业》杂志得意洋洋地提出马克思的一句名言——“一步实际运动比一打纲领更重要”^①，是多么不合时宜。在理论混乱的时代来重复这句话，就如同在人家送葬时高喊“但愿你们拉也拉不完！”^[37]一样。而且上面马克思的这句话，是从他评论哥达纲领^[38]的信里摘引来的，马克思在信里**严厉地斥责了**人们在说明原则时的折中主义态度。马克思写信给党的领袖们说，如果需要联合，那么为了达到运动的具体目

① 见马克思 1875 年 5 月 5 日给威·白拉克的信（《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3 卷第 3 页）。——编者注

标，可以缔结协定，但是决不能拿原则来做交易，决不要作理论上的“让步”。马克思的意思就是这样，而我们这里却有人假借马克思的名义来竭力贬低理论的意义！

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运动。在醉心于最狭隘的实际活动的偏向同时髦的机会主义宣传结合在一起的情况下，必须始终坚持这种思想。而对俄国社会民主党来说，由于还存在三种时常被人忘记的情况，理论的意义就显得更为重要了。这三种情况就是：第一，我们的党还刚刚在形成，刚刚在确定自己的面貌，同革命思想中会危及运动、使运动离开正确道路的其他派别进行的清算还远没有结束。相反，正是在最近时期，非社会民主主义的革命派别显得活跃起来了（这是阿克雪里罗得早就对经济派说过的）。在这种条件下，初看起来似乎并不“不重要的”错误也可能引起极其可悲的后果；只有目光短浅的人，才会以为进行派别争论和严格区别各派色彩，是一种不适时的或者多余的事情。这种或那种“色彩”的加强，可能决定俄国社会民主党许许多多年的前途。

第二，社会民主主义运动就其本质来说是国际性的运动。这不仅意味着我们应当反对民族沙文主义。这还意味着在新国家里开始的运动，只有在运用别国的经验的条件下才能顺利发展。但是，要运用别国的经验，简单了解这种经验或简单抄袭别国最近的决议是不够的。为此必须善于用批判的态度来看待这种经验，并且独立地加以检验。只要想一想现代工人运动已经有了多么巨大

的成长和扩展，就会懂得，为了完成这个任务，需要有多么雄厚的理论力量和多么丰富的政治经验（以及革命经验）。

第三，俄国社会民主党担负的民族任务是世界上任何一个社会政党都不曾有过的。我们在下面还要谈到把全体人民从专制制度压迫下解放出来的这个任务所赋予我们的种种政治责任和组织责任。现在我们只想指出一点，就是**只有以先进理论为指南的党，才能实现先进战士的作用**。读者如果想要稍微具体地了解这句话的意思，就请回想一下俄国社会民主主义运动的先驱者赫尔岑、别林斯基、车尔尼雪夫斯基以及七十年代的那一批杰出的革命家；就请想想俄国文学现在所获得的世界意义；就请……只要想想这些也就足够了！

现在让我们引证一下恩格斯 1874 年谈到理论在社会民主主义运动中的意义问题时所发表的意见吧。恩格斯认为，社会民主党的伟大斗争**并不是有两种形式**（政治的和经济的），象在我国通常认为的那样，**而是有三种形式，同这两种斗争并列的还有理论的斗争**。他对实践上和政治上都已经巩固的德国工人运动的嘱咐，从现代各种问题和争论的观点来看是非常有教益的，因此我们希望读者不要因为我们从那部早已成了非常罕见的珍本书的《德国农民战争》^①的序言中，摘引很长一段话而埋怨

① 1875 年莱比锡第 3 版，合作书局发行。

我们：

“德国工人同欧洲其他国家工人比较起来，有两大优越之处。第一，他们属于欧洲最有理论修养的民族，他们保持了德国那些所谓‘有教养的’阶级几乎完全丧失了的理论感。如果不是先有德国哲学，特别是黑格尔哲学，那么德国科学社会主义，即过去从来没有过的唯一的科学社会主义，就决不可能创立。如果工人没有理论感，那么这个科学社会主义就决不可能象现在这样深入他们的血肉。这个优越之处无限重大，从以下的事实就可以看出：一方面，英国工人运动虽然单个行业有很好的组织，但是前进得非常缓慢，其主要原因之一就是对于一切理论的漠视；另一方面，法国人和比利时人由于原有形式的蒲鲁东主义的传播而发生混乱和动摇，西班牙人和意大利人则由于被巴枯宁滑稽化了的蒲鲁东主义的传播而发生混乱和动摇。

第二个优越之处，就是德国人参加工人运动，差不多比各国人都迟。德国的理论上的社会主义永远不会忘记，它是依靠圣西门、傅立叶和欧文这三位思想家而确立起来的。虽然这三位思想家的学说含有十分虚幻和空想的性质，但他们终究是属于一切时代最伟大的智士之列的，他们天才地预示了我们现在已经科学地证明了其正确性的无数真理。同理论上的社会主义一样，德国的实践的工人运动也永远不应当忘记，它是依靠英国和法国的运动而发展起来的，它能够直接利用英国和法国的运

动用很高的代价换来的经验，而在现在避免它们当时往往无法避免的那些错误。如果没有英国工联运动和法国工人政治斗争的榜样，如果没有特别是巴黎公社所给予的那种巨大的推动，我们现在会处在什么境地呢？

必须承认，德国工人非常巧妙地利用了自己地位的有利之处。自从有工人运动以来，斗争是第一次在其所有三方面——理论方面、政治方面和实践经济方面（反抗资本家）互相配合，互相联系，有计划地进行着。德国工人运动所以强大有力和不可战胜，也正是由于这种可以说是向心的攻击。

一方面由于德国工人具有这种有利的地位，另一方面由于英国工人运动具有岛国的特点，而法国工人运动又受到暴力的镇压，所以现在德国工人是处于无产阶级斗争的前列。事实究竟容许他们把这种光荣地位占据多久，这是不能预先断言的。但是，可以相信，只要他们还占据这个地位，他们就能很好地执行这个地位所加给他们的种种责任。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在斗争和鼓动的各个方面都加倍努力。特别是领袖们有责任越来越透彻地理解种种理论问题，越来越多地摆脱那些属于旧世界观的传统词句的影响，而时时刻刻地注意到：社会主义自从成为科学以来，就要求人们把它当作科学看待，就是说，要求人们去研究它。必须以高度的热情把由此获得的日益明确的意识传布到工人群众中去，必须日益加强团结党组织和工会组织……

……假使德国工人将来还是同样地前进，那么虽然不能说他们一定会走在运动的前列（只是某一个国家的工人走在运动的前列，这并不符合运动的利益），但是一定会在战士的行列中占据一个光荣的地位；而将来如果有意外严重的考验或者伟大的事变要求他们表现出更大的勇气、更大的决心和毅力的时候，他们一定会有充分的准备。”^①

恩格斯的话果然有先见之明。几年之后，德国工人遇到了反社会党人非常法这样意外的严重考验。而德国工人确实是有充分准备地迎接了这次考验，并且胜利地通过了这次考验。

俄国无产阶级将要遇到更加无比严重的考验，将要同凶猛的怪物作斗争，宪制国家中的非常法同这个怪物比较起来，真是小巫见大巫。历史现在向我们提出的当前任务，是比其他任何一个国家的无产阶级的一切当前任务都更革命的任务。实现这个任务，即摧毁这个不仅是欧洲的同时也是（我们现在可以这样说）亚洲的反动势力的最强大的堡垒，就会使俄国无产阶级成为国际革命无产阶级的先锋队。而我们有理由指望，只要我们能够用我们的先驱者七十年代的革命家那种献身的决心和毅力，来鼓舞我们的比当时更广阔和更深刻千百倍的运动，我们就一定能够获得我们的先驱者在当时已经享有的这

^① 列宁摘译自恩格斯《德国农民战争》一书第二版序言的补充（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300—302页）。——编者注

个光荣称号。

二

群众的自发性和社会民主党的自觉性

我们说，必须用七十年代的那种献身的决心和毅力，来鼓舞我们的比那时更广阔和更深刻得多的运动。的确，直到现在，似乎还没有人怀疑过：当前运动的力量在于群众（主要是工业无产阶级）的觉醒，而它的弱点却在于身为领导者的革命家缺乏自觉性和首创精神。

但是，最近有人作了一个惊人的发现，大有把至今对这个问题的一切流行观点全部推翻之势。作出这个发现的是《工人事业》杂志，它在同《火星报》和《曙光》杂志进行论战的时候，不仅提出局部性的反驳，而且力图把“总的意见分歧”归结到更深的根源上去，即归结为“对自发因素和自觉的‘有计划’因素相比哪个意义大，有不同的估计”。《工人事业》杂志提出的指责是：“轻视发展过程中的客观因素或自发因素的意义”^①。对此我们回答说：如果说同《火星报》和《曙光》杂志的论战，只是促使《工人事业》杂志想到这个“总的意见分歧”，而完全没有产生任何其他的结果，那么单是这个结果也就使我们很满意了，因为这句话的含义很深，它把俄国社会民主党人之间当

^① 1901年9月《工人事业》杂志第10期第17页和第18页。着重号是《工人事业》杂志编者加的。

前在理论上和政治上的意见分歧的全部实质都非常清楚地点明了。

正因为如此，自觉性同自发性的关系问题引起了人们极大的普遍的关注，对这个问题应当十分详细地加以讨论。

(一) 自发高潮的开始

我们在前一章中已经指出，九十年代中期俄国有教养的青年醉心于马克思主义理论是**很普遍的**。大约同一时期，在有名的1896年彼得堡工业战争^[39]之后，工人罢工也带有同样的普遍性。工人罢工遍及全俄，清楚地证明了重新高涨起来的人民运动的深度；假使要说什么“自发因素”，那么首先当然应当承认，正是这种罢工运动是自发的。但自发性和自觉性也有不同。在七十年代和六十年代（甚至在十九世纪上半叶），俄国都发生过罢工，与此同时还有“自发地”毁坏机器等等的现象。同这些“骚乱”比较起来，九十年代的罢工甚至可以称为“自觉的”罢工了，可见工人运动在这个时期的进步是多么巨大。这就向我们表明：“自发因素”实质上无非是自觉性的**萌芽状态**。甚至原始的骚乱本身就已表明开始有了某种程度的自觉性，因为工人已经不象历来那样相信压迫他们的那些制度是不可动摇的，而开始感觉到，还不能说是理解到，必须进行集体的反抗，坚决地抛弃奴隶般的顺从上司的态度。但这种行为多半是绝望和报复的表现，还不能

说是**斗争**。九十年代的罢工所表现出来的自觉色彩就多得多了，这时已经提出一定的要求，事先考虑什么样的时机较为有利，并且讨论别处发生的一些事件和实例，等等。如果说骚乱不过是被压迫人们的一种反抗，那么有计划的罢工就已经是阶级斗争的萌芽，但也只能说是一种萌芽。所有这些罢工本身都是工联主义的斗争，还不是社会民主主义的斗争；这些罢工标志着工人同厂主的对抗已经激发起来，但是工人并没有意识到而且也不可能意识到他们的利益同整个现代的政治制度和社会制度的不可调和的对立，也就是说，他们还没有而且也不可能会有社会民主主义的意识。从这个意义上讲，尽管九十年代的罢工比起“骚乱”来有了很大的进步，但仍然是纯粹自发的运动。

我们说，工人本来**也不可能有社会民主主义**的意识。这种意识只能从外面灌输进去。各国的历史都证明：工人阶级单靠自己本身的力量，只能形成工联主义的意识，即确信必须结成工会，必须同厂主斗争，必须向政府争取颁布对工人是必要的某些法律，如此等等。^①而社会主义学说则是由有产阶级的有教养的人即知识分子创造的哲学的、历史的和经济的理论中发展起来的。现代科学社

① 工联主义决不象人们有时认为的那样排斥一切“政治”。工联一向都是进行一定的（但不是社会民主主义的）政治鼓动和斗争的。关于工联主义政治和社会民主主义政治之间的区别，我们将在下一章里加以说明。

会主义的创始人马克思和恩格斯本人，按他们的社会地位来说，也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俄国的情况也是一样，社会民主党的理论学说也是完全不依赖于工人运动的自发增长而产生的，它的产生是革命的社会主义知识分子的思想发展的自然和必然的结果。到我们现在所讲的这个时期，即到九十年代中期，这个学说不仅已经成了“劳动解放社”的完全固定的纲领，而且已经把俄国大多数革命青年争取到自己方面来了。

由此可见，当时既有工人群众的自发的觉醒，趋向自觉生活和自觉斗争的觉醒，又有一些用社会民主党的理论武装起来而竭力去接近工人的革命青年。这里特别要指出那个常常被人忘记的（也是不大有人知道的）事实，就是这个时期的**第一批社会民主党人，在热心地从事经济鼓动**（而且在这方面他们充分注意到了当时还是抄本的小册子《论鼓动》〔40〕中那些真正有益的指示）的同时，不仅没有把经济鼓动当作自己唯一的任务，而且相反，**一开始就提出了整个俄国社会民主党的最广泛的历史任务，特别是推翻专制制度的任务**。例如，创立了“工人阶级解放斗争协会”〔41〕的那些彼得堡的社会民主党人，早在1895年底就编好了定名为《工人事业报》的创刊号。但是这个准备好要付印的创刊号，在1895年12月8日夜裡突然被宪兵从一个会员阿·亚·瓦涅也夫^①那里搜走了，于

① 阿·亚·瓦涅也夫曾在拘留所被单独拘禁，因患肺病于1899年在西伯利亚东部去世。所以，我们认为可以把正文中所引证的情

是第一次创办的《工人事业报》就没有能够问世。这张报纸的社论(也许过个三十年, 会有一家象《俄国旧事》〔42〕那样的杂志把它从警察署档案中找出来)说明了俄国工人阶级的历史任务, 并且把争取政治自由作为首要任务。其次, 有一篇《我们的大臣们在想些什么?》的文章〔2〕, 是揭露警察摧残识字运动委员会的; 此外, 还有许多不仅从彼得堡, 并且从俄国其他地方寄来的通讯(如记载雅罗斯拉夫里省工人流血事件的通讯)。可见, 九十年代俄国社会民主党人所作的这个可以说是“初次的尝试”, 并不是要办一个狭隘的地方性的报纸, 更不是“经济主义”性质的报纸, 而是要办一个想把罢工斗争同反专制制度的革命运动结合起来的, 吸引当时一切受反动黑暗政治压迫的人来支持社会民主党的报纸。凡是稍微知道一点运动实况的人都不会怀疑, 这样的报纸一定能够既获得首都工人又获得革命知识分子的完全同情, 并且会得到极广泛的传播。而这件事没有办成只是证明, 当时的社会民主党人由于革命经验和实际修养不够而不能适应形势的迫切要求。《圣彼得堡工人小报》〔43〕也是如此; 《工人报》以及 1898 年春季成立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所发表的《宣言》〔44〕更是如此。当然, 我们根本没有想到把这种缺

况公布出来, 对于这些情况的确实性, 我们可以担保, 因为这些消息是从直接了解并最熟悉阿·亚·瓦涅也夫的情况的人们那里得来的。

〔2〕 见《列宁全集》第 2 卷第 65—68 页。——编者注

乏修养归罪于当时的活动家。但是，为了利用运动的经验，并且从这个经验中吸取实际的教训，我们必须充分认识各种缺点的原因和意义。因此极为重要的是要明确，一部分（也许甚至是大多数）在1895—1898年间活动的社会民主党人认为，在那个时候，即“自发”运动一开始的时候，就可以提出极其广泛的纲领和战斗策略^①，这是完全正确的。至于大多数革命家缺乏修养，则是很自然的现象，不应引起什么特别的忧虑。既然任务提得正确，有不屈不挠地试图实现这些任务的毅力，那么暂时的失利就不过是一种小小的不幸。革命经验和组织才能是可以学到的东西。只要有养成这些必要品质的愿望就行！只要能认识到缺点就行，因为在革命事业中，认识到缺点就等于改正了一大半！

可是，当这种认识开始模糊的时候（这种认识在上

① “《火星报》对九十年代末的社会民主党人的活动抱否定态度，而忽略了那个时候除了为细小的要求而斗争之外没有条件进行别的工作”——经济派在他们《给俄国各社会民主党人机关刊物的一封信》（《火星报》第12号）中这样说道。正文中所援引的事实证明，所谓“没有条件”的说法是同真实情况绝对相反的。不仅在九十年代末，即使在九十年代中期，除了为细小的要求而斗争之外，进行别的工作所需要的一切条件也是完全具备了，当时只是领导者缺乏足够的修养。“经济派”不公开承认我们这些思想家、我们这些领导者缺乏修养的事实，却想把一切都归咎于“没有条件”，归咎于物质环境的影响，而物质环境决定着运动的道路，任何思想家都不能使运动脱离这条道路。试问，这不是屈从自发性是什么？这不是“思想家”酷爱自己的缺点是什么？

面提到的那些活动家中本来是很明确的),当有一部分人,甚至有些社会民主党人的机关刊物,竟想把缺点推崇为美德,甚至想从理论上论证自己对自发性的屈从和崇拜时,这个小小的不幸可就成为了真正的大不幸了。对于这个派别,用“经济主义”这一过于狭隘的概念来说明它的内容是很不确切的,现在该是做总结的时候了。

(二)对自发性的崇拜。《工人思想报》

在讲到这种对自发性的崇拜在书刊上的种种表现之前,我们先要指出下面一个很能说明问题的事实(这是我们从上面所说过的那些人那里知道的),根据这个事实多少可以看出,俄国社会民主党内后来的两派之间的纠纷在彼得堡活动的同志们中是怎样产生和发展起来的。1897年初,阿·亚·瓦涅也夫和他的几个同志,在流放之前,参加了一次非正式会议⁽⁴⁵⁾,到会的有“工人阶级解放斗争协会”中的“老年派”会员和“青年派”会员。当时谈的主要是组织问题,特别是关于《工人储金会章程》问题,这个章程的定稿发表在《〈工作者〉小报》⁽⁴⁶⁾第九、十期合刊上(第46页)。在“老年派”(彼得堡的社会民主党人当时开玩笑地把他们叫作“十二月党人”⁽⁴⁷⁾)和一部分“青年派”(他们后来积极参加了《工人思想报》的工作)之间,一下子就暴露出了尖锐的意见分歧,发生了激烈的争论。“青年派”拥护的就是后来发表的那个章程的主要原则。

“老年派”说，我们首先需要的决不是这个，而是加强“斗争协会”，使它成为革命家的组织，并且使各种工人储金会以及在青年学生中进行宣传的那些小组等等都受它的领导。显然，争论的人们完全没有想到这个意见分歧就是分道扬镳的开端，恰恰相反，他们认为这是极个别的和偶然的意见分歧。可是这个事实表明，即使在俄国，“经济主义”的产生和泛滥也并不是没有经过同“老年派”社会民主党人的斗争的（现在的经济派往往忘记了这一点）。至于这个斗争多半没有留下“文件的”痕迹，唯一的原因是当时进行活动的各个小组的成员变动极其频繁，没有任何继承性，因此意见分歧也就没有用任何文件记载下来。

《工人思想报》的出现使经济主义暴露出来了，但这也不是一下子暴露的。必须具体地设想一下当时俄国许许多多小组的工作条件及其生命的短促（而只有亲身经历过的人，才能具体地想象出这种情况），才能懂得新派别在各个城市里成败的偶然因素是很多的，才能懂得为什么这个“新”派别的拥护者也好，反对者也好，都长时间不能断定，并且简直是根本无法断定这究竟真是一种特殊的派别呢，或者只是个别人缺乏修养的表现。比如《工人思想报》头几号的胶印版，甚至绝大多数社会民主党人都完全不知道，而我们现在所以能够引用《工人思想报》创刊号上的社论，只是因为弗·伊一申的文章（《〈工人思想报〉小报》第9—10期合刊第47页及以下各页）中转引

了这篇社论，而弗·伊一申自然没有放过这个机会来热心地——狂热地——夸奖这个同上面我们所说的各种报纸以及准备出版的报纸大不相同的新报纸。^①而这篇社论却是值得谈一谈的，因为它把《工人思想报》和整个经济主义的**全部精神**都极其明显地表现出来了。

社论指出穿蓝色袖口衣服的人^②阻止不了工人运动的发展，接着写道：“……工人运动如此富有生命力，是因为工人终于从领导者手里夺回了自己的命运，由自己来掌握了”，并且把这个基本论点进一步作了详细的发挥。其实，领导者（即社会民主党人，“斗争协会”的组织者）可以说是被警察从工人手中夺去的^③，但事情却被说成是工人同这些领导者作过斗争而摆脱了他们的束缚！人们不去号召前进，号召巩固革命组织和扩大政治活动，而去号召**后退**，号召专作工联主义的斗争。说什么“由于力求时刻牢记政治理想而对运动的经济基础模糊了”，说什么

① 这里顺便提一下：弗·伊一申夸奖《工人思想报》是在1898年11月，当时经济主义，特别是在国外，已经完全形成了，就是这位弗·伊一申，很快就成了《工人事业》杂志的一个编辑。而《工人事业》杂志当时却否认俄国社会民主党内存在两派的事实，而且直到现在还在否认这个事实！

② 指沙皇警察。当时沙皇警察穿蓝色袖口的制服。——编者注

③ 从下面一个明显的事实中，可以看出这种比拟是恰当的。这个事实就是：在“十二月党人”遭到逮捕之后，什吕谢尔堡大街的工人中间流传着一个消息，说这次遭到破坏是由一个同“十二月党人”的某个外围团体有密切联系的奸细尼·尼·米哈伊洛夫（牙科医生）促成的，于是这些工人非常愤慨，决定要杀死米哈伊洛夫。

工人运动的座右铭是“为改善经济状况而斗争”(1),或者说得更好一些,是“工人为工人”。说什么罢工储金会“对于运动比上百个其他的组织更有价值”(请把1897年10月说的这段话和1897年初“十二月党人”同青年派的争论比较一下吧),如此等等。所谓我们应当着重注意的不是工人中间的“精华”,而是“中等的”即普通的工人,以及所谓“政治始终是顺从于经济的”^①等等之类的话,已经成为一种时髦的论调,并且对许多青年产生了极大的影响,而这些青年往往只是从合法书刊上的论述中知道马克思主义的一些片断而被吸引到运动里来的。

这表明,自觉性完全被自发性压倒了,而这种自发性出自那些重复瓦·沃·先生的“思想”的“社会民主党人”,出自一部分工人,这些工人听信以下的说法:每个卢布工资增加一戈比,要比任何社会主义和任何政治都更加实惠和可贵;工人要进行“斗争是因为他们知道,斗争不是为了什么将来的后代,而是为了自己本人和自己的儿女”(《工人思想报》创刊号的社论)。这类词句是西欧资产者向来爱用的武器,他们因仇视社会主义而亲自动手

① 这也是从《工人思想报》创刊号的那篇社论中摘录下来的。根据这一点就可以断定,这些“俄国社会民主党中的瓦·沃·”(48)的理论修养究竟怎样。当马克思主义者正在书刊上同这位早已因**这样**理解政治与经济的相互关系而得到了“干反动勾当的能手”这个雅号的真正的瓦·沃·先生作战的时候,这些“俄国社会民主党中的瓦·沃·”却在重复这种把“经济唯物主义”粗暴地庸俗化的论调!

(如德国的“社会政治家”希尔施)把英国的工联主义移植到本国土地上来,向工人说,纯粹工会的斗争^①就是为了自己本人和自己的儿女,而不是为了什么未来的后代和什么未来的社会主义。而“俄国社会民主党中的瓦·沃·”现在也来重复这些资产阶级的词句了。这里必须指出三种情况,这些情况对往下分析**当前的意见分歧**^②是很有用处的。

第一,我们上面所指出的那种自觉性被自发性压倒的现象,也是**自发地**发生的。这好象是在玩弄辞藻,但可惜这是一个令人痛心的真实情况!这种现象的发生,并不是由于两种完全相反的观点进行了公开的斗争,一种观点战胜了另一种观点,而是由于“老年派”革命家越来越多地被宪兵“夺去”,而“俄国社会民主党中的瓦·沃·”“青年派”越来越多地登上舞台。姑且不谈亲身参加过**当前**俄国运动的人,就是任何闻到过运动气味的人也十分清楚,事实正是这样。然而,我们特别坚持要读者彻底弄清这个众所周知的事实,我们为了明确起见而引用有关第一次创办的《工人事业报》以及1897年初“老年派”同

① 德国人甚至有“Nur-Gewerkschaftler”这样一个专门名词,意思是:主张纯粹工会斗争的人。

② 我们强调**当前的**,是要请这样一些人注意,这些人会伪善地耸耸肩膀说:现在斥责《工人思想报》是很容易的,不过这是早已过去的事了!我们回答当前这些伪君子说:这里暗指的就是你。关于这些伪君子完全被《工人思想报》的思想所征服的事实,我们将在下面加以**证明**。

“青年派”争论的材料，是因为有些标榜自己有“民主作风”的人，总是利用广大公众（或者很年轻的青年们）不知道这个事实来投机取巧。关于这个问题，我们下面还要讲到。

第二，根据经济主义最初在书刊上的表现，我们就可以看见一种极其独特而且最能使我们了解当前社会民主党人队伍中的各种意见分歧的现象，这就是那些主张“纯粹工人运动”的人，崇拜与无产阶级斗争保持最密切的、最“有机的”（《工人事业》杂志的说法）联系的人，反对任何非工人的知识分子（哪怕是社会主义的知识分子）的人，为了替自己的立场辩护，竟不得不采用**资产阶级“纯粹工联主义者”**的论据。这个事实向我们表明：《工人思想报》一开始就已经着手（不自觉地）实现《信条》这一纲领。这个事实表明（这是《工人事业》杂志始终不能了解的）：对工人运动自发性的**任何崇拜**，对“自觉因素”的作用即社会民主党的作用的任何轻视，**完全不管轻视者自己愿意与否，都是加强资产阶级思想体系对工人的影响**。所有那些说什么“夸大思想体系的作用”^①，什么夸大自觉因素的作用^②等等的人，都以为工人只要能够“从领导者手里夺回自己的命运”，纯粹工人运动本身就能够创造出而且一定会创造出一种独立的思想体系。但这是极大的错误。为了补充我们以上所说的话，我们还要引用

① 《火星报》第12号上发表的“经济派”的来信。

② 《工人事业》杂志第10期。

卡·考茨基谈到奥地利社会民主党的新纲领草案时所说的下面一段十分正确而重要的话^①。

“在我们那些修正主义批评派中，有许多人以为马克思似乎曾经断言经济发展和阶级斗争不仅造成社会主义生产的条件，而且还直接产生认识到社会主义生产是必要的那种意识（着重号是卡·考茨基加的）。于是这些批评派就反驳道，资本主义最发达的英国，对这种意识却是最陌生的。根据草案可以想见：被人用上述方式驳倒的这一冒充正统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奥地利纲领的起草委员会也是赞成的。草案上写道：‘资本主义的发展越是使无产阶级的人数增加，无产阶级也就越是不得不进行反对资本主义的斗争，并且也越有可能来进行这个斗争。无产阶级就会意识到’社会主义的可能性和必要性。这样一来，社会主义意识就成了无产阶级阶级斗争的必然的直接的结果。但这种观点是完全不正确的。当然，社会主义这种学说，也同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一样，根源在于现代经济关系，也同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一样：是从反对资本主义所引起的群众的贫穷和困苦的斗争中产生的，但社会主义和阶级斗争是并列地产生的，而不是一个从另一个中产生出来，它们是在不同的前提下产生的。现代社会主义意识，只有在深刻的科学知识的基础上才能产生出来。其实，现代的经济科学，也象现代的技术（举例来说）一样，是社会主义生产的条件，尽管无产阶级怀有极其强烈的愿望，它却不能创造出现代的经济科学，也不能创造出现代的技术；这两种东西都是从

① 《新时代》〔49〕第20年卷（1901—1902）第1分卷第3期第79页。
卡·考茨基谈到的纲领起草委员会的草案，由维也纳代表大会（去年年底）稍加修改后通过〔50〕。

现代社会发展过程中产生出来的。但掌握科学的人并不是无产阶级，而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着重号是卡·考茨基加的），因为现代社会主义就是在这一阶层的个别人物的头脑中产生的，他们把这个学说传授给才智出众的无产者，后者又在条件许可的地方把它灌输到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中去。可见，社会主义意识是一种从外面灌输（von Aussen Hineingetragen）到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中去的**东西**，而不是一种从这个斗争中自发地（urwüchsig）产生出来的东西。因此，旧海因菲尔德纲领说得非常正确：社会民主党的任务就是把认清无产阶级的地位及其任务的这种**意识**灌输到无产阶级中去（直译就是：充实无产阶级）。假使这种意识会自然而然地从阶级斗争中产生出来，那就没有必要这样做了。新草案接受了旧纲领中的这个原理，而把它勉强附加到上面所引的那个原理上去。但是这样一来，道理就讲不通了……”

既然谈不到有独立的、工人群众在其运动进程中自己创立的思想体系^①，那么问题只能是**这样**：或者是资产

① 这当然不是说工人不参加创立思想体系的工作。但他们不是以工人的身分来参加，而是以社会主义理论家的身分、以蒲鲁东和魏特林一类人的身分来参加的，换句话说，只有当他们能在某种程度上掌握他们那个时代的知识并把它向前推进的时候，他们才能在相应的程度上参加这一工作。为了使工人能**更多地做到这一点**，就必须尽量设法提高全体工人的觉悟水平，就必须使他们不要自己局限于阅读被人为地缩小了的“**工人读物**”，而要越来越多地学习领会**一般读物**。更正确些说，不是“自己局限于”，而是被局限于，因为工人自己是在阅读并且也愿意去阅读那些写给知识分子看的读物，而只有某些（坏的）知识分子，才认为“对于工人”只要讲讲有关工厂制度的情形，反复地咀嚼一些大家早已知道的东西就够了。

阶级的思想体系，或者是社会主义的思想体系。这里中间的东西是没有的（因为人类从来没有创造过任何“第三种”思想体系，而且在为阶级矛盾所分裂的社会中，任何时候也不可能有非阶级的或超阶级的思想体系）。因此，对社会主义思想体系的**任何轻视和任何脱离**，都意味着资产阶级思想体系的加强。人们经常谈论自发性，但工人运动的**自发的**发展，就恰恰导致运动受资产阶级思想体系的支配，**恰恰是按照《信条》这一纲领进行的**，因为自发的工人运动就是工联主义的、也就是纯粹工会的运动，而工联主义正是意味着工人受资产阶级的思想奴役。因此，我们社会民主党的任务就是要**反对自发性**，就是要**使工人运动脱离**这种投到资产阶级羽翼下去的工联主义的自发趋势，而把它吸引到革命的社会民主党的羽翼下来。《火星报》第十二号上发表的那封“经济派”的来信的作者们说什么无论最热心的思想家怎样努力，终究不能使工人运动脱离那条由物质因素和物质环境的相互作用所决定的道路，这种说法**完全等于抛弃社会主义**；如果这些作者能够把自己所说的话大胆而透彻地通盘思考一番，正如每个从事著作和社会活动的人都应当这样来仔细思考自己的见解一样，那他们就只好“把一双没用的手交叉在空虚的胸前”，而……而把阵地让给司徒卢威和普罗柯波维奇之流的先生们，由他们把工人运动拉到“阻力最小的路线上去”，即拉到资产阶级工联主义路线上去，或是把阵地让给祖巴托夫之流的先生们，由他们把工人

运动拉到神父加宪兵的“思想体系”的路线上去。

请回忆一下德国的例子吧。拉萨尔对于德国工人运动的历史功绩何在呢？就在于他使这个运动脱离了它自发地走上（在舒尔采 - 德里奇之类的人的盛情参与下）的那条进步党^[51]的工联主义和合作社主义的道路。为了执行这个任务，所需要的不是谈论什么轻视自发因素，什么过程策略，什么因素和环境的相互作用等等，而是与此完全不同的做法。为此需要同自发性进行殊死的斗争，也正是由于许多年来进行了这种斗争，比如说，柏林的工人才由进步党的支柱变成了社会民主党的最好的堡垒之一。这种斗争直到现在也远远没有结束（也许那些根据普罗柯波维奇的著述研究德国运动的历史，根据司徒卢威的著述研究德国运动的哲学的人，会认为斗争已经结束了^[52]）。直到现在，德国工人阶级可以说是分属于几种思想体系：一部分工人组织在天主教的和君主派的工会中，另一部分工人组织在崇拜英国工联主义的资产阶级分子所创立的希尔施 - 敦克尔工会^[53]中，还有一部分工人则组织在社会民主党的工会中。最后一部分工人比其余两部分工人多得多，但社会民主党的思想体系只是由于同所有其他的思想体系进行了不懈的斗争才获得了这个首位，而且也只有继续进行这种不懈的斗争，才能保持这个首位。

但是读者会问：自发的运动，沿着阻力最小的路线进行的运动，为什么就恰恰会受资产阶级思想体系的控制

呢？原因很简单：资产阶级思想体系的渊源比社会主义思想体系久远得多，它经过了更加全面的加工，它拥有的传播工具也多得**不能相比**^①。所以某一个国家中的社会主义运动越年轻，也就应当越积极地同一切企图巩固非社会主义思想体系的行为作斗争，也就应当越坚决地告诉工人提防那些叫嚷不要“夸大自觉因素”等等的蹩脚的谋士。经济派的来信的作者们和《工人事业》杂志异口同声地攻击运动在幼年时期所特有的那种不肯容忍的态度。我们回答说：不错，我们的运动确实还处在幼年状态，而为了赶快成长起来，它正应当采取不肯容忍的态度来对待那些用崇拜自发性阻碍运动发展的人。硬把自己装扮成一个早已经历过斗争中的一切重大变故的老年人，这是再可笑、再有害不过的了！

第三，《工人思想报》创刊号向我们表明，“经济主义”这个名称（我们自然不想丢开这个名称，因为这个称呼毕竟已经用惯了）并没有十分确切地表达新派别的实质。《工人思想报》并不完全否认政治斗争，因为在《工人思想

① 人们常常说：工人阶级**自发地**倾向社会主义。在下述意义上说，这是完全正确的，就是社会主义理论比其他一切理论都更深刻更正确地断定了工人阶级受苦的原因，因此工人也就很容易领会这个理论，**只要**这个理论本身不屈服于自发性，**只要**这个理论使自发性受它的支配。通常这是不言而喻的，可是《工人事业》杂志恰恰忘记和曲解了这个不言而喻的道理。工人阶级自发地倾向社会主义，然而最流行的（而且时刻以各种各样的形式复活起来）资产阶级思想体系，却自发地而又最猖狂地迫使工人接受它。

报》创刊号所刊载的那个储金会章程中，就谈到要同政府作斗争。不过《工人思想报》以为“政治始终是顺从于经济的”（《工人事业》杂志则用另一种说法来表达这个论点，它在自己的纲领中说：“在俄国，经济斗争和政治斗争比在其他国家更是分不开的”）。假使所谓的政治是指**社会民主主义的政治**，那么《工人思想报》和《工人事业》杂志的这种说法就是完全不对的。正如我们看到的，工人的经济斗争往往是同资产阶级、教权派等等的政治相联系的（尽管不是分不开的）。假使所谓的政治是指工联主义的政治，即指一切工人普遍地力求由国家采取某些措施来减轻工人的地位所固有的困苦，但不是摆脱这种地位即消灭劳动受资本支配的现象，那么《工人事业》杂志的说法就是对的。这种要求确实是敌视社会主义的英国工联会员以及天主教工人和“祖巴托夫的”工人等等所共有的。政治是有各种各样的。可见，《工人思想报》对政治斗争的态度，与其说是否定它，不如说是崇拜它的**自发性**，崇拜它的不觉悟性。《工人思想报》完全承认从工人运动本身中自发生长出来的政治斗争（正确些说：工人的政治愿望和政治要求），而完全不肯**独立地制定特殊的社会民主主义的政策**，即适合社会主义的一般任务和现代俄国条件的政策。下面我们就要指出，《工人事业》杂志所犯的错误也是这样。

(三)“自我解放社”^[54]和《工人事业》杂志

我们这样详细地分析《工人思想报》创刊号上那篇很少有人知道而且现在差不多已被遗忘的社论，是因为它最早而且最明显地表现了一个总的潮流，这个潮流后来又涌现出无数细流。弗·伊一申称赞《工人思想报》创刊号及其社论，说它写得“很尖锐，很有斗志”（《〈工作者〉小报》第9—10期合刊第49页），这是完全正确的。每一个坚信自己的意见正确，认为自己提出了某种新主张的人，写起文章来总是“很有斗志”，总是很鲜明地表达自己的观点的。只有那些惯于脚踏两只船的人才会毫无“斗志”，只有这样的人，才会昨天称赞《工人思想报》的斗志，今天却攻击该报论敌的“论战的斗志”。

我们现在且不谈《〈工人思想报〉附刊》（下面谈到各种问题时，我们还得引用这篇最彻底地表达了经济派思想的作品），而只简单地谈谈《工人自我解放社宣言》（发表于1899年3月，转载于1899年7月伦敦《前夕》杂志^[55]第7期）。这篇宣言的作者们说得很公道，“工人的俄国**还刚开始觉醒**，刚在那里举目四望并**本能地抓住最初碰到的斗争手段**”，但是他们也和《工人思想报》一样从这里得出了同一个不正确的结论，忘记了本能性也就是社会主义者应当予以帮助的那种不觉悟性（自发性），忘记了在现代社会里“最初碰到的”斗争手段总会是工联主义的斗争手段，而“最初碰到的”思想体系总会是资产阶

级的(工联主义的)思想体系。这些作者也同样不“否认”政治,不过(不过!)他们跟着瓦·沃·先生说,政治是上层建筑,所以“政治鼓动应当是为经济斗争而进行的鼓动的上层建筑,应当在经济斗争的基础上生长起来,并服从于它”。

至于说到《工人事业》杂志那么它的活动一开始就是为经济派“辩护”。《工人事业》杂志竟在它的第一期(第141—142页)上就公然撒谎,说它“不知道阿克雪里罗得”在他那本有名的小册子^①里警告经济派时“所说的究竟是哪些年青的同志”,但是在同阿克雪里罗得和普列汉诺夫因这种谎话而进行激烈争论的时候,《工人事业》杂志又不得不承认它“是想用迷惑不解的口气来替所有那些比较年青的侨居国外的社会民主党人辩护,以反驳这种不公正的责备”(即阿克雪里罗得责备经济派眼光狭小)。其实,这个责备是很公正的,并且《工人事业》杂志清楚地知道这个责备也落到了它的一位编辑弗·伊一申的头上。我想顺便指出:在上述争论中,在解释我的那本小册子《俄国社会民主党人的任务》^②时,阿克雪里罗得完全正确,而《工人事业》杂志却完全不正确。这本小册子是在1897年,在《工人思想报》还没有出版的时候写的,当时我认为并且有理由认为我上面叙述过的圣彼得堡

① 《论俄国社会民主党人的当前任务和策略问题》1898年日内瓦版。1897年写给《工人报》的两封信。

② 参看《列宁选集》第1卷第95—115页。——编者注

“斗争协会”最初的方向是占统治地位的方向。至少到1898年上半年为止，这个方向确实是占统治地位的。所以，《工人事业》杂志丝毫没有权利援引我这本小册子来否认经济主义的存在和危险，而我这本小册子上所阐述的观点却在1897—1898年间在圣彼得堡被“经济主义”观点逐步排挤掉了。^①

但是，《工人事业》杂志不仅为经济派“辩护”，而且自己也时常滑到他们的基本错误上去。所以会滑下去，是因为《工人事业》杂志的纲领中有这样一个模棱两可的论点：“我们认为近年来发生的**群众性工人运动**〈着重号是《工人事业》杂志加的〉是俄国生活中最重要的现象，这个现象基本上**将决定联合会的书刊工作的任务**〈着重号是我们加的〉和性质。”说群众性运动是最重要的现象，这是

① 《工人事业》杂志在写了头一段谎话（“我们不知道巴·波·阿克雪里罗得所说的究竟是哪些年青的同志”）之后，为了替自己辩护，又在《回答》中写出了第二段谎话：“自从我们写了对《任务》一书的书评以来，俄国某些社会民主党人中已经产生或是较为明确地形成了经济主义片面性的倾向，这种倾向同《任务》一书描绘的我国运动的状况相比，就是后退了一步。”（第9页）1900年出版的《回答》是这样说的。但《工人事业》杂志第一期（即登载有书评的那一期）是在1899年4月出版的。难道经济主义1899年才产生出来吗？不，1899年俄国社会民主党人就初次对经济主义提出了抗议（即对《信条》的抗议书）。经济主义是在1897年产生的，《工人事业》杂志分明知道这一点，因为弗·伊一申早在1898年11月（在《工作者》小报》第9—10期合刊上）就称赞过《工人思想报》了。

无可争辩的。但是整个问题就在于怎样理解这个群众性运动“决定任务”这句话。对于这句话可以有两种理解：**或者是**理解为崇拜这个运动的自发性，即把社会民主党的作用降低为专替这个工人运动当听差（《工人思想报》、“自我解放社”以及经济派的其他人就是这样理解的）；**或者是**理解为群众性运动向我们提出了理论上、政治上和组织上的**新任务**，这些任务要比群众性运动产生以前可以使我们感到满足的那些任务复杂得多。《工人事业》杂志过去和现在都正是倾向于前一种理解，因为它根本没有明确地讲过任何新任务，而始终都认为，似乎这个“群众性运动”使我们**不必去**清楚地认识和解决运动所提出的种种任务。为了证明这一点，只要指出下面的事实就够了：《工人事业》杂志认为不可能把推翻专制制度当作群众性工人运动的**首要任务**，而把这种任务降低为（说是为了群众性运动的利益）争取实现最近的政治要求的任务（《回答》第 25 页）。

《工人事业》杂志编辑波·克里切夫斯基发表在第七期上的《俄国运动中的经济斗争与政治斗争》一文，也重复了同样的错误，^①我们暂且不谈这篇文章，而直接来谈

① 例如，在这篇文章中，政治斗争中的“阶段论”或“小心翼翼曲折前进”论是这样论述的：“政治要求按其性质是全俄共同的，但是在最初的时候（这是在 1900 年 8 月写的！）应当适合于该工人阶层（原文如此！）从经济斗争中所获得的经验。只有（！）在这种经验的基础上才能够、才应当去进行政治鼓动”等等（第 11 页）。在第

《工人事业》杂志第十期。我们当然不准备去分析波·克里切夫斯基和马尔丁诺夫反驳《曙光》杂志和《火星报》的各条意见。我们感兴趣的只是《工人事业》杂志在第十期上所持的原则立场。我们不想去分析，比如说《工人事业》杂志发现下面两种提法是“绝对矛盾”的这种笑话。

一种提法是：

“社会民主党不能用某种事先想好的政治斗争的计划或方法来束缚自己的手脚，缩小自己的活动范围。它承认一切斗争手段，只要这些手段同党的现有力量相适应”等等。（《火星报》创刊号）^②

另一种提法是：

“没有一个在任何环境和任何时期都善于进行政治斗争的坚

4 页上，作者反驳了那种在他看来是毫无理由的、说他们宣传经济主义邪说的斥责，他慷慨激昂地喊道：“根据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学说，各个阶级的经济利益在历史上起决定作用，所以，无产阶级为自己的经济利益而进行的斗争对它的阶级发展和解放斗争也应当有首要的意义。试问哪一个社会民主党人不知道呢？”（着重号是我们加的）这“所以”一词是用得完全不恰当的。根据经济利益起决定作用这一点，**决不当作出经济斗争（等于工会斗争）具有首要意义的结论**，因为总的说来，各阶级最重大的、“决定性的”利益**只有通过根本的政治改造来满足**，而具体说来，无产阶级的基本经济利益只能通过无产阶级专政代替资产阶级专政的政治革命来满足。波·克里切夫斯基所重复的是“俄国社会民主党中的瓦·沃·”的议论（即政治服从于经济等等），以及德国社会民主党中的伯恩施坦派的议论（例如沃尔特曼正是用这种议论来证明工人应当首先获得“经济力量”，然后才能考虑政治革命）。

② 参看《列宁选集》第 1 卷第 211 页。——编者注

强的组织，就谈不到具有坚定原则的和坚持不懈地执行的系统的行动计划，而只有这样的计划才配称为策略。”（《火星报》第4号）①

原则上承认一切斗争手段、一切计划和方法（只要它们是适当的）是一回事，要求在一定的政治局势下遵循一个坚持不懈地执行的计划（如果想谈策略的话）是另一回事；把这两者混为一谈，那就等于把医学上承认各种疗法同要求在医治某种病症时采用一定的疗法混为一谈。可是问题也就在于《工人事业》杂志自己得了我们称之为崇拜自发性的病症，却不愿承认医治这个病症的任何“疗法”。因此它就作出了一个了不起的发现：“计划策略是同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精神相矛盾的”（第10期第18页），策略是“党的任务随着党的发展而增长的过程”（第11页，着重号是《工人事业》杂志加的）。后面这一句话很有希望成为一句名言，成为“《工人事业》派”的一座不朽的纪念碑。对于“往何处去？”这个问题，指导性的机关刊物所作的回答是：运动是运动的起点同它下面一点之间的距离改变的过程。可是，这种无比深奥的议论并不只是一个笑话（如果是这样，那就不值得特别来讲了），而且是整个派别的纲领**；尔·姆·在《工人思想报》附刊》上把这个纲领表述如下：最合适的斗争就是可能进行的斗争，而可能进行的斗争就是目前正在进行的斗争。这正是消极地迁就自发性的极端机会主义派别。**

① 参看《列宁全集》第5卷第2页。——编者注

“计划策略是同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精神相矛盾的！”这真是对马克思主义的诬蔑，是把马克思主义变成了讽刺画，正如民粹派在同我们论战时所做的那样。这就是贬低自觉的活动家的首创精神和毅力，而马克思主义却与此相反，它大大推动社会民主党人的首创精神和毅力，给他们开辟最广阔的前景，把“自发地”起来进行斗争的工人阶级中千百万人的强大力量交给（假使可以这样说的话）他们指挥！国际社会民主党的全部历史充满着时而这个政治领袖时而那个政治领袖提出的计划，证实了某个领袖所持的政治观点和组织观点的远见和正确，暴露了另一个领袖的近视和政治错误。当德国遇到建立帝国、成立帝国国会、赐予普选权这种极大的历史转变时，李卜克内西提出了一个关于社会民主党的政策和整个工作的计划，而施韦泽则提出了另一个计划。当德国社会党人遭到非常法的打击时，莫斯特和哈赛尔曼提出了一个计划，打算干脆号召采用暴力和恐怖手段；赫希伯格、施拉姆以及伯恩施坦（部分参与）则提出另一个计划，他们向社会民主党人宣传说，由于社会民主党人自己过分激烈和过分革命才招来了非常法，所以现在应当以模范行为来求得宽恕；当时那些筹备并出版了秘密机关报的人则提出了第三个计划。在选择道路问题引起的斗争已经结束，历史对所选定的道路的正确性已经下了最后的定论以后过了许多年，回顾往事，发表深奥的议论，说什么党的任务随着党的发展而增长，这当然是容易的。但

是在目前这个混乱时期^①，当俄国的“批评派”和经济派把社会民主主义运动降低为工联主义运动，而恐怖派竭力宣扬采取重蹈覆辙的“计划策略”的时候，局限于发表这种深奥的议论，那就等于“证明”自己“思想贫乏”。在目前，许多俄国社会民主党人正苦于缺乏首创精神和毅力，苦于“政治宣传、政治鼓动和政治组织工作的……规模”^②不大，苦于缺少更广泛地进行革命工作的“计划”，在这个时候，说什么“计划策略是同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精神相矛盾的”，那就不仅是在理论上把马克思主义庸俗化，而且是在实践上把党拉向后退。

《工人事业》杂志往下又教训我们说：“社会民主党人革命家的任务，只是要以本身自觉的工作来加速客观发展过程，而不是要取消客观发展过程或者以主观计划来代替它。《火星报》在理论上是知道这一切的。但是，由于《火星报》对策略持有一种学理主义的观点，马克思主义关于自觉的革命工作具有重大意义的正确提法，竟使《火星报》在实践上偏向于轻视发展过程中的客观因素或自发因素的意义。”（第18页）

这又是瓦·沃·先生及其伙伴们才会有的一种极大的理论混乱。我们要问问我们的这位哲学家：主观计划的制订者对客观发展过程的“轻视”，可能表现在什么地

① 梅林所著《德国社会民主党史》一书中有一章标题为《混乱的一年》，在这一章内他描写了社会党人在选择适合新环境的“计划策略”时起先所表现的那种动摇和犹豫。

② 摘自《火星报》创刊号的社论。（见《列宁选集》第1卷第210页。——编者注）

方呢？显然表现在他会忽略这个客观发展过程正在产生或巩固、毁灭或削弱某些阶级、某些阶层、某些集团、某些民族、某些民族集团等等，从而决定国际上各种力量的政治划分以及各个革命政党的立场，等等。如果是这样，那么这些计划制订者的过错就不是轻视自发因素，相反地，却是轻视**自觉**因素，因为他缺乏正确了解客观发展过程的“自觉性”。可见，谈论什么对自发性和自觉性“**相比**〈着重号是《工人事业》杂志加的〉哪个意义大的估计”，仅仅这一点就已经暴露出完全没有“自觉性”。假如说某些“发展过程中的自发因素”是人的意识所能觉察到的，那么对这种自发因素的不正确估计，就等于“轻视自觉因素”。假如说这种因素是人的意识所不能觉察到的，那我们就不知道这种因素，也无法加以谈论了。波·克里切夫斯基所讲的究竟是什么呢？假使他认为《火星报》的“主观计划”是错误的（而他正是宣布这些计划是错误的），那他就应当指明这些计划究竟忽略了哪些客观事实，就应当因这种忽略而责备《火星报》**缺乏自觉性**，用他的说法，就是“轻视自觉因素”。假使他不同意主观计划，除了援引“轻视自发因素”（!!）之外又没有其他论据，那么他以此只是证明：（1）在理论上，他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也和备受别尔托夫讥笑的卡烈也夫和米哈伊洛夫斯基之流一样；（2）在实践上，他完全满足于那些把我们的合法马克思主义者引诱到伯恩施坦主义上去，而把我们的社会民主党人引诱到经济主义上去的“发展过程中的自

发因素”；并且他对那些无论如何也要使俄国社会民主党脱离“自发”发展道路的人“十分恼火”。

再往下纯粹是些滑稽可笑的话了。“正如人们不管自然科学取得什么成就而还是要用古老的方式繁殖一样，将来新社会制度的出现也会不管社会科学取得什么成就以及自觉的战士如何增加而仍然多半是自发地爆发的结果。”（第19页）古代有句妙语：要生儿养女，谁没有本事？——同样，“现代社会党人”（象纳尔苏修斯·土波雷洛夫所说的⁽⁵⁶⁾）也有一句妙语：要参与新社会制度的自发诞生，谁都有本事。我们也认为谁都有这种本事。为了参与，只要在经济主义流行时听从经济主义，在恐怖主义出现时听从恐怖主义就行了。例如，今年春天，正应当告诫大家不要醉心于恐怖手段的时候，《工人事业》杂志对这个在它看来是“新的”问题感到困惑莫解。现在，过了半年之后，当问题已经不很迫切的时候，它却一方面向我们声明说，“我们认为，社会民主党的任务不能够也不应当是阻止恐怖主义情绪的发展”（《工人事业》杂志第10期第23页），同时又向我们提出代表大会的决议，说“代表大会认为有计划的进攻性的恐怖行动是不合时宜的”（《两个代表大会》第18页）。你看，这话说得多么清楚，多么圆通！我们不去阻止它，但宣布它不合时宜，而且这样宣布的意思是说，“决议”并没有把无计划的和防御性的恐怖行动包括在内。应当承认，这样一个决议很保险，完全可以保证不犯错误，正如一个说话是为了什么也不

说的人就可以保证不犯错误一样！为了拟定这样一个决议，只要善于做运动的尾巴就行了。当《火星报》讥笑《工人事业》杂志把恐怖行动问题说成一个新问题时^①，《工人事业》杂志怒气冲冲地指责《火星报》，“把一群侨居国外的作家在十五年以前提出的那种解决策略问题的办法强加于党的组织，这简直是太狂妄了”（第24页）。的确，预先在理论上解决问题，然后设法说服组织，说服党和群众相信这个解决办法正确，——这是多么狂妄和多么夸大自觉因素啊！^②如果只是旧调重弹，不拿什么“强加于人”，对于每一次向经济主义或向恐怖主义的“转变”都唯命是从，那该多么好呀。《工人事业》杂志甚至对这一伟大的处世秘诀作了概括，责备《火星报》和《曙光》杂志“把自己的纲领同运动对立起来，把自己的纲领当作凌驾于混沌状态之上的神灵”（第29页）。难道社会民主党的作用不正是要成为“神灵”，不仅凌驾于自发运动之上，而且要把这一运动提高到“自己的纲领”的水平上去吗？它的作用当然不是做运动的尾巴，因为，如果做运动的尾巴，那么好则对运动无益，坏则对它极其有害。所谓的“工人事业”不仅追随这种“过程策略”，而且把它奉为原则，因此，与其把“工人事业”这种派别称为机会主义，倒不如（根据“尾巴”这个词）称为尾巴主义。而且不能不承

① 见《列宁全集》第5卷第5—6页。——编者注

② 同时还不要忘记，“劳动解放社”“在理论上”解决恐怖行动问题时，还总结了上次革命运动的经验。

认，下定决心要永远做运动的尾巴跟着运动走的人，是永远和绝对保证不会“轻视发展过程中的自发因素”的。

* * *

总之，我们确信，俄国社会民主党内的“新派别”的基本错误就在于崇拜自发性，就在于不了解群众的自发性要求我们社会民主党人表现巨大的自觉性。群众的自发高潮越增长，运动越扩大，对于社会民主党提高理论工作、政治工作和组织工作的自觉性的要求也就越无比迅速地增长起来。

俄国群众的自发高潮来得这样迅速（并且继续在迅速地发展），以致社会民主党的青年们对于完成这些巨大的任务显得缺乏修养。这种缺乏修养的状况是我们大家的不幸，是**全体**俄国社会民主党人的不幸。群众的高潮在连续不断地、前后相承地增长和扩大起来，不仅没有在它开始发生的地方停止，而且席卷了新的地区和新的居民阶层（在工人运动的影响下，青年学生、整个知识界以至农民都掀起了风潮）。但是革命家无论在自己的“理论”或自己的活动中，都**落后于**这个高潮，没有建立起一种不会中断的、前后相承的、能够**领导**全部运动的组织。

在第一章里，我们已经明确指出，《工人事业》杂志贬低我们的理论任务并“自发地”重复“批评自由”这一时髦口号，而重复这一口号的人缺乏“自觉性”，不了解机会主义者“批评派”的立场和革命派的立场在德国和俄国是完全相反的。

在下面几章中，我们就要来考察一下，在社会民主党的政治任务方面和组织工作中，这种对自发性的崇拜是怎样表现的。

写于 1901 年秋—1902 年 2 月
1902 年 3 月第一次用单行本刊印

选自《列宁选集》第 1 卷
第 220—269 页

注 释

〔1〕列宁的《怎么办？（我们运动中的迫切问题）》一书彻底揭示了机会主义的思想根源，指出了革命理论和社会主义觉悟的伟大意义，论证了无产阶级政党是工人运动和社会主义的结合这一马克思主义根本原理。

这本书是列宁在 1901 年底至 1902 年初写成的。1901 年 5 月，列宁写的《从何着手？》一文（见《列宁全集》第 5 卷第 1—10 页）提出了后来在《怎么办？》一书中详细发挥的建党计划的草案。他在 1901 年 12 月《火星报》第十二号上发表的《同经济主义的拥护者商榷》一文（同上，第 280—287 页）是《怎么办？》一书的大纲。1902 年 3 月初，《怎么办？》在斯图加特由狄茨出版社出版。1907 年，列宁把《怎么办？》收入《十二年来》文集时作了一些删节，并新增了几条脚注。

〔2〕《火星报》是第一个全俄马克思主义的秘密报纸，1900 年由列宁创办。《火星报》在建立俄国工人阶级革命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方面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火星报》创刊号于 1900 年 12 月 24 日在莱比锡出版，随后在慕尼黑出版，自 1902 年 4 月起在伦敦出版，自 1903 年春天起在日内瓦出版。

参加《火星报》编辑部的有列宁、格·瓦·普列汉诺夫、尤·奥·马尔托夫、巴·波·阿克雪里罗得、亚·尼·波特列索夫和维·伊·查苏利奇。

党的第二次代表大会确定由列宁、普列汉诺夫和马尔托夫组成编辑部。马尔托夫拒绝参加编辑部，因而《火星报》第四十六至五十一号是由

列宁和普列汉诺夫编辑出版的。后来，普列汉诺夫转到孟什维主义立场上去，他要求让已被代表大会否决的原全体孟什维克编辑参加《火星报》编辑部。列宁不能同意这种做法，于1903年11月1日退出了《火星报》编辑部。第五十二号是由普列汉诺夫一个人编辑出版的。1903年11月26日，普列汉诺夫擅自把以前的孟什维克编辑补进了《火星报》编辑部。从第五十二号起，孟什维克就把《火星报》变成了自己的机关报。“从这时起，党内开始有了旧《火星报》和新《火星报》的叫法，前者是指列宁的布尔什维克的《火星报》，而后者是指孟什维克的机会主义的《火星报》。”（见《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1975年人民出版社版第49页）

〔3〕1901年春，斗争社、俄国社会民主党人联合会、崩得国外委员会、“社会民主党人”组织、《火星报》和《曙光》杂志国外部等社会民主党人国外组织，就组织统一问题进行了协商。1901年6月，这些组织在日内瓦举行代表会议，筹备召开一次代表大会来解决统一问题。这次代表会议通过一项决议（《原则协议》），确认社会民主党人国外组织有必要统一，并谴责经济主义、伯恩施坦主义和米勒兰主义等机会主义。但是会后不久，俄国社会民主党人联合会的机关刊物《工人事业》杂志在1901年9月第十期刊登了波·克里切夫斯基的《原则、策略和斗争》和亚·马尔丁诺夫的《揭露性的刊物和无产阶级的斗争》两篇文章，表现了明显的机会主义倾向。联合会的第三次代表大会又对六月代表会议的决议作了机会主义的修正。在这种情况下，1901年9月21—22日（公历10月4—5日）在苏黎世召开的“统一”代表大会，没有达成协议。当时列宁化名“弗雷”参加了“统一”代表大会并发表演说（见《列宁全集》第5卷第200—204页），同机会主义作了斗争。

〔4〕《工人事业》是经济派的杂志，俄国社会民主党人国外联合会的不定期机关刊物，1899年4月至1902年2月在日内瓦出版，由波·纳·克里切夫斯基、亚·萨·马尔丁诺夫、弗·巴·伊万申担任编辑。杂志总共出了十二期，共九册。

〔5〕《工人报》是基辅社会民主党人的秘密报纸。共出版过两号：第一号在1897年8月出版；第二号在同年12月出版（报上印的日期是11月）。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一次代表大会批准《工人报》是党的正式机关报。代表大会以后，由于中央委员和《工人报》编辑部成员被捕以及警察捣毁了印刷所，已经编排好的第三号没有出版，后来该报一直没有复刊。

〔6〕拉萨尔派和爱森纳赫派是十九世纪六十年代和七十年代初期德

国工人运动中的两个派别。

拉萨尔派是斐·拉萨尔的拥护者和信徒，以1863年由拉萨尔创立的“全德工人联合会”为骨干。拉萨尔派认为可以用普鲁士反动政府资助工人合作社的办法把资本主义和平地改造为社会主义，他们主张用争取普选权的斗争和议会中的和平活动来代替工人阶级的革命斗争。

爱森纳赫派是马克思主义的拥护者，在思想上受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影响。爱森纳赫派在威·李卜克内西和奥·倍倍尔的带领下，在1869年的爱森纳赫代表大会上成立了德国社会民主工党。

这两个派别彼此进行了激烈的斗争。由于工人运动的高涨和政府迫害的加紧，两派于1875年在哥达代表大会上合并为一个统一的德国社会主义工人党。拉萨尔派是这个党里的机会主义派。

〔7〕盖得派和可能派是法国社会主义运动中的两个派别，它们是1882年在法国工人党分裂之后产生的。

盖得派是茹·盖得的拥护者，是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法国社会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其领导是盖得和拉法格。盖得派曾坚持独立的革命的无产阶级政策，1901年组成为法兰西社会党。

可能派是法国社会主义运动中的机会主义派别，以布鲁斯、马隆等人为首。这个派别的领袖们实际上反对革命的策略，他们宣布改良主义的原则，只争取“可能”争得的东西，即主张把工人阶级的活动限制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可能”办到的范围内，因此有“可能派”之称。1902年，可能派同其他一些改良主义派别一起组成了法国社会党。

1905年，法兰西社会党和法国社会党合并为一个党。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茹·盖得和法国社会党的整个领导一起转到社会沙文主义立场上去了。

〔8〕费边派是英国改良主义组织费边社的成员。费边社于1884年成立，代表人物是维伯夫妇、麦克唐纳和肖伯纳等，主要成员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费边社以古罗马统帅费边·马克西姆的名字命名。费边曾在同古迦太基统帅汉尼拔的战争中采取避开决战的待机策略，因而得到“缓进者”的绰号。费边派反对马克思关于无产阶级阶级斗争和社会主义革命的学说，鼓吹通过细微的改良来逐渐地改造社会，宣扬用所谓“地方公有社会主义”的办法使资本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

社会民主党人是指社会民主联盟的参加者。社会民主联盟是英国的社会主义组织，成立于1884年8月。这个组织联合了各种各样的社会主义

者，主要是知识分子中的社会主义者。1884年秋联盟发生分裂，左翼成立了独立的组织——社会主义同盟。1907年，联盟改组为社会民主党，1911年又与独立工党中的左派合并，命名为英国社会党。

〔9〕民意党人是民意党的成员。民意党是民粹派的组织——土地和自由社分裂后于1879年成立的秘密团体。该党把暗杀沙皇政府的个别代表人物作为主要斗争手段。在沙皇亚历山大二世被民意党人刺杀（1881年3月1日〔公历13日〕）以后不久，民意党就被沙皇政府粉碎了。在此以后，民粹派的大多数人都放弃了对沙皇制度的革命斗争，宣传同沙皇专制制度调和和妥协。十九世纪八十年代和九十年代，自由主义民粹派成了富农阶级利益的代表者。

〔10〕内阁派是机会主义的派别，因法国社会党人米勒兰参加反动内阁而得名。米勒兰于1899年参加法国反动的资产阶级政府，同镇压巴黎公社的刽子手加利费将军合作。

〔11〕据罗马神话，密纳发女神从雷神丘必特脑袋里一生下来，就头戴盔帽，身披铠甲，手执宝剑。因此，人们常常借此来比喻某人或某事一开始就完备无缺。

〔12〕见克雷洛夫的寓言《两只桶》。这则寓言说，有两只桶在路上滚。一只桶里装着酒，一声不响地向前进。另一只桶是空的，一路上轰隆隆作响，路人纷纷躲避。尽管空桶发出响亮的声音，但却不象第一只桶那么有价值。列宁借此寓言来揭露经济派只会唱高调的虚伪实质。

〔13〕俄国社会民主党人国外联合会是1894年根据劳动解放社倡议在日内瓦成立的。它有自己的印刷所，印刷革命书刊，出版《工作者》文集。最初联合会由劳动解放社领导，它的出版物也由劳动解放社编辑。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一次代表大会承认联合会是党的国外代表机关。后来，由于机会主义分子——经济派，或所谓的青年派在联合会里占了优势，1898年11月劳动解放社在联合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上，声明拒绝为联合会编辑出版物。劳动解放社同联合会彻底分裂和退出联合会是在1900年4月联合会的第二次代表大会上发生的，当时劳动解放社和与它观点一致的人退出了代表大会，并成立了独立的组织“社会民主党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通过了关于解散联合会的决议。

〔14〕《曙光》是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政治杂志，1901年至1902年由《火星报》编辑部在斯图加特出版，共出了四期（三册）。该杂志曾刊登了列宁的一些著作。

〔15〕山岳派和吉伦特派是十八世纪末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的两个资产阶级政治派别。山岳派又称雅各宾派，是当时的革命阶级即资产阶级中最坚决的代表，他们主张必须消灭专制政体和封建主义。吉伦特派与山岳派不同，他们动摇于革命和反革命之间，最终走上了同君主派勾结的道路。

〔16〕无题派是指1906年在彼得堡出版的《无题》杂志的组织者和参加者谢·尼·普罗柯波维奇、叶·德·库斯柯娃、瓦·雅·鲍古查尔斯基等人。无题派公开宣布自己是修正主义的拥护者，支持孟什维克和自由派，反对无产阶级的独立的政策。

〔17〕伊洛瓦伊斯基是俄国贵族君主派历史学家，编写过许多在革命前俄国中小学里普遍采用的官定历史教科书。他在教科书中把历史主要归结为帝王将相的活动，用种种次要的和偶然的情况来解释历史过程。

〔18〕反社会党人非常法即《防止社会民主党危害治安法》，是俾斯麦政府在1878年10月通过的镇压工人运动的反动法令。它使德国社会民主党处于非法地位，党的一切组织、工人团体被取缔，社会主义书刊被查禁，社会民主党人遭到迫害。德国社会民主党组织工人阶级进行长期的艰苦斗争，终于迫使反动政府在1890年10月废除了这个法令。

〔19〕《前进报》是德国社会民主党的中央机关报，1876年10月在莱比锡出版。恩格斯曾在该报上对机会主义的各种表现进行斗争。从九十年代后半期起，即在恩格斯逝世后，《前进报》经常发表在德国社会民主党和第二国际内占统治地位的机会主义者的文章。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前进报》站在社会沙文主义的立场上。该报在柏林出版到1933年。

〔20〕讲坛社会主义者是十九世纪七十至九十年代资产阶级思想的一个流派的代表，主要是德国的大学教授；讲坛社会主义者在大学的讲坛上打着社会主义的幌子鼓吹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讲坛社会主义的代表人物有阿·瓦格纳、古·施穆勒、路·布伦坦诺、威·桑巴特等。他们硬说国家是超阶级的组织，能够调和敌对的阶级，逐步地实行“社会主义”。

〔21〕诺兹德烈夫是果戈里的小说《死魂灵》中的一个地主，喜欢争吵，招摇撞骗。果戈里称诺兹德烈夫为“历史”人物，因为他每到一处，都要闹出丑“史”和乱子来。这里所说的“历史的”意义，即指此意。

〔22〕汉诺威决议是1899年10月9—14日德国社会民主党在汉诺威举行的代表大会上就“对党的基本观点和策略的攻击”问题通过的决议。代表大会所以讨论这个问题并通过这项专门的决议，是因为以伯恩斯坦为首

的一伙机会主义者提出要修改马克思主义理论，并要求重新审查社会民主党的革命政策和策略。代表大会的决议否决了修正主义者的要求，但是没有对伯恩斯坦主义进行揭露和批判。

〔23〕卢卑克决议是1901年9月22—28日德国社会民主党在卢卑克举行的代表大会上通过的决议。代表大会的中心问题是进行反对修正主义的斗争。那时，修正主义已经成为党内的右翼，有自己的纲领和刊物《社会主义月刊》。修正主义者的首领伯恩斯坦在代表大会前很久就发表过修正科学社会主义的言论，他在代表大会上的发言要求有对马克思主义的“批评自由”。代表大会拒绝了伯恩斯坦派提出的决议案。在代表大会通过的决议中对伯恩斯坦提出了公开的警告，但是在原则上没有提出伯恩斯坦派不能留在工人政党内的课题。

〔24〕德国社会民主党斯图加特代表大会于1898年10月3—8日举行，它第一次讨论了德国社会民主党内的修正主义的问题。大会宣读了没有出席的伯恩斯坦的声明。伯恩斯坦在声明中叙述了他以前在一系列文章中发表过的机会主义观点并且为这些观点辩护。在大会上，在反对伯恩斯坦的人中间，没有一致的意见。一些人（倍倍尔、考茨基等）主张对伯恩斯坦进行思想斗争，并批判他的错误，但反对对他采取组织手段。另一些人——以罗·卢森堡为首的少数则比较坚决地反对伯恩斯坦主义。代表大会没有就这个问题作出任何决议。

〔25〕旧教徒即亚·尼·波特列索夫。《曙光》杂志1901年4月第一期刊载了他论述俄国思想界危机的《发生了什么？》一文。文中作者问道：“在我们的土地上，马克思主义中的臭名远扬的‘改良派’（即伯恩斯坦——编者注）的怀疑论比在任何地方获得的成就都大；同时在俄罗斯，这种理论的隐蔽的拥护者这么多，公开的拥护者这么少，好象伯恩斯坦主义是不可告人的暗疾，得了这种病通常不好大声坦白地承认。这是为什么呢？”

〔26〕“合法马克思主义”即司徒卢威主义，是对马克思主义所作的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歪曲。彼·伯·司徒卢威及其他“合法马克思主义者”企图利用马克思主义的旗帜和工人运动来为资产阶级的利益服务。列宁在自己的著作里揭露了司徒卢威主义是国际机会主义和后来采取伯恩斯坦主义和考茨基主义形式的修正主义的萌芽；他指出司徒卢威主义必然发展为资产阶级的民族自由主义。

〔27〕阿·马·高尔基早期的一篇短篇小说题为《趾高气扬的作家》。

〔28〕指《说明我国经济发展状况的资料》文集。该文集在1895年4月

由公开的印刷所印了两千册。文集中包括列宁为反对“合法马克思主义者”而写的一篇文章《民粹主义的经济内容及其在司徒卢威先生的书中受到的批评(马克思主义在资产阶级著作中的反映)》，署名是：克·士林。见《列宁全集》第1卷第311—481页。

〔29〕赫罗斯特拉特是公元前四世纪的希腊人。据传说，他为了留名于后世，竟焚毁了他故乡爱非斯城有名的阿尔蒂米斯神殿。赫罗斯特拉特的名字成了追求个人名声而不惜犯罪的人的通称。

〔30〕《信条》是经济派于1899年写的一个文件。这个文件极其明显地表明了经济派的机会主义观点，否认无产阶级独立的政治作用和工人阶级政党的必要性。《信条》的作者是谢·尼·普罗柯波维奇和叶·德·库斯柯娃，他们后来都成了立宪民主党人。

〔31〕《往事》是一种历史月刊，主要论述民粹主义运动以及早期社会运动的历史。1906年至1907年在彼得堡出版。1908年改名为《过去的年代》，后被沙皇政府封闭。1917年7月，该杂志在彼得格勒复刊，一直出版到1926年。

〔32〕《工人思想报》是经济派的报纸，1897年10月至1902年12月先后在彼得堡、柏林、华沙和日内瓦出版，共出十六号。

〔33〕指《〈工人事业〉杂志编辑部指南》。这是一本揭露俄国社会民主党人国外联合会及其机关刊物《工人事业》杂志编辑部的机会主义观点的资料和文件汇编。汇编由普列汉诺夫编辑并写序，由劳动解放社于1900年在日内瓦出版。

〔34〕《宣言》(《Profession de foi》)是基辅委员会在1899年起草的一份传单。这份传单表明了基辅委员会的机会主义观点，其内容有很多地方和经济派的有名的《信条》相同。列宁在《论〈Profession de foi〉》一文中对这个文件进行了批判(见《列宁全集》第4卷第251—260页)。

〔35〕《〈工人思想报〉附刊》是《工人思想报》编辑部于1899年9月出版的一本小册子。在这本小册子中，特别是在署名尔·姆·的《我国的实际情况》一文中，公开宣扬经济派的机会主义观点。

〔36〕劳动解放社是格·瓦·普列汉诺夫1883年在日内瓦创立的俄国第一个马克思主义团体，一直存在到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1903年)。

劳动解放社“为在俄国传播马克思主义作了大量的工作，在理论上为社会民主党奠定了基础，跨出了走向工人运动的第一步”(见《联共(布)党

史简明教程》1975年人民出版社版第27页)。它把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著作：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共产党宣言》、马克思的《雇佣劳动与资本》、恩格斯的《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等译成俄文，在国外刊印并在俄国境内秘密传播。普列汉诺夫及其劳动解放社给了民粹主义一个决定性的打击。但是劳动解放社也有严重错误：民粹主义观点的残余、对农民的革命性估计不足、对自由资产阶级的作用估计过高。这些错误成了普列汉诺夫和劳动解放社的其他一些成员后来的孟什维主义观点的胚胎。

〔37〕“但愿你们拉也拉不完！”这句话出自俄罗斯民间故事《十足的傻瓜》。傻瓜伊万努什卡看到农民在脱粒，叫喊道：“你们脱三天，只能脱三粒。”为此挨了一顿打。傻瓜回家向母亲哭诉。母亲告诉他应当说：“但愿你们运也运不完，抬也抬不完，拉也拉不完！”第二天，傻瓜遇见人家送葬，就叫喊道：“但愿你们抬也抬不完，拉也拉不完！”结果又挨了一顿打。

〔38〕哥达纲领是1875年在哥达举行的爱森纳赫派和拉萨尔派合并代表大会上通过的德国社会主义工人党纲领。这个纲领是一个彻头彻尾的机会主义纲领，它根本不提无产阶级专政，否认农民参加革命的可能性，要求把国家资助工人生产合作社作为过渡到社会主义的方法，并要求用一切合法手段建立所谓自由的人民国家。马克思和恩格斯坚决反对两派在机会主义纲领基础上的合并，并对哥达纲领草案作了毁灭性的批判（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1—25页）。

〔39〕指1896年5—6月彼得堡纺织工人大罢工。罢工是在彼得堡工人阶级解放斗争协会的领导下进行的，罢工的基本要求是缩短工作时间。这次罢工是彼得堡的无产阶级第一次结成广大阵线向剥削者进行的斗争，参加罢工的工人达三万人以上。彼得堡罢工促进了俄国全国罢工运动的发展，迫使沙皇政府加快了工厂法的修改并于1897年6月2日（公历14日）颁布了关于把各类工厂工作日缩短至十一个半小时的法律。

〔40〕《论鼓动》一书的作者是阿·克烈美尔，写于1894年。该书总结了社会民主党人在维尔诺的工作经验，号召放弃闭塞的小组宣传活动，而在工人中开展日常的群众性宣传工作。该书对俄国社会民主党人有很大影响，但夸大纯经济斗争的意义和作用，包含了后来的“经济主义”的萌芽。

〔41〕工人阶级解放斗争协会是列宁在1895年秋天组成的。该协会统一了彼得堡所有的马克思主义工人小组。领导斗争协会的是以列宁为首的中心小组。

斗争协会第一次在俄国开始实现社会主义同工人运动的结合，把在少数先进工人中间宣传马克思主义变为在工人阶级广大群众中进行政治鼓动。斗争协会领导了工人运动，把工人为实现经济要求的斗争同反对沙皇制度的政治斗争联系起来。斗争协会给工人印发传单和小册子，领导了罢工运动。斗争协会的影响远远超出了彼得堡。在斗争协会的推动下，俄国其他城市和区域中的工人小组也相继统一成为这样的协会。

“彼得堡‘工人阶级解放斗争协会’的意义，如列宁所说，就在于它是**依靠着工人运动的革命政党的第一个不容忽视的萌芽。**”（见《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1975年人民出版社版第19页）

〔42〕《俄国旧事》是一种历史杂志，主要刊载历史文献和回忆录等，1870年至1918年在彼得堡每月出版一次。

〔43〕《圣彼得堡工人小报》是彼得堡工人阶级解放斗争协会的秘密报纸。共出版过两号；第一号在1897年2月出版（报上印的日期是1月。这一号在俄国油印了三、四百份）；第二号于1897年9月在日内瓦出版。

〔44〕指1898年3月在明斯克举行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公布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宣言》。《宣言》宣布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成立，把争取政治自由和推翻专制制度的斗争作为俄国社会民主党的主要任务，并提出把政治斗争同工人运动的一般任务结合起来。

〔45〕非正式会议于1897年2月14日到17日（公历2月26日到3月1日）之间在彼得堡举行。出席这次会议的一方面有列宁、阿·亚·瓦涅也夫、格·马·克尔日札诺夫斯基和彼得堡工人阶级解放斗争协会的其他成员即所谓“老年派”（他们被遣往西伯利亚流放地以前曾释放出狱三天），另一方面有在列宁被捕后领导斗争协会的“青年派”。

〔46〕《〈工作者〉小报》是俄国社会民主党人国外联合会于1896年至1899年在日内瓦出版的不定期的刊物。一共出版过十期。第一至八期是由劳动解放社负责编辑的。后因联合会大多数会员转向经济主义，劳动解放社拒绝为联合会编辑出版物，《〈工作者〉小报》第九、十期合刊（1898年11月）由经济派编辑出版。

〔47〕十二月党人是俄国贵族革命者，1825年12月14日曾发动反对沙皇政府和农奴制的起义。

〔48〕瓦·沃·是十九世纪八十至九十年代自由主义民粹派的思想家之一瓦·巴·沃龙佐夫的笔名。列宁所说的“俄国社会民主党中的瓦·沃·”，指的是俄国社会民主党中的机会主义思潮的代表——经济派。

〔49〕《新时代》是德国社会民主党的理论杂志，1883年至1923年在斯图加特出版，1890年10月前为月刊，后改为周刊。1917年10月前编辑为卡·考茨基，后为亨·库诺。1885—1894年该杂志发表了恩格斯的许多文章；恩格斯经常给杂志编辑部以指示，也激烈地批评它背离马克思主义的一些表现。1895年恩格斯逝世后，《新时代》开始系统地刊登修正主义者文章。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该杂志采取中派主义立场，事实上支持社会沙文主义者。

〔50〕1901年11月2—6日举行的奥地利社会民主党维也纳代表大会通过了新的党纲，以代替旧海因菲尔德纲领（1888年）。新党纲是由1899年布隆代表大会委托一个专门委员会起草的。新党纲草案对伯恩斯坦主义作了重大让步，因此受到很多批评。

〔51〕进步党是1861年6月成立的普鲁士资产阶级政党。进步党要求在普鲁士领导下统一德国，召开全德议会，建立对众议院负责的强有力的自由派内阁。由于害怕工人阶级和仇视社会主义运动，进步党在半专制的德国的条件下容忍了普鲁士容克（地主）的统治。进步党政治上的动摇反映了它所依靠的商业资产阶级、小工业家和部分手工业者的不稳定性。

〔52〕列宁指的是谢·尼·普罗柯波维奇的《西方工人运动。批判性研究的尝试》（第一卷。德国和比利时。1899年圣彼得堡版）一书，以及彼·伯·司徒卢威的文章《马克思的社会发展理论》和他对爱·伯恩斯坦的《社会主义的前提和社会民主党的任务》一书及卡·考茨基的《伯恩斯坦与社会民主党的纲领》一书的评论。

普罗柯波维奇在书中企图证明德国和比利时的工人运动缺乏进行革命斗争和实行社会民主党的革命策略的条件。司徒卢威在文章中企图驳倒马克思主义理论及其哲学前提，否认社会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必要性。

〔53〕希尔施—敦克尔工会是由德国自由资产者希尔施和敦克尔两人在1868年建立的，他们鼓吹“阶级利益和谐论”，诱惑工人离开反对资产阶级的革命的阶级斗争，把工会运动的任务局限于组织互助储金会和文化教育团体。

〔54〕即工人阶级自我解放社。该社是经济派的一个小组织，1898年秋在彼得堡出现，存在数月。该社发表过阐述自己目的的宣言、章程和几份告工人的传单。

〔55〕《前夕》是民粹派的杂志，1899年1月至1902年2月在伦敦用俄

文出版，共出版了三十七期。该杂志把一批小资产阶级政党的代表纠集在自己的周围。

〔56〕这里指的是马尔托夫以纳尔苏修斯·土波雷洛夫的笔名发表在《曙光》杂志第一期（1901年4月）上的一首讽刺诗《现代俄国社会党人之歌》。诗中嘲笑了崇拜自发运动的经济派。

列 宁

进 一 步，退 两 步

(我们党内的危机)⁽¹⁾(节选)

(九) 党 章 第 一 条

我们已经列举了在代表大会⁽²⁾上引起热烈的有趣的争论的不同条文⁽³⁾。这种争论几乎占了两次会议的时间，并且是以**两次记名投票**结束的(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在整个代表大会期间只举行过八次记名投票，这种记名投票花费时间太多，所以只在特别重要的情况下才采用)。当时涉及的问题无疑是原则问题。代表大会对于争论的兴趣是很大的。**所有代表**都参加了表决——这是我们代表大会(正如任何一个大的代表大会一样)少有的现象，这也证明，所有参加争论的人都很关心这个问题。

试问，争论的问题的实质究竟是什么呢？我在代表大会上已经说过，后来又不止一次地重复过：“我决不认为我们的意见分歧(关于党章第一条)是决定党的生死存亡的重大分歧。我们还决不至于因为党章有一条不好的条

文而灭亡！”(第250页)^①这种意见分歧,虽然揭露出原则上的不同色彩,但是它本身无论如何也不会引起代表大会以后所形成的那种分离(其实,如果老实不客气地说,这是分裂)。但是,任何一种小的意见分歧,如果有人坚持它,如果把它提到首位,如果硬要去寻找这种分歧的全部来龙去脉,那它就会变成大的意见分歧。任何一种小的意见分歧,如果成为转向某些错误见解的出发点,如果这些错误见解又由于新增加的分歧而同使党分裂的无政府主义行动结合起来,那么这种意见分歧就会有重大的意义了。

这一次也正是这样。党章第一条引起的比较不大的意见分歧,现在竟有了重大的意义,因为正是这种意见分歧成了少数派(特别是在同盟代表大会^[4]上以及后来在新《火星报》^[5]上)走向机会主义的深奥思想和无政府主义的空谈的转折点。正是这种意见分歧奠定了火星报少数派同反火星派以及泥潭派结成联盟的基础,这个联盟到选举时已经有了确定的形式,不了解这个联盟,就不能了解在中央机关人选问题上发生的主要的根本的分歧。马尔托夫和阿克雪里罗得在党章第一条问题上所犯的小错误,原是我们器皿上的一个小裂缝(正如我在同盟代表大会上所说的那样)。这个器皿本来可以用绳子打个死结把它捆紧(而不是用绞索把它勒裂,就象在同盟代表大

^① 见《列宁全集》第6卷第455页。——编者注

会期间几乎陷于歇斯底里状态的马尔托夫所听错的那样)。但是也可以**竭尽全力**使这个裂缝扩大,以至弄裂这个器皿。由于热心的马尔托夫分子采取了抵制等等无政府主义的手段,结局就是后一种情况。关于党章第一条的意见分歧在中央机关人选问题上起了不小的作用,而马尔托夫在这个问题上遭到失败,也就使他走向用粗暴的、机械的、甚至是无理取闹的(在“俄国革命社会民主党人国外同盟”代表大会上的发言)手段进行“原则斗争”。

现在,经过这一切事件以后,党章第一条问题就有了**重大的意义**,所以我们应当确切地认识到代表大会在表决这一条时形成的派别的性质,同时更重要的是,应当确切地认识到在讨论党章第一条时就已经显现或者开始显现出来的**形形色色的观点的真实性质**。现在,在读者熟悉的各种事件发生以后,问题的**提法**已经是这样:究竟是得到阿克雪里罗得拥护的马尔托夫的条文,象我在党代表大会上所说的那样(第333页),反映了他的(或者他们的)不坚定性、动摇性和政治态度模糊,或象普列汉诺夫在同盟代表大会上所指出的那样(同盟记录第102页及其他各页),反映了他(或者他们)倾向于饶勒斯主义和无政府主义呢,还是得到普列汉诺夫拥护的我的条文,反映了我在集中制问题上有官僚主义的、形式主义的、昏愤刚愎的、非社会民主主义的错误观点呢?是**机会主义和无政府主义**呢,还是**官僚主义和形式主义**?——现在,当小的分歧变成大的分歧时,问题的**提法**就是这样。在从

实质上讨论那些赞成和反对我的条文的理由时，我们应当注意的正是事态的发展强加给我们大家的，甚至可以说(如果不是有点夸张的话)是历史进程决定的这种问题的提法。

让我们从分析代表大会的讨论来开始剖析这些理由吧。第一个发言，即叶哥罗夫同志的发言所以值得注意，只是因为他的态度(不明白，我还不明白，我还不知道真理在哪里)很可以说明当时还难以认清一个确实是新的、相当复杂而细致的问题的许多代表的态度。第二个发言，即阿克雪里罗得的发言，立刻从原则上提出问题。这是阿克雪里罗得同志的第一个原则性的发言，其实这就是他在代表大会上的第一次发言，而且很难说他这个谈到有名的“大学教授”的发言是特别成功的。阿克雪里罗得同志说：“我认为，我们必须分清党和组织这两个概念。而这里有人把这两个概念混淆了。这种混淆是危险的。”这就是用来反对我的条文的第一个理由。请你们仔细看一看这个理由吧。如果我说，党应当是组织^①的

① “组织”一词通常有两种含义，即广义的和狭义的。狭义的是指人类集体中的，至少是有最低限度确定形式的人类集体中的单个细胞。广义的是指结合成一个整体的这种细胞的总和。例如，海军、陆军和国家，既是许多组织(从该词的狭义来说)的总和，同时又是一种社会组织(从该词的广义来说)。教育主管机关是一个组织(从该词的广义来说)，同时它又是由许多组织(从该词的狭义来说)组成的。同样，党也是一个组织，而且应当是一个组织(从该词的广义来说)；同时党又应当是由许多不同的组织(从该词的狭

总和（并且不是什么简单的算术式的总和，而是一个整体），那么，这是不是说我把党和组织这两个概念“混淆了”呢？当然不是。我只是以此来十分明确地表示自己的愿望，自己的要求，使作为阶级的先进部队的党成为尽量有组织的，使党只吸收至少能接受最低限度组织性的分子。反之，我的论敌却把有组织的分子和无组织的分子，接受领导的分子和不接受领导的分子，先进的分子和不可救药的落后分子——因为还可救药的落后分子是能够加入组织的——混淆在党内。这样的混淆才真正是危险的。随后，阿克雪里罗得同志援引“从前那些十分秘密的集中的组织”（“土地和自由社”⁽⁶⁾和“民意党”⁽⁷⁾）作例子，说这些组织周围“聚集了许多虽然没有加入组织，却以某种方式帮助它，并被认为是党员的人。……这个原则应当在社会民主党组织内更严格地实行”。于是我们就接触到一个关键问题：“这个原则”，即许可那些不加入任何一个党组织而只是“以某种方式帮助它”的人自称为党员的原则，真的是社会民主党的原则吗？普列汉诺夫对这个问题作了唯一可能的回答，他说：“阿克雪里罗得援引七十年代的情况作例子是不正确的。当时有组织严密、纪律良好的中央机关，在它周围有它所成立的各种

义来说)组成的。所以，阿克雪里罗得同志在谈论划分党和组织这两个概念时，第一、他没有注意到组织一词的广义和狭义的区别，第二、他没有发现他自己把有组织的分子和无组织的分子混淆起来了。

种组织，而在这些组织以外是一片混乱和无政府状态。这一混乱状态中的分子虽然也自称为党员，对于事业却并没有好处，反而造成了损失。我们不应该仿效七十年代的无政府状态，而要避免这种状态。”可见，阿克雪里罗得同志想要冒充为社会民主党的原则的“这个原则”，其实是**无政府主义的原则**。谁要想推翻这个结论，就必须证明在组织以外有可能实现监督、领导和纪律，就必须证明有必要授予“混乱状态中的分子”以党员称号。拥护马尔托夫同志的条文的人，对于以上两点都没有加以证明，而且也无法加以证明。阿克雪里罗得同志拿了“自认为是社会民主党人并声明这一点的大学教授”作例子。要把这个例子所包含的思想贯彻到底，阿克雪里罗得同志就应当进一步地说：有组织的社会民主党人是否承认这位大学教授是社会民主党人呢？阿克雪里罗得同志既然没有提出这个更进一步的问题，那他就是中途抛弃了自己的论据。的确，二者必居其一。或者是有组织的社会民主党人承认我们所谈的这位大学教授是社会民主党人，那么他们为什么又不把他编到某一个社会民主党组织里面呢？只有把他编进去，这位大学教授的“声明”才会同他的行动相符合，才不致成为空话（而大学教授们的声明往往就是空话）。或者是有组织的社会民主党人不承认这位大学教授是社会民主党人，那么给这位大学教授以享有光荣的责任重大的党员称号的权利，就是荒谬的，毫无意义的，而且是有**害的**。所以，归结起来说，

问题正在于是彻底实行组织原则，还是崇尚涣散状态和无政府状态。我们究竟是以已经形成的、已经团结起来的社会民主党人的核心——譬如说，已经召开党代表大会并且应当扩大和增加各种党组织的社会民主党人的核心——为出发点来建设党呢，还是满足于一切帮助党的人都是党员这种聊以自慰的空话？阿克雪里罗得同志接着又说：“我们采纳列宁的条文，就会把虽然不能直接吸收到组织中，但终究还是党员的那一部分人抛弃掉。”在这里，阿克雪里罗得同志本人十分明显地犯了他想归罪于我的那种混淆概念的错误：他竟把所有帮助党的人都是党员这一点当作既成事实，其实正是这一点引起了争论，而我的论敌还应当来证明这种解释是必要的和有益的。所谓“抛弃”这样一个初看起来似乎可怕的字样，究竟有什么内容呢？如果说只有已被承认为党组织的那些组织中的成员才能称为党员，那么不能“直接”加入任何一个党组织的人，也还是能在靠近党的非党组织中工作的。因此，所谓抛弃，如果是指取消工作机会，取消参加运动的机会，那是根本谈不上的。相反，我们容纳真正的社会民主党人的党组织愈坚强，党内的动摇性和不坚定性愈少，党对于在它周围的、受它领导的工人群众的影响，也就会愈加广泛、全面、巨大和有效。把作为工人阶级先进部队的党同整个阶级混淆起来，显然是绝对不行的。阿克雪里罗得同志说：“当然我们要建立的首先是党的最积极的分子的组织，即革命家的组织，但是我们既然是阶级

的党，就应当想法不把那些也许并不十分积极但却自觉靠近这个党的人抛在党外。”他这样说，正是犯了这种混淆的错误（这种错误是我们的整个机会主义经济派的特点）。第一，列为社会民主工党积极部分的，决不单是革命家组织，还有许多被承认为党组织的工人组织。第二，究竟有什么理由，按照什么逻辑，可以根据我们是阶级的党这一事实，就作出结论说不必把加入党的人和靠近党的人区分开来呢？恰恰相反：正因为人们的觉悟程度和积极程度有差别，所以必须区别他们同党的关系的密切程度。我们是阶级的党，因此，几乎整个阶级（而在战争时期，在国内战争年代，甚至完全是整个阶级）都应当在我们党的领导下行动，都应当尽量紧密地靠近我们党；但是，如果以为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不论在什么时候，几乎整个阶级或者整个阶级都能把自己的觉悟程度和积极程度提高到自己的先进部队即自己的社会民主党的水平，那就是马尼洛夫精神^{〔8〕}和“尾巴主义”。还没有一个明白事理的社会民主党人怀疑过，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连工会组织（比较原始的、比较容易为落后阶层的觉悟程度接受的组织）也不能包括几乎整个工人阶级或者整个工人阶级。忘记先进部队和倾向于它的所有群众之间的区别，忘记先进部队的经常责任是把愈益广大的阶层提高到这个先进的水平，那只是欺骗自己，无视我们的巨大任务，缩小这些任务。抹杀靠近党的分子和加入党的分子之间的区别，抹杀自觉而又积极的分子和帮助党的分子之间

的区别，正是这种无视和遗忘的表现。

拿我们是阶级的党作借口来为组织界限模糊**辩护**，为把有组织和无组织现象混淆起来的观点**辩护**，就是重复纳杰日丁的错误，因为纳杰日丁“把运动在‘深处’的‘根子’这一哲学的和社会历史的问题同……组织技术问题混淆起来了”（《怎么办？》一书第91页）^①。阿克雪里罗得同志首创的这种混淆，后来被拥护马尔托夫同志条文的那些发言人重复了几十次。“党员称号散布得愈广泛愈好。”——马尔托夫这样说，但是他没有说明这种名不副实的**称号散布得广泛究竟有什么好处**。对不加入党组织的人实行监督不过是一句空话，这能否定得了吗？空话如果广泛散布，那是有害而无益的。“如果每一个罢工者，每一个示威者，在对自己行动负责的情况下，都能宣布自己是党员，那我们只会对此表示高兴。”（第239页）真的吗？**每一个罢工者都应当有权宣布自己是党员吗？**马尔托夫同志的这个论点一下子就把他的错误弄到了荒谬的地步，他把社会民主主义**降低**为罢工主义，重蹈阿基莫夫之流的覆辙。如果社会民主党能够领导每一次罢工，我们只会对此表示高兴，因为社会民主党的直接的和责无旁贷的义务就是领导无产阶级的一切表现形式的阶级斗争，而罢工就是这种斗争最深刻最强有力的表现形式之一。但是，如果我们把这种初步的，按实质来说，不过是

^① 见《列宁选集》第1卷第331页。——编者注

工联主义的斗争形式同全面的自觉的社会民主主义的斗争**等同起来**，那么我们就将是尾巴主义者了。如果我们给每一个罢工者以“宣布自己是党员”的权利，那么我们就是以机会主义态度使一件**分明不真实的事情合法化**，因为这样的“宣布”在**大多数场合都是不真实的**。如果我们想自欺欺人，以为当那些“没有受过训练的”非熟练工人的极广大阶层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必然是十分涣散、备受压迫、愚昧无知的时候，**每一个罢工者都可以成为社会民主主义者和社会民主党党员**，那么我们就是沉湎于马尼洛夫的幻想了。正是根据“**罢工者**”的例子，可以特别明显地看出力求本着社会民主主义精神领导每一次罢工的**革命意向同把每一个罢工者宣布为党员的机会主义词句之间的区别**。我们是阶级的党，因为我们**事实上**是本着社会民主主义精神领导几乎整个或者甚至整个无产阶级的，但是，只有阿基莫夫之流才能由此作出结论说，我们在**提法上**应当把党和阶级等同起来。

马尔托夫同志在同一次发言中说，“我不怕密谋组织”，但是，他补充说，“在我看来，密谋组织，只有当它由广泛的社会民主工党围绕着的时候，才是有意义的”（第239页）。为了说得确切些，应当说：只有当它由广泛的社会民主主义工人**运动**围绕着的时候，才是有意义的。如果马尔托夫同志的论点是以这种形式表达的，那就不仅是不容置辩，而且是不言自明的定论了。我所以要讲到这一点，只是因为以后发言的人把马尔托夫同志的这个

不言自明的定论变成非常**流行和非常庸俗**的论据，说什么列宁想“使党员总数以密谋者人数为限”。当时作出这个只能令人好笑的结论的有波萨多夫斯基同志以及波波夫同志，而当马尔丁诺夫和阿基莫夫发言附和这个结论时，这个结论的真正性质，即机会主义词句的性质，就充分暴露出来了。目前阿克雪里罗得同志在新《火星报》上又发挥了这个论据，想使读者们了解新编辑部的新的组织观点。还在代表大会讨论党章第一条问题的第一次会议上，我就发现我的论敌想要利用这种廉价的武器，所以我在发言中告诫说：“不要以为党的组织只应当由职业革命家组成。我们需要有一切形式、类型和色彩的极其多种多样的组织，从极狭小极秘密的组织起，一直到非常广泛、自由、松散的组织止。”（第240页）^①这本来是有目共睹、不言自明的真理，所以我当时认为这是不必多谈的。但是，在目前时期，有人在很多很多方面把我们拉向后退，这就不得不“重提旧事”了。因此我要从《怎么办？》和《给一个同志的信》中摘录几段话：

“……象阿列克谢也夫、梅什金、哈尔士林和热里雅鲍夫这样一些卓越的活动家的小组，是能够胜任最切实最实际的政治任务的。他们所以能够胜任，正是并且只是因为他们的热烈的宣传能够获得自发觉醒起来的群众的反应，因为他们的沸腾的毅力能够得到革命阶级的毅

^① 见《列宁全集》第6卷第454页。——编者注

力的响应和支持。”^①要成为社会民主党，就必须得到本阶级的支持。不是象马尔托夫同志所想象的那样，党应该去围绕密谋组织，而是革命阶级即无产阶级应该围绕既包括密谋组织又包括非密谋组织的党。

“……为进行经济斗争而建立的工人组织应当是职业的组织。每个工人社会民主党人都应当尽量帮助这种组织并在这种组织内积极工作。……但是要求只有社会民主党人才能成为行业工会会员，那就完全不符合我们的利益了，因为这会缩小我们影响群众的范围。让每一个了解必须联合起来同厂主和政府作斗争的工人，都来参加行业工会吧。行业工会如果不把一切只要有这种初步了解的人都联合起来，如果不是一种很广泛的组织，就不能达到行业工会的目的。这种组织越广泛，我们对它们的影响也就会越广泛，但这种影响的发生不仅是由于经济斗争的‘自发的’发展，而且是由于参加工会的社会党人对他们的同事给以直接的和自觉的推动。”（第86页）^②顺便说一下，对于如何评价关于党章第一条的争论，工会的例子是特别值得注意的。至于说工会应当在社会民主党组织的“监督和领导下”进行工作，这在社会民主党人中间是不会产生异议的。但是根据这一点就给工会全体会员以“宣布自己”为社会民主党党员的权利，

① 见《列宁选集》第1卷第318页。——编者注

② 同上书，第324—325页。——编者注

那就是十分荒谬的了，而且势必有两个害处：一方面是**缩小工会运动的规模并且削弱工人在工会运动基础上的团结**，另一方面，这会把模糊不清和动摇不定的现象带进社会民主党内。德国社会民主党在汉堡石匠由于做包工而引起有名事件〔9〕的具体情况下曾解决过类似的问题。当时社会民主党毫不迟疑地认为工贼行为是社会民主党人所不齿的无耻行为，即认为领导罢工和支援罢工是**自己的切身事业**，但是同时它又十分坚决地否决了把党的利益和行业工会的利益等同起来，**要党对个别工会的个别步骤承担责任**的要求。党应当并且一定力求把自己的思想灌输到行业工会中去，使工会接受自己的影响，但是，正是为了这种影响，党应当把这些工会中完全是社会民主主义的（加入社会民主党的）人和那些不十分自觉和政治上不十分积极的人区别开来，而不是象阿克雪里罗得同志所希望的那样，把他们混为一谈。

“……革命家组织把最秘密的职能集中起来，这决不会削弱而只会扩大其他许许多多组织的活动范围和**内容**，这些组织既然要把广大群众包括在内，就应当是一些形式尽量不固定，秘密性尽量少的组织，如工会、工人自学小组、秘密书刊阅读小组、以及其他一切居民阶层中的社会主义和民主主义小组等等。这样的小组、工会和团体，必须在各地**极普遍地**组织起来，使它们担负各种不同的任务；但是如果把这些组织同革命家的组织混为一谈，

抹杀这两者之间的界限……那就是荒唐和有害的了。”(第96页)①从这种引证中可以看出,马尔托夫同志是多么不合时宜地对我提醒说:革命家组织应当由广泛的工人组织围绕起来。我在《怎么办?》一书中就已经指出了这一点,而在《给一个同志的信》中更具体地发挥了这个思想。我在这封信中写道,工厂小组“对我们特别重要。运动的全部主要力量就在于各大工厂工人的组织性,因为大工厂中集中的那一部分工人,不但数量上在工人阶级中占优势,而且在影响上、发展上和斗争能力上更占优势。每个工厂都应当成为我们的堡垒。……工厂分委员会应当通过各种各样的小组网(或代办员网)力求掌握整个工厂;掌握尽量多的工人。……一切小组、分委员会等等都应当处于委员会的机构或分部的地位。其中一些可以直接申请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而一经委员会批准就可以加入,在委员会的委托或者同意下担负一定的工作,服从党机关的指示,享有一切党员的权利,可以成为委员会委员的直接的候补者,等等。另一些不参加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则处于由党员建立的各种小组或者接近党的某一个小组的小组的地位,等等”(第17—18页)②。从我加着重号的地方可以特别明显地看出,我的第一条条文的思想在《给一个同志的信》中已经充分表明了。那里直接指出了入党的条件:(1)一定程度的组织性;(2)由

① 见《列宁选集》第1卷第336页。——编者注

② 见《列宁全集》第6卷第213页和第215—216页。——编者注

党委员会批准。在下一页，我又大致指出是什么样的团体和组织，根据什么理由应当（或者不应当）吸收入党：“书刊投递员小组应当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并知道一定数量的党员和党的负责人员。研究职工劳动条件和提出职工各种要求的小组不一定要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有一两个党员参加的大学生自学小组、军官自学小组和职员自学小组，有时甚至完全不应该知道这一两个人是党员，等等。”（第18—19页）^①

请看这又是一种可以说明“光明磊落”问题的材料！马尔托夫同志的草案上的条文甚至完全没有讲到党对于组织的关系，而我几乎在代表大会一年以前就已经指出，一部分组织应该加入党，另一部分组织不应该加入党。在《给一个同志的信》里已经很明确地提出我在代表大会上所辩护的那个思想。这一点可以具体表述如下。一般按照各组织的组织程度，尤其是按照它们的秘密程度来说，大致可以分为以下几种：（1）革命家组织；（2）尽量广泛和多种多样的工人组织（我只说到工人阶级，当然也认为其他阶级中某些分子在一定条件下也会参加这些工人组织的）。这两种组织就构成为党。其次，（3）靠近党的工人组织；（4）不靠近党，但是事实上服从党的监督和领导的工人组织；（5）工人阶级中没有参加组织的分子，其中一部分——至少在阶级斗争的重大事件中——也是

^① 见《列宁全集》第6卷第216页。——编者注

服从社会民主党的领导的。在我看来，情况大致就是这样。相反，在马尔托夫同志看来，党的界限是极不明确的，因为“每一个罢工者”都可以“宣布自己是党员”。试问，这种界限模糊有什么好处呢？不过是使“称号”广泛散布而已。它的害处就是会产生一种把党和阶级混淆起来的**瓦解组织**的思想。

为了说明我们所提出的一般原理，我们还要粗略地看一看代表大会继续讨论党章第一条的情况。勃鲁克尔同志发言（这一点使马尔托夫同志感到满意）赞成我的条文，但是他和我的联盟是跟阿基莫夫同志和马尔托夫的联盟不同的，这只是出于误会。勃鲁克尔同志“不同意整个党章和它的全部精神”（第 239 页），而他拥护我的条文，是因为他把我的条文**看成是工人事业派分子所希望的那种民主制的基础**。勃鲁克尔同志当时还没有认识到在政治斗争中有时不得不挑选**害处比较少**的办法；勃鲁克尔同志没有觉察到，在我们这样的代表大会上为民主制辩护，是徒劳无益的。阿基莫夫同志就比较精明了。他完全正确地提出问题，认为“马尔托夫同志和列宁同志争论的是哪一种〈条文〉更能达到他们的共同目的”（第 252 页）。他继续说：“我和勃鲁克尔，想挑选一个**不大能达到目的的条文**。于是我就挑选了马尔托夫的条文。”阿基莫夫同志又坦率地解释说，他认为“他们的目的〈即普列汉诺夫、马尔托夫和我三个人的目的，即建立一个起领导作用的革命家组织〉是实现不了的，而且是有害的”；他

象马尔丁诺夫同志^①一样，拥护经济派所谓不必有“革命家组织”的思想。他“完全相信，实际生活终究会闯进我们党组织中来，不管你们是用马尔托夫的条文还是用列宁的条文阻挡它的去路”。本来，这种“尾巴主义的”“实际生活”观点是不值一提的，如果我们没有在马尔托夫同志那里也看到这种观点的话。马尔托夫同志的第二次发言（第 245 页）一般讲来是很有意思的，所以值得详细分析一番。

马尔托夫同志的第一个理由是：党组织对于不加入组织的党员的监督是“可以实现的，因为委员会既然委托某人担负某种职务，就有可能考察它”（第 245 页）。这个论点非常值得注意，因为它可以说是“道破了”马尔托夫的条文究竟是谁需要的，事实上是为谁效劳的：是为知识分子个人效劳呢，还是为工人团体和工人群众效劳。原来，马尔托夫的条文有可能作两种解释：（1）凡是在党的某一个组织的领导下经常亲自协助党的人，都有权“宣

① 不过，马尔丁诺夫同志想同阿基莫夫同志区别开来，他想证明，“密谋”似乎不等于“秘密”，这两个不同的词有概念上的差别。究竟是什么差别，无论马尔丁诺夫同志或者现在跟着他走的阿克雪里罗得同志都没有加以说明。马尔丁诺夫同志“装出一副样子”，使人感到，似乎我，例如在《怎么办？》一书中，没有坚决（如在《任务》一书（见《列宁选集》第 1 卷第 95—115 页。——编者注）中那样）反对“把政治斗争缩小成密谋”。马尔丁诺夫同志想使听众忘记一件事实，就是我当时所反对的那些人不认为需要革命家组织，正如阿基莫夫同志现在不认为需要这种组织一样。

布自己”(这是马尔托夫同志本人的话)是党员;(2)每一个党组织都有权承认凡是在它的领导下经常亲自协助党的人是党员。只有第一种解释才真正有可能使“每一个罢工者”自称为党员,所以也只有这种解释才立刻得到了李伯尔之流、阿基莫夫之流以及马尔丁诺夫之流的衷心拥护。但是,这种解释显然是一句空话,因为这样就会把整个工人阶级都包括进去,从而抹杀党和阶级之间的区别;所谓监督和领导“每一个罢工者”,那只能是“象征性地”谈一谈。正因为如此,马尔托夫同志在第二次发言时立刻就倒向第二种解释(不过,顺便说一下,这种解释被代表大会直接否决了,因为代表大会否决了科斯季奇的决议案^[10],第255页),即认为委员会将委托人们担负各种职务并考察其执行情况。这种专门职务当然从来不会委托给工人群众,不会委托给成千上万的无产者(即阿克雪里罗得同志和马尔丁诺夫同志所说的那些无产者),而恰恰是常常委托给阿克雪里罗得同志所提起的大学教授,委托给李伯尔同志和波波夫同志所关心的中学生(第241页),委托给阿克雪里罗得同志在第二次发言中所提到的革命青年(第242页)。总之,马尔托夫同志的条文要么是一种死板的字句和空洞的词藻,要么就多半是而且几乎完全是有利于那些“浸透了资产阶级个人主义”而不愿意加入组织的“知识分子”。马尔托夫的条文在口头上是维护无产阶级广大阶层的利益的,但是事实上却是为那些害怕无产阶级纪律性和组织性的资产阶级知识分

子的利益效劳。谁也不敢否认：**作为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中特殊阶层的知识分子**，他们的特点，一般和整个说来，**正是个人主义和不能接受纪律性和组织性**（请参看一下哪怕是考茨基论知识分子的著名论文）；这也就是这个社会阶层不如无产阶级的地方；这就是使无产阶级常常感觉到的知识分子意志消沉、动摇不定的一个原因；知识分子的这种特性是同他们通常的生活条件，同他们在很多方面接近于**小资产阶级生存条件的谋生条件**（单独工作或者在很小的集体里工作等等）有密切联系的。最后，拥护马尔托夫同志条文的那些人恰恰必须拿大学教授和中学生作例子，也不是偶然的！在关于党章第一条的争论中，并不象马尔丁诺夫和阿克雪里罗得两位同志所想的那样，是坚决主张广泛进行无产阶级斗争的人反对坚决主张搞激进密谋组织的人，而是拥护**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个人主义**的人同拥护**无产阶级组织性和纪律性**的人发生了冲突。

波波夫同志说：“在彼得堡，也象在尼古拉也夫或敖德萨一样，据这些城市的代表说，到处都有数以十计的散发书刊和进行口头鼓动的工人不能成为组织中的成员。可以把他们编到组织里面，但是不能看作组织中的成员。”（第241页）为什么他们不能成为组织中的成员呢？这始终是波波夫同志的一个秘密。上面我引了《给一个同志的信》中的一段话，正是说明把所有这些工人（是数以百计，而不是数以十计）编到组织里面是可能的而且是必

要的，其中有许许多多这样的组织能够而且应当加入党。

马尔托夫同志的第二个理由是说：“列宁认为党内除了党组织以外，再也不能有其他什么组织。〈完全对啊！〉反之，我却认为这样的组织应当存在。实际生活在十分迅速地建立和繁殖这些组织，以致我们来不及把它们一一纳入我们职业革命家的战斗组织的体系中。”这个说法在两方面都是不正确的：（1）“实际生活”繁殖真正干练的革命家组织，要比我们所需要的，要比工人运动所要求的少得多；（2）我们党应当是一个不仅包括革命家组织而且包括许许多多工人组织在内的体系。“列宁认为中央委员会只会批准那些在原则方面完全可靠的组织为党的组织。可是，勃鲁克尔同志清楚地了解，实际生活〈原文如此！〉一定会显示自己的力量，中央委员会为了不致把许多组织抛在党外，就会不管它们是不是完全可靠而一概批准；因此，勃鲁克尔同志也就附和了列宁的意见。”请看，这真是尾巴主义的“实际生活”观点呢！当然，如果中央委员会一定要由一些不是按照自己的意见而是按照别人的意见行事的人（见组委会事件^①）组成，那“实际生活”就真正会“显示自己的力量”，就是说，党内最落后的分子就会占上风（现在由于党内存在着由落后分子组成的“少数派”，情况正是如此）。但是，无论如何也找不到一个适当的理由能迫使一个干练的中央委员会把那些“不

^① 见《列宁全集》第7卷第199—208页。——编者注

可靠的”分子吸收到党内来。马尔托夫同志拿“实际生活”“繁殖”不可靠的分子作借口，正好十分明显地暴露了他的组织计划的机会主义性质！他继续说：“而我认为，如果这样的组织〈不完全可靠的组织〉同意接受党纲，接受党的监督，我们可以把它吸收入党，但并不因此就把它变成党的组织。例如，如果某个‘独立派’协会决定接受社会民主党的观点和党纲，并加入党，那我就会认为这是我们党的一个重大胜利，然而这还不是说，我们就把这个协会编入党组织中了。……” 请看，马尔托夫的条文竟混乱到什么程度：加入党的非党组织！请看一看他的方案吧：党 = (1) 革命家组织，+ (2) 被承认是党组织的工人组织，+ (3) 没有被承认是党组织的工人组织（多半是“独立派”组织），+ (4) 执行各种职务的个人，如大学教授、中学生等等，+ (5) “每一个罢工者”。可以同这个出色的计划相媲美的只有李伯尔同志的下面一段话：“我们的任务不只是一定要组织一个组织〈!!〉，我们能够并且应该组织一个党。”（第 241 页）是的，当然我们能够并且应该做到这一点，但是要真正做到这一点，需要的并不是什么“组织一些组织”的废话，而是向党员**直接提出要求**，要他们切实地从事**建立组织**的工作。说是“组织一个党”，而又拥护用“党”这个词来掩盖一切无组织性和一切涣散状态，那就是说空话。

马尔托夫同志说：“我们的条文是表示一种想使革命家组织和群众之间有许多组织的意图。”恰恰不是这样。

马尔托夫的条文恰恰**不是表示**这种真正必要的意图，因为它**并不是促进大家组织起来**，不是要求大家组织起来，不是把有组织的东西和无组织的东西区分开来。它只是给大家一个**称号**^①。说到这里，不能不回想起阿克雪里罗得同志说过的一段话：“无论用什么命令都不能禁止它们〈革命青年小组等等〉以及个别人自称为社会民主主义者〈十足的真理！〉，甚至自认为党的一部分〈这就**根本错了**！〉。……”禁止人家自称为社会民主主义者是不可能的，而且**没有必要**，因为这个词直接表示的只是一种信念体系，而不是一定的组织关系。当个别小组和个别人危害党的事业，败坏和瓦解党的组织时，禁止这些小组和个人“自认为党的一部分”，是可以而且应该的。如果党竟不能“用命令禁止”小组“自认为”整体的“一部分”，那么说党是个整体，是个政治单位，就太可笑了！如果这样，那又何必规定开除党籍的手续和条件呢？阿克雪里

① 马尔托夫同志在同盟代表大会上又提出一个令人好笑的论据来为自己的条文辩护。他说：“我们可以指出，列宁的条文按字面意义来了解，是把**中央代办员**置于党外，因为这些代办员并不组成一个组织。”（第59页）这个论据在同盟代表大会上曾受到**嘲笑**，这一点从记录上可以看出来。马尔托夫同志以为他所指出的“困难”，只有中央代办员加入“中央委员会的组织”才能够解决。但是问题不在这里。问题在于马尔托夫同志所引用的例子清楚地表明他**完全不了解党章第一条的思想**，表明那种纯粹咬文嚼字的批评方式确实值得嘲笑。从形式上说，只要成立一个“中央代办员组织”，起草一个把这个组织编到党内来的**决议**，那个使马尔托夫同志大伤脑筋的“困难”就会立刻消失。而我提出的党章第一条条文的思想

罗得同志显然已经把马尔托夫同志的基本错误弄到了荒谬的地步；他甚至把这个错误发挥成**机会主义理论**，因为他补充说：“按照列宁的条文，党章第一条是直接同无产阶级社会民主党的实质<!!>及其任务根本矛盾的。”（第243页）这恰恰等于说：对党提出的要求高于对阶级的要求，是同无产阶级任务的实质根本矛盾的。怪不得阿基莫夫要拚命拥护这个**理论**。

必须公正地指出，阿克雪里罗得同志**现在**想把这个显然有机会主义倾向的错误条文变成**新观点**的种子，但是他在代表大会上反而表示愿意“磋商”，他说：“但是我发现，我原来敲的是敞开的大门<我在新《火星报》上也发现了这一点>，因为列宁同志既然承认外围小组是党组织的一部分，也就是迎合了我的要求<不仅承认外围小组，而且还承认各种各样的工人联合会：参看记录第242页斯特拉霍夫同志的发言，以及上面从《怎么办？》和《给一

是要**促进**大家“组织起来！”，是要**保证实在**的监督和领导。从**实质**上看，中央代办员应不应该入党这个问题本身就是可笑的，因为对他们的**实在**的监督，**由于他们被任命为代办员**，由于他们被留在代办员的职位上，**已经有了完全的和绝对的保证**。所以，这里根本谈不上把有组织的东西和无组织的东西混为一谈（而这正是马尔托夫同志的条文中的错误的根源）。马尔托夫同志的条文所以要不得，就是因为它使每一个人，使每一个机会主义者，每一个夸夸其谈的人，每一个“大学教授”和每一个“中学生”都可以**宣布自己是党员**。这就是马尔托夫同志的条文的**致命弱点**，而马尔托夫同志却枉费心机地企图用一些根本谈不上什么自封为党员、自行宣布为党员的例子来**掩饰这个弱点**。

个同志的信》里摘录的一些话)。剩下的还有个别人，但是在这里也是可以磋商的。”我当时回答阿克雪里罗得同志说，一般说来，我并不反对磋商，但是我现在应当解释一下，这句话究竟是指什么而言。正是关于个别人，关于所有这些大学教授和中学生等等，我是最不同意作什么让步的。但是，如果引起怀疑的是工人组织问题，那我就会同意（虽然上面我已经证明，这种怀疑是完全没有根据的）给我的第一条条文加上这样一个附注：“凡是接受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党纲和党章的工人组织，应当尽量吸收到党组织中来。”当然，严格说来，党章应当以法律上的定义为限，这种愿望不适于在党章中规定，而只适于在解释性的注解中、在小册子中加以说明（我已经指出，还在党章制定之前很久，我就在自己的小册子中作过这样的解释）；但是，这样的附注至少丝毫不会有什么可能导致瓦解组织的**错误思想**，丝毫不会有马尔托夫条文中显然包含的**机会主义的论断**^①和“**无政府主义**的观念”。

① 在企图论证马尔托夫的条文时必然涌现出来的这些论断中，特别值得提出的是托洛茨基同志的一段话（第248页和第346页），他说：“机会主义是由一些比党章某一条文更复杂的原因造成的（或者说：由更深刻的原因决定的），——它是由资产阶级民主运动和无产阶级的相对发展水平引起的。……”但是问题不在于党章条文能造成机会主义，而在于要利用党章条文锻造出比较锐利的武器来反对机会主义。机会主义产生的原因愈深刻，这种武器也就应当愈锐利。因此，以机会主义有“深刻的原因”作理由来为向机会主义敞开大门的条文**辩护**，那就是十足的尾巴主义。当托洛茨基同志还在反对李伯尔同志时，他了解党章是整体对部分、先进部队对落

我加了引号的最后一个说法，是巴甫洛维奇同志的。他当时很公正地把承认“**不负责任的和自行列名入党的分子**”是党员的主张看作**无政府主义**。巴甫洛维奇同志向李伯尔同志解释我的条文时说，“如果翻译成普通

后部队所表示的“有组织的不信任”；而当托洛茨基同志已经站到李伯尔同志方面时，他却忘记了这一点，甚至用“复杂的原因”、“无产阶级的发展水平”等等，为我们在组织这种不信任（对机会主义的不信任）方面所表现的**软弱**和动摇辩护了。托洛茨基同志的另一个论据是说：“已有某种组织的青年知识分子，是更容易**自行列入**（着重号是我加的）党员名单的。”正是这样。所以，有知识分子模糊不清的毛病的，正是那个甚至容许无组织的分子**自行宣布**为党员的条文，而不是我的**绝对不许**人们“自行列入”名单的条文。托洛茨基同志说，中央委员会“不承认”机会主义者的组织，只是因为注意到这些人的性质，但是既然大家都知道这些人的政治面貌，那么他们就没有什么危险，因为可以用全党抵制的办法把他们驱逐出去。这一点只有在必须把某人**驱逐出党**的情况下才是对的（而且只是对了一半，因为有机党的党不是用抵制的办法而是用表决的办法**实行驱逐**的）。这一点在很多日常情况下，即在只需要**实行监督**而绝对不能**实行驱逐**时，是完全不正确的。中央委员会为了实行监督，可以**有意**把某一个虽然不完全可靠，但有工作能力的组织在一定条件下接纳到党内来，以便考验它，试图把它**引上正确道路**，用自己的领导来克服它的局部的倾向，等等。如果根本不允许“自行列入”党员名单，那么这样的接纳是没有危险的。为了能使人公开地和**负责地**，即在有监督的条件下表达（并讨论）其错误观点和错误策略，这样的接纳往往是有好处的。“但是，如果说法律上的定义应当适合事实上的关系，那么列宁同志的条文就应当被否决。”——托洛茨基同志这样说，但这又是机会主义者的说法。事实上的关系并不是死的，而是有生气的和不断发展的。法律上的定义能适合这些关系的进步发展，但是也能（如果这些定义是坏定义的话）“适合”退化或停滞。后一种情况也就是马尔托夫同志的“情况”。

话”，——这个条文就是说：“既然你想做一个党员，就还应当不只是抽象地承认组织关系。”这种“翻译”虽然很简单，但是它不仅对于那些各种各样可疑的大学教授和中学生，而且对于最真实的党员，对于上层人物，都不是多余的（正如代表大会以后的事件证明的那样）。……巴甫洛维奇同志同样公正地指出，马尔托夫同志的条文是同马尔托夫同志引证得很不恰当的那个不容争辩的科学社会主义原理相抵触的。“我们党是不自觉过程的自觉表现者。”正是如此。并且正因为如此，所以力求使“每一个罢工者”都能自称为党员的这一倾向是不正确的，因为假使“每次罢工”都不只是强大的阶级本能和必然引向社会革命的阶级斗争的自发表现，而是这个过程的自觉表现，那么……那么，总罢工就不是无政府主义的空话，那么我们的党就会立刻一下子**包括整个工人阶级**，因而也就会一下子把**整个资产阶级社会**消灭掉。为了真正成为自觉的表现者，党应当善于造成一种能**保证有相当的觉悟水平**并不断提高这个水平的组织关系。巴甫洛维奇同志说：“按照马尔托夫的道路走去，首先就要删掉关于承认党纲的条文，因为要接受党纲，就必须领会和了解这个党纲。……承认党纲是要有相当高的政治觉悟水平才能做到的。”我们从来不容许用任何要求（领会、了解等等）来人为地限制人们支持社会民主党以及参加它所领导的斗争，因为单是参加斗争这一事实本身就能提高觉悟性和组织本能，但是，既然我们**结成一个党**，以便进行有计

划的工作，那我们就应当设法保证这种计划性。

巴甫洛维奇同志关于党纲问题的警告原来不是多余的，这在同一次会议过程中就立即显示出来了。保证马尔托夫同志的条文得以通过的阿基莫夫同志和李伯尔同志^①立刻就暴露出自己的真正本性，他们要求（第254—255页）对于党纲也只要（为了取得“党员资格”）抽象地加以承认，即只承认它的“基本原理”就行了。巴甫洛维奇同志指出：“阿基莫夫同志的提议，从马尔托夫同志的观点看来，是完全合乎逻辑的。”可惜，我们从记录中看不出究竟有多少票赞成阿基莫夫的这个提议，——大概不少于七票（五个崩得分子⁽¹⁾，再加上阿基莫夫和勃鲁克尔）。正因为这七个代表退出了代表大会，所以原先在讨论党章第一条时形成的“紧密结合的多数派”（反火星派分子，“中派”和马尔托夫分子）结果变成了紧密结合的少数派！正因为这七个代表退出了代表大会，主张批准旧编辑部的提议才遭到了失败，《火星报》办报的“继承性”才受到这种似乎惊人的破坏！而这奇异的七个人却是《火

① 投票赞成这个条文的有二十八票，反对的有二十二票。八个反火星派分子中有七个人赞成马尔托夫，有一个人赞成我。假如没有机会主义者的帮忙，马尔托夫同志就不能使自己的机会主义条文通过。（马尔托夫同志在同盟代表大会上毫无成效地企图驳倒这件不成问题的事情，不知为什么只指出崩得分子的票数，而把阿基莫夫同志和他的朋友们忘记了，确切些说，只有在这一点可以作为攻击我的证据——勃鲁克尔同志同意我的条文——时，才想起这些人。）

星报》的“继承性”的唯一救星和保证：这七个人就是崩得分子以及阿基莫夫和勃鲁克尔，也就是说，正是那些对承认《火星报》为中央机关报的理由投过反对票的代表，而他们的机会主义立场曾经由代表大会肯定地指出过几十次了，并且是由马尔托夫和普列汉诺夫两人在讨论关于缓和党章第一条有关党纲的提法问题时肯定地指出过的。反火星派分子所捍卫的《火星报》的“继承性”！——这就是代表大会以后展开的一幕悲喜剧的开端。

* * *

表决党章第一条条文时形成的派别，也跟使用语言平等事件暴露的情况完全相同：由于火星报多数派方面有四分之一（大概数目）的票数脱离出去，结果就使“中派”所追随的反火星派有可能取得胜利。当然，这里也有个别的票数破坏了画面的完整性，——在象我们代表大会这样一个大规模的会议上，必然有一部分“野”票偶然地有时跑到这方有时跑到那方，尤其是在讨论党章第一条这样的问题时情况是这样，因为在这个问题上发生意见分歧的实质还刚刚显露出来，许多人简直还来不及把问题弄清楚（因为这个问题预先没有在书刊上探讨过）。从火星报多数派方面跑出去五票（各有两票表决权的鲁索夫和卡爾斯基以及有一票表决权的连斯基）；同时，又有一个反火星派分子（勃鲁克尔）和三个中派分子（梅德维捷夫、叶哥罗夫和察辽夫）归附到火星报多数派方面；结果多数派共有二十三票（24 - 5 + 4），比后来进行选举时

最终形成的派别少一票。反火星派分子使马尔托夫取得了多数，反火星派分子中有七个人赞成马尔托夫，有一个人赞成我（“中派”方面也有七票赞成马尔托夫，三票赞成我）。火星报少数派和反火星派以及“中派”的联盟——即在代表大会快结束时和在代表大会以后组成的紧密结合的少数派的那个联盟——开始形成起来。马尔托夫和阿克雪里罗得在提出党章第一条条文时，特别是在为这个条文辩护时所犯的无疑是向机会主义和无政府个人主义迈进了一步的政治错误，由于有代表大会这样一个自由的公开的舞台，立刻和特别明显地暴露出来了，具体表现就是，最不坚定的和最不坚持原则的分子马上发动了他们的全部力量来扩大社会民主党革命派观点中出现的裂缝或漏洞。在组织方面公开追求不同目的（见阿基莫夫的发言）的人们共同参加代表大会的事实，立刻就推动了在原则上反对我们的组织计划和反对我们的章程的人去支持马尔托夫同志和阿克雪里罗得同志的错误。在这个问题上仍然忠实于社会民主党革命派观点的火星派分子竟成了少数。这是一件有重大意义的事实，因为谁如果没有弄清楚这件事实，谁就根本无法了解由于争论党章的细节问题而发生的斗争，也无法了解由于争论中央机关报和中央委员会人选问题而发生的斗争。

（十七）新《火星报》。组织问题 上的机会主义

在剖析新《火星报》的原则立场时，无疑应当把阿克雪里罗得同志的两篇小品文^①当作基本对象来考察。关于他爱用的那一套字眼的具体意义，我们在上面已经详细地指出来了，因此现在应当竭力撇开这种具体意义，来仔细考察一下那个使“少数派”（根据某种细小的琐碎的论据）得出正是这些而不是什么别的口号的思考过程，探讨一下这些口号的原则意义，而不管它们的来源如何，不管“补选”问题如何。目前我们正处在让步空气浓厚的時候，那就让我们对阿克雪里罗得同志让一下步，“认真地谈谈”他的“理论”吧。

阿克雪里罗得同志的一个基本论点（《火星报》第57号），就是“我们的运动一开始就包含着两种对立的倾向，这两种倾向的互相对抗，不能不随着运动本身的发展而发展，同时又不能不影响这个运动”。这就是说：“在原则上，运动的无产阶级目的（在俄国）同西方社会民主党的目的是一样的。”可是，我们这里影响工人群众的却是“在他们看来是异己的社会成分”，即激进知识分子。总之，

① 这两篇小品文已收入《〈火星报〉两年来》文集，1906年圣彼得堡版第2册第122页及以下各页。（这是列宁给1907年版加的注。——编者注）

阿克雪里罗得同志认定，我们党内存在着无产阶级倾向和激进知识分子倾向之间的对抗。

阿克雪里罗得同志在这一点上无疑是正确的。在这里（而且不仅在俄国社会民主党一个党内）确实存在着这种对抗。况且，大家都知道，正是这种对抗才在很大程度上说明为什么现代社会民主党已经划分成革命的（即正统的）和机会主义的（即修正主义、内阁主义、改良主义的）两派，而这种划分也在我们俄国近十年来的运动中充分地显露了出来。同时大家又知道，社会民主党正统派所代表的正是运动中的无产阶级倾向，而社会民主党机会主义派所代表的则是民主知识分子倾向。

可是，阿克雪里罗得同志在接近到这个尽人皆知的事实时，便胆怯地向后退缩了。他一点也不打算分析一下，上述这种划分一般在俄国社会民主运动史上，尤其是在我们党代表大会上究竟是怎样表现出来的，虽然阿克雪里罗得同志所写的正是有关代表大会的问题！阿克雪里罗得同志也同新《火星报》整个编辑部一样，对这次代表大会的记录**怕得要死**。我们看了上述一切之后已不会对此表示惊奇，但是，这对一个仿佛在研究我们运动中各种倾向的“理论家”却是一件**害怕真相**的奇事。阿克雪里罗得同志由于自己有这个特性而避开了关于我们运动中各种倾向的最新最精确的材料，于是便到惬意的幻想中去求救。他说：“既然合法马克思主义^{〔12〕}或半马克思主义给我国自由派提供了一个文坛上的领袖，为什么捉弄人

的历史，就不能从正统的，即革命的马克思主义学派中提供一个领袖给革命的资产阶级民主派呢？”关于阿克雪里罗得同志的这种惬意的幻想，我们只能说，如果历史有时是在捉弄人，那么，这并不能替一个分析这种历史的人的捉弄人的思想作辩护。当那位半马克思主义的领袖显露出是一个自由派分子时，那些愿意（和善于）探讨他的“倾向”的人所引证的并不是什么可能有的历史捉弄，而是这位领袖数十种甚至数百种心理和逻辑的表现，是他全部著作的面貌特征，这些特征显出了马克思主义在资产阶级著作中的反映^[13]。既然阿克雪里罗得同志在分析“我们运动中的一般革命倾向和无产阶级倾向”时，**丝毫——确实是丝毫——**不能证明并指出他所痛恨的党内正统派的某些代表人物的某些倾向，那他只不过是**郑重地证明自己思想贫乏**罢了。既然阿克雪里罗得同志只能引证什么可能有的历史捉弄，那么，他的事情大概已经是十分不妙了！

阿克雪里罗得同志的另一引证，即关于“雅各宾派”^[14]的引证，是更有教益的。阿克雪里罗得同志大概不会不知道，现代社会民主党分成革命派和机会主义派，早已——并且不仅在俄国——使人有了运用“法国大革命时代的历史比拟”的借口。阿克雪里罗得同志大概不会不知道，现代社会民主党中的**吉伦特派**^[14]随时随地都在用“雅各宾主义”、“布朗基主义”^[15]之类的术语来形容自己的对手。我们不会象阿克雪里罗得同志那样害怕真

相，且让我们来翻阅一下我们代表大会的记录，看看这些记录究竟有没有什么材料可供我们分析和检查现在我们所考察的这些倾向和我们所剖析的这种比拟。

第一个例子。在党代表大会上关于党纲的争论。阿基莫夫同志（他“完全赞同”马尔丁诺夫同志的意见）声明：“关于夺取政权（即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一段条文写得跟所有其他各国社会民主党的纲领不同，这种写法有可能被解释成领导组织的作用一定会把受它领导的那个阶级推到后面去，并把它自己和那个阶级隔离开，而且普列汉诺夫就是这样解释的。因此，我们的政治任务也就表述得完全和‘民意党’的一样。”（记录第 124 页）普列汉诺夫同志和其他火星派分子反驳了阿基莫夫同志，指责他这是一种机会主义观点。阿克雪里罗得同志难道看不出，这次争论向我们表明（是用事实，而不是用想象的历史捉弄）社会民主党内有**现代雅各宾派**和**现代吉伦特派**相对抗吗？阿克雪里罗得同志所以谈起雅各宾派来，不正是因为他（由于他所犯的错误）已经与社会民主党内的**吉伦特派**为伍了吗？

第二个例子。波萨多夫斯基同志认为在“民主原则的绝对价值”这个“基本问题”上存在着“严重的意见分歧”（第 169 页）。他和普列汉诺夫一起否认民主原则的绝对价值。“中派”或泥潭派首领（叶哥罗夫）和反火星派首领（哥尔德勃拉特）坚决反对这种看法，认为普列汉诺夫是在“仿效资产阶级的策略”（第 170 页），——这正是

阿克雪里罗得同志认为正统派同资产阶级倾向有联系的看法，所不同的只是阿克雪里罗得没有把这种看法具体地说出来，而哥尔德勃拉特则把它同一定的辩论联系起来。我们不妨再问一次：阿克雪里罗得同志难道看不出这次争论也向我们**具体地**（在我们党代表大会上）表明了现代社会民主党内有雅各宾派和吉伦特派相对抗吗？阿克雪里罗得同志所以高喊反对雅各宾派，不正是因为他已经与吉伦特派为伍了吗？

第三个例子。关于党章第一条的争论。究竟是谁在捍卫“**我们运动中的无产阶级倾向**”，谁在强调说明工人不怕组织，无产者不同情无政府状态，无产者重视“组织起来！”这个口号的促进作用呢？究竟是谁叫人防范那些浸透机会主义思想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呢？是**社会民主党中的雅各宾派**。究竟是谁在把激进知识分子拉到党里来，是谁在关心大学教授和中学生、单干人物和激进青年呢？是**吉伦特派分子阿克雪里罗得伙同吉伦特派分子李伯尔**。

阿克雪里罗得同志为在我们党代表大会上公开散播的那个加给“劳动解放社”^[16]多数人的“莫须有的机会主义罪名”进行辩护，可是他辩护得多么笨拙啊！他不过是重弹伯恩施坦派的一些关于雅各宾主义、布朗基主义等等的陈词滥调，从而证实这个罪名有根有据罢了！他高喊什么激进知识分子的危险，无非是为了掩饰他自己在党代表大会上发表的那些对这种知识分子关怀备至的

言论。

使用雅各宾主义等等这些“吓人的字眼”，只是暴露出自己有机会主义思想罢了。同已经意识到本阶级利益的无产阶级的组织密切联系在一起的雅各宾派分子，就是革命的社会民主党人。留恋大学教授和中学生，害怕无产阶级专政，迷恋民主要求的绝对价值的吉伦特派分子，就是机会主义者。现在，把政治斗争缩小为密谋活动的思想已经在书刊上被驳斥过几千次了，它早就被实际生活驳倒和排挤掉了，群众性的政治鼓动的根本重要意义已经被阐明和反复地说明了，在这种情况下，只有机会主义者还会认为密谋组织是危险的东西。人们害怕密谋主义即布朗基主义的实际原因，并不是实际运动显露出来的某种特征（象伯恩施坦之流早就枉费心地力图证明的那样），而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那种在现代社会民主党人中间常常暴露出来的吉伦特派的怯懦心理。最滑稽不过的就是新《火星报》拚命想说出一种新意见（其实这种意见早已有人说过几百次了），即要人们防范四十年代和六十年代法国革命密谋家的策略（第62号上的社论）^[17]。在即将出版的一号《火星报》上，现代社会民主党中的吉伦特派大概会给我们举出这样一批四十年代的法国密谋家，对这些人来说，在工人群众中进行政治鼓动的作用，工人报纸作为党用来影响阶级的基本工具的作用，早已成了背得烂熟的起码常识。

可是，新《火星报》力图在发表新意见的幌子下重提

旧事和咀嚼起码常识，这决不是偶然的，而是已经堕落到我党机会主义派中去的阿克雪里罗得和马尔托夫所处的地位的必然结果。处于什么样的地位，讲什么样的话。所以他们只好重复机会主义词句，只好**向后退**，以便从**遥远的过去**找到一点什么理由来替自己的立场辩护，但从代表大会上的斗争来看，从代表大会上形成的党内各种不同的色彩和派别划分来看，这个立场是无法辩护的。阿克雪里罗得同志除了谈一些阿基莫夫式的关于雅各宾主义和布朗基主义的深奥思想，还发了一些阿基莫夫式的怨言，说不仅“经济派”而且“政治派”也有“片面性”、过分“迷恋”的毛病等等。当你在妄自尊大、自以为比有上述一切片面性和迷恋毛病的人高明的新《火星报》上读到有关这个题目的高谈阔论时，你就会惶惑莫解地自问道：他们是在照着谁画像？他们是从什么地方听到这些议论的？^[18]谁不知道俄国社会民主党人分成经济派和政治派的时期早已过去了呢？你们看看党代表大会以前一两年的《火星报》，就会知道，反对“经济主义”的斗争还在1902年就平息下去了，完全停止了；就会知道，例如，在1903年7月（第43号），人们就认为“经济主义时代”“已经完全过去了”，经济主义“已经被彻底埋葬了”，认为政治派的迷恋是一种明显的返祖现象。《火星报》新编辑部究竟根据什么理由重新提起这个已经被彻底埋葬了的划分呢？难道我们在代表大会上同阿基莫夫之流进行斗争，是因为他们两年以前在《工人事业》杂志^[19]上犯的那些错误吗？

如果是这样，那我们就成了十足的白痴了。可是，谁都知道我们并没有这样做，我们在代表大会上同阿基莫夫之流进行斗争，不是因为他们《工人事业》杂志上所犯的旧的、已经被彻底埋葬了的错误，而是因为他们代表大会上发言和表决时犯了新的错误。我们并不是根据他们在《工人事业》杂志上的立场，而是根据他们在代表大会上的立场来判断究竟哪些错误已经真正消除，哪些错误仍然存在，因而有争论的必要。到举行代表大会时，经济派和政治派这种旧的划分已不存在，但是各种机会主义倾向仍然存在，这些倾向曾经在讨论和表决许多问题时表现了出来，并且终于造成党的“多数派”和“少数派”的新划分。问题的全部实质在于，《火星报》新编辑部由于某些很明显的原因为图掩盖这种新的划分同我们党内当前机会主义的联系，因此也就不得不从新的划分退到旧的划分上去。既然不善于说明新的划分的政治起源（或者说，为了让步而想掩盖^①这种起源），那就只好去反复

① 见《火星报》第五十三号上普列汉诺夫关于“经济主义”的文章。在这篇文章的副题上，大概印错了几个字。“关于第二次党代表大会的几点公开意见”显然应该是“关于同盟代表大会”，也许是“关于补选”。虽然在一定条件下可以对个人的要求作些让步，然而决不容许——不是从庸人观点而是从党的观点来看——把党所关心的一些问题混淆起来，不能把已经开始由正统派方面转到机会主义方面去的马尔托夫和阿克雪里罗得所犯的新错误问题，偷换为今天在纲领和策略的许多问题上也许愿意由机会主义方面转到正统派方面来的马尔丁诺夫之流和阿基莫夫之流所犯的旧错误（即现在只有新《火星报》才会回忆的错误）问题。

咀嚼早已过时的旧划分。尽人皆知，新划分的根据是在**组织问题上的分歧**，这种分歧是由组织原则（党章第一条）的争论引起的，其结果便是只有无政府主义者才干得出来的“实践”。经济派和政治派之间的旧划分的根据主要是在**策略问题上的分歧**。

这种由党内生活的真正是当前迫切的更为复杂的问题退回到早已解决而现在又故意翻腾出来的问题上去的行为，新《火星报》正在竭力用一种只能称为尾巴主义的可笑的深奥思想加以辩护。阿克雪里罗得同志首创的那个贯穿在新《火星报》一切言论中的深奥“思想”，就是认为内容比形式重要，纲领和策略比组织重要，认为“组织**的生命能力同它所灌输给运动的那种内容的范围和意义成正比**”，认为集中制不是“自满自足的东西”，不是“万灵丹”等等，等等。这是多么深奥而伟大的真理呵！纲领的确比策略重要，策略比组织重要。识字课本比词法重要，词法比句法重要，——可是，关于那些在考试句法时没有及格而现在居然因留级而矜夸的人，又能说些什么呢？阿克雪里罗得同志在组织原则问题上的议论，象一个机会主义者（关于党章第一条），而在组织中的行动象一个无政府主义者（在同盟代表大会上），现在他又在加深社会民主主义：葡萄还是酸的！（20）其实，什么是组织呢？它不过是一种形式罢了；什么是集中制呢？它不是万灵丹；什么是句法呢？它并不象词法那样重要，它不过是把各个单词联结起来的形式罢了……《火星报》新编辑部得意地

问道：“如果我们说，代表大会制定党纲要比它通过一个无论怎样完善的党章更能促进党的工作的集中化，难道亚历山大罗夫同志会不同意我们的说法？”（第 56 号的附刊）可以设想，这个经典性的名言将要博得的广泛而持久的历史名声，不会亚于克里切夫斯基同志所说的那句名言：社会民主党也和人类一样，永远只给自己提出可以实现的任务。新《火星报》的这个深奥思想真是与此如出一辙。为什么克里切夫斯基同志的这句话遭到讥笑呢？这是因为他用了一种冒充哲学的庸俗议论来替某一部分社会民主党人在策略问题上的错误辩护，替他们不会正确地提出政治任务辩护。同样，新《火星报》也是用一种所谓党纲比党章重要、党纲问题比组织问题重要的庸俗议论，来替某一部分社会民主党人在组织问题上的错误辩护，替某些同志的那种导致无政府主义空话的知识分子的不坚定性辩护！这难道不是尾巴主义吗？这难道不是因留级而夸耀吗？

通过党纲要比通过党章更能促进工作的集中化。这种冒充哲学的庸俗议论散发着多么浓厚的激进知识分子的气味，这种知识分子对资产阶级颓废思想比对社会民主主义要亲近得多！要知道，集中化这个词在这句名言里完全是从**象征**的意义上理解的。如果说这句话的人不善于或者不愿意思索，那么他们至少也应该回忆一下这个简单的事实：我们和崩得分子共同通过党纲，这不仅没有使我们共同的工作集中化，而且也没有使我们避免

分裂。在党纲问题上和在策略问题上的一致是保证党内团结，保证党的工作集中化的必要条件，但只有这个条件还是不够的（我的老天呀！在今天一切概念都弄得混淆不清的时候，一个多么浅显的道理也要人翻来覆去地讲！）。为了保证党内团结，为了保证党的工作集中化，还需要有组织上的统一，而这种统一在一个多少超出了家庭式小组范围的党里面，如果没有正式规定的党章，没有少数服从多数，没有部分服从整体，那是不可想象的。当我们在纲领和策略的基本问题上还没有一致时，我们曾直截了当地说，我们是处在一个涣散状态和小组习气盛行的时代，我们曾直截了当地声明，在统一之前必须划清界限，我们当时还没有说到共同组织的形式，只是谈到在纲领和策略方面同机会主义斗争的那些新问题（这在当时确实是些新问题）。现在我们大家都认为，这个斗争已经保证了表述在党纲和党关于策略的决议中的充分的一致；现在我们必须采取下一个步骤，于是我们就在我们大家的同意下实行了这个步骤：我们制定了把一切小组溶为一体的统一组织的**形式**。现在却有人把我们拉向后退，把这些形式破坏了一半，把我们拉去干无政府主义的行为，讲无政府主义的空话，恢复小组来代替党的编辑部，而现在又用什么读识字课本要比学句法更能促进文理通顺的道理来替这种退步辩护！

三年前在策略问题上盛行一时的尾巴主义哲学，现在又在组织问题上复活了。我们不妨看看新编辑部发表

的这样一段议论。亚历山大罗夫同志说：“战斗的社会民主主义方针，在党内不只应当通过思想斗争，而且应当通过一定的组织形式来实行。”编辑部教训我们说：“把思想斗争和组织形式这样相提并论，的确不坏。思想斗争是一种过程，而组织形式不过是……形式（在第五十六号的附刊第四版第一栏下面确实是这样刊印的！），这些形式应当包着一种流动的、发展着的内容，即发展着的党的实际工作。”这种说法和那种说实心炮弹是实心炮弹，爆炸炮弹是爆炸炮弹的笑话毫无二致。思想斗争是一种过程，而组织形式不过是包着内容的形式！问题在于我们的思想斗争是由**较高级**的形式，即对大家都有约束力的党组织的形式包着呢，还是由过去的涣散状态和小组习气的形式包着。人们把我们从较高级的形式拉回到较原始的形式上去，并且还为此辩护，说什么思想斗争是一种过程，而形式不过是形式。这和克里切夫斯基同志从前把我们从计划策略拉回到过程策略上去是一模一样的。

我们不妨看一看新《火星报》为了反对那些似乎只看到形式却看不到内容的人而说的这些关于“无产阶级的自我教育”的大话（第58号的社论）。难道这不是第二号阿基莫夫主义吗？头号阿基莫夫主义曾经拿“无产阶级斗争”的更“深刻”内容，无产阶级的自我教育，来替社会民主党内某一部分知识分子在策略任务的提法上的落后辩护。第二号阿基莫夫主义，也用组织不过是形式而整个实质在于无产阶级的自我教育这种同样深奥的理由，

来替社会民主党内某一部分知识分子在组织的理论和实践问题上的落后辩护。替小兄弟操心的先生们，无产阶级是不怕组织和纪律的！无产阶级是不会去操心让那些不愿加入组织的大学教授先生和中学生先生因为在党组织的监督下工作，就被承认为党员的。无产阶级由它的全部生活养成的组织性，要比许多知识分子彻底得多。对我们党纲和策略已经有些认识的无产阶级，是不会用形式不如内容重要的口实来替组织上的落后辩护的。并不是无产阶级，而是我们党内**某些知识分子**，在组织和纪律方面缺乏**自我教育**，在仇视和鄙视无政府主义空话方面缺乏**自我教育**。正如头号阿基莫夫之流从前诬蔑无产阶级，说它还没有成熟到进行政治斗争的地步一样，现在第二号阿基莫夫之流也在诬蔑无产阶级，说它还没有成熟到组织起来的地步。已经成为自觉的社会民主主义者并感到自己是党员的无产者，也一定会象他从前用十分鄙视的态度斥责策略问题上的尾巴主义那样来斥责组织问题上的尾巴主义。

最后，请看一看新《火星报》的那位“实际工作者”⁽²¹⁾的深奥思想吧。他说：“建立一个能将革命家的**活动**〈用着重号是为了加深意思〉统一集中起来的‘战斗的’集中组织的思想，即使被人正确理解，也只有在**有了**这种活动的时候才会自然实现〈真是既新颖又聪明〉；组织本身作为一种形式〈请听，请听呀！〉，只能**随着**〈这里以及这段引文里其他各处的着重号，都是作者自己加的〉构成其内容

的革命工作的开展而成长起来。”(第 57 号)这岂不又一次使我们想起民间故事里的那个遇见人家送葬时高喊“但愿你们拉也拉不完”〔22〕的人物吗?大概,我们党内没有哪一个实际工作者(不带引号的)不了解:我们活动的形式(即组织)老早就落在内容的后面了,并且落后得太远了;只有党内的伊万努什卡才会向落在后面的人们喊:齐步前进!不要抢先!不妨拿我们党和崩得比较一下。毫无疑问,我们党的**工作内容**①要比崩得的工作内容丰富、多样、广泛、深入得多。理论规模更巨大,纲领更成熟,对工人群众(不仅对有组织的手工业者)的影响更广泛更深刻,宣传鼓动工作更多样,在先进分子和普通分子那里的政治工作的脉搏更活跃,在示威和总罢工时开展的人民运动更壮阔,在非无产者阶层中进行的活动更有力。可是“形式”怎样呢?我们工作的“形式”同崩得工作的形式比起来竟落后到不能容忍的地步,落后得使每一个对自己党内事务不“袖手旁观”的人都感到痛心和羞愧。工作的组织比工作的内容落后,是我们的一个弱点,并且远在召开代表大会以前,远在组委会成立以前,就已经是我们的一个弱点了。由于形式不成熟、不牢固,我们

① 且不必说,我们党的**工作内容**在代表大会上是按社会民主党革命派的精神确定(在党纲等等中确定)的,这只是用**斗争的代价**换来的,是我们同那些反火星派分子以及在“少数派”内占大多数的泥潭派分子斗争的结果。关于“内容”问题,如把旧《火星报》所出版的六号(第 46—51 号)同新《火星报》所出版的十二号(第 52—63 号)比较一下,那也是很有趣的。但这只好另外有机会再说了。

无法采取继续前进的重大步骤来发展内容，因而造成了可耻的停滞，力量的浪费，言行的不一。大家都为这种言行不一而大伤脑筋，可是阿克雪里罗得之流和新《火星报》的“实际工作者们”，却在这时来鼓吹深奥思想形式只应当随着内容自然地成长起来！

如果有人想**加深**谬论并从哲学上替机会主义词句找根据，那就请看在组织问题（党章第一条）上所犯的小错误会引向怎样的结局吧。要慢慢地走，要小心翼翼地曲折前进！^{〔23〕}——从前我们就听见有人用这个调子来对待策略问题；现在我们又听见有人用这个调子来对待组织问题。**组织问题上的尾巴主义是无政府个人主义者的心理的自然的和必然的产物**，只要他开始把自己的（起初也许是偶然的）无政府主义倾向上升为**观点的体系**，上升为一种特别的**原则意见分歧**，就会是这种情况。在同盟代表大会上，我们看见了这种无政府主义的开端；在新《火星报》上，我们又看见有人企图把它上升为观点的体系。这种企图十分明显地证实了我们在党代表大会上已经表示过的意见：参加社会民主运动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观点跟意识到本阶级利益的无产者的观点是不同的。例如，新《火星报》的那位“实际工作者”（他的深奥思想我们已经领教过了）揭发我，说我把党想象成一个“大工厂”，厂长就是中央委员会（第 57 号的附刊）。这位“实际工作者”根本没有料到，他提出来的这个吓人的字眼一下子就暴露出既不了解无产阶级组织的实际工作又不了解无产

阶级组织的理论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心理。工厂在某些人看来不过是一个可怕的怪物，其实工厂是资本主义协作的最高形式，它把无产阶级联合了起来，使它纪律化，教它学会组织，使它成为其余一切被剥削劳动群众的首脑。马克思主义是由资本主义训练出来的无产阶级的思想体系，正是马克思主义一贯教导那些不坚定的知识分子要把工厂的剥削作用（建筑在饿死的威胁上面的纪律）和工厂的组织作用（建筑在由技术高度发达的生产条件联合起来的共同劳动上面的纪律）区别开来。正因为无产阶级在这种工厂“学校”里受过训练，所以它特别容易接受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难以接受的纪律和组织。对这种学校怕得要死，对这种学校的组织作用一无所知，这正是那些反映小资产阶级生存条件的思想方法的特点，这种思想方法产生了德国社会民主党人叫作Edelanarchismus的无政府主义即“贵族式的”无政府主义，据我看不如把它称作老爷式的无政府主义。这种老爷式的无政府主义是俄国虚无主义者所特有的。党的组织在他们看来是可怕的“工厂”；部分服从整体和少数服从多数在他们看来是“农奴制”（见阿克雪里罗得的小品文），他们一听见在中央领导下实行分工，就发出可怜又可笑的嚎叫，反对把人们变成“小轮子和小螺丝钉”（并且他们认为特别吓死人的，就是把编辑变成工作人员），他们一听见有人提起党的组织章程，就作出瞧不起人的样子，发表鄙视的（对“形式主义者”）意见，说完全不要章程也可以。

这是难以置信的，但这是事实：马尔托夫同志在《火星报》第五十八号上向我提出的正是这样一种训示，并且为了更加使人信服，还从《给一个同志的信》里引了我本人的话。举一些涣散时代的例子，小组时代的例子，来替在党性时代保持和赞美小组习气、无政府状态辩护，这难道不是“老爷式的无政府主义”，这难道不是尾巴主义吗？

为什么从前我们不需要章程呢？因为当时党是由一些彼此没有任何组织联系的单个小组组成的。当时由这一小组转到另一小组，只是某一个人“自愿”的事情，并没有任何正式规定的整体意志作为他的行动的准绳。各个小组内部的争论问题不是按照章程，“而是用斗争和退出的要挟”来解决，正如我在《给一个同志的信》^①里根据许多小组特别是我们六人编辑部的经验所说的那样。在小组时代，这种现象是自然的和不可避免的，可是谁都没有想到要赞美它，没有认为它是理想的；大家都埋怨过这种涣散状态，大家都为此感到苦恼，渴望把各个零星小组溶为一个正式的党组织。现在，这种溶合实现了，却有人把我们拉向后退，用冒充最高组织观点的无政府主义的空话来款待我们！在那些过惯了穿着宽大睡衣、趿拉着拖鞋的奥勃洛摩夫^[24]式的家庭式小组生活的人们看来，正式章程是太狭隘、太狭窄、太累赘、太低级了，太官僚主义化、太农奴制度化了，太约束思想斗争的自由“过程”了。

① 见《列宁全集》第6卷第204—221页。——编者注

老爷式的无政府主义不了解，正式章程所以必要，正是为了用广泛的党的联系来代替狭隘的小组联系。一个小组内部或各个小组之间的联系，在过去是不需要规定的，也是无法规定的，因为这种联系是靠朋友关系或盲目的、没有根据的“信任”来维持的。党的联系不能而且也不应该靠这两种东西来维持。党的联系一定要以**正式的**，即所谓“用官僚主义态度”（在自由散漫的知识分子看来）制定的章程为基础，也只有严格遵守这个章程，才能保证我们摆脱小组的刚愎自用，摆脱小组的任意胡闹，摆脱美其名为思想斗争的自由“过程”的小组争吵。

新《火星报》编辑部打出的一张反对亚历山大罗夫的王牌，就是用教训的口吻指出：“信任是一种微妙的东西，决不能把它钉到人心和脑袋里去。”（第56号的附刊）编辑部不了解，正是提出信任——**单纯的信任**——这一范畴本身，再一次把它那种老爷式的无政府主义和组织上的尾巴主义暴露了出来。当我还只是一个小组——无论《火星报》六人编辑部或《火星报》组织——的成员时，譬如我为了说明我不愿意同某某人在一起工作，我有权拿那种盲目的、没有根据的不信任当作唯一的借口。当我成了一个党员时，**我就没有权利**只凭感情来表示不信任了，因为我这样做，便给以前小组习气盛行时代的一切任意胡闹和刚愎自用的现象大开方便之门；**我有责任**用正式的理由，即根据我们纲领、我们策略、我们党章中某一项正式规定的原则来说明我为什么“信任”或“不信任”；

我就不能只限于盲目的“信任”或“不信任”，而必须承认我自己的决定以及党内任何一部分的一切决定都要对全党负责；我必须遵照**正式规定**的手续来表示自己的“不信任”，来实现根据这种不信任所得出的观点和愿望。我们已经从盲目“信任”的**小组**观点，提高到**党的**观点。党的观点要求我们按照受监督的和正式规定的手续，来表示和**检查**信任，可是编辑部却把我们拉向后退，并把自己的尾巴主义叫作新的组织观点！

请看，我们的所谓党的编辑部怎样议论那些也许要求派代表参加编辑部的作家集团吧。时时处处都藐视纪律的老爷式的无政府主义者教训我们说：“我们不会发怒，我们不会叫起纪律来。”他们说什么，假如提出这种要求的是一个能干的集团，我们就同它“达成协议”（原文如此！）；不然我们就对它的要求置之一笑。

你看，这对庸俗的“工厂式的”形式主义该是一种多么高贵的态度呀！其实，这只是编辑部赠给党的一套略加修饰的、充满小组习气的辞令，编辑部感到它不是一个党的机关，而是旧时小组的残余。这种立场的内在的虚伪性，必然会产生**无政府主义**的深奥思想，这种深奥思想把涣散状态推崇为社会民主党组织的**原则**，同时在口头上又伪善地把这种涣散状态说成是早已过去了的事情。根本不需要什么由上下各级党机关构成的体系，因为在老爷式的无政府主义看来，这种体系不过是办公室里拟制的司厅科股等等的玩意（见阿克雪里罗得的小品文）；

根本不需要什么部分服从整体的原则，根本不需要对党的“达成协议”或划清界限的办法作出“形式的官僚主义的”规定，还是让人们去空谈“真正社会民主主义的”组织方法，崇尚旧时的小组争吵吧。

正是在这方面，受过“工厂”训练的无产者可以而且应当来教训无政府个人主义者。觉悟的工人早已脱离了害怕同知识分子打交道的幼稚状态。觉悟的工人善于尊重他在知识分子社会民主党人那里发现的比较丰富的知识、比较广阔的政治视野。可是，随着我们这个真正的政党的形成，觉悟的工人应当学会辨别无产阶级军队的战士的心理和爱说无政府主义空话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心理，应当学会不仅要求普通党员，而且要求“上层人物”履行党员的义务，应当学会象他从前蔑视策略问题上的尾巴主义那样，来蔑视组织问题上的尾巴主义！

新《火星报》在组织问题上的立场的最后一个特点，是同吉伦特主义和老爷式的无政府主义密切联系在一起的：这就是拥护自治制，反对集中制。对官僚主义和专制的嚎叫，对“非火星派分子〈在代表大会上拥护自治制的非火星派分子〉受到不应有的忽视”的惋惜，对“唯命是从”这种要求的滑稽喊叫，对“昏愤刚愎”的伤心抱怨等等，正是含有这样的原则意思（如果说含有什么原则意思的话^①）。任何一个党的机会主义派总是捍卫和辩护任

① 这里我也和在本节其他地方一样，把这些嚎叫的“补选”意思撇开不谈。

何一种落后表现的，无论在纲领方面、策略方面或组织方面都是如此。新《火星报》拥护组织方面的落后表现（尾巴主义），是同拥护自治制密切联系着的。诚然，一般说来，经过旧《火星报》三年来的宣传揭露，自治制已经名声很坏了，因此新《火星报》公开拥护自治制还有些害羞；它还硬要我们相信它同情集中制，不过它用来证明这一点的，只是给集中制这个词加上着重号罢了。其实，只要稍微考察一下新《火星报》的所谓“真正社会民主主义的”（不是无政府主义的吗？）准集中制的“原则”，处处都会发现拥护自治制的观点。难道现在不是大家都看见阿克雪里罗得和马尔托夫在组织问题上已经转到阿基莫夫那里去了吗？难道他们自己不是用所谓“非火星派分子受到不应有的忽视”这句名言郑重地承认了这一点吗？难道阿基莫夫和他的朋友们在我们党的代表大会上所拥护的不是自治制吗？

马尔托夫和阿克雪里罗得在同盟代表大会上所拥护的正是自治制（如果不是无政府主义的话），当时他们令人可笑地竭力证明：部分不应该服从整体，部分在决定自己对整体的关系时应有自治权，确定了这种关系的国外同盟章程是在违反党内多数的意志、违反党中央机关的意志的情况下生效的。现在马尔托夫同志在新《火星报》（第60号）上说到中央委员会指定地方委员会委员问题时公开拥护的正是自治制。我不来谈马尔托夫同志在同盟代表大会和现在在新《火星报》上用来拥护自治制的那些

幼稚的诡辩^①，我认为重要的是，应当在这里指出他无疑有**拥护自治制、反对集中制**的倾向，这种倾向是组织问题上的机会主义所固有的根本特征。

在新《火星报》(第53号)上拿“形式的民主主义的原则”(着重号是原作者加的)和“形式的官僚主义的原则”相对照，要算是分析官僚主义这个概念的唯一尝试了。这种对照(可惜，这种对照也象提到非火星派分子时那样没有加以发挥，没有加以阐明)，也多少有些道理。官僚主义对民主主义，这也就是集中制对自治制，也就是社会民主党革命派的组织原则对社会民主党机会主义派的组织原则。后者力求自下而上地来行动，因此在凡是可能的地方和凡是可能的程度内，都坚决主张实行自治制，主张实行达到(在那些狂热坚持这点的人们那里)无政府主义地步的“民主主义”。前者力求由上层出发，坚决主张扩大中央对于部分的权利和权限。在涣散状态和小组习气盛行的时代，这种上层机关(社会民主党革命派力求在组织上由上层出发)必然是一个由于自己的活动和自己的革命彻底性而享有极大威信的小组(在我们这里就是《火星报》组织)。在恢复党的真正统一并在这个统一的基础上解散各个过了时的小组的时代，这种上层机关必

① 马尔托夫同志列举党章各项条文时，恰巧遗漏了说明整体对部分的关系的一条：中央委员会“分配全党人力”(第6条)。如果不把工作人员从一个委员会调到另一个委员会去，那怎么能分配人力呢？关于这个浅显的道理，真是不好意思来说明。

然是党的代表大会，即党的最高机关；代表大会尽可能把各个积极组织的所有代表团结起来，任命中央机关（它的成分往往是多让党内先进分子满意，少让党内落后分子满意，多让党内革命派喜欢，少让党内机会主义派喜欢），使它成为党的最高机关，直到召开下届代表大会为止。至少在欧洲社会民主党人那里是如此；目前，无政府主义者所根本仇视的这种惯例在亚洲社会民主党人中间也开始流行起来，虽然流行得很慢，不免要遇到困难，不免要遇到斗争，不免要遇到无谓争吵。

非常值得指出的是，我在上面所谈到的组织问题上的机会主义的这些根本特征（自治制、老爷式的或知识分子的无政府主义、尾巴主义和吉伦特主义），在世界各国社会民主党内，在凡是划分为革命派和机会主义派的地方（试问在什么地方没有这种划分呢？）都可以看到，不过有相应的改变罢了。这种情形最近在德国社会民主党内暴露得特别明显，第二十号萨克森选区竞选的失败（所谓觉勒事件^①），把党的组织原则提到日程上来了。由这一事件引起了原则问题，这主要是德国机会主义者推波助

① 觉勒 1903 年 6 月 16 日曾在第十五号萨克森选区里被选为国会议员，但他在德勒斯顿代表大会〔25〕以后辞去了议员职务。第二十号选区在议员罗津诺夫逝世后出现空缺，该区选民又想推举觉勒为候选人。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和萨克森中央鼓动委员会对此表示反对，虽然它们没有权利正式禁止推举觉勒为候选人，但是它们终于使觉勒放弃了候选人的资格。在这次选举中，社会民主党人遭到了失败。

澜的结果。觉勒（他从前是一个牧师，他是不无名气的《当工厂工人的三个月》一书的作者，他是德勒斯顿代表大会上的“主角”之一）本人是一个疯狂的机会主义者，所以彻底的德国机会主义者的机关刊物《社会主义月刊》^{〔26〕}就立刻来“袒护”他。

纲领上的机会主义，自然是同策略上的机会主义和组织问题上的机会主义有联系的。当时出面陈述“新”观点的是沃尔弗干格·海涅同志。为了向读者说明这个参加社会民主党并带来机会主义思想习气的典型知识分子的面目，只要指出沃尔弗干格·海涅同志是一个比德国的阿基莫夫同志小一点而比德国的叶哥罗夫同志大一点的人物就够了。

沃尔弗干格·海涅同志在《社会主义月刊》上，也象阿克雪里罗得同志在新《火星报》上那样大举进攻。单是文章的标题《对觉勒事件的几点民主意见》（《社会主义月刊》4月第4期），就已经了不起了。内容也同样是很厉害的。沃·海涅同志反对“侵犯选区自治权”，捍卫“民主原则”，抗议“委任的上司”（即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干涉人民自由选举议员。沃·海涅同志教训我们说，问题并不在于偶然事件，而在于一般“**在党内有一种官僚主义和集中制的倾向**”，这种倾向从前也有过，但是现在变得特别危险了。必须“在原则上承认：党的地方机关是党的生活的体现者”（这是从马尔托夫同志所写的《又一次处在少数地位》这本小册子中剽窃来的）。不要“习惯于让一切

重要政治决定都出自一个中央机关”，应当要党防备“脱离实际生活的教条政策”（这是从马尔托夫同志在党代表大会上大谈“实际生活一定会显示自己的力量”那篇发言中借来的）。沃·海涅同志加深自己的论据说：“……如果细心观察事物的根源，如果把这次也和任何时候一样起过不小作用的种种个人冲突撇开不谈，那么我们会从这种激烈反对修正主义者的斗争中看到〈着重号是原作者加的，大概是想暗示要把“对修正主义的斗争”和“对修正主义者的斗争”这两个概念区别开来吧〉，主要是党内的官方人士对‘局外人’〈沃·海涅显然还没有读过论反对戒严状况的小册子，因此只好借用英国式的名词：Outsidertum〉表示不信任，传统对一切异乎寻常的现象表示不信任，没有个性的机关对一切有个性的东西表示不信任〈见阿克雪里罗得在同盟代表大会上提出的关于反对压制个人主动性的决议案〉，一句话，就是我们在前面所说明的那种倾向，就是党内官僚主义和集中制的倾向。”

“纪律”这个概念在沃·海涅同志的心里所引起的高尚愤怒，并不亚于阿克雪里罗得同志。他写道：“……有人指责修正主义者缺乏纪律，只是因为他们给《社会主义月刊》写过文章，有人甚至不愿承认这个刊物是社会民主主义的，因为它不受党的监督。单是这种试图缩小‘社会民主主义’这一概念的做法，单是这种让人在应当有绝对自由的思想生产方面遵守纪律的要求〈请回忆一下所谓思

想斗争是一个过程，而组织形式不过是形式的说法》，就足以证明那种官僚主义和压制个性的倾向了。”接着沃·海涅又滔滔不绝地百般攻击这种创造“一个包罗万象的、尽量集中化的巨大组织，一个策略，一个理论”的可恨倾向，攻击“绝对服从”、“盲目服从”的要求，攻击“简单化的集中制”等等，真是一字不差地“模仿阿克雪里罗得”。

沃·海涅所挑起的争论激烈起来了，因为德国党内没有什么由补选问题引起的无谓争吵把这个争论遮盖起来，因为德国的阿基莫夫之流不仅在代表大会上而且经常在专门的机关刊物上暴露自己的面目，所以这次争论很快就变成了对正统思想和修正主义在组织问题上的原则倾向的分析。以革命派（它当然也和我们这里一样被人加上“独裁制”和“宗教裁判”等等的可怕罪名）代表之一的资格出面说话的，是卡·考茨基（《新时代》杂志〔27〕1904年第28期的《选区和党》一文）。他说，沃·海涅的论文“表明整个修正派的思想进程”。不仅德国而且法国和意大利的机会主义者，也都在拚命维护自治制，力图削弱党的纪律，力图把党的纪律化为乌有，他们的倾向到处都在导向**瓦解组织**，导向把“民主原则”歪曲为**无政府主义**。卡·考茨基教训组织问题上的机会主义者说：“民主并不是没有权力，民主并不是无政府状态，民主是群众对他们委任的代表的统治，它不同于冒充人民公仆而实际上是人民统治者的其他权力形式。”卡·考茨基详细考察了各国机会主义的自治制所起的瓦解组织的作用，指出，

正是由于“大批资产阶级分子”^①参加社会民主党，才使机会主义、自治制和违反纪律的倾向严重起来，并且再三提醒说，“组织是无产阶级解放自己的武器”，“组织是无产阶级所特有的阶级斗争的武器”。

德国的机会主义比法意两国的弱些，所以那里的“自治制的倾向所产生的结果，暂时还只是唱一些反对独裁者和大宗教裁判者，反对开除教籍^②和追究异端的相当动听的高调，只是进行无休止的吹毛求疵和无谓争吵，而对这种吹毛求疵和无谓争吵加以分析，又只会引起无休止的争吵”。

俄国党内的机会主义比德国的更弱，所以俄国的自治制倾向所产生的东西，其思想成分少，“动听的高调”和无谓争吵的成分多，这原是不足为奇的。

难怪考茨基要作出结论说：“也许，世界各国修正主义在任何其他问题上，都不象在组织问题上表现得那样性质一致，虽然形态各不相同，色彩互有差异。”在谈到正统思想和修正主义在这方面的基本倾向时，卡·考茨基也用了“吓人的字眼”：官僚主义对民主主义。卡·考茨基写道：据说，给予党的执行委员会权利来影响各地方选

① 卡·考茨基把饶勒斯拿来作例子。这种人愈是倾向于机会主义，他们也就“必然觉得党的纪律对于他们的自由个性是一种不可容许的约束”。

② *Bannstrahl*——开除教籍。德语的这个词相当于俄语的“戒严状况”和“非常法”。这是德国机会主义者用的“吓人的字眼”。

区选择候选人(国会议员候选人),就是“无耻地侵犯民主原则,因为民主原则要求全部政治活动自下而上地,由群众自动地来进行,而不是自上而下地,用官僚主义的办法来进行。……但是,如果说有什么真正民主的原则,那它就是多数应比少数占优势,而不是相反。……”任何一个选区选举国会议员都是关系全党的一个重要问题,所以党至少应该经过党所信任的人去影响指定候选人的事情。“如果谁觉得这太官僚主义化或太集中化,那就不妨让他试一试,建议由全体党员来直接表决候选人。既然这办不到,那么,当上述职能也同其他许多有关全党的职能一样是由党的一级或几级机关来执行的时候,就不用不着埋怨说这是缺乏民主精神。”按照德国党的“习惯法”,从前各个选区也是就提出某某人为候选人的问题同党的执行委员会进行“同志式的商议”的。“可是党现在已经太大了,这个不言而喻的习惯法已经不够了。当人们不再承认习惯法为不言而喻的东西时,当这个习惯法规定的内容以及这个习惯法本身的存在都引起争议时,那它就不成其为法了。因而绝对需要精确地规定这个法,把它明文规定下来……”乃至“用精确的章程确定下来①,

① 把卡·考茨基这些关于用正式规定的党章法来代替不言而喻的习惯法的意见,拿来和我们党尤其是编辑部从召开党代表大会时起所经历的全部“更换”对照一下,是非常有益的。参看维·伊·查苏利奇的发言(在同盟代表大会上,见第66页及以下各页),她未必能领会现在发生的这种更换的全部意义。

从而加强组织的严格性”。

这样你们就看到：在另一个环境中也有同样的斗争，即党内机会主义派和革命派在组织问题上的斗争，有同样的冲突，即自治制同集中制的冲突，民主主义同“官僚主义”的冲突，削弱组织严格性和纪律严格性的倾向同加强组织严格性和纪律严格性的倾向的冲突，不坚定的知识分子的心理同坚定的无产者的心理的冲突，知识分子的个人主义同无产阶级的团结精神的冲突。试问，**资产阶级民主派**——不是捉弄人的历史还只是私下里答应在将来什么时候指给阿克雪里罗得同志看的那个资产阶级民主派，而是实实在在的资产阶级民主派，它在德国也有一些聪明敏锐的代表人物，并不亚于我国的解放派先生们，——当时是怎样对待这种冲突的呢？德国的资产阶级民主派马上起来响应了这个新的争论，并且也和俄国的资产阶级民主派一样，也和任何时候任何地方的资产阶级民主派一样，拚命支持社会民主党内的机会主义派。德国交易所资本家办的著名的《**法兰克福报**》^[28]发表了一篇气势汹汹的社论（1904年4月7日《**法兰克福报**》第97号晚刊），它表明无耻剽窃阿克雪里罗得的言论简直已经成了德国报刊的一种流行病。法兰克福交易所里的威风凛凛的民主派分子大肆攻击社会民主党内的“专制”、“党内独裁”、“党内首长的专制统治”，攻击“似乎是专门惩罚整个修正主义”（请回忆一下“莫须有的机会主义罪名”这句话）的“开除教籍”的作法，攻击“盲目服从”、

“死板纪律”的要求，攻击“唯命是从”、把党员变成“政治僵尸”（这比讲小螺丝钉和小轮子厉害得多！）的要求。交易所里的骑士们在社会民主党那里看见反民主的制度时愤愤不平地说：“请看，任何个人特性，任何个性都要加以取缔，因为这种个性有产生法国制度，即产生饶勒斯主义和米勒兰主义的危险，如曾德尔曼〈在萨克森社会民主党人代表大会上〉叙述这个问题时直截了当地说过的那样。”

总之，如果说新《火星报》关于组织问题的新字眼有什么原则含义，那么毫无疑问，这就是机会主义的含义。证实这个结论的，既有对我们那次分成革命派和机会主义派的党代表大会的全部分析，又有欧洲各国社会民主党的实例，在这些社会民主党内，组织问题上的机会主义也是用同样的倾向和同样的责难表现出来的，并且往往用的是同样的字眼。当然，各国党的民族特点和各国政治条件的不同都会发生相当的影响，因而使得德国机会主义完全不同于法国机会主义，法国机会主义完全不同于意大利机会主义，意大利机会主义完全不同于俄国机会主义。虽然有上述条件的种种差别，但是所有这些党内的革命派和机会主义派之间的基本划分显然是相同的，机会主义在组织问题上的思想过程和倾向显然是相同的^①。由于在我国马克思主义者和我国社会民主党人

^① 现在谁也不会怀疑，俄国社会民主党人过去在策略问题上分成经

中间有许多激进知识分子的代表人物，所以由这种知识分子心理产生的机会主义不论过去或现在都必然在各个不同的方面用各种不同的形式表现出来。从前我们是在世界观的基本问题上，即在纲领的问题上，同机会主义进行斗争，因此在目的方面的根本分歧也就必然使那些把我国合法马克思主义弄得声名狼藉的自由派和我们社会民主党人分道扬镳。后来我们是在策略问题上同机会主义进行斗争的，因此我们同克里切夫斯基和阿基莫夫两位同志在这个比较次要问题上的分歧也就自然只是暂时的，并没有弄到各自成立政党的地步。现在我们应当克服马尔托夫和阿克雪里罗得在组织问题上的机会主义，这些问题同纲领问题和策略问题相比当然不是那样有根本意义，但是它们在目前却涌到我们党内生活的前台来了。

谈到同机会主义作斗争的时候，决不应当忘记整个现代机会主义在各个方面所表现出来的特征：模棱两可，含糊不清，不可捉摸。机会主义者按其本性来说总是回

济派和政治派，同整个国际社会民主党分为机会主义派和革命派是一样的，尽管马尔丁诺夫和阿基莫夫两同志同冯·福尔马尔和冯·艾耳姆两同志，或同饶勒斯和米勒兰两人有很大的区别。同样，在组织问题上的基本划分也毫无疑问是相同的，虽然，人民没有政治权利的国家和有政治自由的国家之间的条件大不相同。极其值得注意的是，讲原则的新《火星报》编辑部肤浅地涉及了一下考茨基和海涅的争论（第64号），便畏缩地避开了一切机会主义派和一切正统派在组织问题上的原则倾向问题。

避明确地肯定地提出问题，企图找出一种合力，在两种互相排斥的观点之间象游蛇一样回旋，力图既“同意”这一观点，又“同意”另一观点，把自己的不同意见归结为小小的修正、怀疑、善良天真的愿望等等。纲领问题上的机会主义者爱德·伯恩施坦同志是“同意”党的革命纲领的，虽然他本来显然是想“根本改良”这个纲领，但是他却认为这样做是不合时宜的，是不适当的，还不如阐明“批评”的“一般原则”（主要是用非批判的态度抄袭资产阶级民主派的原则和字眼）来得重要。策略问题上的机会主义者冯·福尔马尔同志也是同意社会民主党革命派的老的策略的，也是多半只限于唱唱高调，提出小小的修正，讲几句风凉话，但是根本不提出任何明确的“内阁主义的”策略。组织问题上的机会主义者马尔托夫同志和阿克雪里罗得同志，直到现在也没有提出什么可以“用党章确定下来的”明确的原则论点，尽管有人一再公开提醒他们这样做；他们本来也愿意，绝对愿意“根本改良”我们的组织章程（《火星报》第 58 号第 2 版第 3 栏），但是他们宁愿先来讲“一般组织问题”（因为如果按新《火星报》精神把我们这个不管第一条如何但毕竟是集中制的章程实行一番真正根本的改良，那就必然会导致自治制，可是马尔托夫同志当然甚至在自己面前也不愿意承认自己在原则上是倾向自治制的）。因此，他们在组织问题上的“原则”立场，也就来得五花八门：多半是唱一些关于什么专制和官僚主义、什么盲目服从、小螺丝钉和小轮子等等幼稚的动听

的高调。——这种高调是如此幼稚，以至使人很难确定其中所包含的哪些真正是原则性的意思，哪些真正是补选问题的意思。可是他们愈陷愈深：他们企图对他们所仇恨的“官僚主义”加以分析并下一个确切的定义，这必然会导向自治制；他们企图“加深”和论证自己的观点，这必然要为落后现象辩护，走向尾巴主义，陷入吉伦特主义的空谈。最后，**无政府主义**原则是作为唯一的、真正明确的、因而在实践上表现得特别明显的（因为实践总是走在理论前面的）原则表现出来的。藐视纪律——自治制——无政府主义，这就是我们那个组织上的机会主义时而爬上时而爬下的小梯子，它从一个梯级跳到另一个梯级，巧妙地回避明确说出自己的原则^①。在纲领和策略上的机会主义那里，也可以看到同样的阶梯：藐视“正统思想”、虔诚信仰、狭隘死板——修正主义的“批评”和内阁主

① 现在，回想一下党章第一条的争论，就会清楚地看到，马尔托夫同志和阿克雪里罗得同志在党章第一条问题上的错误的发展和加深，必然导向组织上的机会主义。马尔托夫同志的基本思想，即自行列名入党的思想，正是虚伪的“民主主义”，是自下而上建立党的思想。相反，我的思想所以是“官僚主义化的”，就是因为 I 主张自上而下，由党代表大会到各个党组织来建立党。无论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心理也好，无论是无政府主义的词句也好，无论是机会主义的、尾巴主义的深奥思想也好，都是在对党章第一条的争论中就显露了出来。马尔托夫同志在《戒严状况》这本小册子（第 20 页）中说新《火星报》上“开始了思想工作”。这种说法在某种意义上是正确的，因为他和阿克雪里罗得确实是从党章第一条开始把思想按新方向推进的。只是不幸这个新方向是机会主

义——资产阶级民主。

在一切现代机会主义者尤其是我国少数派的一切著作中发出的那种绵延不断的埋怨声调，都是同仇恨纪律的心理有密切联系的。据说，有人在迫害他们，排挤他们，赶走他们，围困他们，欺侮他们。在这些字眼里流露出来的真实心理和政治真相，大概要比编造某某人被欺侮和某某人欺侮人这种诙谐而动听的笑话的人自己所意料的多得多。的确，拿我们党代表大会的记录来看，就可以看到少数派都是一些在某个时候和因为某件事情受过社会民主党革命派欺侮的人。这中间有崩得分子和工人事业派分子，我们把他们“欺侮”得退出了代表大会；这中间有南方工人派分子，他们因为一切组织尤其是他们自己的组织被取消而受到致命的侮辱；这中间有马霍夫同志，他每次发言的时候都受到了侮辱（因为他每一次准丢丑）；最后，这中间有马尔托夫同志和阿克雪里罗得同

义的方向。他们愈顺着这个方向“工作”下去，他们的这种工作愈脱离补选问题的无谓争吵，他们也就会愈陷到泥潭里去。普列汉诺夫同志在党代表大会上已经清楚地看出了这一点，并且他在《不该怎么办？》一文中又再次警告过他们说：我甚至情愿把你们补选进来，不过你们不要顺着这条只会走到机会主义和无政府主义方面去的道路走去。——但马尔托夫和阿克雪里罗得两人并没有接受这个忠告，他们说：怎么？不顺着这条路走？要赞同列宁所说补选不过是一种无谓争吵的意见吗？绝对不行！我们要向他表明我们是些讲原则的人！——果然表明了。他们已经向大家具体地表明了，如果说他们有什么新的原则，那不过是机会主义的原则。

志，他们受到侮辱是因为党章第一条而被加上了“莫须有的机会主义罪名”，是因为在选举中遭到了失败。所有这些难堪的侮辱，都不象许多庸人至今想象的那样，是由于有什么人说过不可容许的挖苦话，作了激烈的攻讦，进行了疯狂的论战，有什么人把门关得很响，有什么人挥动拳头进行威胁等等偶然引起的结果，而是由于《火星报》整个三年思想工作必然产生的政治结果。如果我们在这三年中不是光耍耍嘴皮子，而是表示了一种应该转变成行动的信念，那么，我们在代表大会上也就不能不对反火星派和“泥潭派”进行斗争。在我们同公开站在前列进行过斗争的马尔托夫同志一起把这样一大堆人再三地欺侮过以后，我们只要稍微把阿克雪里罗得同志和马尔托夫同志侮辱一下，就会使他们忍无可忍。数量转变成质量了。发生了否定的否定。所有受到侮辱的人都忘记了相互间的嫌隙，嚎啕大哭，互相拥抱起来，并树起了“反列宁主义的起义”^①旗帜。

当先进分子起义反对反动分子时，起义是一件大好事。革命派实行起义反对机会主义派，这是很好的。机会主义派实行起义反对革命派，那就不妙了。

普列汉诺夫同志只得可以说成是战俘的身分参加这

^① 这种奇怪的说法是马尔托夫同志说出来的（《戒严状况》第68页）。马尔托夫同志总想等到他自己方面凑成五个人时实行“起义”来反对我一个人。马尔托夫同志所采用的论战手法并不巧妙，他分明是想用绝顶恭维敌人的办法来消灭敌人。

种不妙的勾当。他抓住起草支持“多数派”的某些决议的人们的个别不恰当的词句，竭力“泄愤出气”，并高声叹息道：“穷得可怜的列宁同志呵！他的正统派拥护者真妙呵！”（《火星报》第63号的附刊）

可是，普列汉诺夫同志呵，如果说我穷得可怜，那么，新《火星报》编辑部就未免穷得靠乞讨过日子了。无论我怎样穷，但我总还没有落到绝对贫困的地步，以至只好闭起眼来不看党代表大会，而到某些地方委员会委员的决议中去找材料来练习自己的机智。无论我怎样穷，但我总比某些人阔千百倍，他们的拥护者不是偶而说出某句不恰当的话，而是在一切问题上，不论在组织问题上也好，在策略问题或纲领问题上也好，都是死死抓住同社会民主党革命派原则相反的原则不放。无论我怎样穷，但我总还没有穷到只好把这班拥护者赠给我的颂词向公众隐瞒起来的地步。可是新《火星报》编辑部只好如此。

读者们，你们知道俄国社会民主工党沃罗涅什委员会是个什么东西吗？如果你们不知道，可以读一读党代表大会的记录。你们从那里可以看出，这个委员会的方向完全由阿基莫夫和勃鲁克尔两同志表现了出来，这两位同志在代表大会上对我们党的革命派进行过全面的斗争，并且有几十次被大家——从普列汉诺夫同志起到波波夫同志止——当作机会主义者来看待。正是这个沃罗涅什委员会在它的一月份的传单（1904年1月第12号）上声明说：

“去年在我们不断发展的党内，发生了一件对于党有重要意义的大事件：举行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即由党的组织的代表参加的大会。召集党代表大会本是一件很复杂的事情，而在君主制的条件下更是一件很冒险很困难的事情，因此难怪召集这次代表大会的工作做得**很不完善**；代表大会本身虽然完全平安无事地举行过了，可是并没有满足党对它所提出的一切要求。受1902年代表会议委托负责召开代表大会的那些同志被逮捕了，因此**召开代表大会的工作只是由俄国社会民主党内一个派别——火星派——挑选的那些人担任的**。许多属于社会民主党而不属于火星派的组织，都没有被吸收来参加代表大会的工作，**在某种程度上正是由于这个原因**，才使代表大会关于制定**党纲和党章的任务执行得极不完善**，至于党章里含有‘可能引起危险的误解’的重大缺陷，连参加代表大会的人自己也是承认的。在代表大会上，火星派本身分裂了，我们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内许多从前似乎完全接受过《火星报》的行动纲领的重要人物，也都意识到该报许多**主要由列宁和普列汉诺夫**两人所主张的观点不切合实际。虽然他们两个人在代表大会上也占过上风，可是实际生活的力量，实际工作——即一切非火星派分子也参加了的实际工作——的要求，很快就纠正了理论家的错误，并且在代表大会开完以后就作了重大的修正。《火星报》大大地改变了，并且答应细心听取社会民主党内一切活动家的要求。这样，虽然**代表大会的工作应当由下届代表大会来审查**，并且在代表大会参加者本人看来，显然也是不能令人满意的，因此也就不能作为不可改变的**决议要党接受**，可是代表大会阐明了党内状况，对于党今后的理论工作和组织工作提供了大量的材料，因而对全党的工作来说也是一个大有教益的经验。代表大会通过的决议和制定的党章，将

受到一切组织的注意，但是由于它们具有显而易见的不足之处，许多组织都表示反对只以它们为指南。

沃罗涅什委员会了解全党工作的整个重要性，所以对有关组织代表大会的一切问题热烈地发表了它的意见。它意识到代表大会上发生的事情的整个重要性，欢迎已经成了中央机关报（主要机关报）的《火星报》所发生的转变。虽然党内和中央委员会内的状况还不能令我们满意，但是我们相信，困难的建党工作经过共同的努力是会日益改进的。鉴于有许多谣传，沃罗涅什委员会特向同志们声明，关于沃罗涅什委员会退党一事是根本谈不上的。沃罗涅什委员会十分了解，象沃罗涅什委员会这样一个工人组织退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会是一个多么危险的先例，会是加于党的一种多么厉害的责备，这对那些可能仿效这种先例的工人组织是多么的不利。我们需要的不是制造新的分裂，而是坚决努力使一切觉悟的工人和社会主义者统一成一个党。何况第二次代表大会是一次定期大会，而不是一个成立大会。开除出党只能根据党的裁决来进行，因此任何一个组织，甚至中央委员会本身也没有权利把某一个社会民主党组织开除出党。况且在第二次代表大会上通过的党章第八条已经规定，任何一个组织都在本地的事务方面享有自治权（自主权），因此沃罗涅什委员会有充分的权利把自己的组织观点贯彻到实际生活中去，贯彻到党内来。”

新《火星报》编辑部在第六十一号上引证这个传单

时，转载了上面这一大段文字的后一部分，即用大号字排印的这一部分；至于前一部分，即用小号字排印的那一部分，编辑部宁愿删去不要。

大概是有些不好意思吧。

(十八) 稍微谈谈辩证法。两个变革

只要整个看一看我们党内危机的发展经过，我们就容易看出，斗争双方的基本成员，除了小小的例外，始终没有改变。这是我们党内革命派和机会主义派之间的斗争。可是，这个斗争经过了各种不同的阶段，而每个想了解已有的大量文献的人，每个想了解许多片断的例证、孤立的引文、个别的责难等等的人，都必须对其中每个阶段的特点有一确切的认识。

我们且把各个显然不同的主要阶段列举出来：（1）关于党章第一条问题的争论。这是关于基本组织原则问题的纯思想斗争。我和普列汉诺夫两人处在少数地位。马尔托夫和阿克雪里罗得两人提出机会主义条文，因而投到机会主义者怀抱中去了。（2）《火星报》组织由于中央委员会候选人名单问题——是佛敏还是瓦西里也夫参加五人小组，是托洛茨基还是特拉文斯基参加三人小组——发生了分裂。我和普列汉诺夫争得了多数（九票对七票），这在某种程度上正是由于我们在党章第一条的问题上占少数。马尔托夫同机会主义者的联盟，用事实

证明了组委会事件使我产生的种种担心。(3)继续就党章细节进行争论。机会主义者又来援救马尔托夫。我们又处于少数地位,并捍卫少数在中央机关内的权利。(4)七个极端机会主义者退出代表大会。我们成了多数并在选举中战胜了联盟(即火星报少数派、“泥潭派”以及反火星派的联盟)。马尔托夫和波波夫拒绝接受我们所提出的两个三人小组中的席位。(5)代表大会闭会以后因补选问题而发生无谓争吵。无政府主义行为和无政府主义词句猖獗。最不彻底和最不坚定的分子在“少数派”中占上风。(6)普列汉诺夫为了避免分裂而采取了“用温柔的手段杀死”的政策。“少数派”占据中央机关报编辑部和总委员会,并且竭力攻击中央委员会。无谓争吵仍然充斥于一切。(7)对中央委员会的第一次攻击被打退。无谓争吵似乎开始稍微平息下来。这样便有可能比较心平气和地讨论两个纯系思想性质而又使我们党极为关心的问题:(一)我们党在第二次代表大会上分成“多数派”和“少数派”从而代替了一切旧的划分这个事实的政治意义和原因何在?(二)新《火星报》在组织问题上的新立场有什么原则意义?

每个阶段都有其根本不同的斗争情势和直接的攻击目标,每个阶段都可以说是一个总的战役中的个别战斗。不研究每个战斗的具体情况,就丝毫不能了解我们的斗争。我们把这一点研究清楚以后,就会明显地看出,发展确实是按着辩证的道路,矛盾的道路行进的:少数变成多

数，多数变成少数；各方时而转守为攻，时而转攻为守；思想斗争的出发点（党章第一条）“被否定”，让位给充斥于一切的无谓争吵^①，但以后就开始“否定的否定”，我们既然在各占一个中央机关的情况下勉强同上帝赐予的妻子“和睦相处”，那就又回到纯思想斗争的出发点上来了；但是这个“正题”已由“反题”的一切成果所充实，并变成了高一级的合题：这时对于党章第一条问题的孤立的偶然的错误，已经发展成为组织问题上的机会主义观点的所谓体系；这时这个现象同我们党的分成革命派和机会主义派这种根本划分的联系，愈来愈清晰地呈现在大家面前。总而言之，不仅燕麦是按照黑格尔的规律生长的，而且俄国社会民主党人也是按照黑格尔的规律互相进行斗争的。

可是，无论什么时候都不应当把马克思主义使之用脚立地后接受过来的黑格尔的伟大辩证法，同那种为某些从我党革命派滚向机会主义派的政治活动家的曲折路线进行辩护的庸俗手法混为一谈，不应当把它同那种将个别声明，将统一过程中各个阶段发展的个别因素混作一团的庸俗态度混为一谈。真正的辩证法并不辩护个人错误，而是研究不可避免的转变，根据对发展过程的全部

① 如何把无谓争吵和原则分歧区分开来这个难题，现在已经自行解决：凡是涉及补选问题的都是无谓争吵；凡是涉及分析代表大会上的斗争，涉及党章第一条问题以及关于向机会主义和无政府主义转变问题的争论的都是原则分歧。

具体情况的详尽研究来证明这种转变的不可避免性。辩证法的基本原理是：没有抽象的真理，真理总是具体的。…… 同时也不应当把这个黑格尔的伟大辩证法同那种可以用“脑袋钻不进去的地方，就把尾巴塞进去”这句意大利谚语来形容的庸俗的处世秘诀混为一谈。

我们党内斗争的辩证发展过程的总结可归结为两个变革。党代表大会是一个真正的变革，如马尔托夫同志在他的《又一次处在少数地位》中所公正指出的那样。少数派里爱说俏皮话的人也说得对，他们说：世界是由革命推动的，所以我们就实行了一次革命！他们在代表大会以后确实实行了一次革命；一般地说，世界是由革命推动的，这也是正确的。可是，每次具体革命的具体意义，还不能用这句一般的名言来断定，因为如果把永志不忘的马霍夫同志的永志不忘的句子换个样子来说的话，也有类似反动的革命。为了断定某次具体革命究竟是向前还是向后推动了“世界”（我们党），就必须知道究竟是党内的革命派还是机会主义派成了实行变革的实际力量，就必须知道究竟是革命原则还是机会主义原则鼓舞了战士。

我们党的代表大会是全部俄国革命运动史上独一无二的、空前未有的现象。秘密的革命党第一次从黑暗的地下状态走到光天化日之下，向大家表明了我们党内斗争的整个进程和结局，表明了我们党以及它的每个多少显著的部分在纲领、策略和组织问题上的全部面貌。我

们第一次摆脱了小组自由散漫和革命庸俗观念的传统，把几十个极不相同的集团结合在一起，这些集团往往是彼此极端仇视，彼此只是由思想力量联系起来的，它们准备（在原则上准备）为了我们第一次在事实上创立起来的伟大整体——党而牺牲所有一切集团的特点和集团的独立性。可是，在政治上战利品并不是不用代价就能得来的，而是经过战斗夺取来的。由于取消组织而引起的战斗，不可避免地成了异常残酷的战斗。公开的自由斗争的清风变成了狂风。这阵狂风扫除了——扫除得太好了！——所有一切小组利益、情感和传统的残余，第一次创立了真正富有党性的负责集体。

然而，称呼什么是一回事，而实际上是什么又是一回事。在原则上为了党牺牲小组习气是一回事，而放弃自己的小组又是一回事。清风对那些习惯于腐败的庸俗观念的人，还是太新鲜了。“党没有经得住它自己的第一次代表大会的考验”，象马尔托夫同志在他的《又一次处在少数地位》中所公正说过的（偶然公正说过的）那样。为组织被取消而受的委屈未免太厉害了。狂风把我们党的巨流底下的全部渣滓都翻了上来，于是这些渣滓就卷土重来。旧的顽固的小组习气压倒了还很年轻的党性。党内被击溃的机会主义派，用阿基莫夫偶然到手的卤获品加强了自己的力量，又对革命派占了——当然是暂时的——优势。

结果就产生了新《火星报》，这个新《火星报》不得不

发展和加深它的编辑们在党的代表大会上所犯的 错误。旧《火星报》曾教人学会革命斗争的真理。新《火星报》却教人去学处世秘诀：忍让与和睦相处。旧《火星报》是战斗的正统派的机关报。新《火星报》却使机会主义死灰复燃——主要是在组织问题上。旧《火星报》为俄国机会主义者以及西欧机会主义者所憎恶，但这是光荣的。新《火星报》“聪明起来了”，很快就不再以极端机会主义者赞扬它为耻了。旧《火星报》一往直前地朝着自己的目标前进，言行一致。在新《火星报》上，由于它的立场的内在的虚伪性，必然产生——甚至不以什么人的意志和意识为转移——政治上的伪善态度。它大骂小组习气，是为了掩护小组习气对党性的胜利。它假惺惺地斥责分裂，似乎除了少数服从多数，还可以设想用什么其他手段来防止一个多少组织起来的多少象个党的党发生分裂。它声明必须考虑革命舆论，同时却又隐瞒阿基莫夫之流的赞扬，并制造一些卑鄙的谣言来诬蔑我们党内革命派的委员会^①。这是多么可耻呵！他们把我们的旧《火星报》糟蹋到何等地步了呵！

进一步，退两步…… 在个人的生活中，在民族的历史上以及政党的发展中都有这种现象。革命的社会民主党的原则，无产阶级的组织和党的纪律，必定获得完全的

^① 为了这件可爱的工作，甚至已经制定了一个固定的格式：根据我们自己的某一个通讯员的报告，多数派的某一个委员会虐待了少数派的某某同志。

胜利，怀疑这一点，即使是怀疑一分钟，也是一种罪恶极大的意志薄弱的表现。我们已经取得了许多成就，我们应当继续努力奋斗，不因遭到挫折而灰心丧气；我们应当坚持斗争，鄙弃那些庸俗的小组争吵的方法，尽一切可能来保卫用极大精力建立起来的全俄一切社会民主党人的统一的党内联系，力求通过顽强而有步骤的工作使全体党员特别是工人充分地自觉地了解党员义务，了解第二次党代表大会上的斗争，了解我们的分歧的一切原因和演变，了解机会主义的全部危害性：机会主义在组织工作方面也象在我们的纲领和我们的策略方面一样无能为力地屈从于资产阶级心理，一样不加批判地接受资产阶级民主派的观点，一样削弱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的武器。

无产阶级在争取政权的斗争中，除了组织，没有别的武器。无产阶级既然被资产阶级世界中居于统治地位的无政府竞争所分散，既然被那种为资本的强迫劳动所压抑，既然经常被抛到赤贫、粗野和退化的“底层”，那么，无产阶级所以能够成为而且必然会成为不可战胜的力量，就是因为它根据马克思主义原则形成的思想统一是用组织的物质统一来巩固的，这个组织把千百万劳动者团结成工人阶级的大军。在这支大军面前，无论是已经衰败的俄国专制政权或正在衰败的国际资本政权，都是支持不住的。不管有任何曲折和退步，不管现代社会民主党的吉伦特派讲些什么机会主义词句，不管怎样得意地赞美落后的小组习气，不管怎样炫耀和喧嚷知识分子的无

政府主义，这支大军一定会把自己的队伍日益紧密地团结起来。

写于1904年2—5月

1904年5月在日内瓦

印成单行本

选自《列宁选集》第1卷

第452—510页

注 释

〔1〕《进一步，退两步（我们党内的危机）》一书全面地阐明了关于党的学说，规定了无产阶级革命政党的组织原则，粉碎了组织问题上的孟什维克机会主义，奠定了布尔什维克党的组织基础。

这本书是列宁在几个月内，详细地研究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会议记录和决议、每个代表的发言、代表大会上所形成的各政治派别、党中央委员会和总委员会的各种文件后写成的。列宁的这本书引起了孟什维克的狂怒。普列汉诺夫要求中央摒弃列宁这本书。中央委员会的调和派企图阻止该书的刊印和发行。

《进一步，退两步》一书于1904年夏在日内瓦出版，它在俄国先进工人中传布很广。在莫斯科、彼得堡、里加、萨拉托夫、图拉、奥廖尔、乌法、彼尔姆、科斯特罗马、希格雷、沙弗里（科夫诺省）等地，在逮捕和搜查时曾经发现过这本书。列宁曾把这部著作收在1907年（在里封上印的是1908年）出版的《十二年来》文集第一卷中。

〔2〕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于1903年7月30日—8月23日举行。代表大会最初在布鲁塞尔开了十三次会。后来因受警察迫害而移至伦敦举行。总共开了三十七次会。列入代表大会日程的共有二十个问题，其中最主要的问题是：党纲、党的组织（批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党章）、选举党的中央委员会和中央机关报编辑部。出席代表大会的有代表二十六个组织的四十三名代表，他们有五十一票表决权（其中八个代表各有两票），另外有十四名代表有发言权。

代表大会由列宁的《火星报》筹备。列宁为筹备代表大会做了巨大的工作。

这次代表大会的主要任务，就是要“在《火星报》所提出和制定的原则的和组织的基础上建立**真正的政党**”(见《列宁全集》第7卷第195页)。在第二次代表大会上，列宁为了在俄国建立革命无产阶级政党而进行的巨大斗争，终于取得了胜利。

第二次代表大会的历史意义在于：它在马克思恩格斯逝世后的国际工人运动史上第一次通过了以争取无产阶级专政为基本任务的革命纲领。列宁在提出争取无产阶级专政胜利的任务的同时，着重指出农民的革命斗争的重大意义。大会把民族自决权列入党纲，维护了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原则。

在第二次代表大会上，围绕着建党的组织原则展开了激烈的斗争。列宁和他的战友捍卫了马克思主义关于党的作用的根本原理：党是工人阶级先进的、觉悟的、有组织的部队，它是由革命理论、社会发展规律和阶级斗争规律的知识以及革命运动的经验武装起来的。唯有这样高度觉悟而有组织的、团结而集中的、具有统一意志的党，才能够引导工人阶级走向胜利，夺取政权。列宁在第二次代表大会上同机会主义分子进行的不调和的斗争，具有重大的国际意义。

对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的意义的评介，见《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1975年人民出版社版第47页。

〔3〕指《进一步，退两步》第七节《党章。马尔托夫同志的草案》中列举的关于党章第一条的不同条文。列宁说：“马尔托夫的草案第一条条文是：‘凡是承认党纲、并且在党的机关〈原文如此！〉监督和领导下为实现党的任务而积极工作的，都可以成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党员。’我的草案第一条条文是：‘凡是承认党纲、在物质上帮助党并且参加党的一个组织的，都可以成为党员。’马尔托夫在代表大会上提出并由代表大会通过的第一条条文是：‘凡是承认党纲、在物质上帮助党并且在党的一个组织领导经常亲自协助党的，都可以成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党员。’”(见《列宁全集》第7卷第230页)

〔4〕指俄国革命社会民主党人国外同盟第二次代表大会。同盟是由列宁发起于1901年10月成立的。参加同盟的有《火星报》—《曙光》杂志组织的国外部和“社会民主党人”组织(包括劳动解放社)。同盟是《火星报》的国外代表。同盟出版了一些《通报》和小册子，其中有列宁的小册子《给农

村贫民》。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批准同盟为党在国外的唯一组织，具有党章所规定的委员会的权利。第二次代表大会后孟什维克在同盟内隐藏起来，从内部来反对列宁，反对布尔什维克。

同盟第二次代表大会于1903年10月26—31日在日内瓦举行。这次大会是因孟什维克再三要求而召开的。出席代表大会的有：以列宁为首的多数派的十五名代表（共十八票），少数派的十八名代表（共二十二票）以及既不倾向布尔什维克也不倾向孟什维克的一名代表（共两票）。

大会议程的主要项目是出席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的同盟代表列宁作报告。列宁报告以后，马尔托夫发言为孟什维克的机会主义辩护，污蔑并攻击布尔什维克。列宁及其拥护者退出了同盟代表大会。由于同盟代表大会拒绝履行党的第二次代表大会的决议，中央委员会和党总委员会宣布它是非法的。

〔5〕《火星报》是第一个全俄马克思主义的秘密报纸，1900年由列宁创办。《火星报》在建立俄国工人阶级革命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方面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由于警察的迫害，在俄国无法出版革命的报纸，列宁早在西伯利亚流放期间就周密地考虑了在国外出版报纸的计划。列宁在1900年1月流放结束后立刻着手实现这个计划。

《火星报》创刊号于1900年12月24日在莱比锡出版，随后在慕尼黑出版，自1902年4月起在伦敦出版，自1903年春天起在日内瓦出版。

参加《火星报》编辑部的有：列宁、格·瓦·普列汉诺夫、尤·奥·马尔托夫、巴·波·阿克雪里罗得、亚·尼·波特列索夫和维·伊·查苏利奇。自1901年春天起，娜·康·克鲁普斯卡娅任编辑部的秘书。列宁实际上是《火星报》的主编和领导者。他在《火星报》上发表了有关党的建设和俄国无产阶级阶级斗争的各种根本问题的文章，对国际生活中的重大事件做了评论。

在俄国的许多城市（彼得堡、莫斯科等）建立了列宁火星派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小组和委员会。

火星派组织是在列宁培养出来的职业革命家（尼·厄·鲍曼、伊·瓦·巴布什金、谢·伊·古谢夫、米·伊·加里宁等）的直接领导下产生和进行工作的。

《火星报》编辑部根据列宁的倡议和在他的直接的参与下，制定了党纲草案，准备了在1903年7—8月举行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

大会。

在代表大会召开以前，俄国的大多数地方的社会民主党组织都拥护《火星报》，赞同它的策略、纲领和组织计划，承认它是自己的领导机关。代表大会在一个专门的决议中指出《火星报》在建党斗争中的特殊作用，并宣布它是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中央机关报。

在第二次代表大会上，确定由列宁、普列汉诺夫和马尔托夫组成编辑部。马尔托夫不顾党代表大会的决定而拒绝参加编辑部，因而《火星报》第46—51号是由列宁和普列汉诺夫编辑出版的。后来，普列汉诺夫转到孟什维克主义立场上去，他要求让已被代表大会否决的原来的全体孟什维克编辑参加《火星报》编辑部。列宁不能同意这种做法，于1903年11月1日退出了《火星报》编辑部，以便加强党中央委员会里的阵地，并从这个阵地上打击孟什维克机会主义者。第52号是由普列汉诺夫一个人编辑出版的。1903年11月26日，普列汉诺夫违背代表大会的意志，独自把以前的孟什维克编辑补选为《火星报》编辑。从第52号起，孟什维克就把《火星报》变成了自己的机关报。“从这时起，党内开始有了旧《火星报》和新《火星报》的叫法，前者是指列宁的布尔什维克的《火星报》，而后者是指孟什维克的机会主义的《火星报》。”（见《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1975年人民出版社第49页）

〔6〕土地和自由社是民粹派的组织，1876年在彼得堡建立，其主要成员有：亚·德·米哈伊洛夫、格·瓦·普列汉诺夫、谢·米·克拉夫钦斯基、奥·瓦·阿普捷克曼等。土地自由派错误地认为俄国主要革命力量不是工人阶级而是农民，认为只靠农民就可以推翻沙皇政府。为了发动农民反对沙皇政府，土地自由派到农村进行宣传鼓动；由于农民不了解他们的宣传，没有跟他们走，于是该社一部分成员主张不要人民参加，专靠自己的力量，采取暗杀手段去继续进行反对沙皇政府的斗争。土地和自由社因此发生了两派分歧，其中一派（以安·伊·热里雅鲍夫为首）主张采取新的斗争手段（恐怖手段），另一派（以格·瓦·普列汉诺夫为首）主张继续采取原来的策略。两派于1879年分裂为民意党和土地平分社。

〔7〕见本书《怎么办？》注〔9〕。

〔8〕马尼洛夫是果戈里的小说《死魂灵》中的一个地主，他具有游手好闲、痴心妄想、阿谀逢迎和虚假伪善的性格。这里，马尼洛夫精神是想入非非的意思。

〔9〕指1900年在汉堡发生的事件，这次事件是由于“石匠自由联合会”的一批会员在罢工期间违反中央联合会的禁令去做包工而产生的。汉堡石

匠联合会向当地党组织提出了这批社会民主党人会员破坏罢工行为的问题。德国社会民主党中央指定的党的仲裁法庭指责了“石匠自由联合会”内这些社会民主党人的行为，但否决了把他们开除出党的建议。

〔10〕被代表大会否决的兹博罗夫斯基（科斯季奇）的决议案提出的党章第一条条文是：“凡承认党纲、在物质上帮助党并在党的一个组织领导下经常亲自协助党的人，都可被该组织承认为党员。”（见《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会议记录》1959年俄文版第281页）

〔11〕崩得即立陶宛、波兰和俄罗斯犹太工人总联盟，成立于1897年，它所联合的主要是俄国西部各省的犹太手工业者。1898年3月，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一次代表大会上，崩得加入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上，崩得分子要求承认崩得是犹太无产阶级的唯一代表。在代表大会驳斥了崩得在组织上的民族主义以后，崩得退出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

1906年第四次（统一）代表大会以后，崩得重新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崩得分子一直支持孟什维克，不断反对布尔什维克。崩得形式上加入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其实是一个资产阶级民族主义性质的组织。崩得提出民族文化自治的要求同布尔什维克的民族自决权这个纲领性的要求相对立。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崩得分子采取了社会沙文主义的立场；1917年崩得支持反革命的临时政府，同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敌人站在一边。在国内战争时期，著名的崩得分子同反革命势力勾结在一起，而一般的崩得分子则开始转变，主张同苏维埃政权合作。当无产阶级专政对国内反革命和外国武装干涉者的胜利日益明显时，崩得声明不再反对苏维埃政权。1921年3月崩得自行解散，部分成员根据一般原则加入了俄国共产党（布）。加入党的某些崩得分子是两面派，其入党的目的是要从内部破坏党；后来他们被揭发为人民的敌人。

〔12〕见本书《怎么办？》注〔26〕。

〔13〕指“合法马克思主义”代表人物彼·伯·司徒卢威为资产阶级辩护的观点，列宁曾于1894年秋在彼得堡马克思主义者小组里宣读了题为《马克思主义在资产阶级著作中的反映》的论文，对司徒卢威的观点进行了尖锐批判。

〔14〕见本书《怎么办？》注〔15〕。

〔15〕布朗基主义是以法国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著名领袖路易·奥古斯特·布朗基为首的一个流派。

布朗基积极参加了法国的革命运动，两次被判死刑，差不多有半生是在监狱中度过。

列宁认为布朗基是一个无可怀疑的革命家和社会主义的热烈拥护者，但同时又坚决地批评了他的宗派主义和密谋活动的方法。列宁指出：“布朗基主义是否认阶级斗争的理论。布朗基主义不是想通过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而是想通过少数知识分子的密谋使人类摆脱雇佣奴隶制。”（见《列宁全集》第10卷第361页）

〔16〕见本书《怎么办？》注〔36〕。

〔17〕指马尔托夫在《火星报》上发表的《我们能这样去准备吗？》一文，该文反对准备全俄武装起义，认为准备武装起义是空想和密谋活动。

〔18〕这两句话引自莱蒙托夫的一首诗《记者、读者和作家》。（参看《莱蒙托夫诗选》1951年时代出版社版第305页）

〔19〕《工人事业》是经济派的杂志，俄国社会民主党人国外联合会的不定期机关刊物，1899年4月至1902年2月在日内瓦出版，由波·纳·克里切夫斯基、亚·萨·马尔丁诺夫、弗·巴·伊万申担任编辑。杂志总共出了十二期，共九册。列宁在《火星报》上发表的文章中和在《怎么办？》一书中批判了《工人事业》的观点。

〔20〕见克雷洛夫寓言《狐狸和葡萄》。这篇寓言说的是一只饥饿的狐狸，看见果园里高挂着一串串亮晶晶的葡萄，不禁馋涎欲滴，但又够不着，最后只好懊丧地走开，并自我安慰地说：这葡萄看上去很好，实际上并没有熟，还是酸的。

〔21〕“实际工作者”（帕宁）是孟什维克马·萨·马卡久勃的笔名。

〔22〕见本书《怎么办？》注〔37〕。

〔23〕这两句话引自马尔托夫以纳尔苏修斯·土波雷洛夫的笔名发表在《曙光》杂志第一期（1901年4月）上的一首讽刺诗《现代俄国社会党人之歌》。诗中嘲笑了崇拜自发运动的经济派。

〔24〕奥勃洛摩夫是俄国作家冈察洛夫的长篇小说《奥勃洛摩夫》中的主角，他怠惰成性，害怕变动，终日耽于幻想，对生活抱消极态度。这个词一般用来比喻因循守旧和宗法式的落后性。

〔25〕德国社会民主党德勒斯顿代表大会于1903年9月13—20日举行。代表大会指责了伯恩斯坦、布劳恩、党勒、大卫等修正主义者，但是并没有把他们开除出党，因此他们便毫无阻碍地继续宣传自己的机会主义观点。

〔26〕《社会主义月刊》是德国社会民主党内机会主义者的主要机关刊

物，也是国际机会主义者的机关刊物之一，1897年至1933年在柏林出版。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该报采取社会沙文主义立场。

〔27〕 见本书《怎么办？》注〔49〕。

〔28〕 《法兰克福报》是德国资产阶级的报纸，自1856年至1943年在美因河畔法兰克福出版。

列 宁

共产主义运动中的
“左派”幼稚病^{〔1〕}（节选）

二

布尔什维克成功的基本条件之一

大概，现在差不多每个人都已看到，如果我们党没有极严格的真正铁的纪律，如果我们党没有得到整个工人阶级全心全意的拥护，就是说，没有得到工人阶级中所有的一切善于思考、诚实、有自我牺牲精神、有威信并且能带领或吸引落后阶层的人的全心全意的拥护，那末布尔什维克别说把政权保持两年半，就是两个半月也保持不住。

无产阶级专政是新阶级对更强大的敌人，对资产阶级进行的最奋勇和最无情的战争。资产阶级的反抗，由于自己被推翻（哪怕是在一个国家内）而凶猛十倍；资产阶级的强大不仅在于国际资本的力量，在于它的各种国际联系牢固有力，而且还在于习惯的力量，小生产的力量。因为世界上可惜还有很多很多小生产，而小生产是经常地、每日每时地、自发地和大批地产生着资本主义和

资产阶级的。由于这一切原因，无产阶级专政是必要的，不进行长期的、顽强的、拚命的、殊死的战争，不进行需要坚持不懈、纪律严明、坚定不移、百折不挠和意志统一的战争，便不能战胜资产阶级。

再说一遍，俄国无产阶级专政取得胜利的经验向那些不善于思索或不曾思索过这一问题的人清楚地表明，无产阶级的无条件的集中制和极严格的纪律，是战胜资产阶级的基本条件之一。

人们时常议论这个问题。但是，这到底是什么意思？这在什么情况下才是可能的？关于这些，他们却考虑得远远不够。在对苏维埃政权和布尔什维克欢呼的同时，是不是应该对布尔什维克为什么能够制定革命无产阶级所必需的纪律的原因**多作些极其认真的分析**呢？

布尔什维主义作为一种政治思潮，作为一个政党而存在，是从1903年开始的。只有布尔什维主义**整个**存在时期的历史，才能令人满意地说明，为什么它能够制定为无产阶级胜利所必需的铁的纪律并在最困难的条件下坚持这种纪律。

这里首先发生这样一个问题：无产阶级革命政党的纪律是靠什么来维持的？是靠什么来检验的？是靠什么来加强的？第一、是靠无产阶级先锋队的觉悟，靠它对革命的忠诚，它的坚韧性、自我牺牲精神和英雄气概。第二、是靠它善于同最广大的劳动群众，首先是同无产阶级劳动群众，**但同样也同非无产阶级劳动群众联系、接近，甚**

至可以说在某种程度上同他们打成一片。第三、是靠这个先锋队所实行的政治领导正确，靠它的政治战略和策略正确，而最广大的群众根据**切身经验**也确信其正确。没有这些条件，一个革命政党的纪律，一个真正能够成为必然要推翻资产阶级并改造整个社会的先进阶级的政党的纪律，是不可能实行的。没有这些条件，建立纪律的企图，就必然会成为空谈，成为漂亮话，成为装模作样。可是另一方面，这些条件又不能一下子产生。只有经过长期的努力和艰苦的实验才能造成这些条件；正确的革命理论，会使这些条件容易造成，但这个理论不是教条，它只有同真正群众性的和真正革命的运动的实践密切地联系起来，才能最终形成。

布尔什维主义所以能够制定并且在1917—1920年异常艰难的条件下顺利地实行极严格的集中制和铁的纪律，其原因仅仅在于俄国有若干历史上的特点。

一方面，布尔什维主义是1903年在最坚固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上产生的。而这个——也只有这个——革命理论的正确性，不仅为整个十九世纪全世界的经验所证实，尤其为俄国革命思想界的徘徊和动摇、错误和失望的经验所证实。在上一世纪差不多半个世纪期间，大约从四十年代至九十年代，俄国进步的思想界在空前野蛮和反动的沙皇制度的压迫之下，曾如饥如渴地寻求正确的革命理论，专心致志地、密切地注视着欧美在这方面的每一种“最新成就”。俄国在半个世纪期间，经受了闻所未闻

的痛苦和牺牲，表现了空前未有的革命英雄气概，以难以置信的毅力和舍身忘我的精神去探索、学习和实验，经受了失望，进行了验证，参照了欧洲的经验，真是**饱经苦难才找到了马克思主义这个唯一正确的革命理论**。由于人们在沙皇政府的迫害下侨居国外，革命的俄国在十九世纪后半期同国际的联系相当广泛，对世界各国革命运动的形式和理论十分熟悉，这是世界上任何一国所不及的。

另一方面，在这个坚如磐石的理论基础上产生的布尔什维主义，通过十五年（1903—1917年）的历史实践，获得了举世无比的丰富经验。因为任何一个国家在这十五年内，在革命经验方面，在各种运动形式——合法的和不合法的、和平的和激烈的、地下的和公开的、小组的和群众的、议会方式的和恐怖主义的等运动形式更替的迅速和多样性方面，都没有过哪怕类似这样丰富的经历。任何一个国家都没有在这样一个短短的时期内，集中了现代社会一切阶级进行斗争的如此丰富的形式、特色和方法，而且由于俄国的落后和沙皇制度的残酷压迫，这个斗争成熟得特别迅速，它特别如饥如渴地并卓有成效地掌握了欧美政治经验方面相宜的“最新成就”。

四

布尔什维主义是在反对工人运动内部 哪些敌人的斗争中成长、 壮大和得到锻炼的？

首先是而且主要是在反对机会主义的斗争中。机会主义在1914年彻底变成社会沙文主义，彻底倒向资产阶级方面反对无产阶级。这自然是布尔什维主义在工人运动内部的主要敌人。现在这个敌人在国际范围内仍然是主要敌人。对于这个敌人，布尔什维主义过去和现在都给予极大的注意。布尔什维克在这方面的活动，现在就是在国外也知道得很清楚。

关于布尔什维主义在工人运动内部的另一个敌人，就不能这样说了。国外还极少知道布尔什维主义是在同**小资产阶级革命性**作长期斗争中成长、成熟和得到锻炼的。这种革命性有些象无政府主义，或者说，有些地方照搬无政府主义；它在任何重大问题上，都背离无产阶级进行坚韧的阶级斗争的条件和要求。马克思主义者在理论上完全认定，并且欧洲一切革命和革命运动的经验也充分证实：小私有者，即小业主（这一社会类型的人在欧洲许多国家中都十分普遍地大量地存在着），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经常受到压迫，生活往往异常突然地、迅速地恶化，

以至于破产，所以容易转向极端的革命性，却不能表现出坚韧性、组织性、纪律性和坚定性。被资本主义摧残得“发狂”的小资产者，和无政府主义一样，是一切资本主义国家所固有的一种社会现象。这种革命性动摇不定，华而不实，必然很快转为俯首听命、消沉颓丧、耽于幻想，甚至转为“疯狂地”醉心于这种或那种资产阶级的“时髦”思潮，——这一切都是人所共知的。可是，革命政党在理论上抽象地承认这些真理，还丝毫不能避免旧的错误，这种错误总是会由于意想不到的原因，以稍微不同一点的形式，以前所未见的打扮或装饰，在新异的（多少新异一点的）环境里重新表现出来。

无政府主义往往是对工人运动中机会主义罪过的一种惩罚。这两种畸形东西是互相补充的。如果说在俄国无政府主义在两次革命（1905年与1917年）及其准备时期的影响都比较小（尽管俄国居民中小资产阶级的成分大于西欧各国），那末毫无疑问，这不能不部分地归功于布尔什维主义一贯对机会主义进行最无情最不调和的斗争。我所以说“部分地”，是因为削弱俄国无政府主义势力的，还有另一个更重要的因素，这就是无政府主义在过去（十九世纪七十年代）曾盛极一时，从而彻底暴露了它是不正确的，不适合革命阶级的指导理论。

布尔什维主义在1903年诞生时，便继承了同小资产阶级的、半无政府主义的（或者是迎合无政府主义的）革命性作无情斗争的传统；革命的社会民主党向来就有这

种传统，而在1900—1903年俄国革命无产阶级的群众性的政党奠基期间，这种传统在我们这里已特别巩固。布尔什维主义继承并继续了同表现小资产阶级革命性倾向最厉害的政党即“社会革命党”的斗争，这一斗争表现在下列三个主要之点上。第一、这个党否认马克思主义，顽固地不愿（说它不能，也许更确切一些）了解在采取任何政治行动之前必须对各种阶级力量及其相互关系作出极为客观的估计。第二、这个党认为它的独特的“革命性”或“左的精神”，在于它承认个人恐怖，暗杀手段，而我们马克思主义者却坚决摒弃这种手段。自然，我们摒弃个人恐怖，只是因为这种手段不适当，如果有人竟在“原则上”谴责法国大革命的恐怖行为，或者谴责已经获得胜利的革命政党在全世界资产阶级的包围下所采取的任何恐怖手段，那末这类人早在1900—1903年间，就已经受到当时还是马克思主义者和革命家的普列汉诺夫的嘲笑和唾弃了。第三、“社会革命党人”认为，他们的“左的精神”就在于嘲笑德国社会民主党内比较轻微的机会主义罪过，而他们在某些问题上，例如在土地问题或无产阶级专政问题上，却又效法这个党的极端机会主义者。

附带说明一点，历史现在已经在广大的、世界历史的范围内证实了我们始终坚持的那个意见：**革命的德国社会民主党**（请注意，普列汉诺夫还在1900—1903年间就要求开除伯恩施坦的党籍，后来布尔什维克始终继承这种传统，在1913年揭穿了列金的全部卑鄙、下流和叛

卖行为^①)最近似革命无产阶级为了取得胜利所必需的那种政党。现在1920年,在经历了战争期间和战后最初几年的一切可耻的破产和危机之后,可以清楚地看到,西欧一切政党中正是革命的德国社会民主党才产生了最优秀的领袖,并且比别的政党更早地恢复了元气和健康,重新巩固了起来。无论在斯巴达克派⁽²⁾的党那里,或在“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左翼,即无产阶级一翼那里,都可以看到这种情形。这一翼正在对考茨基、希法亭、累德堡、克里斯平之流的机会主义和失节行为进行坚定不移的斗争。如果我们现在总地回顾一下从巴黎公社起到第一个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建立时止这一完全终结了的历史时期,那末,关于马克思主义对无政府主义的态度,便可以大体上得到一个十分明确的毫不含糊的轮廓。归根到底马克思主义是正确的,虽然无政府主义者曾经正确地指出在多数社会党内所盛行的国家观是机会主义的,但是,第一、这种机会主义是同曲解甚至公然隐匿马克思的国家观(我在《国家与革命》一书中已经指出,恩格斯给倍倍尔的一封信,曾经异常鲜明、尖锐、直接、明确地揭穿了社会民主党内所流行的国家观是机会主义的,可是这封信却被倍倍尔从1875年到1911年搁置了三十六年^②)分不开的;第二、正是欧美社会党中最忠实于马克

① 参看列宁《德国工人运动中的哪些东西是不应该摹仿的》一文(《列宁全集》第20卷第249—253页)。——编者注

② 见《列宁选集》第3卷第225页。——编者注

思主义的派别才最迅速最广泛地纠正了这种机会主义观点，承认了苏维埃政权及其对资产阶级议会制民主所具有的优越性。

布尔什维主义反对自己党内“左”倾的斗争，有两次规模特别大：一次是1908年关于是否参加最反动的“议会”和是否参加受最反动法律限制的合法工人组织的问题；另一次是1918年（缔结布列斯特和约时）关于可否容许某种“妥协”的问题。

1908年，“左派”布尔什维克由于顽固地不愿意了解参加最反动的“议会”的必要性而被开除出党。那时“左派”——其中许多人是优秀的革命者，后来还光荣地成了（而且现在仍然是）共产党员——特别援引的论据，是1905年抵制议会的成功经验。当1905年8月沙皇宣布召集谄议性的“议会”时，布尔什维克同一切反对党和孟什维克相反，曾经宣布抵制，而1905年的十月革命^{〔3〕}果然扫除了这个议会。那次抵制所以正确，并不是因为根本不参加反动议会是正确的，而是因为正确地估计到，当时的客观形势正在由群众罢工迅速转为政治罢工，进而转为革命罢工，再进而转为起义。而且当时的斗争是由这样一个问题引起的，即让沙皇去召集第一个代表机构呢，还是设法把这个召集权从旧政权手中夺过来？后来，既然没有把握并且也不可能有把握断定是否存在着同样的客观形势，以及这种形势是否按照同样的方向和同样的速度向前发展，所以抵制便不再是正确的了。

1905年布尔什维克对“议会”的抵制，使革命无产阶级增加了非常宝贵的政治经验，表明在把合法的同不合法的斗争形式、议会的同议会外的斗争形式互相配合的时候，善于放弃议会的斗争形式，有时是有益的，甚至是必要的。但是，如果在不同的条件下和不同的环境里盲目地、机械地、不加批判地搬用这种经验，那就大错特错了。1906年布尔什维克抵制“杜马”，虽然是一个不算大的、易于纠正的错误^①，但毕竟已经是一个错误。至于1907年、1908年以及以后几年的抵制，就是极其严重而难于纠正的错误了，因为当时一方面不能期望革命浪潮会非常迅速地高涨并转为起义，另一方面，资产阶级君主制度正在维新的整个历史环境，使我们必须把合法的工作同不合法的工作配合起来。这个历史时期已经完全终结，它同以后各时期的联系也已经完全显示出来了，现在如果回顾一下，就会特别清楚地看出：假使布尔什维克当时不在最严酷的斗争中坚持一定要把合法的斗争形式同不合法的斗争形式结合起来，坚持一定要参加最反动的议会以及其他一些受反动法律限制的机构（如保险基金会等），那末他们就决不能在1908—1914年间保住（更不用说巩固、发展和加强）无产阶级革命政党的坚强核心。

1918年事情没有弄到分裂的地步。那时“左派”共

① 关于个人所说的话，作适当的修改，也适用于政治和政党。聪明人并不是不犯错误的人。不犯错误的人是没有而且也不可能有的。聪明人是犯的错误不太大同时又能容易而迅速地加以纠正的人。

产主义者〔4〕只是在我们党内形成了一个特殊集团，或者说“派别”，而且为时不久。“左派共产主义者”最有名的代表，如拉狄克、布哈林同志，就在1918这一年都公开承认了自己的错误。他们原来认为，布列斯特和约是同帝国主义者的妥协，对于革命无产阶级政党说来，在原则上是不能容许的而且是有害的。这的确是同帝国主义者的妥协，但这种妥协在当时那种情况下恰恰是**必要的**。

现在当我听到人们，例如“社会革命党人”，攻击我们签订布列斯特和约的策略的时候，或者当兰斯柏利同志和我谈话，讲到“我们英国工联的领袖们说，既然布尔什维克可以妥协，那他们也可以妥协”的时候，我通常是先用一个简单的“通俗的”比喻来回答说：

假定您坐的汽车被武装强盗拦住了。您把钱、身分证、手枪、汽车都交给他们，于是您摆脱了这次幸遇。这显然是一种妥协。〈Do ut des〉^①（“我给”你钱、武器、汽车，“是为了你给”我机会安全脱险）。但是很难找到一个没有发疯的人会说这种妥协“在原则上是不能容许的”，或者说实行这种妥协的人是强盗的同谋者（虽然强盗坐上汽车又可以利用它和武器再去打劫）。我们同德国帝国主义强盗的妥协正是这样的妥协。

而俄国的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德国的谢德曼派（考茨基派在很大程度上也是这样），奥地利的奥托·鲍威尔和弗里德里希·阿德勒（更不用说伦纳之流的先

① 拉丁文，意为：我给（你）是为了你给（我）。——编者注

生们了)，法国的列诺得尔和龙格之流，英国的费边派、“独立党人”、“劳工分子”（“拉布分子”〔5〕）等，在1914—1918年间以及1918—1920年间，同他们本国的资产阶级强盗，有时甚至同“盟国的”资产阶级强盗实行**妥协**，**反对本国的革命无产阶级**，所有这班先生才真是**强盗的同谋者**。

结论很清楚：“原则上”反对妥协，不论什么妥协都一概加以反对，这简直是难于当真看待的孩子气。一个政治家要想有益于革命无产阶级，正是应当善于辨别出那种不能容许的、表现出机会主义和**叛卖行为的具体**的妥协，并善于对**这种具体**的妥协全力展开批判，猛烈地进行无情的揭露和不调和的斗争，决不容许那班老于世故的“专讲实利的”社会党人和老奸巨猾的议员用泛谈“一般的妥协”来推卸和逃避责任。英国工联以及费边社和“独立”工党的“领袖”先生们，正是这样来推卸**他们实行叛卖所应负**的责任，推卸他们实行无异于最恶劣的机会主义、变节和叛卖的那**种妥协所应负**的责任。

有各种各样的妥协。应当善于分析每一个妥协或每一种妥协的环境和具体条件。应当学习区分这样的两种人：一种人把钱和武器交给强盗，为的是要减少强盗所能加于的祸害和便于后来捕获、枪毙强盗；另一种人把钱和武器交给强盗，为的是要入伙分赃。这在政治上决不总是象这个极其简单的例子那样容易分辨。但如果有人异想天开，要替工人们打一张包票，能包治百病，或者能保

证在革命无产阶级的政治活动中不会遇到任何困难和任何错综复杂的情况，那他简直就是一个江湖骗子。

为了不给人们留下曲解的余地，我想把一些基本情况提出来(即使是十分简要地)，以便对具体的妥协进行分析。

通过签订布列斯特和约而同德帝国主义者实行妥协的党，从1914年末以来就在实际上制定了它的国际主义政策。它在两伙帝国主义强盗进行战争时就敢于提出使沙皇君主制失败的主张，敢于痛斥“保卫祖国”的谬论。这个党的议会代表，宁愿流放到西伯利亚，而不去谋求资产阶级政府里的大臣职位。革命在推翻了沙皇制度和建立了民主共和国以后，又使这个党受到了新的、极大的考验：它不同“本国的”帝国主义者实行任何妥协，而是做了推翻他们的准备，并且把他们推翻了。这个党取得政权以后，便彻底废除了地主和资本家的私有制。这个党一面公布和废除帝国主义者所缔结的秘密条约，一面向各国人民建议和平，只是在英法帝国主义者加以破坏而布尔什维克已经做了人力所及的一切来加快德国和其他国家的革命以后，它才屈服于布列斯特强盗的暴力。大家都越来越清楚地看到，这样的党在这样的情况下实行这样的妥协是完完全全正确的。

俄国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同1914—1920年间世界上第二国际的一切领袖一样)，一开始就实行叛卖，直接间接地为“保卫祖国”即保卫本国的资产阶级强盗辩

护。后来他们又进一步实行叛卖，同本国的资产阶级实行联合，同本国的资产阶级一起来反对本国的革命无产阶级。他们在俄国起初同克伦斯基和立宪民主党人〔6〕结成同盟，后来又同高尔察克和邓尼金结成同盟，正如他们国外的同道者同各自国家的资产阶级结成同盟一样，都是倒向资产阶级一边反对无产阶级。他们同帝国主义强盗的妥协，自始至终在于使自己变成帝国主义强盗的同谋者。

五

德国“左派”共产党人。

领袖、政党、阶级、群众间的相互关系

我们现在所要讲的那些德国共产党人，他们不是把自己叫作“左派”，而是叫作——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原则上的反对派”〔7〕。但是他们却完全具有“左派幼稚病”的症候，这从下面的阐述中可以清楚地看出来。

有一本持这个反对派观点的小册子，叫作《德国共产党(斯巴达克联盟)的分裂》，是由“美因河畔法兰克福地方组织”出版的；这本小册子把这一反对派的观点的实质，叙述得极其鲜明、确切、清楚、扼要。我们只要从中引证几段，就足以使读者了解这一实质了。

“共产党是进行最坚决的阶级斗争的政党……”

“……从政治方面来看，这个过渡时期〈在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之间〉就是无产阶级专政时期……”

“……现在发生这样一个问题：谁应当是专政的**执行者**，是**共产党**，还是**无产阶级**？……原则上应该力求实现的是共产党的专政，还是无产阶级的专政？”

（引文内的着重号一律按照原文）

往下小册子的作者责难德国共产党“中央”，说这个“中央”在寻求和**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结成联盟**的途径，说这个“中央”提出“**原则上承认**”斗争的“**一切政治手段**”（包括参加议会）“**的问题**”，只是为了掩饰它想同独立党人结成联盟这一真正的和主要的意图。小册子接着说道：

“反对派选择了另一条道路。它认为共产党的统治和党的专政问题只是一个策略问题。不管怎样，共产党的统治是一切政党统治的最后形式。原则上应该力求实现无产阶级的专政。党的一切措施、党的组织、党的斗争形式、党的战略和策略，都应该适合于这一目的。因此，凡是同其他政党妥协，凡是回头再去采用在历史上和政治上已经过时了的议会制度斗争形式，凡是实行机动和通融的政策，都应当十分坚决地拒绝。”“无产阶级所特有的革命斗争方法应该大力加以强调。为了把那些应当参加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斗争的无产阶级各行业各阶层的最广大群众吸收进来，就必须建立基础最广泛和范围最广大的新的组织形式。这种汇集一切革命分子的场所，便是以工厂组织为基础而建立起来的**工人联合会**。凡是听从‘退出工会！’这一口号的工人，都应当集合在这里。在这里，正在斗争的无产阶级组成最广大的战斗队伍。凡承认阶级斗争、苏维埃制度、专政的人，都可以加入。至

于进一步对正在斗争的群众进行政治教育和在斗争中进行政治指导，则是站在工人联合会以外的共产党的任务……”

“……可见，现在有两个共产党彼此对立着：

一个是领袖的党，它力图从上面来组织和指挥革命斗争，不惜实行妥协和参加议会，以便造成一种形势，使他们可以参加掌握专政大权的联合政府。

另一个是群众的党，它等待革命斗争从下面高涨起来，为了进行这种斗争，它只知道并且只采用一个明确地引向目的的方法，而排斥任何议会方法和机会主义方法；这个唯一的方法就是无条件地推翻资产阶级，以便随后建立无产阶级的阶级专政来实现社会主义……”

“……那里是领袖专政，这里是群众专政！这便是我们的口号。”

这就是表明德国共产党内反对派观点的最重要的论点。

凡是自觉地参加过或密切地观察过 1903 年以来布尔什维主义发展过程的布尔什维克，读了这些议论，一定会立刻说：“这是多么陈腐的、早已听腻了的废话！这是多么‘左的’孩子气！”

不过，我们还是要进一步考察一下这些议论。

“是党专政还是阶级专政？是领袖专政（领袖的党）还是群众专政（群众的党）？”——单是问题的这种提法就已经证明思想混乱到了不可思议的无可救药的地步。这些人竭力要标新立异，结果却弄巧成拙。谁都知道：群众是划分为阶级的；只有把不按照生产的社会结构中的地

位区分的笼统的大多数同在生产的社会结构中占有特殊地位的集团对立时，才可以把群众和阶级对立起来；在通常情况下，在多数场合，至少在现代的文明国家内，阶级是由政党来领导的；政党通常是由最有威信、最有影响、最有经验、被选出担任最重要职务而称为领袖的人们所组成的比较稳定的集团来主持的。这都是起码的常识。这都是简单而明了的。为什么不要这简单明了的道理，却要来这一套胡说八道呢？来这一套新奇的沃拉皮尤克^{〔8〕}呢？一方面，大概是由于人们看到党的合法状态和不合法状态的迅速更替破坏了领袖、政党和阶级之间那种通常的、正常的和简单的关系，面对这种难于理解的情况，他们的思想发生了混乱。在德国，也象在欧洲其他国家那样，人们过分习惯于合法状态，习惯于由政党按期举行的代表大会自由地正常地选举“领袖”，习惯于通过议会选举、群众大会、报章杂志、工会和其他团体的情绪变化等方便办法来检验各政党的阶级成分。但是，由于革命的急剧发展和内战的展开，不得不放弃这种通常的办法，而迅速转为交替使用合法的和不合法的方式，结合使用这两种方式，采用“不方便的”和“非民主的”方法来推选或组成或保留“领导集团”，在这个时候，人们不知所措，臆想出了荒谬绝伦的东西。大概荷兰“论坛派”^①由

① 这里“荷兰论坛派”应改为“荷兰共产党的某些党员”，见《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一书增补第五节列宁的说明。——编者注

于不幸生在一个小国，具有特别优越和特别稳定的合法状态的傳統和条件，根本没有见过合法状态和非法状态的相互更替，因此思想上发生了混乱而不知所措，助长了这种荒谬的臆想。

另一方面，很明显，这不过是未经很好考虑就胡乱使用“群众”和“领袖”这类当今“时髦”的字眼而已。这些人时常听到并切实学会了怎样攻击“领袖”，怎样把“领袖”同“群众”对立起来；但是他们却不能想一想究竟是怎么回事，不能把事情弄清楚。

在帝国主义战争末期和战后时期，在一切国家里，“领袖”和“群众”的分离表现得特别明显和突出。产生这种现象的基本原因，马克思和恩格斯在1852—1892年间曾以英国为例作过多次说明。英国的垄断地位使“群众”分化出一部分半市侩的机会主义的“工人贵族”。这种工人贵族领袖总是投奔到资产阶级方面，直接间接地受资产阶级豢养。马克思所以光荣地被这班混蛋痛恨，就是因为他公开地斥责他们是叛徒。现代（二十世纪的）帝国主义造成了某些先进国家的垄断特权地位，正是在这个基础上，第二国际内到处出现了叛徒领袖、机会主义者、社会沙文主义者这样一种人，他们只顾自己这个行会的利益，只顾自己这个工人贵族阶层的利益。于是机会主义的政党就脱离了“群众”，即脱离了最广大的劳动阶层，脱离了大多数劳动者，脱离了工资最低的工人。不同这种祸害作斗争，不揭露这些机会主义的、背叛社会主义的领

袖，使他们大丢其丑，并把他们驱逐出去，革命无产阶级就不可能取得胜利；第三国际所实行的正是这样的政策。

为此竟把群众专政和领袖专政**根本**对立起来，实在是荒唐和愚蠢得可笑。尤其可笑的是，人们在“打倒领袖”这一口号掩饰下，实际上竟把一些胡说八道、满口谬论的**新领袖**拉出来代替那些对普通事物还能持常人见解的老领袖。德国的劳芬堡、沃尔弗海姆、霍纳、卡尔·施罗德、弗里德里希·文德尔、卡尔·埃勒^①，就是这样的新领袖。^②埃勒企图使问题“深入一步”，他宣称政党是根本不需要的，是“资产阶级性”的，这真是荒谬绝顶，简直使人啼笑皆非。如果坚持错误，深入一步地来为错误辩护，把错误“坚持到底”，那就往往真要把小错铸成骇人听闻的大

① 《共产主义工人报》〔9〕（汉堡1920年2月7日第32号所载卡尔·埃勒《论解散政党》一文）上说：“工人阶级不消灭资产阶级民主，就不能摧毁资产阶级国家，而不摧毁政党，就不能消灭资产阶级民主。”

罗曼语国家的工团主义者和无政府主义者中间头脑最糊涂的人物可以“心满意足”了，因为那些显然以马克思主义者自居的庄重的德国人（卡·埃勒和克·霍纳通过在上述报纸上发表的文章特别庄重地证明，他们自己是庄重的马克思主义者，可是同时他们又特别可笑地说出一些荒谬绝伦的话，暴露出他们连马克思主义的起码常识都没有），竟也发表出这种极不恰当的议论。仅仅承认马克思主义还是不能避免错误的。这一点俄国人特别清楚，因为马克思主义在我国曾经特别经常地成为一种“时髦的东西”。

② 句中的霍纳是安·潘涅库克的笔名；卡尔·埃勒是劳芬堡的笔名。——编者注

错了。

否认党性和党的纪律，——这就是从反对派那里得出的结论。这就等于完全解除无产阶级的武装而有利于资产阶级。这也就恰恰是小资产阶级的散漫、动摇、不能坚持、不能团结、不能统一行动，而纵容这些行为，就必然断送无产阶级的任何革命运动。从共产主义的观点看来，否认党性就意味着从资本主义崩溃的前夜（在德国）跃进到共产主义的最高阶段，而不是跃进到它的低级阶段和中级阶段。我们在俄国（推翻资产阶级后的第三年）还是在采取最初步骤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即向共产主义的低级阶段过渡。阶级还存在，而且在任何地方，**在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之后都还要存在好多年**。在没有农民（但仍然有小业主！）的英国，也许这个时期会短一些。消灭阶级不仅意味着要驱逐地主和资本家，——这个我们已经比较容易地做到了——而且意味着要**消灭小商品生产者**，可是对于这种人**不能驱逐**，不能镇压，**必须同他们和睦相处**，可以（而且必须）改造他们，重新教育他们，这只有通过很长期、很缓慢、很谨慎的组织工作才能做到。他们用小资产阶级的自发势力从各方面来包围无产阶级，浸染无产阶级，腐蚀无产阶级，经常使小资产阶级的懦弱性、涣散性、个人主义以及由狂热转为灰心等旧病在无产阶级内部复发起来。要抵制这一切，要使无产阶级正确地、有效地、胜利地发挥自己的**组织作用**（这是它的**主要作用**），就必须在无产阶级政党内部实行极严

格的集中制和极严格的纪律。无产阶级专政是对旧社会的势力和传统进行的顽强斗争，流血的和不流血的，暴力的和和平的，军事的和经济的，教育的和行政的斗争。千百万人的习惯势力是最可怕的势力。没有铁一般的和在斗争中锻炼出来的党，没有为本阶级全体忠实的人所信赖的党，没有善于考察群众情绪和影响群众情绪的党，要顺利地进行这种斗争是不可能的。战胜集中的大资产阶级，要比“战胜”千百万小业主容易千百倍；而这些小业主用他们日常的、琐碎的、看不见摸不着的腐蚀活动制造着**正是**资产阶级所需要的、使资产阶级得以**复辟**的那种恶果。谁要是把无产阶级政党的铁的纪律哪怕是稍微削弱一点（特别是在无产阶级专政时期），那他事实上就是帮助资产阶级来反对无产阶级。

除了领袖、政党、阶级、群众间的相互关系问题外，还必须提出“反动”工会的问题。但是先让我根据我们党的经验讲几句话来结束前一问题。在我们党内，对于“领袖专政”的攻击**是一直都有的**。我记得这样的攻击最早是在1895年，那时党还没有正式成立，但是中心小组^[10]已经在彼得堡开始形成，它必须负起领导该城各区小组的责任。在我们党的第九次代表大会^[11]（1920年4月）上，有一个小小的反对派，也声言反对“领袖专政”，反对“寡头政治”等等。所以德国“左派共产党人”的“幼稚病”是毫不足怪的，既没有什么新东西，也没有什么可怕的地方。这种病没有什么危险，一经治愈，机体甚至会更加强

壮。另一方面，合法工作和不合法工作的迅速更替，正是要求我们特别要把总指挥部，把领袖们“藏起来”，隐蔽起来，这有时就使我们党内产生十分危险的现象。最糟糕的就是1912年奸细马林诺夫斯基混进了布尔什维克中央委员会。他断送了几十个上百个极优秀极忠实的同志，把他们送去服苦役，使其中许多人过早死去。他所以没有能够造成更大的祸害，是因为我们的合法工作和不合法工作配合得正确。为了取得我们的信任，马林诺夫斯基作为党中央委员和杜马代表，曾不得不帮助我们创办合法的日报，这些日报即使在沙皇制度下也能进行反对孟什维克机会主义的斗争，并且能采用适当的隐蔽方式宣传布尔什维克的原理。马林诺夫斯基一只手把几十个上百个极优秀的布尔什维克活动家送去服苦役，使他们遭到死亡，另一只手又不得不通过合法报刊来帮助培养成千上万个新的布尔什维克。对于这个事实，那些必须学会在反动工会里进行革命工作的德国同志（以及英国、美国、法国、意大利的同志），不妨好好地考虑一下^①。

① 马林诺夫斯基后来在德国被俘。他在布尔什维克掌握政权时回到俄国，立即被送交法庭审判，由我们的工人枪决了。孟什维克特别恶毒地攻击我们竟让一个奸细混进我们党中央的这个错误。可是当我们在克伦斯基执政时期要求逮捕杜马主席罗将柯并且将他提交法庭审判（因为他在战前就知道马林诺夫斯基的奸细活动，却没有把这事通知杜马中的劳动派〔12〕和工人）时，同克伦斯基一起执政的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没有支持我们的要求，因此罗将柯得以逍遥法外，自由自在地投奔邓尼金去了。

在许多国家里，包括最先进的国家在内，资产阶级无疑正在派遣而且将来还会派遣奸细到共产党里来。对付这种危险的手段之一，就是要把合法的工作和不合法的工作巧妙地结合起来。

写于1920年4—5月间
1920年6月用单行本刊印

选自《列宁选集》第4卷
第180—183, 188—202
页

注 释

〔1〕《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是一部马克思主义战略和策略的重要著作。列宁在这本书里，总结了布尔什维克党的历史经验，论证了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阐述了马克思主义关于党的领导的原则，在批判了第二国际修正主义的同时，批判了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从而论证了布尔什维主义的战略与策略。

《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于1920年4月写成，增补部分于5月12日写成。该书俄文本于同年6月8—10日出版，德文本、法文本和英文本相继在7月出版。为了使这本书能在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开会之前出版，列宁曾亲自校阅该书清样和机样。该书曾分发给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的全体代表。1920年7—11月，该书在莱比锡、巴黎和伦敦分别用德文、法文和英文再版。

在这本书的手稿上有一个副标题：《〈马克思主义战略和策略通俗讲话的尝试〉》。列宁在世时出版的以及后来出版的这本书的一切版本中都没有印上这个副标题。

〔2〕斯巴达克派（国际派）是德国左派社会民主党人的革命组织的成员。该组织于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成立，创始人和领导人是卡·李卜克内西、卢森堡、梅林、蔡特金等人。斯巴达克派在群众中进行了反对帝国主义战争的革命宣传，揭露了德国帝国主义的掠夺政策和社会民主党机会主义领

袖的叛卖行为。但是斯巴达克派在一些重大的理论问题和政策问题上没有摆脱半孟什维主义的错误。列宁《论尤尼乌斯的小册子》和《论对马克思主义的讽刺和“帝国主义经济主义”》（见《列宁选集》第2卷第846—860页和《列宁全集》第23卷第18—72页）等著作，以及斯大林的信《论布尔什维主义历史中的几个问题》（见《斯大林全集》第13卷第76—91页）都对德国左派的错误做了批评。1917年4月，斯巴达克派加入德国中派独立社会民主党，但保持组织上的独立。1918年11月，在德国革命过程中斯巴达克派形成了斯巴达克联盟。十一月革命后，斯巴达克派同“独立党人”决裂，于同年12月建立德国共产党。

〔3〕指1905年10月的全俄政治罢工。这次罢工是1905—1907年第一次俄国革命中最重要的事件之一，它显示了无产阶级运动的强大力量。罢工先由莫斯科一喀山铁路开始，很快就发展成为全俄大罢工。参加罢工的人数达二百万以上。十月罢工的口号是：推翻专制制度，积极抵制布里根杜马，召集立宪会议和建立民主共和国。十月政治罢工的风暴扫除了布里根杜马，把无产阶级引向十二月武装起义。关于十月罢工，参看列宁《全俄政治罢工》一文（《列宁全集》第9卷第377—380页）。

〔4〕“左派共产主义者”是1918年初由于缔结布列斯特和约问题而产生的一个反党集团。“左派共产主义者”集团在“左”的辞句掩饰下，坚持要当时还没有军队的年轻的苏维埃共和国同德国作战。这个集团的首领是：布哈林、拉狄克、皮达可夫。这些“左派共产主义者”的头目都是托洛茨基的帮手，当时托洛茨基在既不进行战争也不签订和约的口号下，以更加隐蔽的形式执行叛变性的继续战争的政策。列宁坚决主张签订和约，以便赢得时间，整顿国家经济，建立红军，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托洛茨基和“左派共产主义者”与此相反，他们强迫布尔什维克党接受显然会使无产阶级专政遭受灭亡的政策。列宁把“左派共产主义者”称做“帝国主义进行挑衅的工具”。“左派共产主义者”在托洛茨基的支持下，进行了公开的反党斗争，展开了肆无忌惮的派别活动。他们对党乱加诽谤，造谣中伤，竭力分裂党，瓦解党的队伍，以辞去苏维埃和党的职务等等来破坏党，要挟党。列宁、斯大林和斯维尔德洛夫为了争取通过签订和约的决定，以便拯救年轻的苏维埃共和国，不得不在中央内部坚持顽强的斗争，反对托洛茨基和“左派共产主义者”。

布尔什维克党在列宁的领导下，坚决回击了托洛茨基和“左派共产主义者”的罪恶活动，痛斥了他们的叛卖和投降的立场。“左派共产主义者”终于被孤立、被击溃了。

〔5〕“拉布分子”是列宁对英国工党党员的称呼。工党是英国的一个机会主义政党，于1900年由工联、费边社等联合而成，最初叫工人代表委员会，1906年改名为工党。工党公开执行同资产阶级实行阶级合作的政策。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工党的首领们采取社会沙文主义的立场。

〔6〕立宪民主党(或称人民自由党)是俄国主要的资产阶级政党，自由资产阶级的政党，1905年10月成立，首领是米留可夫。立宪民主党企图用立宪君主制的形式来保存沙皇君主制。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该党支持沙皇政府的对外侵略政策。1917年二月资产阶级革命后，在资产阶级临时政府中占据领导地位。十月革命胜利后，立宪民主党人组织反革命阴谋活动和暴动，被苏维埃政权粉碎。苏维埃政府于1917年12月宣布立宪民主党人为人民公敌。

〔7〕指德国“左派”共产党人所组成的一个无政府工团主义集团。这一集团于1919年10月被开除出德国共产党，1920年4月成立了独立的组织，即所谓“德国共产主义工人党”。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曾要求德国“左派”共产党人放弃宗派主义的策略，加入德国共产党，但他们没有执行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的决定，因此被开除出共产国际。后来，“左派”共产党人的上层分子滚到反革命那边去了。

〔8〕沃拉皮尤克(*Volapük*)是德国人约·马·施莱艾尔于1879年提出的一种世界语方案，后来没有流行于世。

〔9〕《共产主义工人报》是德国“左派”共产党人的机关报，1919年至1927年在汉堡出版。

〔10〕指列宁在1895年秋天组成的工人阶级解放斗争协会。该协会统一了彼得堡所有的马克思主义工人小组。领导斗争协会的是以列宁为首的中心小组。斗争协会第一次在俄国实现了社会主义同工人运动的结合，把在少数先进工人中间宣传马克思主义变为在工人阶级广大群众中进行政治鼓动。斗争协会领导了工人运动，把工人为实现经济要求的斗争同反对沙皇制度的政治斗争联系起来。斗争协会给工人印发传单和小册子，领导了罢工运动。斗争协会的影响远远超出了彼得堡。在斗争协会的推动下，俄国其他城市和区域中的工人小组也相继统一成为这样的协会。1895年12月20日夜，以列宁为首的斗争协会的领导核心被捕。列宁在狱中从没有停止革命斗争。他提出种种意见和指示帮助斗争协会，送出他自己所写的传单和小册子。党纲草案也是列宁在狱中写的。“彼得堡工人阶级解放斗争协会的意义，如列宁所说，就在于它是依靠着工人运动的革命政党的

第一个不容忽视的萌芽。”(见《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1975年人民出版社版第19页)

〔11〕俄共(布)第九次代表大会于1920年3月29日至4月5日在莫斯科举行。在出席代表大会的代表中,有表决权的代表五百五十三人,有发言权的代表一百六十二人,共代表六十一万一千九百七十八名党员。代表大会的主要议题是经济建设问题。列宁致开幕词,做了党中央委员会政治工作总结报告和关于报告的结论,并就经济建设问题和合作社问题发表了讲话。在代表大会闭幕式上,列宁致闭幕词,并提出中央委员候选人名单。第九次代表大会确定了运输、粮食、燃料和工业等方面的当前任务,指出工会参加经济建设的必要性。大会特别重视统一的经济计划的问题。在统一的经济计划中居于首位的是全部国民经济电气化问题。在代表大会上,反党集团民主集中派(萨普龙诺夫、奥新斯基等)反对列宁的路线。他们歪曲民主集中制原则,否认在生产中实行一长制的必要性,反对党和国家的坚强的纪律,胡说中央没有执行集体领导的原则。在大会上民主集中派得到了李可夫、托姆斯基等人的支持。大会对民主集中派给予了坚决的回击。

〔12〕劳动派即劳动团,是小资产阶级民主派集团,1906年4月由第一届国家杜马的农民代表组成。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劳动派采取了沙文主义立场。在二月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后,劳动派同社会党人一起投入反革命阵营。劳动派对十月革命采取敌视态度。

斯 大 林

无产阶级和无产阶级政党

(论党章第一条)

大胆宣布“俄国是统一而不可分的”时代已经过去。现在连小孩子也知道“统一而不可分的”俄国并不存在，它早就分成两个对立的阶级，即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现在谁都晓得这两个阶级间的斗争已变成我国现代生活所赖以旋转的轴心。

然而，在此以前这一点是难于看出的，其原因是由于当时只有个别集团在个别城市和个别角落里进行斗争，因此我们只看见斗争舞台上的个别集团，而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作为两个阶级，当时还看不出来，也难以看出来。可是后来各个城市和各个区域联合起来了，无产阶级各个集团携起手来了，总罢工和示威运动爆发了，——于是在我们面前就呈现出两个俄国即资产阶级俄国和无产阶级俄国互相斗争的一幅壮丽的图画。在斗争舞台上出现了两支大军即无产者大军和资产者大军，这两支大军间的斗争已波及我国整个的社会生活。

既然军队没有领导者就不能行动，既然每支军队都

有自己领路的先头部队，那末就很明显，和这两支大军一起行动的还应有各自的领导集团，即通常所说的政党。

于是出现了如下的情景：一边是自由党率领的资产者大军，另一边是社会民主党率领的无产者大军，每支大军都在自己的政党领导下进行阶级斗争^①。

我们之所以提到这点，是为了把无产阶级政党和无产阶级作个比较，从而简略地阐明无产阶级政党的一般面貌。

上述一切已经足以说明：无产阶级政党作为一个战斗的领导集团，第一、按成员数量来说，它应当比无产阶级小得多；第二、按觉悟程度和经验来说，它应当比无产阶级更高些；第三、它应当是一个团结一致的组织。

在我们看来，上述一切是用不着证明的，因为很明显，只要有必然使人民大众贫困落后的资本主义制度存在，整个无产阶级就不能提高到应有的觉悟程度，所以必须有一个觉悟的领导集团用社会主义思想教育无产者大军，把这支大军联合起来，并在斗争中领导他们。同样很明显，一个以领导**战斗**的无产阶级为目的的政党，就不应当是个人的偶然凑合，而应当是团结一致的集中的**组织**，因为只有这样才能按照统一的计划指导党的工作。

简略说来，我们党的一般面貌就是如此。

先记住这一点，再来谈我们的主要问题：我们究竟能

① 我们完全没有讲到俄国其他各政党，因为要来阐明我们所分析的问题，根本没有讲到这些政党的必要。

把什么人称为党员呢？本文所论的党章第一条就是讲这个问题的。

那末，我们就来研究这个问题吧。

我们究竟能把什么人称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党员呢？换句话说，党员的义务是什么呢？

我们党是社会民主主义的党。这就是说，我们党有自己的纲领（运动的最近目的和最终目的），有自己的策略（斗争方式）和自己的组织原则（结合形式）。纲领观点、策略观点和组织观点的一致是我们党赖以建立的基础。只有这些观点的一致才能把党员结成一个集中的党。如果观点的一致被破坏了，党也就要瓦解的。所以只有完全承认党的纲领、策略和组织原则的人才能称为党员，只有足够理解和完全承认我们党的纲领、策略和组织观点的人才能参加我们党的队伍，同时也就是参加无产者大军的领导者队伍。

可是，就一个党员说来，是不是只承认党的纲领、策略和组织观点就够了呢？能不能把这样的人称为无产者大军的真正领导者呢？当然不能！第一、大家知道，世界上有不少的空谈家很乐意“承认”党的纲领、策略和组织观点，可是除了讲空话以外，什么也不能做。如果把这种空谈家称为党员（即称为无产者大军的领导者），那就会亵渎党的神圣尊严！况且我们党又不是一个哲学学派或宗教教派。难道我们党不是一个斗争的党吗？既然我们党是一个斗争的党，它就不能满足于抽象地承认它的纲领、

策略和组织观点，它就一定要求自己的党员**实现**他所承认的观点，这难道不明白吗？这就是说，谁要想成为我们党的党员，谁就不能只以承认我们党的纲领、策略和组织观点为满足，而应该实行这些观点，实现这些观点。

但是，就一个党员说来，实现党的观点是什么意思呢？他什么时候才能实现这种观点呢？只有当他进行斗争的时候，当他和全党一起走在无产阶级大军前头的时候。能不能单独地、分散地进行斗争呢？当然不能！相反地，人们首先要联合起来，组织起来，然后再投入战斗。否则任何斗争都是不会有结果的。所以很明显，就是党员也只有当他们结成**一个团结一致的组织**时，才能进行斗争，因而才能实现党的观点。同样很明显，党员愈能紧密地结成**一个团结一致的组织**，就愈能更好地进行斗争，因而也就愈能更完满地实现党的纲领、策略和组织观点。有些人说得对，我们党是领导者的**组织**，而不是个人的凑合。既然我们党是领导者的**组织**，那末很明显，只有在这个组织中工作、认为自己的义务是把个人愿望同党的愿望融为一体并和党一起行动的人，才能算做这个党的一员，算做这个组织的一员。

这就是说，要做一个党员，就必须实现党的纲领、策略和组织观点；要实现党的观点，就必须为这种观点而斗争；要为这种观点而斗争，就必须在党的组织中工作和党一起工作。显然，要做一个党员，就必须参加党的一个

组织^①。只有当我们参加了党的一个组织、因而把我们个人的利益和党的利益融为一体的时候，我们才能成为党员，才能成为无产者大军的真正领导者。

既然我们党不是一些空谈家的凑合，而是通过中央委员会来很好地引导无产者大军前进的领导者的组织，那末上述一切也就不言而喻了。

还要指出一点。

以前我们党很象一个好客的宗法家庭，愿意把一切同情者都接纳进来。可是我们党在成了一个集中的组织以后，也就抛掉了那副宗法的面貌，完全变为一座只对够资格的人开放大门的堡垒了。这对于我们是有重大意义的。正当专制政府竭力用“工联主义”、民族主义和教权主义等等来腐蚀无产阶级的阶级觉悟的时候，而另一方面，又当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在竭力摧残无产阶级的政治独立性、竭力想控制无产阶级的的时候，我们应当非常警惕，决不应忘记我们党是一座只对经过考验的人开放大门的堡垒。

我们已经阐明了做党员的两个必要条件（承认党纲

① 正如任何复杂的有机体都是由无数最简单的有机体组成的一样，我们党作为一个复杂的总的组织，也是由许多区域的组织即地方组织所组成的；这些组织一经党代表大会或中央委员会批准，便可称为党的组织。由此可见，并不只是委员会才称为党的组织。中央委员会的成立是为了指导这些组织使它们按照统一计划来工作；这些地方党组织便通过中央委员会而组成一个巨大的集中的组织。

和在党组织中工作)。如果再加上一个条件,即党员必须给党以物质上的帮助,那末有权取得党员称号的一切必要条件就完全具备了。

这就是说,只有承认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党纲、给党以物质上的帮助并**参加党的一个组织**的人,才能称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党员。

列宁同志^①所提出的党章第一条的条文就是这样。

可见这个条文完全是从我们党是集中的**组织**而不是个人的**凑合**这一观点产生的。

这个条文的最大优点就在这里。

然而,竟有一些同志把列宁的条文当做“狭隘的”和“不方便的”条文而加以摈斥,并提出了自以为既不“狭隘”又非“不方便的”条文。我们说的是马尔托夫^②的条文,现在我们来分析这个条文。

依据马尔托夫的条文说来,“凡承认党纲,在物质上帮助党并在党的一个组织领导下经常亲自协助党者,皆得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党员”。可见这个条文中略去了做党员所必要的第三个条件,即党员必须**参加党的一个组织**。马尔托夫竟认为这个明确而必要的条件是多余的,并在自己的条文内加进了“在党的一个组织领导下……亲自协助党”这样一个含糊的语句来代替这个条件。这样说来,不参加党的任何一个组织(这象什么“党”呵!),

① 列宁是革命的社会民主党中杰出的理论家和实践家。

② 马尔托夫是《火星报》编辑之一。

不认为自己应该服从党的意志（这象什么“党的纪律”呵！）也可以成为一个党员！试问，党对于那些不参加党的任何一个组织、因而不认为自己应该绝对服从党的纪律的人，又怎能“经常地”加以领导呢？

马尔托夫提出的党章第一条的条文就在这个问题上碰得粉碎了，而这个问题在列宁的条文中却解决得很巧妙，因为列宁的条文肯定地认为**参加党的一个组织**是做党员所必要的第三个条件。

这样，我们只有把马尔托夫条文中“在党的一个组织领导下……亲自协助党”这个含糊而毫无意义的语句丢掉。如果丢掉这个条件，马尔托夫的条文中就只剩下两个条件（承认党纲和给予物质上的帮助），这两个条件本身是没有任何价值的，因为任何一个空谈家都可以“承认”党纲并给党以物质上的帮助，但这决不能使他享有做党员的权利。

看吧，这就是所谓“方便的”条文！

我们说：真正的党员决不应该只以承认党纲为满足，他们必须努力实现自己所承认的纲领。马尔托夫回答说：你们太严格了，因为就一个党员说来，如果他不拒绝给党以物质上的帮助等等，那末实现他所承认的纲领就不十分需要了。马尔托夫好象怜悯某些“社会民主主义”空谈家似的，不愿意对他们关上党的大门。

其次，我们说，因为要实现党的纲领，就必须进行斗争，而要进行斗争，就必须团结起来，所以愿意做党员的

人必须加入党的一个组织，必须把个人愿望同党的愿望融为一体，必须和党一起去领导战斗的无产者大军，就是必须组成集中的政党的严整部队。马尔托夫回答说：并不一定要求党员非组成严整的部队不可，非结成组织不可，各人单独进行斗争也成了。

我们要问：那末我们党究竟是什么呢？是个人的偶然凑合呢，还是团结一致的领导者的组织？如果说它是领导者的组织，那末能不能把不参加这个组织、因而不认为自己必须服从其纪律的人算做这个组织中的一员呢？马尔托夫回答说：党并不是一个组织，或者确切些说，党是一个**无组织的组织**（请看，这是什么“集中制”呀！）！

可见照马尔托夫看来，我们党不是一个集中的组织，而是由一些承认我们党纲等等的地方组织和个别“社会主义”分子凑合起来的。但是，如果我们党不是一个集中的组织，它也就不会是一座只对经过考验的人才敞开大门的堡垒。的确，在马尔托夫看来，也正如他的条文所表明的那样，党并不是一座堡垒，而是一切同情者都可以自由参加的宴会。一个人只要有一点知识，只要表示一点同情，只要给一点物质上的帮助，那就成了，他就有充分权利算做一个党员了。马尔托夫给那些吓慌了的“党员”打气说：有些人认为党员必须参加党的一个组织，因而必须使个人愿望服从党的愿望，别听他们的话！第一、同意这些条件是很难的，因为使个人愿望服从党的愿望并不是好玩的呀！第二、我已经在自己的说明中指出

过，这些人的意见是错误的。好吧，先生们，请光临……宴会吧！

马尔托夫好象是怜悯某些没有决心使个人愿望服从党的愿望的教授和中学生，于是他在我们党的堡垒上凿了一个洞，让这些可敬的先生有机会偷偷地钻进我们党内来。他向机会主义大开方便之门，而且是在成千上万的敌人压制无产阶级的阶级觉悟时大开方便之门呢！

然而，还不止于此。问题在于马尔托夫那个可疑的条文使机会主义有可能在我们党内从另一方面产生出来。

我们知道，马尔托夫的条文只说到承认纲领，关于策略和组织却只字未提，其实为了保证党内的一致，不仅要有纲领观点的一致，同样还要有组织观点和策略观点的一致。有人会对我们说，列宁同志的条文也没有讲到这一点。不错！但是要知道，列宁同志的条文是没有必要讲到这一点的！一个人既在党的一个组织中工作，就必然和党在一起进行斗争，服从党的纪律，所以他除了遵循党的策略和党的组织原则而外，当然不能遵循其他的策略和其他的组织原则，难道这还不明白吗？然而对于一个只承认党纲而不参加党的任何组织的“党员”，你有什么可说呢？怎能担保这个“党员”所持的策略和组织观点就是党的策略和组织观点，而不是别的策略和组织观点呢！这就是马尔托夫的条文无法向我们说明的问题！接受了马尔托夫的条文，我们就不免会有一个奇怪的“党”，

它的“党员”有同一的纲领(这还成问题!),而策略观点和组织观点却各不相同!真是妙不可言的多样性!我们的党又怎能不象一个宴会呢?

不过要问一问:究竟应当把党的第二次代表大会所嘱咐我们的、与马尔托夫条文根本矛盾的那个思想上和实践上的集中制置于何地呢?毫无疑问,如果一定要在两者之间选择一个,那末丢掉马尔托夫的条文是会正确一些。

这就是马尔托夫向我们提出的、和列宁同志的条文相反的多么荒谬的条文!

我们认为党的第二次代表大会通过马尔托夫的条文是考虑不周的结果;我们希望党的第三次代表大会一定能改正第二次代表大会的错误并采纳列宁同志的条文。

现在把以上所说的再略述一遍。无产者大军已经走上了斗争舞台。如果说任何一支大军都要有自己的先头部队,那末无产者大军也应有这样一个部队。因此,就出现了无产阶级领导者集团,即俄国社会民主工党。这个党既然是一定的大军的先头部队,第一、它就应当用自己的纲领、策略和组织原则武装起来;第二、它就应当是一个团结一致的组织。如果要问究竟应当把什么人称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党员,那末这个党只能给一个回答:只有承认党纲、在物质上帮助党并在党的一个组织中工作的人,才能称为本党党员。

列宁同志在他那个杰出的条文中所表达的正是这个十分明显的真理。

载于1905年1月1日《无产阶级斗争报》第8期

本文没有署名

从格鲁吉亚文译成俄文

选自《斯大林全集》第1卷
第55—64页

斯大林

略论党内意见分歧⁽¹⁾

“社会民主党是工人运动和社会主义的结合。”

——考茨基

我们的“孟什维克”真是太讨厌了！我说的是梯弗里斯的“孟什维克”。他们一听说党内有分歧意见，就喋喋不休地说：不管你高兴不高兴，我们随时随地都要谈论意见分歧，不管你高兴不高兴，我们反正总是要骂“布尔什维克”！于是他们就拚命地骂，好象发了疯一样。在一切十字路口，在自己人或外人中间，总而言之，不管在什么地方，他们都是叫嚷着老一套：要提防“多数派”，这不是自己人，这是靠不住的人！单在“通常的”活动场所叫骂，他们还嫌不够，还把“案件”搬到合法刊物上去，从而再次向世人表明自己的……讨厌。

“多数派”究竟有什么过错呢？我们的“少数派”为什么要这样“生气”呢？

让我们来看看历史事实吧。

“多数派”和“少数派”是在党的第二次代表大会

(1903年)上开始产生的。在这次代表大会上,我们分散的力量本来应该团结成一个统一的强大的党。我们这些党的工作者对这次代表大会曾抱着很大的希望。我们当时欢呼:我们终于等到了这一天,我们就要团结成一个统一的党了,我们就有可能按照统一的计划活动了!……固然,在此以前我们也活动过,但我们过去的活动是分散的无组织的。固然,在此以前我们也曾企图统一起来,正是为了这个目的,我们召开了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1898年),甚至似乎是“统一起来了”,可是这种统一只在口头上存在:党仍然分散为一些单个的集团,力量仍然是分散而需要统一的。所以党的第二次代表大会必须把分散的力量集合起来,并把它们团结成一个整体。我们必须建立一个统一的党。

但事实证明,我们当时的希望在某种程度上是过早了。这次代表大会并没有能够使我们团结成一个统一而不可分的党,它只是为这样一个党奠定了基础。然而代表大会却向我们清楚地表明:党内存在着两条路线,一条是《火星报》(指旧《火星报》)^[2]的路线,一条是《火星报》反对者的路线。因此代表大会就分成两部分,即“多数派”和“少数派”。前者拥护《火星报》路线,并团结在《火星报》周围;后者则反对《火星报》而采取相反的立场。

这样,《火星报》就成了党内“多数派”的旗帜,而《火星报》的立场就成了“多数派”的立场。

《火星报》走的是什么道路呢?它所维护的是什么

呢？

要了解这一点，就必须知道它是在什么条件下登上历史舞台的。

《火星报》创刊于1900年12月。这是俄国工业开始发生危机的时候。伴随有一系列同业罢工（1896年至1898年间）的工业繁荣，渐渐为危机代替了。危机一天天尖锐起来，而且成了同业罢工的障碍。虽然如此，工人运动还是为自己开辟道路，并向前发展：许多细流汇成一条洪流，运动日益带有阶级色彩，渐渐走上了政治斗争的道路。工人运动以惊人的速度发展起来了……不过当时还看不见先进部队，还看不见能把社会主义意识灌输到工人运动中去、把工人运动和社会主义结合起来因而赋予无产阶级斗争以社会民主主义性质的社会民主党^①。

当时的“社会民主党人”（他们被称为“经济派”）究竟干了些什么呢？他们竭力赞扬自发运动，漫不经心地重复说：工人运动并不怎样需要社会主义意识，没有这种意识它也能很好地达到自己的目的，问题的实质在于运动本身。运动就是一切，而意识却是微不足道的。**没有社会主义的工人运动**，——这就是他们努力追求的目标。

既然如此，那末俄国社会民主党的使命究竟是什么呢？他们断定说：它应该是自发运动的驯服的工具。把社会主义意识灌输到工人运动中去并不是我们的事情，

^① 社会民主党是无产阶级的先进部队，其中包括一切社会民主主义的战士，不论他是工人或是知识分子。

领导这个运动也不是我们的事情，——这只是徒劳无益的强制；我们的义务只是倾听这个运动的声音并准确地记录社会生活中所发生的事情，——我们应该做自发运动的尾巴^①。一句话，**社会民主党被描绘成运动中的累赘。**

谁不承认社会民主主义，谁也就不应该承认社会民主党。正因为如此，“经济派”才这样固执己见，再三断言无产阶级政党在俄国是不可能存在的。他们说：让自由派去从事政治斗争吧，这种事情是比较合乎自由派的身分的。我们社会民主党人应该干些什么呢？我们应该依旧以单个的小组形式存在，各小组在自己的圈子里单独活动。

需要的不是党而是小组！——他们说。

① 我们的《社会民主党人报》(3)燃起了“批评”的热情(见创刊号《多数派还是少数派?》一文)，不过我应该指出，它对“经济派”和“工人事业派”(他们彼此的区别不大)估计得不正确。问题并不在于他们“蔑视政治问题”，而在于他们做运动的尾巴和只是重复运动所提示给他们的东西。过去有一个时期仅仅举行罢工。那时他们宣传的是经济斗争。到了游行示威的时期(1901年)，发生了流血事件，产生了失望情绪，于是工人就采用恐怖手段，以为这能拯救他们，使他们不受暴君的统治。这时“经济派—工人事业派”也加入总的合唱队并且神气十足地宣称：现在应该采取恐怖手段，袭击监狱，释放狱中同志等等了(见《工人事业》杂志(4)《历史性的转变》一文)。可见这决不能说他们是“蔑视政治问题”的。该文作者是借用马尔丁诺夫的话来进行“批评”的，但如果他去了解一下历史事实，那就比较有益了。

这样，一方面，工人运动发展起来了，它需要一个先进的领导的队伍；另一方面，以“经济派”为代表的“社会民主党”，不但不去领导运动，反而否认自己的作用，做了运动的尾巴。

当时必须大声疾呼地说明一个思想：没有社会主义的自发工人运动就是在黑暗中摸索，即使有一天能摸索到目的地，但谁知道要到什么时候并且要受多少痛苦，所以社会主义意识对于工人运动是有极大意义的。

同时还必须说明，这种意识的体现者社会民主党应该把社会主义意识灌输到工人运动中去，应该始终走在运动的前头，而不要冷眼旁观，做自发工人运动的尾巴。

同时还必须说明一个思想：俄国社会民主党的直接责任是把无产阶级各个先进队伍集合起来，把它们团结成一个统一的党，从而永远结束党内的分散状态。

《火星报》着手规定的正是这些任务。

请看它在一篇纲领性的论文（见《火星报》创刊号）中是怎样说的：“社会民主党是工人运动和社会主义的结合。”^{〔5〕}这就是说，没有社会主义的工人运动或站在工人运动外面的社会主义，都是社会民主党应该反对的一种不良现象。可是，因为“经济派—工人事业派”崇拜自发运动，因为他们轻视社会主义的意义，所以《火星报》指出：“工人运动脱离了社会民主党，就会变得烦琐，并且必然会堕入资产阶级的泥潭。”因此，社会民主党的责任是“给这个运动指出最终目的，指出政治任务，保护它在政

治上思想上的独立性。”

俄国社会民主党负有什么责任呢？《火星报》继续写道：“由此自然产生出俄国社会民主党所应该实现的任务：把社会主义思想和政治自觉灌输到无产阶级群众中去，组织一个和自发工人运动有紧密联系的革命政党。”这就是说，它应该始终走在运动的前头，它的首要任务就是把工人运动中的社会民主主义的力量团结成一个统一的党。

《火星报》编辑部^①就是这样论证它的纲领的。

《火星报》是否实现了这个出色的纲领呢？

大家都知道它是怎样努力实现这些极重要的思想的。党的第二次代表大会向我们清楚地证明了这一点，因为代表大会以三十五票的多数承认《火星报》为全党的中央机关报。

既然如此，那末某些可怜的马克思主义者还要“谩骂”旧《火星报》，难道不是很可笑的吗？

请看孟什维克的《社会民主党人报》对《火星报》所发的议论吧：

“它《火星报》应当分析‘经济主义’的思想，摒弃谬误的观点，采取正确的观点，并把‘经济主义’纳入新的轨道……可是事实上却不是这样。反对‘经济主义’的斗争引起了另一个极端，即轻视经济斗争，对它采取鄙弃的

^① 当时《火星报》编辑部由普列汉诺夫、阿克雪里罗得、查苏利奇、马尔托夫、斯塔罗维尔(6)和列宁六人组成。

态度，只承认政治斗争有首要的意义。不经济的〈应该说：“没有经济的”〉政治，——这就是新的方向。”（见《社会民主党人报》创刊号《多数派还是少数派？》一文）

但是，可敬的“批评家”，这一切究竟是在什么地方、在什么时候、在哪个国家发生的呢？普列汉诺夫、阿克雪里罗得、查苏利奇、马尔托夫和斯塔罗维尔做了些什么？他们既然在编辑部中占多数，为什么不把《火星报》引上“正”路呢？最可敬的“批评家”，在这以前你自己究竟干什么去了？你为什么没有警告党的第二次代表大会？要是警告了的话，那它就不会承认《火星报》为中央机关报了。

但是，我们且把“批评家”撇开吧。

事情是这样的：《火星报》正确地看出了“迫切的问题”，正是走上了我在上面说过的那条道路，并且努力地执行了自己的纲领。

列宁在他卓越的著作《怎么办？》一书中更明确、更令人信服地表明了《火星报》的立场。

我们就来谈谈这本书吧。

“经济派”崇拜自发的工人运动，但谁不知道自发运动就是没有社会主义的工人运动，“就是工联主义的……运动”^①，而工联主义是不愿看见资本主义范围以外的任何东西的。谁不知道没有社会主义的工人运动就

① 见本书第52页。

是在资本主义圈子里踏步不前，在私有制周围徘徊，即使有一天能达到社会革命，但谁知道要在什么时候并且要受多少痛苦才能达到。工人们是在最近时期还是经过一个长时期、是经过容易的道路还是经过困难的道路才能踏上“乐土”，这些问题对于他们难道都是无所谓的吗？显然，谁赞扬自发运动并崇拜自发运动，谁就不由自主地在社会主义和工人运动之间挖掘鸿沟，谁就轻视社会主义思想体系的意义，谁就把这个思想体系逐出实际生活之外，并且不由自主地使工人受资产阶级思想体系的支配，因为他不了解“社会民主党是工人运动和社会主义的结合”^①，不了解“对工人运动自发性的任何崇拜，对‘自觉因素’的作用即社会民主党的作用的任何轻视，完全不管轻视者自己愿意与否，都是加强资产阶级思想体系对工人的影响”^②。

我们来比较详细地说明一下。在我们这个时代只能存在着两种思想体系：资产阶级思想体系和社会主义思想体系。它们之间的区别，也在于前者（即资产阶级思想体系）较后者要老得多，传播的范围要广得多，在生活中扎下的根要深得多，无论在自己人中间或外人中间，到处都可以碰到资产阶级的观点，而社会主义的思想体系则刚刚开始走了几步，刚刚给自己开辟道路。不用说，如果就思想的传播来讲，那末资产阶级的思想体系即工联主

① 考茨基，《爱尔福特纲领》第94页，中央委员会出版。

② 见本书第49页。

义的意识，比刚刚走了几步的社会主义思想体系，传播起来要容易得多，对于**自发**工人运动的影响也要广泛得多。这一点之所以正确，尤其是因为**自发运动**——没有社会主义的工人运动——本来“就恰恰导致运动受资产阶级思想体系的支配”^①。而受资产阶级思想体系支配就是排斥社会主义思想体系，因为这两种思想体系是互相否定的。

有人会问我们：怎么？难道工人阶级不是倾向于社会主义的吗？是的，它是倾向于社会主义的。不然的话，**社会民主党的活动就会是毫无结果的了**。然而同样正确的是：反对和阻碍这个倾向的，有另一个倾向，就是受资产阶级思想体系支配的倾向。

我刚才说过，我国社会生活中浸透了资产阶级思想，所以资产阶级思想体系比社会主义思想体系传播起来要容易得多。不要忘记，资产阶级的思想家这时也并没有打瞌睡，他们照自己的办法装扮成社会主义者，竭力想使工人阶级受资产阶级思想体系的支配。如果社会民主党人也象“经济派”一样地毫不在意，做自发运动的尾巴（社会民主党采取这种态度时，工人运动就是自发的），那末不言而喻，自发的工人运动就将沿着这条老路走去并受资产阶级思想体系的支配，当然要到长期的摸索和痛苦迫使它和资产阶级思想体系断绝联系而奔赴社会革命的

① 见本书第 52 页。

时候为止。

这就叫做受资产阶级思想体系支配的倾向。

请看列宁是怎样说的：

“工人阶级自发地倾向社会主义，然而最流行的（而且时刻以各种各样的形式复活起来）资产阶级思想体系，却自发地而又最猖狂地迫使工人接受它。”^①正因为如此，所以自发的工人运动，当它还带着自发性的时候，当它还没有和社会主义意识结合起来的时候，就要受资产阶级思想体系的支配并且有受这种思想体系支配的倾向^②。如果不是这样，那末社会民主主义的批评、社会民主主义的宣传就是多余的了，那末“工人运动和社会主义的结合”也是多余的了。

社会民主党一定要反对这种受资产阶级思想体系支配的倾向，而促进另一种倾向即社会主义的倾向。当然，将来总有一天，经过长期的摸索和痛苦之后，自发运动没有社会民主党的帮助也会达到自己的目的，也会走到社会革命的门前，因为“工人阶级自发地倾向社会主义”^③。但在那时以前怎么办呢？在那时以前我们应该做些什么呢？象“经济派”那样袖手旁观并且让位给司徒卢威和祖巴托夫一伙人吗？摈弃社会民主主义而促成资产阶级的工联主义思想体系的统治吗？忘掉马克思主义而不把

① 见本书第 54 页。

② 见本书第 52 页。

③ 见本书第 54 页。

“社会主义和工人运动结合起来”吗？

不！社会民主党是无产阶级的先进部队^①，它的责任是始终走在无产阶级前头，它的责任是“使工人运动脱离这种投到资产阶级羽翼下去的工联主义的自发趋势，而把它吸引到革命的社会民主党的羽翼下来”^②。社会民主党的责任是把社会主义意识灌输到自发的工人运动中去，把工人运动和社会主义结合起来，因而赋予无产阶级斗争以社会民主主义的性质。

有些人说，某些国家的工人阶级自己已经创立了社会主义思想体系（科学的社会主义），并且其他国家的工人阶级自己也会创立这种思想体系的；因此，他们说，把社会主义意识从外面灌输到工人运动中去完全是多余的。但这是极大的错误。要创立科学的社会主义，就必须领导科学，就必须用科学知识武装起来，并善于深刻地研究历史发展的法则。而工人阶级，当它还是工人阶级时，是不能领导科学、推进科学并科学地研究历史法则的，因为它既没有时间，也没有经费来做这件事情。考茨基说：科学的社会主义“只有在深刻的科学知识的基础上才能产生出来。……但掌握科学的人并不是无产阶级，而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着重号是卡·考茨基加的），因为现代社会主义就是在这一阶层的个别人物的头脑中产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64页。

② 见本书第52页。

生的，他们把这个学说传授给才智出众的无产者……”^①

因此，列宁说：凡是崇拜自发的工人运动和对它袖手旁观的人，凡是经常轻视社会民主党的意义而让位于司徒卢威—祖巴托夫一伙的人，都以为这个运动本身就能创立科学社会主义。“但这是极大的错误”^②。有些人以为在九十年代举行罢工的彼得堡工人已经有了社会民主主义的意识，但这也是错误的。他们并没有这种意识，而且“本来也不可能有…… 这种意识〈社会民主主义的意识〉只能从外面灌输进去。各国的历史都证明：工人阶级单靠自己本身的力量，只能形成工联主义的意识，即确信必须结成工会，必须同厂主斗争，必须向政府争取颁布对工人是必要的某些法律，如此等等。而社会主义学说则是由有产阶级的有教养的人即知识分子创造的哲学的、历史的和经济的理论中发展起来的。现代科学社会主义的创始人马克思和恩格斯本人，按他们的社会地位来说，也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③。列宁继续写道：这当然不是说，“工人不参加创立思想体系的工作。但他们不是以工人的身分来参加，而是以社会主义理论家的身分、以蒲鲁东和魏特林〈他们两个都是工人〉一类人的身分来参加的，换句话说，只有当他们能在某种程度上掌握他们那个时代的知识并把它向前推进的时候，他们才

① 见本书第 50—51 页。

② 见本书第 49 页。

③ 见本书第 40—41 页。

能在相应的程度上参加这一工作”^①。

这一切可以大致设想如下。存在着资本主义制度。有工人，也有厂主。他们之间进行着斗争。科学社会主义暂时还没有在任何地方出现。当工人已在进行斗争时，科学社会主义在任何地方却还无影无踪…… 对的，工人在斗争着。然而他们是各自反对自己的厂主，和自己的地方当局发生冲突：那里在罢工，这里在举行群众大会和游行示威；那里在向当局要求权利，这里在宣布抵制；有些人在谈论政治斗争，另一些人则在谈论经济斗争，如此等等。但这并不是说工人已经具有社会民主主义的意识；也不是说：他们的运动的目的是要摧毁资本主义制度，他们确信推翻资本主义和建立社会主义制度就象确信旭日必然东升一样，他们认为争取自己的政治统治（无产阶级专政）是达到社会主义胜利的必要工具等等。

与此同时，科学在发展着。工人运动逐渐引起科学的注意。大部分学者有了一种想法，认为工人运动是些不安分守己的人的骚动，不妨用皮鞭去开导他们。另外一些学者则以为富人应该分给穷人一点残羹剩饭，即认为工人运动是乞丐运动，目的是要讨得一些施舍。在一千个这样的学者中间，也许只有一个能够科学地观察工人运动，科学地研究全部社会生活，注意阶级间的冲突，倾听工人阶级的怨声，并且终于科学地证明：资本主义制

^① 见本书第 51 页。

度决不是什么永恒的东西，它也和封建制度一样是暂时的，随之而来的必然是把它否定了的社会主义制度，而社会主义制度只能由无产阶级经过社会革命来建立。一句话，科学社会主义正在被创立着。

当然，假如没有资本主义和阶级斗争，也就不会有科学社会主义。但同样正确的是：少数的几个人，比方说，马克思和恩格斯，假如他们没有掌握科学的知识，也就不能创立科学社会主义。

什么是**没有工人运动**的科学社会主义呢？——这好象是放在船上不用的罗盘，只会生锈，结果只好把它扔到海里去。

什么是**没有社会主义的工人运动**呢？——这好象是一只没有罗盘的大船，虽然也能驶到彼岸，但是有了罗盘，到达彼岸就会快得多，危险也会少一些。

把这两件东西结合起来就会有一只很好的大船，它会一直驶向彼岸，安然靠近码头。

把工人运动和社会主义结合起来就会有社会民主主义运动，它会一直向前猛进，到达“乐土”。

所以，社会民主党（而不只是社会民主党的知识分子）的责任就是把社会主义和工人运动结合起来，把社会主义意识灌输到工人运动中去，因而赋予自发的工人运动以社会民主主义的性质。

列宁就是这样说的。

某些人断定说，似乎在列宁和“多数派”看来，工人运

动如果不和社会主义思想体系联结起来，就会趋于灭亡，不能达到社会革命。然而这是一种臆说，是一些闲人的臆说，这种臆说恐怕只能从安恩之流的可怜的马克思主义者头脑中产生出来（见《旅行家》杂志⁽⁷⁾第六期《什么是党？》一文）。

列宁确定地说：“工人阶级自发地倾向社会主义。”^①列宁之所以没有详细说明这一点，只是因为他认为用不着去证明本来已经证明了的东西。此外，列宁并没有打算研究自发运动，他只是想向实际工作者说明他们应该自觉地做些什么。

列宁在和马尔托夫论战的另一个地方又说过如下一段话：

“‘我们党是不自觉过程的自觉表现者。’正是如此。并且正因为如此，所以力求使‘每一个罢工者’都能自称为党员的这一倾向是不正确的，因为假使‘每次罢工’都不只是强大的阶级本能和必然引向社会革命的阶级斗争的自发表现，而是这个过程的自觉表现……那么我们的党……就会一下子把整个资产阶级社会消灭掉。”^②

可见在列宁看来，即使不能称为社会民主主义的那种阶级斗争和阶级搏斗，也必然会把工人阶级引向社会革命的。

如果你们对另外一些“多数派”代表的意见也感兴

① 见本书第54页。

② 见本书第104页。

趣，那末就请你们听听吧。他们中间的哥林同志在党的第二次代表大会上说道：

“如果让无产阶级自行其是，那末事情会怎样呢？这就会和资产阶级革命前夜所发生的事情相似。资产阶级革命家未曾有过任何科学的思想体系。然而资产阶级制度还是产生了。没有自己的思想家的无产阶级，当然，归根到底也会朝着社会革命方面工作的，不过是本能地工作……无产阶级也会本能地实行社会主义，但它不会有社会主义理论。这一过程不过是缓慢而较为痛苦罢了。”①

这段话是无须解释的。

总之，**自发的工人运动，即没有社会主义的工人运动**，必然会变得烦琐而带有工联主义的性质，它一定会受资产阶级思想体系的支配。能否由此得出结论说，社会主义就是一切，工人运动却是微不足道的呢？当然不能！只有唯心主义者才这样说。经过很长时期以后，总有一天经济的发展必然把工人阶级引向社会革命，因而将迫使它和资产阶级思想体系断绝任何联系。问题只在于这~~将~~是一条很漫长很痛苦的道路。

另一方面，**没有工人运动的社会主义**，不管它是在什么样的科学基础上产生的，终究还是一句空话，毫无意义。能否由此得出结论说，运动就是一切，社会主义却是

① 见《党的第二次代表大会记录》第129页。

微不足道的呢？当然不能！只有那些可怜的马克思主义者才会发出这样的议论，他们认为意识既然是社会生活本身产生的，因而也就没有任何意义。社会主义可以和工人运动结合起来，从而由空洞的词句变成锐利的武器。

结论呢？

结论就是：工人运动必须和社会主义相结合，实践活动和理论思想必须融合为一，从而赋予自发的工人运动以社会民主主义的性质，因为“社会民主党是工人运动和社会社会主义的结合”^①。于是，和工人运动结合起来的社会主义就会由空洞的词句变成工人手中极大的力量。于是，变成社会民主主义运动的自发运动就会循着正确的道路迅速地走向社会主义制度。

那末，俄国社会民主党的使命何在呢？我们应该做些什么呢？

我们的责任，社会民主党的责任，就是使自发的工人运动离开工联主义的道路而走上社会民主主义的道路。我们的责任就是把社会主义意识^②灌输到这个运动中去，并把工人阶级的先进力量团结成一个集中的党。我们的任务就是始终走在运动的前头，毫不倦怠地和一切阻碍这些任务实现的人作斗争，不管他们是敌人也罢，“朋友”也罢。

大体说来，“多数派”的立场就是如此。

① 见《爱尔福特纲领》第94页，中央委员会出版。

② 即马克思和恩格斯创立的意识。

我们的“少数派”不喜欢“多数派”的立场，他们说，这个立场是“非马克思主义的”，是和马克思主义“根本矛盾的”！最尊敬的先生们，真是这样的吗？究竟在什么地方、在什么时候、在什么行星上有这种事情呢？他们说：读一读我们的论文，你们就会相信我们是对的。好，我们就来读一读吧。

我们面前有一篇叫做《什么是党？》的文章（见《旅行家》杂志第6期）。“批评家”安恩是怎样责备党内“多数派”的呢？“他们〈“多数派”〉……自称为党的首脑……硬要别人服从他们……为了替自己的行为辩护，甚至常常臆造出一些新理论，譬如说，工人群众靠自己的力量不能领会〈着重号是我加的〉‘崇高理想’等等。”①

试问：“多数派”现在或过去什么时候是否提出过类似的“理论”呢？在任何地方、任何时候都没有提出过！恰恰相反，“多数派”的思想代表列宁同志十分确定地说，工人阶级很容易领会“崇高理想”，很容易领会社会主义。请听吧：

“人们常常说：工人阶级自发地倾向社会主义。在上述意义上说，这是完全正确的，就是社会主义理论比其他一切理论都更深刻更正确地断定了工人阶级受苦的原因，因此工人也就很容易领会这个理论。”②

可见在“多数派”看来，工人是很容易领会那些叫做

① 见《旅行家》杂志第6期第71页。

② 见本书第54页。

社会主义的“崇高理想”的。

那末安恩为什么要异想天开，他这个奇怪的“发现”是从什么地方挖掘出来的呢？读者们，原来“批评家”安恩所指的完全是另外一回事。他指的是《怎么办？》一书中的一段话，列宁在那里讲到了**创立社会主义并断言工人阶级靠自己的力量不能创立出科学社会主义**^①。但你们会说：怎么会是这样的呢？**创立社会主义是一回事，领会社会主义则是另外一回事**。为什么安恩忘记了列宁明白地说到**领会“崇高理想”**的那些话呢？读者们，你们是对的，但安恩既然很想做一个“批评家”，他应该怎么办呢？你们想一想，这是多么英勇的事情：编造出自己的一套“理论”，把它硬套在对方的头上，然后就对准自己幻想出来的果实开火。这就是所谓批评！不管怎样，安恩“靠自己的力量不能领会”列宁的《怎么办？》一书，这倒是毫无疑问的。

现在我们就打开所谓《社会民主党人报》来看看吧。《多数派还是少数派？》（见《社会民主党人报》创刊号）一文的作者说了些什么呢？

他勇气十足、大喊大叫地攻击列宁，因为在列宁看来，“工人运动的自然的〈应当是“自发的”〉发展不是走向社会主义，而是走向资产阶级思想体系”^②。可见作者并不懂得**自发的工人运动就是没有社会主义的工人运动**

① 见本书第 40 页。

② 见《社会民主党人报》创刊号第 14 页。

(让作者去证明不是这样吧!),而**这样的**运动一定会受资产阶级的工联主义的思想体系的支配,一定会倾向于它,因为我们这个时代只能存在着两种思想体系,即社会主义思想体系和资产阶级思想体系,凡是前者不存在的地方,后者就一定出现并占据其地位(你证明这是相反的吧!)。是的,列宁正是这样说的。但同时他并没有忘记工人运动所特有的另一种倾向,即社会主义的倾向,这种倾向不过是暂时被那种接受资产阶级思想体系的倾向所遮蔽罢了。列宁直截了当地说“工人阶级自发地倾向社会主义”^①,并且正确地指出社会民主党的任务是除其他办法外,也采取和“经济派”作斗争的办法来加速**这种**倾向的胜利。可敬的“批评家”,为什么你的文章里不引用列宁的这些话呢?难道这些话不也就是这位列宁说的吗?这样做是于你不利的,对不对?

作者又说:“依照列宁的意见……工人按其**地位**〈着重号是我加的〉来说,与其说是社会主义者,不如说是资产者……”^②真是蠢话,我简直没有料到这样的作者会说这样的蠢话!难道列宁指的是工人的**地位**吗?难道他断言工人按其**地位**来说是资产者吗?该要多么蠢的人才会说被剥夺了生产工具、靠出卖劳动力过活的工人按其**地位**来说是资产者呢?不!列宁所说的完全是另外一回事。问题在于一个人按其**地位**来说可能是无产者而不是

① 见本书第54页。

② 见《社会民主党人报》创刊号第14页。

资产者，但他同时也可能没有意识到自己的地位，因而受资产阶级思想体系的支配。在这种场合，工人阶级的情形也正是如此。而这却完全是另外一回事。

一般地说，作者爱说空话，不加思考就脱口而出！例如作者一味固执地说“列宁主义是和马克思主义根本矛盾的”^①，他这样反复地说，却不了解这种“思想”会把他引到哪里去。假定我们暂时相信他，以为列宁主义确实“是和马克思主义根本矛盾的”，往下又怎样呢？由此会得出什么结论呢？结论如下：“列宁主义把《火星报》（旧《火星报》）拉过去了”（这是作者也不否认的），可见《火星报》也“是和马克思主义根本矛盾的”。党的第二次代表大会以三十五票的多数承认《火星报》为党的中央机关报，并且对它的功绩大加称赞^②，可见这次代表大会及其纲领和策略也“是和马克思主义根本矛盾的”……读者们，这岂不可笑吗？

作者仍继续说：“照列宁的意见，自发的工人运动是去和资产阶级结合的……”是的，是的，作者无疑是去和愚蠢结合了，如果他能离开这条道路，那就好了。

但是，我们且把“批评家”撇开，来请教马克思主义吧。

可敬的“批评家”一味固执地说，“多数派”及其代

① 见《社会民主党人报》创刊号第15页。

② 见《党的第二次代表大会记录》第147页。记录里载有一项决议，把《火星报》称为社会民主主义原则的真正维护者。

表——列宁的立场是和马克思主义根本矛盾的，因为无论是考茨基，或马克思和恩格斯所说的，都和列宁所坚持的相反！真是这样吗？我们来看看吧！

作者告诉我们说：“考茨基在他的《爱尔福特纲领》中写道：‘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利益互相对立到这样的程度，以致这两个阶级的意向在相当长久的时期内不能结合起来。在每个具有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国家中，工人阶级之参加政治活动迟早会使工人阶级脱离资产阶级政党而成立独立的工人党。’”

但是，由此得出的结论是什么呢？结论只能是：资产阶级的利益和无产阶级的利益是互相矛盾的，无产阶级“迟早”要脱离资产阶级而成立独立的工人党（请记住：是工人党而不是社会民主工党）。作者以为考茨基在这里是和列宁的意见分歧的！其实列宁是说无产阶级迟早不仅要和资产阶级脱离，而且要实行社会革命，即推翻资产阶级^①。他又补充说：社会民主党的任务就是竭力使社会革命尽可能迅速地实现，并且自觉地实现。是的，正是自觉地而不是自发地实现，因为列宁所说的正是这种自觉性。

这位“批评家”继续从考茨基的书中引证说：“……在情况已经发展到建立独立的工人党的地方，工人党如果不是一开始就受到社会主义倾向的感染，迟早必定能领

① 见本书第104页。

会社会主义倾向，那末归根到底它一定会成为社会主义的工人党，即社会民主党。”^①

这是什么意思呢？这只是说工人党将领会社会主义的倾向。难道列宁否认这一点吗？根本没有这回事！列宁直截了当地说：不仅工人党，而且整个工人阶级也在领会社会主义^②。既然如此，这个《社会民主党人报》和它那位大撒其谎的英雄为什么要胡说八道呢？他们为什么要乱说一通呢？俗语说：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我们这位迷糊了的作者正是这样。

可见考茨基在这里是和列宁没有丝毫分歧的。但这一切却异常清楚地证明了作者的思考不周。

考茨基是否说过什么有利于“多数派”立场的话呢？请看，这就是他在一篇分析奥地利社会民主党纲领草案的出色论文中说过的一段话：

“在我们那些修正主义批评派〈伯恩施坦的信徒〉中，有许多人以为马克思似乎曾经断言经济发展和阶级斗争不仅造成社会主义生产的条件，而且还直接产生认识到社会主义生产是必要的那种意识〈着重号是卡·考茨基加的〉。于是这些批评派就反驳道，资本主义最发达的英国，对于这种意识却是最陌生的。根据草案〈奥地利草案〉可以想见：……这一……观点，奥地利纲领的起草委员会也是赞成的。草案上写道：‘资本主义的发展越是使

① 见《社会民主党人报》创刊号第15页。

② 见本书第54页。

无产阶级的人数增加，无产阶级也就越是不得不进行反对资本主义的斗争，并且也越有可能来进行这个斗争。无产阶级**就会意识到**社会主义的可能性和必要性。这样一来，社会主义意识就成了无产阶级阶级斗争的必然的直接的**结果**。但这种观点是**完全不正确的**。……现代社会主义意识，**只有在深刻的科学知识的基础上**才能产生出来。……但掌握科学的人并不是无产阶级，而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着重号是卡·考茨基加的），因为现代的社会主义就是在这一阶层的个别人物的头脑中产生的，他们把这个学说（科学社会主义）传授给才智出众的无产者，后者又……把它灌输到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中去。可见，社会主义意识是一种**从外面灌输到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中去的**东西，而不是一种**从这个斗争中自发地产生出来的**东西。因此，旧海因菲尔德纲领^{〔8〕}说得非常正确：社会民主党的任务就是把认清无产阶级的地位及其任务的这种**意识灌输到无产阶级中去**……”^①

读者们，你们能否回忆起列宁对这一问题的类似的思想？你们能否回忆起“多数派”的那个众所周知的立场？为什么“梯弗里斯委员会”及其《社会民主党人报》要隐瞒真情呢？为什么可敬的“批评家”讲到考茨基的时候在自己论文中却不引证考茨基的这几句话呢？那些最可敬的人是在欺骗谁呢？为什么他们这样“轻视”读者呢？

① 见本书第50—51页。

莫非因为他们……害怕真理，躲避真理，以为真理也是可以隐瞒的吗？他们正象一种鸟，把自己的头藏在翅膀下面，就以为谁都看不见它了！他们正象这种鸟一样糊涂。

既然社会主义意识是在科学基础上创立的，既然这种意识要由社会民主党^①努力从外面灌输到工人运动中去，那末很明显，这一切都是因为当工人阶级还是工人阶级的时候，就不能领导科学，不能靠本身的力量创立科学社会主义；它既没有时间，也没有经费来做这件事情。

考茨基在他的《爱尔福特纲领》中说过如下一段话：

“……无产者至多只能领会资产阶级学者们所创造的一部分知识，并使之适合于自己的目的和需要，然而当他们还是无产者的时候，他们是没有空闲时间和经费来独立地把科学发挥到资产阶级思想家所达到的范围之外的。所以独创的工人社会主义不免带有空想主义的一切重要特征。”^②（空想主义就是虚假的非科学的理论。）

考茨基继续说：这种空想社会主义往往带有无政府主义的性质，可是“……大家知道，凡是无政府主义运动（即指无产阶级空想主义而言。——卡·考茨基注）真正深入群众而成为阶级运动的地方，尽管这种运动在表面上还带有激进的色彩，但迟早总要变为最狭隘的**纯粹的**

^① 并且不仅是社会民主党的知识分子。

^② 见《爱尔福特纲领》第 93 页，中央委员会出版。

职工运动”。^①

换句话说，工人运动若不和科学社会主义相结合，就不免会变得烦琐而具有“狭隘职工运动的”性质，因而受工联主义思想体系的支配。

“这是蔑视工人，这是抬高知识分子呀！”我们的“批评家”及其《社会民主党人报》大喊大叫起来……不幸的“批评家”，可怜的《社会民主党人报》！他们把无产阶级看成一位任性的小姐，对她不能说实话，永远只能恭维她，使她不至于跑掉！不，最可敬的人们！我们相信，无产阶级会表现出超过你们所想象的坚强性来。我们相信它不会害怕实话！而你们……究竟对你们有什么可说：你们现在还是害怕实话，而且在自己的文章中没有把考茨基的真实观点告诉读者……

总之，**没有工人运动的科学社会主义**，永远是些随便说说的空话。

另一方面，**没有社会主义的工人运动**，就是一种工联主义的瞎闯，固然它有一天也会引导到社会革命，可是要付出长期的磨难和痛苦的代价。

结论呢？

“工人运动应和社会主义相结合”：“社会民主党是工人运动和社会主义的结合。”^②

马克思主义理论家考茨基就是这样说的。

① 见《爱尔福特纲领》第94页，中央委员会出版。

② 见《爱尔福特纲领》第94页。

我们已经看到《火星报》(旧《火星报》)和“多数派”也是这样说的。

我们已经看到列宁同志也是站在这个立场上的。

可见“多数派”是坚定地站在马克思主义立场上的。

很明显,少数派“批评家”喋喋不休地说出的所谓“蔑视工人”、“抬高知识分子”、“多数派的非马克思主义立场”以及诸如此类的奇谈,不过是梯弗里斯“孟什维克”的胡说和空想罢了。

相反地,我们可以看出,事实上“和马克思主义根本矛盾的”是梯弗里斯“少数派”自己,是“梯弗里斯委员会”及其《社会民主党人报》。但这一点容我们以后再说。我们暂时把注意力放在下面一点上吧。

为了证明自己的言论正确,《多数派还是少数派?》的作者引用马克思(?)的一段话说:“某一阶级的理论家在理论上得出的结论,乃是该阶级本身在实践中已经走到了结论。”^①

二者必居其一。不是作者不懂格鲁吉亚文,就是排字工人弄错了。任何一个识字的人都不会说“已经走到了结论”。正确的说法应该是:“已经得出了的结论”或者“正要得出的结论”。如果作者是指后一种说法(正要得出的结论),那就应当指出:他把马克思的话转述错了,马克思从来没有说过这类的话。如果作者是指前一

^① 见《社会民主党人报》创刊号第15页。

种说法，那末他引证的句子就应当是这样的：“某一阶级的理论家在理论上得出的结论，乃是该阶级本身**在实践中已经得出了的结论。**”换句话说，如果马克思和恩格斯在理论上得出了推翻资本主义和建立社会主义是不可避免的这一结论，那末，这就是说，无产阶级**在实践中已经推翻了资本主义，已经打倒了资本主义制度并且在它的废墟上建立了社会主义生活！**

不幸的马克思！谁知道我们那些可怜的马克思主义者还会把多少荒谬的言论加在他的头上呵！

马克思真是这样说的吗？事实上他说的是：小资产阶级的理论上的代表“**在理论上得出的任务和作出的决定，也就是小资产者的物质利益和社会地位在实际生活上引导他们得出的任务和作出的决定。**一般说来，一个阶级的政治代表和著作方面的代表人物同他们所代表的阶级间的关系，都是这样。”^①

由此可见，马克思根本没有说“已经走到了”。这些“哲学”词句是可敬的“批评家”捏造出来的。

在这种场合，马克思的话完全是另外一种意思。

马克思在上述论点中所发挥的是什么思想呢？他所发挥的不过是：无论哪个阶级的理论家都不能创造出一种在实际生活中没有具备相当要素的理想，他**只能看出未来事物的要素，并据此在理论上创造出本阶级在实践**

^① 如果读者手边没有《雾月十八日》〔9〕，就请参看《党的第二次代表大会记录》第111页，那里引用了马克思所说的这段话。

中要达到的理想。差别就在于理论家超过本阶级而先看出未来事物的萌芽。这也就叫做“在理论上得出什么结论”。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他们的《宣言》中说：

“因此，在实践方面共产党人〈即社会民主党人〉是各国工人政党中最坚决的、始终起推动作用的部分；在理论方面，他们胜过其余无产阶级群众的地方在于他们了解无产阶级运动的条件、进程和一般结果。”

是的，思想家是“起推动作用”的，他们比“其余无产阶级群众”看得远得多，全部要点也就在这里。思想家起推动作用，正因为如此，所以思想、社会主义意识对于运动具有伟大的意义。

尊敬的“批评家”，你就是为这一点攻击“多数派”吗？那末你就和马克思主义诀别吧，你要知道“多数派”正是以自己的马克思主义立场自豪的。

“多数派”在这种场合的情形很和恩格斯在九十年代的情形相似。

当时唯心主义者硬说思想是社会生活的泉源。在他们看来，社会意识是社会生活借以建立的基础，所以他们被称为唯心主义者。

当时必须证明，思想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思想是生活本身产生的。

马克思和恩格斯走上了历史舞台并且卓绝地完成了这个使命。他们证明：社会生活是思想的泉源，因此社会

生活是社会意识借以建立的基础。这样，他们也就替唯心主义挖掘了坟墓，而替唯物主义扫清了道路。

某些半马克思主义者却这样了解：似乎意识、思想在生活中只有极小的意义。

当时必须证明思想的伟大意义。

于是恩格斯出来发表意见，在他的书信（1891年至1894年）中强调说：诚然，思想不是从天上掉下来，而是生活本身所产生的，可是它一旦产生出来，就会获得巨大的意义，它把人们联合起来，组织起来，并且在产生它的社会生活上打下自己的烙印，——思想在历史运动中有巨大的意义。

伯恩施坦及其伙伴高声叫道：“这不是马克思主义，这是叛变马克思主义。”但马克思主义者只是付之一笑而已……

俄国也有过一些半马克思主义者，即“经济派”。他们硬说，既然思想是社会生活产生的，那末社会主义意识对于工人运动也就只有微不足道的意义。

当时必须证明，社会主义意识对工人运动有重大的意义，没有这种意识，运动就是工联主义的瞎闯，无产阶级不知何时才能从瞎闯中摆脱出来而到达社会革命。

于是《火星报》出现了，它卓绝地完成了这个使命。《怎么办？》一书出版了，列宁在这部著作中强调社会主义意识的伟大意义。党的“多数派”形成了，它坚定地走上了这条道路。

然而这时一些伯恩施坦的喽罗们却跑出来叫喊道，这“是和马克思主义根本矛盾的”！

“经济派”的喽罗们，你们可知道马克思主义是什么吗？

读者会说：真奇怪！读者会问：究竟是怎么一回事？为什么普列汉诺夫写了一篇批评的文章反对列宁（见新《火星报》第70期和第71期）？他为什么非难“多数派”呢？难道梯弗里斯那些可怜的马克思主义者和他们的《社会民主党人报》不是重复着普列汉诺夫发表过的意见吗？是的，他们是在重复，但重复得很蠢笨，简直令人讨厌。是的，普列汉诺夫发表了批评的意见。然而你们知道是怎么一回事吗？普列汉诺夫跟“多数派”和列宁是没有分歧的。不止普列汉诺夫一人，而且马尔托夫、查苏利奇、阿克雪里罗得也是如此。真的，就我们上面讲的那个问题来说，“少数派”的领袖和旧《火星报》是没有分歧的。而旧《火星报》乃是“多数派”的旗帜。不要惊讶！请看事实吧。

我们读过旧《火星报》上的一篇纲领性的论文（见上）。我们知道，这篇论文完全表明了“多数派”的立场。这篇论文是谁发表的呢？是当时的《火星报》编辑部。谁参加了这个编辑部呢？列宁、普列汉诺夫、阿克雪里罗得、马尔托夫、查苏利奇和斯塔罗维尔。他们中间现在只有列宁一个人是“多数派”，其余五个人都在领导“少数派”，然而事实毕竟是事实，——《火星报》的这篇纲领性

的论文是在他们负责编辑时发表的，因此他们不应当自食其言，他们大概相信自己所写的东西吧。

但是，好吧，我们就撇开《火星报》不谈。

且看马尔托夫写些什么：

“这样看来，社会主义思想最初并不是在工人群众中间产生的，而是在资产阶级出身的学者的书房中产生的。”^①

再看查苏利奇写些什么：

“甚至整个无产阶级的阶级团结的思想……也不是这么简单而能从每个工人的头脑中独立产生出来的……社会主义……也决不是在工人的头脑中‘自然而然’生长起来的……社会主义理论是由生活和知识的全部发展过程准备起来的……并且是由具有这种知识的天才头脑创造出来的。社会主义思想在工人中间的传播，几乎在整个欧洲大陆上，都是由那些在上层阶级的学校里受过教育的社会主义者开始的。”^②

现在我们来听一听曾在新《火星报》（第70期和第71期）上郑重其事地反对列宁的普列汉诺夫所说的话吧。事情发生在党的第二次代表大会上。普列汉诺夫驳斥马尔丁诺夫而为列宁辩护。当时，普列汉诺夫责备马尔丁诺夫，说他抓住了列宁的一句话，而忽略了《怎么办？》一书的全文，然后普列汉诺夫继续说：

① 马尔托夫：《红旗》第3页。

② 见《曙光》杂志〔10〕第4期第79—80页。

“马尔丁诺夫同志的手法使我想起了一个书报检查官的话：‘给我一篇“祷告词”，让我从中抽出一句话来，我可以给你们证明，它的作者是应该判处绞刑的。’然而，不仅马尔丁诺夫同志一个人而且还有其他许许多多的人对这句倒霉话〈列宁的话〉的一切责难全是出于误解。马尔丁诺夫同志引证恩格斯的话：‘现代社会主义是现代工人运动在理论上的表达。’列宁同志也同意恩格斯的意见……但要知道，恩格斯的话乃是一般原理。问题在于究竟是谁最先阐述了这一理论上的表达。列宁所写的不是一篇论述历史哲学的学术论文，而是一篇反对‘经济派’的辩论文章，‘经济派’硬说：我们应当静待工人阶级不用‘革命霉菌’〈即社会民主党〉的帮助而独自达到的结局。其所以禁止社会民主党向工人进行宣传，正因为它是‘革命霉菌’，正因为它具有理论的意识。但如果你们把‘霉菌’去掉，那就只剩下没有觉悟而必须从外面把意识灌输进去的群众了。假如你们愿意公正地对待列宁并把这部书仔细地读一遍，那末你们就会看到列宁所说的正是这一点。”^①

普列汉诺夫在党的第二次代表大会上就是这样说的。

然而，正是受马尔托夫、阿克雪里罗得、查苏利奇、斯塔罗维尔等等唆使的同一位普列汉诺夫，过了几个月再

^① 见《党的第二次代表大会记录》第123页。

出来说话的时候，竟抓住他在第二次代表大会上所**辩护**过的列宁的同一句话，宣称列宁和“多数派”不是马克思主义者。他知道，如果从“祷告词”中抽出一句话来断章取义地加以解释，那末它的作者恐怕也要因背叛上帝而受绞刑的。他知道这样做是不公正的，一个公正的批评家是不会这样做的，但他还是从列宁的书中抽出这句话来，他还是不公正地做去，当众打自己的嘴巴。而马尔托夫、查苏利奇、阿克雪里罗得和斯塔罗维尔则附和着他，由他们自己负编辑责任，把普列汉诺夫的文章登在新《火星报》（第70期和第71期）上，因而再一次使他们自己丢脸。

为什么他们表现得这样没有气节，为什么“少数派”的这些领袖们自己打自己的嘴巴，为什么他们否认由自己署名登在《火星报》上的那篇纲领性的论文，为什么他们自食其言呢？什么时候听说社会民主党内有过这样颠倒是非的丑事？

在第二次代表大会以后和普列汉诺夫的文章发表以前这几个月内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呢？

事情原来是这样的。第二次代表大会从原有的六个编辑中只选出了三个即普列汉诺夫、列宁和马尔托夫来担任《火星报》的编辑。至于阿克雪里罗得、斯塔罗维尔和查苏利奇三人，代表大会则指定他们去担任别的职务了。代表大会当然有权这样做，而且每个人都应服从它的决定，因为代表大会是全党意志的体现者，是党的最高

机关，谁反对它的决定，谁就是践踏党的意志。

可是这些固执的编辑却没有服从党的意志，没有服从党的纪律（党的纪律也就是党的意志）。原来党的纪律是专为我们这种普通工作者编造的！他们痛恨代表大会没有把他们选为编辑，于是退到一边，并把马尔托夫勾引过去组成了反对派。他们对党宣布抵制，拒绝党的工作，并开始威吓党说，把我们选进编辑部、中央委员会和党总委员会去，不然我们就要制造分裂。于是分裂开始了。这样，他们又一次践踏了党的意志。

下面就是这些罢工的编辑提出的要求：

“恢复旧有的《火星报》编辑部（就是说，让我们在编辑部占三个位置）。

把一定数量的反对派分子（即“少数派”）加进中央委员会去。

让反对派分子在党总委员会中占两个位置等等……

我们提出的这些条件是使党内不至发生威胁全党生存的冲突的唯一保证。”（就是说，要满足我们的要求，不然我们就要在党内制造大分裂。）^①

党怎样回答他们呢？

党的代表者（中央委员会）和其他同志向他们声明说：我们不能违反党代表大会的决议，选举是代表大会的事情，可是我们仍然企图恢复和平和一致，老实说，争位

^① 见《对同盟代表大会记录的述评》第26页。

置已经是可耻的了，而你们却为了争位置要来分裂党，等等。

罢工的编辑们恼羞成怒了，——真的，他们为了争位置而发动斗争了，——他们把普列汉诺夫拉了过去^①，开始干起他们的英雄事业来了。他们必须在“多数派”和“少数派”之间硬找出某种更“厉害的”“意见分歧”，借以证明他们并不是为了争位置。他们东找西找，结果在列宁的书中找到了一段话，如果把这段话同原文割裂开来，断章取义地加以解释，确实可以吹毛求疵地骂一通。“少数派”的领袖们暗中想道：这个主意妙极了，列宁是“多数

- ① 也许读者要问：这位热烈拥护过“多数派”的普列汉诺夫怎么会转到“少数派”方面去了呢？原来是他和列宁之间发生了意见分歧。当“少数派”暴怒起来并宣布抵制的时候，普列汉诺夫就认为必须完全让步。列宁不同意他的意见。普列汉诺夫就渐渐倾向“少数派”了。他们之间的意见分歧更加扩大了，普列汉诺夫终于变成了列宁和“多数派”的反对者。关于这一点列宁写道：

“……过了几天，我真的同一位总委员会委员一起去见普列汉诺夫，当时，我们和普列汉诺夫的谈话是这样进行的：

——要知道，世界上有一种爱吵闹的老婆（即指‘少数派’），对这样的老婆必须让步，免得她疯疯癫癫、当众大吵大闹起来。

——普列汉诺夫这样说道。

——也许是这样，但即使是让步，自己也要保持力量，使更大的‘吵闹’不致发生。——我回答说。”（见《对同盟代表大会记录的述评》第37页，那里引证了列宁的信）〔11〕

列宁和普列汉诺夫没有达成协议。从这时起，普列汉诺夫就开始转到“少数派”方面去了。

我们根据可靠的消息得知，普列汉诺夫又在离开“少数派”，并已创办了自己的机关刊物《社会民主党人日志》〔12〕。

派”的领导人，我们糟蹋了列宁，就能把党拉到自己方面来。于是普列汉诺夫那一套论调就来了，说什么“列宁及其追随者并不是马克思主义者”。诚然，他们今天拚命攻击的，就是他们昨天还在拥护的列宁书中的那种思想，但有什么办法：机会主义者之所以称为机会主义者，正因为他们是不尊重原则性的。

这就是他们自己打自己嘴巴的缘故，这就是他们颠倒是非的根源。

但还不止于此。

过了一些时候，他们看出，除了几个幼稚的人而外，谁也没有理睬他们反对“多数派”和列宁的那种煽动，他们看到“事情”不妙，于是决定再来粉饰一番。同一个普列汉诺夫、同一个马尔托夫和同一个阿克雪里罗得又于1905年3月10日用党总委员会的名义通过了一项决议，其中有这样一段话：

“同志们！〈他们向“多数派”说〉…… 双方〈即“多数派”和“少数派”〉都曾屡次表示自己确信：现有的策略上组织上的意见分歧，并不是一种使双方不能在统一的党组织范围内进行工作的意见分歧。”^①他们说，因此我们要召集同志裁判会（由倍倍尔等组成）来解决我们之间的小小争执。

一句话，党内的意见分歧不过是一种可以由同志裁

^① 见《火星报》第91期第3页。

判会来解决的意气之争，而我们大家——他们说——是一个统一的整体。

然而怎么会这样呢？人居然号召我们这些“非马克思主义者”到党组织中去，说我们大家还是一个统一的整体等等……这是什么意思呢？“少数派”的领袖们，要知道这是你们叛变了党！难道可以委任“非马克思主义者”担负党的领导职务吗？难道社会民主党内有“非马克思主义者”立足的余地吗？或许是你们自己也叛变了马克思主义，所以改变了阵线吧？

然而，若要等待他们回答，那就未免太幼稚了。原来这些妙不可言的领袖们在口袋里装着几种“原则”，需要哪一种就掏出哪一种来。你看他们是多么反复无常呵！……

所谓“少数派”的领袖就是这样的。

不难想象，跟随在这种领袖后面的喽罗们，即梯弗里斯的所谓“少数派”该是些什么样的人了……还有一件不幸的事，就是尾巴有时不听头脑的指挥，不肯服从它。例如在“少数派”的领袖们认为可能调解并号召党的工作人员取得一致时，而梯弗里斯的“少数派”及其《社会民主党人报》却继续在那里大闹特闹，说“多数派”和“少数派”之间的斗争是“决死的斗争”^①，所以我们一定要厮杀一番！真是各人唱各人的调子。

^① 见《社会民主党人报》创刊号。

“少数派”埋怨我们把他们叫做机会主义者（无原则的分子）。可是，既然他们自食其言，既然他们出尔反尔，既然他们始终动摇，试问，这不叫做机会主义又叫做什么呢？难道一个真正的社会民主党人能常常改变自己的信念吗？要知道，就连手帕也不是这样经常更换的。

我们那些可怜的马克思主义者一味固执地说，“少数派”具有真正的无产阶级性质。真是这样的吗？好，我们来看看吧。

考茨基说：“无产者比较容易接受党的原则，他倾向于不以一时情绪、不以个人利益或局部利益为转移的原则性的政策。”^①

而“少数派”呢？他们也是倾向于这种不以一时情绪和其他东西为转移的政策吗？恰恰相反，他们经常摇摆，他们永不动摇，他们憎恨坚定的原则性的政策，他们宁愿采取无原则的立场，他们听从一时的情绪的驱使。至于事实，我们早已知道了。

考茨基说：无产者喜爱党的纪律，“无产者在他还是孤零零的个体时是没有什么力量的。他的全部力量，他走向进步的全部能力，他的一切希望和愿望，都是从组织中，从他和同志们的有计划共同活动中汲取来的……”正因为如此，所以他不为个人利益所诱，不为个人荣誉所惑，他“在指定的任何岗位上都履行自己的职责，自愿地

① 见《爱尔福特纲领》第88页，中央委员会出版。

服从那贯穿在他的全部情感和全部思想中的纪律”^①。

而“少数派”呢？他们也是这样被纪律性所贯穿的吗？恰恰相反，他们藐视党的纪律，嘲笑党的纪律^②。“少数派”的领袖们就是天字第一号破坏党内纪律的人。请你们回想一下阿克雪里罗得、查苏利奇、斯塔罗维尔、马尔托夫及其他不服从第二次代表大会决议的人们吧。

考茨基继续说：“知识分子却完全不是这样的。”他服从党的纪律是很勉强的，是迫不得已，而不是出于自愿的。“他认为纪律只有群众才需要去遵守，而上等人物是不必遵守的。至于他自己，当然是属于上等人物之列的……李卜克内西是……理想的知识分子的榜样，他充满了无产阶级的情绪，他……在指定给他的任何岗位上工作，他使自己完全服从于我们的伟大事业，并鄙视……知识分子一落到少数地位时……的那种颓丧的啜泣。这里还可以举马克思为例，他从来没有想要出什么风头，他在国际中不止一次地处于少数地位，每次他都十分严格地服从党的纪律。”^③

而“少数派”呢？他们在什么地方表现过“无产阶级的情绪”呢？他们的行为象李卜克内西和马克思那样吗？恰恰相反，我们看到“少数派”的领袖们并没有使自己的“我”服从于我们的神圣事业；我们看到正是这些领袖们

① 《列宁全集》第7卷第316页。

② 见《同盟代表大会记录》。

③ 《列宁全集》第7卷第317页。

在第二次代表大会上“落到少数地位时”，就沉溺于“颓丧的啜泣”；我们看到，在代表大会后，正是他们为了争夺“头等位置”而痛哭起来，并且正是为了争夺这种位置而挑起了党内的分裂……

可敬的孟什维克，这就是你们的“无产阶级性格”吗？

孟什维克向我们问道：那末，为什么某些城市的工人站在我们这方面呢？

是的，不错，在某些城市中工人们是站在“少数派”方面的，但这并不能证明什么。在某些城市中工人们也跟着修正主义者（德国的机会主义者）走，但这并不是说修正主义者的立场是无产阶级的立场，这并不是说他们不是机会主义者。有一次，连乌鸦也找到了玫瑰花，但这并不是说乌鸦就是夜莺。难怪俗语说：

乌鸦一找到了玫瑰花，
就把自己当做夜莺夸。

* * *

现在很清楚，党内的意见分歧究竟是在什么基础上发生的。显然，我们党内暴露了两种趋向：**无产阶级坚定性的趋向和知识分子动摇性的趋向**。现在的“少数派”就是这种知识分子动摇性的表现者。梯弗里斯“委员会”及其《社会民主党人报》就是这个“少数派”的驯服的奴隶！

全部问题就在这里。

诚然，我们那些可怜的马克思主义者常常叫喊说他们反对“知识分子的心理”，并且他们还企图责备“多数

派”有“知识分子的动摇性”，但这很象一个贼偷了别人的钱，却大声叫喊：“捉贼呀！”

此外，大家知道，谁害的什么病，谁就老是谈着这种病。

按俄国社会民主工党高加索联盟委员会
一九〇五年五月出版的小册子原文刊印

选自《斯大林全集》第1卷
第79—117页

从格鲁吉亚文译成俄文

注 释

〔1〕斯大林的《略论党内意见分歧》一书写于1905年4月底。这是对饶尔丹尼亚的几篇论文（在《社会民主党人报》上发表的《多数派还是少数派？》和在《旅行家》杂志上发表的《什么是党？》等等）的答覆。关于斯大林的《略论党内意见分歧》一书出版的消息，布尔什维克国外中央很快就知道了。1905年7月18日，克鲁普斯卡娅致函俄国社会民主工党高加索联盟委员会，要求把这书寄一本到国外去。《略论党内意见分歧》一书在南高加索各布尔什维克组织中传播得很广泛，先进工人们根据这本书认识了党内的意见分歧，认识了列宁和布尔什维克的立场。这本书是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高加索联盟秘密印刷所（阿福拉巴尔印刷所）用几种文字（1905年5月用格鲁吉亚文，同年6月又用俄文和阿尔明尼亚文）印的，每种文字各印一千五百册至二千册。

〔2〕《火星报》是第一个全俄马克思主义的秘密报纸，1900年由列宁创办。列宁《火星报》创刊号于1900年12月11日（24日）在莱比锡出版，随后几期在慕尼黑出版，自1902年4月起在伦敦出版，自1903年春天起则在日内瓦出版。当时在俄国许多城市（彼得堡、莫斯科及其他城市）中建立了列宁火星派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小组和委员会。在南高加索坚持《火星报》思想的，有格鲁吉亚革命的社会民主党秘密的机关刊物《斗争报》（关于《火星报》的意义和作用，见《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1975年版第32—42

页)。

〔3〕《社会民主党人报》是高加索孟什维克的秘密报纸，于1905年4月至11月在梯弗里斯用格鲁吉亚文出版。该报由饶尔丹尼亚主持。《社会民主党人报》创刊号是作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梯弗里斯委员会机关报》出版的，后来该报自称为《高加索社会民主工人组织机关报》。

〔4〕《工人事业》杂志是侨居外国的俄国社会民主党人联合会（“经济派”）的不定期机关刊物。该杂志于1899年至1902年在日内瓦出版。

〔5〕见《列宁选集》1972年10月第2版第1卷第208页。

〔6〕斯塔罗维尔是坡特列索夫的笔名。

〔7〕《旅行家》是一种历史考古学和地理人种学的格鲁吉亚文杂志，于1901年至1905年11月在梯弗里斯出版。从1905年1月起，《旅行家》成了格鲁吉亚社会民主党人的文艺政治周刊，由马哈拉则主编。《旅行家》除刊登布尔什维克的文章外，还刊登孟什维克的文章。

〔8〕《海因菲尔德纲领》是奥地利社会民主党于1888年在海因菲尔德城建党大会上通过的。这个纲领的原则部分包含一些正确阐明社会发展进程和无产阶级及其政党任务的论点。后来，在1901年维也纳代表大会上，《海因菲尔德纲领》已被含有修正主义原则的新纲领代替了。

〔9〕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1972年5月第1版第1卷第632页。

〔10〕《曙光》是俄国社会民主党的理论杂志，由列宁创办，同时与《火星报》由同一个编辑部主编出版。该杂志于1901年4月至1902年8月在斯图加特出版。

〔11〕见《列宁全集》1959年5月第1版第7卷第181页。

〔12〕《社会民主党人日志》是1905年3月至1912年4月由普列汉诺夫在日内瓦出版的不定期杂志。共出十六期。1916年又出过一期。

斯 大 林

关于德国共产党的 前途和布尔什维克化

(和德国共产党党员海尔佐克的谈话)

第一个问题 (海尔佐克): 你是否认为德意志资本主义民主共和国的政治关系和经济关系必然促使工人阶级在不久的将来进行夺取政权的斗争?

答 (斯大林): 如果讲的是期限而不是趋向, 那末要极其肯定地回答这个问题是很困难的。用不着证明, 不论从国际条件或从国内条件来看, 目前的局势和一九二三年的局势是有本质上的区别的。可是, 这并不是说, 在最近时期内局势不会因外部环境可能发生重大变化而产生有利于革命的急剧转变。国际形势的不稳定就是这种设想很可能成为事实的保证。

第二个问题: 从目前的经济状况和力量对比来看, 我们是否需要一个比较长的准备时期来争取无产阶级大多数(列宁曾向各国共产党提出过这个要求, 他认为这是夺取政权前极重要的任务)?

答: 既然讲的是经济状况, 那我只能根据我所掌握

的一般材料来估计问题。我认为道威斯计划已经产生了一些效果，它已经使局势趋于相对稳定。美国资本的投入德国工业，通货的稳定，德国一些最重要的工业部门的改善（以上三点决不意味着德国经济的根本好转），以及工人阶级物质生活状况的某些改善，——这一切都不能不使德国资产阶级的阵地得到一定的巩固。这可以说是道威斯计划的“好的”一面。

但是道威斯计划还有“坏的”一面，这一面不可避免地要在一定的时期表现出来，而且一定会破坏这个计划的“好的”效果。毫无疑问，道威斯计划使德国无产阶级受到国内资本和国外资本的双重压榨。德国工业的扩大和它的国外市场范围的缩小之间的矛盾，协约国的过分要求和德国国民经济满足这些要求的最大可能之间的不相适应，——这一切必然使无产阶级、小农、职员和知识分子的境遇恶化，因而也就不能不引起革命爆发，促使无产阶级直接进行夺取政权的斗争。

但是，不能把这种情况看成德国革命的唯一有利条件。为了使这个革命取得胜利，还必须使共产党能够代表工人阶级大多数，使它成为工人阶级内部的决定性力量。必须揭露和粉碎社会民主党，使它降到只占工人阶级的极少数的地位。不然就休想建立无产阶级专政。为了使工人能够获得胜利，必须用统一的意志去鼓舞他们，必须由一个得到工人阶级大多数真正信任的党去领导他们。如果工人阶级内部有两个力量相等而彼此竞争的

党，那末，即使外部存在着有利条件，也不可能取得巩固的胜利。列宁是十月革命以前第一个特别强调这一点的人，他认为这是无产阶级胜利最必需的条件。

可以认为对革命最有利的形势是下面这种形势：一方面德国内部发生危机和共产党的力量大大地增长，另一方面在德国外敌的阵营中发生严重的纠纷。

我认为，一九二三年的革命时期因为不具备上述形势的第二方面，所以情况极其不利。

第三个问题：你说德国共产党必须使大多数工人跟自己走。至今大家还很少注意这个目标。在你看来，怎样才能使德国共产党成为这种力量不断增长的强有力的党呢？

答：有些同志认为巩固党和使党布尔什维克化就是把一切抱有不同思想的人驱逐出党。这当然是不对的。只有在为工人阶级的具体需要进行日常斗争的进程中，才能揭穿社会民主党，使它降到只占工人阶级极少数的地位。揭露社会民主党的罪恶，不应当依靠行星问题，而应当依靠工人阶级为改善自己的物质生活状况和提高政治地位而进行的日常斗争；同时工资问题、工作日问题、居住条件问题、保险问题、税收问题、失业问题以及生活费用高昂问题等等即使不起决定性的作用，也应该起极重大的作用。每天都要在这些问题上打击社会民主党人，揭露他们的背叛行为，——任务就是这样。

但是，如果不把日常的实际问题和关于德国的国内

外状况的一些根本问题联系起来，如果在党的全部工作中不从革命和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的观点出发来阐明这一切日常工作，那就不能完全实现这个任务。

而要实行这样的政策，只有经验丰富和理论修养很高的干部所领导的党才有可能，因为这些干部的经验足以使他们利用社会民主党的种种失算来加强自己的党，同时他们的理论修养足以使他们不致因个别胜利而看不见革命的发展前途。

这主要也就说明了所有共产党（其中包括德国共产党）的领导干部问题是实现布尔什维克化的根本问题之一。

要实现布尔什维克化，至少必须具备若干基本条件，没有这些条件，各国共产党的布尔什维克化根本是不可能的。

（一）必须使党不把自己看成国会选举机构的附属品，象社会民主党在实际上把自己看成的那样；必须使党不把自己看成工会的免费附加品，象某些无政府工团主义者有时反来复去所说的那样；而必须使党把自己看成无产阶级的阶级联合的最高形式，即负有领导无产阶级组织的其他一切形式（从工会到国会党团）的使命的形式。

（二）必须使党特别是党的领导者完全精通与革命实践有不可分割的联系的马克思主义革命理论。

（三）必须使党在制定口号和指示的时候，不是根据

背熟的公式和历史的比拟，而是根据对革命运动所处的国内外的具体条件的仔细分析，同时还必须考虑到各国的革命经验。

(四)必须使党在群众的革命斗争的烈火中检查这些口号和指示的正确性。

(五)必须按照新的革命的方式来改组党的全部工作，特别是当社会民主党的传统在党内还没有清除的时候。这样，党的每个步骤和每个行动就能自然而然地使群众革命化，使工人阶级的广大群众受到革命的训练和教育。

(六)必须使党在自己的工作中善于把最高的原则性(不能和宗派主义混为一谈!)和与群众最广泛的联系及接触(不能和尾巴主义混为一谈!)结合起来。不然，党不但不能教导群众，而且也不可能向群众学习；不但不能引导群众并把他们提高到党的水平，而且也不可能倾听群众的呼声和预料到他们的迫切需要。

(七)必须使党在自己的工作中善于把不可调和的革命性(不能和革命的冒险主义混为一谈!)和最大限度的灵活性及机动性(不能和迁就行为混为一谈!)结合起来。不然，党就不可能掌握各种斗争形式和组织形式，不可能把无产阶级的日常利益和无产阶级革命的根本利益联系起来，也不可能在自己的工作中把合法斗争和非法斗争配合起来。

(八)必须使党不掩饰自己的错误，使它不怕批评，使

它善于用自己的错误来提高和教育自己的干部。

(九)必须使党善于把先进战士中的优秀分子选拔到基本的领导集团中去。因为这些优秀分子十分忠诚，足以成为革命无产阶级的意向的真正表达者；他们有丰富的经验，足以成为能运用列宁主义的策略和战略的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领袖。

(十)必须使党经常地改善自己组织的社会成分，清除那些腐化的机会主义分子，以便达到最大限度的团结一致。

(十一)必须使党制定无产阶级的铁的纪律。这种纪律的基础是思想的一致性、运动目的明确性、实际行动的统一和广大党员群众对待党的任务的自觉态度。

(十二)必须使党经常检查自己的决定和指示的执行情况。不然，这些决定和指示就有变成空洞的诺言的危险，而空洞的诺言只能破坏广大无产阶级群众对党的信任。

没有诸如此类的条件，实行布尔什维克化就是空谈。

第四个问题：你说，除了道威斯计划的坏的一面以外，德国共产党夺取政权的第二个条件是社会民主党在群众面前的被彻底揭露，是它不是工人阶级中比较重要的力量。从实际情况来看，要达到这一点还有很远的路程。这里明显地反映出党目前的工作方法上有缺点和弱点。怎样才能消除这些缺点和弱点呢？在一九二四年十二月的选举中，社会民主党——完全是一个腐化堕落的

党——不但没有失去什么，而且获得了将近两百万张选票，你对这次选举的结果如何估计？

答：这里问题不在于德国共产党工作上有缺点。这里问题首先在于：美国的借款，美国资本的输入加上通货的稳定使得状况有些好转，因而就造成一种错觉，认为和德国状况有关的国内外矛盾似乎有可能根本消除。德国社会民主党也就是借着这种错觉，象骑在白马上那样进入了现今的德国国会。现在维尔斯正炫耀自己在选举中的胜利。但是，他大概不了解他占有了别人的胜利。胜利的不是德国社会民主党，而是摩根集团。维尔斯过去和现在都只是摩根的一个代理人。

载于 1925 年 2 月 3 日
《真理报》第 27 号

选自《斯大林全集》第 7 卷
第 32—37 页

毛 泽 东

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

(一九二九年十二月)

红军第四军的共产党内存在着各种非无产阶级的思想，这对于执行党的正确路线，妨碍极大。若不彻底纠正，则中国伟大革命斗争给予红军第四军的任务，是必然担负不起来的。四军党内种种不正确思想的来源，自然是由于党的组织基础的最大部分是由农民和其他小资产

-
- * 这是毛泽东同志为红军第四军第九次党的代表大会写的决议。中国人民军队的建设，是经过了艰难的道路的。中国红军（抗日时期是八路军、新四军，现在是人民解放军）从一九二七年八月一日南昌起义时期创始，到一九二九年十二月，经过了两年多的时间。在这个时期内，红军中的共产党和各种错误思想作斗争，学到了许多东西，积累了相当丰富的经验。毛泽东同志写的这个决议，就是这些经验的总结。这个决议使红军完全建立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础上，将一切旧式军队的影响都肃清了。这个决议不但在红军第四军实行了，后来各部分红军都先后不等地照此做了，这样就使整个中国红军完全成为真正的人民军队。二十几年来，中国人民军队中的党的工作和政治工作有广大的发展和创造，现在的面貌和过去大不相同了，但是基本的路线还是这个决议的路线。

阶级出身的成份所构成的；但是党的领导机关对于这些不正确的思想缺乏一致的坚决的斗争，缺乏对党员作正确路线的教育，也是使这些不正确思想存在和发展的重要原因。大会根据中央九月来信的精神，指出四军党内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的表现、来源及其纠正的方法，号召同志们起来彻底地加以肃清。

关于单纯军事观点

单纯军事观点在红军一部分同志中非常发展。其表现如：

(一)认为军事政治二者是对立的，不承认军事只是完成政治任务的工具之一。甚至还有说“军事好，政治自然会好，军事不好，政治也不会好”的，则更进一步认为军事领导政治了。

(二)以为红军的任务也和白军相仿佛，只是单纯地打仗的。不知道中国的红军是一个执行革命的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特别是现在，红军决不是单纯地打仗的，它除了打仗消灭敌人军事力量之外，还要负担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帮助群众建立革命政权以至于建立共产党的组织等项重大的任务。红军的打仗，不是单纯地为了打仗而打仗，而是为了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并帮助群众建设革命政权才去打仗的，离了对群众的宣传、组织、武装和建设革命政权等项目标，就是失去了

打仗的意义，也就是失去了红军存在的意义。

(三)因此，在组织上，把红军的政治工作机关隶属于军事工作机关，提出“司令部对外”的口号。这种思想如果发展下去，便有走到脱离群众、以军队控制政权、离开无产阶级领导的危险，如象国民党军队所走的军阀主义的道路一样。

(四)同时，在宣传工作上，忽视宣传队的重要性。在群众组织上，忽视军队士兵会的组织和对地方工农群众的组织。结果，宣传和组织工作，都成了被取消的状态。

(五)打胜仗就骄傲，打败仗就消极。

(六)本位主义，一切只知道为四军打算，不知道武装地方群众是红军的重要任务之一。这是一种放大的小团体主义。

(七)有少数同志囿于四军的局部环境，以为除此就没有别的革命势力了。因此，保存实力、避免斗争的思想非常浓厚。这是机会主义的残余。

(八)不顾主客观条件，犯着革命的急性病，不愿意艰苦地做细小严密的群众工作，只想大干，充满着幻想。这是盲动主义的残余^{〔1〕}。

单纯军事观点的来源：

(一)政治水平低。因此不认识军队中政治领导的作用，不认识红军和白军是根本不同的。

(二)雇佣军队的思想。因为历次作战俘虏兵甚多，此种分子加入红军，带来了浓厚的雇佣军队的思想，使单

纯军事观点有了下层基础。

(三)因有以上两个原因,便发生第三个原因,就是过分相信军事力量,而不相信人民群众的力量。

(四)党对于军事工作没有积极的注意和讨论,也是形成一部分同志的单纯军事观点的原因。

纠正的方法:

(一)从教育上提高党内的政治水平,肃清单纯军事观点的理论根源,认清红军和白军的根本区别。同时,还要肃清机会主义和盲动主义的残余,打破四军本位主义。

(二)加紧官兵的政治训练,特别是对俘虏成份的教育要加紧。同时,尽可能由地方政权机关选派有斗争经验的工农分子,加入红军,从组织上削弱以至去掉单纯军事观点的根源。

(三)发动地方党对红军党的批评和群众政权机关对红军的批评,以影响红军的党和红军的官兵。

(四)党对于军事工作要有积极的注意和讨论。一切工作,在党的讨论和决议之后,再经过群众去执行。

(五)编制红军法规,明白地规定红军的任务,军事工作系统和政治工作系统的关系,红军和人民群众的关系,士兵会的权能及其和军事政治机关的关系。

关于极端民主化

红军第四军在接受中央指示之后,极端民主化的现

象,减少了许多。例如党的决议比较地能够执行了;要求在红军中实行所谓“由下而上的民主集权制”、“先交下级讨论,再由上级决议”等项错误主张,也没有人再提了。但是在实际上,这种减少,只是一时的和表面的现象,还不是极端民主化的思想的肃清。这就是说,极端民主化的根苗还深种在许多同志的思想中。例如对于决议案的执行,表示种种勉强的态度,就是证据。

纠正的方法:

(一)从理论上铲除极端民主化的根苗。首先,要指出极端民主化的危险,在于损伤以至完全破坏党的组织,削弱以至完全毁灭党的战斗力,使党担负不起斗争的责任,由此造成革命的失败。其次,要指出极端民主化的来源,在于小资产阶级的自由散漫性。这种自由散漫性带到党内,就成了政治上的和组织上的极端民主化的思想。这种思想是和无产阶级的斗争任务根本不相容的。

(二)在组织上,厉行集中指导下的民主生活。其路线是:

1 党的领导机关要有正确的指导路线,遇事要拿出办法,以建立领导的中枢。

2 上级机关要明了下级机关的情况和群众生活的情况,成为正确指导的客观基础。

3 党的各级机关解决问题,不要太随便。一成决议,就须坚决执行。

4 上级机关的决议,凡属重要一点的,必须迅速地

传达到下级机关和党员群众中去。其办法是开活动分子会，或开支部以至纵队的党员大会（须看环境的可能），派人出席作报告。

5 党的下级机关和党员群众对于上级机关的指示，要经过详尽的讨论，以求彻底地了解指示的意义，并决定对它的执行方法。

关于非组织观点

四军党内存在着的非组织的观点，其表现如下：

甲 少数不服从多数。例如少数人的提议被否决，他们就不诚意地执行党的决议。

纠正的方法：

（一）开会时要使到会的人尽量发表意见。有争论的问题，要把是非弄明白，不要调和敷衍。一次不能解决的，二次再议（以不妨碍工作为条件），以期得到明晰的结论。

（二）党的纪律之一是少数服从多数。少数人在自己的意见被否决之后，必须拥护多数人所通过的决议。除必要时得在下一次会议再提出讨论外，不得在行动上有任何反对的表示。

乙 非组织的批评：

（一）党内批评是坚强党的组织、增加党的战斗力的武器。但是红军党内的批评有些不是这样，变成了攻击

个人。其结果，不但毁坏了个人，也毁坏了党的组织。这是小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表现。纠正的方法，在于使党员明白批评的目的是增加党的战斗力以达到阶级斗争的胜利，不应当利用批评去做攻击个人的工具。

(二)许多党员不在党内批评而在党外去批评。这是因为一般党员还不懂得党的组织(会议等)的重要，以为批评在组织内或在组织外没有什么分别。纠正的方法，就是要教育党员懂得党的组织的重要性，对党委或同志有所批评应当在党的会议上提出。

关于绝对平均主义

红军中的绝对平均主义，有一个时期发展得很厉害。例如：发给伤兵用费，反对分伤轻伤重，要求平均发给。官长骑马，不认为是工作需要，而认为是不平等制度。分物品要求极端平均，不愿意有特别情形的部分多分去一点。背米不问大人小孩体强体弱，要平均背。住房子要分得一样平，司令部住了一间大点的房子也要骂起来。派勤务要派得一样平，稍微多做一点就不肯。甚至在一副担架两个伤兵的情况，宁愿大家抬不成，不愿把一个人抬了去。这些都证明红军官兵中的绝对平均主义还很严重。

绝对平均主义的来源，和政治上的极端民主化一样，是手工业和小农经济的产物，不过一则见之于政治生活方面，一则见之于物质生活方面罢了。

纠正的方法：应指出绝对平均主义不但在资本主义没有消灭的时期，只是农民小资产者的一种幻想；就是在社会主义时期，物质的分配也要按照“各尽所能按劳取酬”的原则和工作的需要，决无所谓绝对的平均。红军人员的物质分配，应该做到大体上的平均，例如官兵薪饷平等，因为这是现时斗争环境所需要的。但是必须反对不问一切理由的绝对平均主义，因为这不是斗争的需要，适得其反，是于斗争有妨碍的。

关于主观主义

主观主义，在某些党员中浓厚地存在，这对分析政治形势和指导工作，都非常不利。因为对于政治形势的主观主义的分析和对于工作的主观主义的指导，其必然的结果，不是机会主义，就是盲动主义。至于党内的主观主义的批评，不要证据的乱说，或互相猜忌，往往酿成党内的无原则纠纷，破坏党的组织。

关于党内批评问题，还有一点要说及的，就是有些同志的批评不注意大的方面，只注意小的方面。他们不明白批评的主要任务，是指出政治上的错误和组织上的错误。至于个人缺点，如果不是与政治的和组织的错误有联系，则不必多所指摘，使同志们无所措手足。而且这种批评一发展，党内精神完全集注到小的缺点方面，人人变成了谨小慎微的君子，就会忘记党的政治任务，这是很大

的危险。

纠正的方法：主要是教育党员使党员的思想 and 党内的生活都政治化，科学化。要达到这个目的，就要：（一）教育党员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方法去作政治形势的分析和阶级势力的估量，以代替主观主义的分析和估量。（二）使党员注意社会经济的调查和研究，由此来决定斗争的策略和工作的方法，使同志们知道离开了实际情况的调查，就要堕入空想和盲动的深坑。（三）党内批评要防止主观武断和把批评庸俗化，说话要有证据，批评要注意政治。

关于个人主义

红军党内的个人主义的倾向有如下各种表现：

（一）报复主义。在党内受了士兵同志的批评，到党外找机会报复他，打骂就是报复的一种手段。在党内也寻报复；你在这次会议上说了我，我就在下次会议上找岔子报复你。这种报复主义，完全从个人观点出发，不知有阶级的利益和整个党的利益。它的目标不在敌对阶级，而在自己队伍里的别的个人。这是一种削弱组织、削弱战斗力的销蚀剂。

（二）小团体主义。只注意自己小团体的利益，不注意整体的利益，表面上不是为个人，实际上包含了极狭隘的个人主义，同样地具有很大的销蚀作用和离心作用。

红军中历来小团体风气很盛，经过批评现在是好些了，但其残余依然存在，还须努力克服。

(三)雇佣思想。不认识党和红军都是执行革命任务的工具，而自己是其中的一员。不认识自己是革命的主体，以为自己仅仅对长官个人负责任，不是对革命负责任。这种消极的雇佣革命的思想，也是一种个人主义的表现。这种雇佣革命的思想，是无条件努力的积极分子所以不很多的原因。雇佣思想不肃清，积极分子便无由增加，革命的重担便始终放在少数人的肩上，于斗争极为不利。

(四)享乐主义。个人主义见于享乐方面的，在红军中也有不少的人。他们总是希望队伍开到大城市去。他们要到大城市不是为了去工作，而是为了去享乐。他们最不乐意的是在生活艰难的红色区域里工作。

(五)消极怠工。稍不遂意，就消极起来，不做工作。其原因主要是缺乏教育，但也有是领导者处理问题、分配工作或执行纪律不适当。

(六)离队思想。在红军工作的人要求脱离队伍调地方工作的与日俱增。其原因，也不完全是个人的，尚有一，红军物质生活过差；二，长期斗争，感觉疲劳；三，领导者处理问题、分配工作或执行纪律不适当等项原因。

纠正的方法：主要是加强教育，从思想上纠正个人主义。再则处理问题、分配工作、执行纪律要得当。并要设法改善红军的物质生活，利用一切可能时机休息整理，以

改善物质条件。个人主义的社会来源是小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思想在党内的反映，当进行教育的时候必须说明这一点。

关于流寇思想

由于红军中游民成份占了很大的数量和全国特别是南方各省有广大游民群众的存在，就在红军中产生了流寇主义的政治思想。这种思想表现在：一，不愿意做艰苦工作建立根据地，建立人民群众的政权，并由此去扩大政治影响，而只想用流动游击的方法，去扩大政治影响。二，扩大红军，不走由扩大地方赤卫队、地方红军到扩大主力红军的路线，而要走“招兵买马”“招降纳叛”的路线。三，不耐烦和群众在一块作艰苦的斗争，只希望跑到大城市去大吃大喝。凡此一切流寇思想的表现，极大地妨碍着红军去执行正确的任务，故肃清流寇思想，实为红军党内思想斗争的一个重要目标。应当认识，历史上黄巢〔2〕、李闯〔3〕式的流寇主义，已为今日的环境所不许可。

纠正的方法：

（一）加紧教育，批评不正确思想，肃清流寇主义。

（二）对现有红军基本队伍和新来的俘虏兵，加紧反流氓意识的教育。

（三）争取有斗争经验的工农积极分子加入红军队伍，改变红军的成份。

(四)从斗争的工农群众中创造出新的红军部队。

关于盲动主义残余

红军党内对盲动主义已经做了斗争，但尚不充分。因此，红军中还有盲动主义思想的残余存在着。其表现如：一，不顾主观和客观条件的盲干。二，城市政策执行得不充分，不坚决。三，军纪松懈，特别是打败仗时。四，还有某些部队有烧屋行为。五，枪毙逃兵的制度和肉刑制度，也是带着盲动主义性质的。盲动主义的社会来源是流氓无产者的思想和小资产阶级的思想的综合。

纠正的方法：

(一)从思想上肃清盲动主义。

(二)从制度和政策上纠正盲动的行为。

注 释

〔1〕一九二七年革命失败后的短期间，在共产党内曾经出现一种“左”倾盲动主义倾向，认为中国革命的性质是所谓“不断革命”，中国革命的形势是所谓“不断高涨”，因而不肯去组织有秩序的退却，错误地用命令主义的方法，企图依靠少数党员和少数群众在全国组织毫无胜利希望的许多的地方起义。这种盲动主义的行动曾经在一九二七年底流行过，到了一九二八年初渐渐地停止了下來。但有些党员也还存在着这种情绪。盲动主义就是冒险主义。

〔2〕黄巢是唐朝末年农民起义的领袖，曹州冤句（今平原省菏泽县）人。公元八七五年，即唐僖宗乾符二年，黄巢聚众响应王仙芝领导的起义。王仙芝被杀后，黄巢收集王的余部，号“冲天大将军”。黄巢带领的起义队伍

曾经两次出山东流动作战。第一次由山东到河南，转入安徽和湖北，由湖北回到山东。第二次又由山东到河南，转到江西，经浙东到福建及广东，转广西经湖南到湖北，再由湖北东进安徽浙江等地，然后渡淮入河南，克洛阳，攻破潼关，据有长安。黄巢入长安后建立齐国，称皇帝。后因内部分裂（大将朱温降唐），又被沙陀族酋长李克用的军队进攻，黄巢失长安，又入河南，由河南回到山东，终于失败自杀。黄巢的战争继续了十年，是中国历史上有名的农民战争之一。旧统治阶级的史书称：当时“民之困于重敛者争归之”。但他只是简单地进行流动战争，没有建立过比较稳固的根据地，所以被称为“流寇”。

〔3〕李闯即李自成，是明朝末年农民起义的领袖，陕西米脂人。公元一六二八年，即明思宗崇祯元年，陕西北部农民形成起义的潮流。李自成参加高迎祥的起义队伍，曾经由陕西入河南，到安徽，折回陕西。一六三六年高迎祥死，李自成被推为闯王。李自成在群众中的主要口号是“迎闯王，不纳粮”。他约束队伍的纪律，曾有“杀一人如杀我父、淫一妇如淫我母”的口号。因此，拥护他的人很多，成为当时农民起义的主流。但他也没有建立过比较稳固的根据地，总是东流西窜。他于被推为闯王后，率部入川，折回陕南，经湖北又入河南，旋占湖北襄阳，再经河南攻陕占西安，于一六四四年经山西攻入北京。不久为明将吴三桂勾引清兵联合进攻而失败。

选自《毛泽东选集》第1卷

毛 泽 东

反对自由主义

(一九三七年九月七日)

我们主张积极的思想斗争，因为它是达到党内和革命团体内的团结使之利于战斗的武器。每个共产党员和革命分子，应该拿起这个武器。

但是自由主义取消思想斗争，主张无原则的和平，结果是腐朽庸俗的作风发生，使党和革命团体的某些组织和某些个人在政治上腐化起来。

自由主义有各种表现。

因为是熟人、同乡、同学、知心朋友、亲爱者、老同事、老部下，明知不对，也不同他们作原则上的争论，任其下去，求得和平和亲热。或者轻描淡写地说一顿，不作彻底解决，保持一团和气。结果是有害于团体，也有害于个人。这是第一种。

不负责任的背后批评，不是积极地向组织建议。当面不说，背后乱说；开会不说，会后乱说。心目中没有集体生活的原则，只有自由放任。这是第二种。

事不关己，高高挂起；明知不对，少说为佳；明哲保

身^{〔1〕}，但求无过。这是第三种。

命令不服从，个人意见第一。只要组织照顾，不要组织纪律。这是第四种。

不是为了团结，为了进步，为了把事情弄好，向不正确的意见斗争和争论，而是个人攻击，闹意气，泄私愤，图报复。这是第五种。

听了不正确的议论也不争辩，甚至听了反革命分子的话也不报告，泰然处之，行若无事^{〔2〕}。这是第六种。

见群众不宣传，不鼓动，不演说，不调查，不询问，不关心其痛痒，漠然置之^{〔3〕}，忘记了自己是一个共产党员，把一个共产党员混同于一个普通的老百姓。这是第七种。

见损害群众利益的行为不愤恨，不劝告，不制止，不解释，听之任之。这是第八种。

办事不认真，无一定计划，无一定方向，敷衍了事，得过且过，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这是第九种。

自以为对革命有功，摆老资格，大事做不来，小事又不做，工作随便，学习松懈。这是第十种。

自己错了，也已经懂得，又不想改正，自己对自己采取自由主义。这是第十一种。

还可以举出一些。主要的有这十一种。

所有这些，都是自由主义的表现。

革命的集体组织中的自由主义是十分有害的。它是一种腐蚀剂，使团结涣散，关系松懈，工作消极，意见分

歧。它使革命队伍失掉严密的组织和纪律，政策不能贯彻到底，党的组织和党所领导的群众发生隔离。这是一种严重的恶劣倾向。

自由主义的来源，在于小资产阶级的自私自利性，以个人利益放在第一位，革命利益放在第二位，因此产生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的自由主义。

自由主义者以抽象的教条看待马克思主义的原则。他们赞成马克思主义，但是不准备实行之，或不准备完全实行之，不准备拿马克思主义代替自己的自由主义。这些人，马克思主义是有的，自由主义也是有的：说的是马克思主义，行的是自由主义；对人是马克思主义，对己是自由主义。两样货色齐备，各有各的用处。这是一部分人的思想方法。

自由主义是机会主义的一种表现，是和马克思主义根本冲突的。它是消极的东西，客观上起着援助敌人的作用，因此敌人是欢迎我们内部保存自由主义的。自由主义的性质如此，革命队伍中不应该保留它的地位。

我们要用马克思主义的积极精神，克服消极的自由主义。一个共产党员，应该是襟怀坦白⁽⁴⁾，忠实，积极，以革命利益为第一生命，以个人利益服从革命利益；无论何时何地，坚持正确的原则，同一切不正确的思想和行为作不疲倦的斗争，用以巩固党的集体生活，巩固党和群众的联系；关心党和群众比关心个人为重，关心他人比关心自己为重。这样才算得一个共产党员。

一切忠诚、坦白、积极、正直的共产党员团结起来，反对一部分人的自由主义的倾向，使他们改变到正确的方面来。这是思想战线的任务之一。

注 释

〔1〕明哲保身，是封建社会的一句格言，意思是深明事理的人应该保全自己。这里是指一种个人主义的待人处世态度，计较个人利害，回避原则斗争。

〔2〕泰然：毫不在意的样子。若：好象。泰然处之，行若无事：这里是对原则问题采取无所谓的态度，好象没有事情一样。

〔3〕漠然：冷淡、不关心。置之：放在一边。

〔4〕襟怀：胸怀。坦白：正直，诚实。

选自《毛泽东著作选读（乙种本）》

毛泽东

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

(一九三八年十月)

同志们！我们有一个光明的前途；我们必须战胜日本帝国主义，必须建设新中国，也一定能够达到这些目的。但是由现在到这个光明前途的中间，存在着一段艰难的路程。为着一个光明的中国而斗争的中国共产党和全国人民，必须有步骤地同日寇作斗争；而要打败它，只

-
- * 这是毛泽东同志在党的第六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上的报告。这次会议批准了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党中央政治局的路线，是一个很重要的会议。毛泽东同志在报告中提出“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这一个问题，便是为使全党同志明确地知道并认真地负起我们党领导抗日战争的重大历史责任。全会确定了坚持抗日统一战线的方针，同时指出了在统一战线中有团结又有斗争，“一切经过统一战线”的提法对于中国情况是不合适的，这样就批判了关于统一战线问题上的迁就主义的错误；毛泽东同志在结论中所说的“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问题”，就是关于这方面的问题。全会同时又确定了全党从事组织人民的抗日武装斗争的极端重要性，决定党的主要工作方面是战区和敌后，而批判了那种把战胜日寇的希望寄托于国民党军队以及把人民的命运寄托于国民党反动派统治下的合法运动等项错误思想；毛泽东同志在做结论时所说的“战争和战略问题”，就是关于这一方面的问题。

有经过长期的战争。关于这个战争的各方面问题，我们已经说得很多。抗战以来的经验，我们也总结了；当前的形势，我们也估计了；全民族的紧急任务，我们也提出了；用长期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支持长期的战争的理由和方法，我们也说明了；国际形势，我们也分析了。那末，还有什么问题呢？同志们，还有一个问题，这就是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处于何种地位的问题，这就是共产党员应该怎样认识自己、加强自己、团结自己，才能领导这次战争达到胜利而不致失败的问题。

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

国际主义者的共产党员，是否可以同时又是一个爱国主义者呢？我们认为不但是可以的，而且是应该的。爱国主义的具体内容，看在什么样的历史条件之下来决定。有日本侵略者和希特勒的“爱国主义”，有我们的爱国主义。对于日本侵略者和希特勒的所谓“爱国主义”，共产党员是必须坚决地反对的。日本共产党人和德国共产党人都是他们国家的战争的失败主义者。用一切方法使日本侵略者和希特勒的战争归于失败，就是日本人民和德国人民的利益；失败得越彻底，就越好。日本共产党人和德国共产党人都应该这样做，他们也正在这样做。这是因为日本侵略者和希特勒的战争，不但是损害世界人民的，也是损害其本国人民的。中国的情况则不同，中

国是被侵略的国家。因此，中国共产党人必须将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结合起来。我们是国际主义者，我们又是爱国主义者，我们的口号是为保卫祖国反对侵略者而战。对于我们，失败主义是罪恶，争取抗日胜利是责无旁贷的。因为只有为着保卫祖国而战才能打败侵略者，使民族得到解放。只有民族得到解放，才有使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得到解放的可能。中国胜利了，侵略中国的帝国主义者被打倒了，同时也就是帮助了外国的人民。因此，爱国主义就是国际主义在民族解放战争中的实施。为此理由，每一个共产党员必须发挥其全部的积极性，英勇坚决地走上民族解放战争的战场，拿枪口瞄准日本侵略者。为此理由，我们的党从九一八事变⁽¹⁾开始，就提出了用民族自卫战争反抗日本侵略者的号召；后来又提出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命令红军改编为抗日的国民革命军开赴前线作战，命令自己的党员站在抗日战争的最前线，为保卫祖国流最后一滴血。这些爱国主义的行动，都是正当的，都正是国际主义在中国的实现，一点也没有违背国际主义。只有政治上糊涂的人，或者别有用心的人，才会瞎说我们做得不对，瞎说我们抛弃了国际主义。

共产党员在民族战争中的模范作用

根据上述理由，共产党员应在民族战争中表现其高度的积极性；而这种积极性，应使之具体地表现于各方

面，即应在各方面起其先锋的模范的作用。我们的战争，是在困难环境之中进行的。广大人民群众的民族觉悟、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的不足，大多数民众的无组织，军力的不坚强，经济的落后，政治的不民主，腐败现象和悲观情绪的存在，统一战线内部的不团结、不巩固等等，形成了这种困难环境。因此，共产党员不能不自觉地担负起团结全国人民克服各种不良现象的重大的责任。在这里，共产党员的先锋作用和模范作用是十分重要的。共产党员在八路军和新四军中，应该成为英勇作战的模范，执行命令的模范，遵守纪律的模范，政治工作的模范和内部团结统一的模范。共产党员在和友党友军发生关系的时候，应该坚持团结抗日的立场，坚持统一战线的纲领，成为实行抗战任务的模范；应该言必信，行必果，不傲慢，诚心诚意地和友党友军商量问题，协同工作，成为统一战线中各党相互关系的模范。共产党员在政府工作中，应该是十分廉洁、不用私人、多做工作、少取报酬的模范。共产党员在民众运动中，应该是民众的朋友，而不是民众的上司，是诲人不倦的教师，而不是官僚主义的政客。共产党员无论何时何地都不应以个人利益放在第一位，而应以个人利益服从于民族的和人民群众的利益。因此，自私自利，消极怠工，贪污腐化，风头主义等等，是最可鄙的；而大公无私，积极努力，克己奉公，埋头苦干的精神，才是可尊敬的。共产党员应和党外一切先进分子协同一致，为着团结全国人民克服各种不良现象而努力。必须懂得，

共产党员不过是全民族中的一小部分，党外存在着广大的先进分子和积极分子，我们必须和他们协同工作。那种以为只有自己好、别人都不行的想法，是完全不对的。共产党员对于落后的人们的态度，不是轻视他们，看不起他们，而是亲近他们，团结他们，说服他们，鼓励他们前进。共产党员对于在工作中犯过错误的人们，除了不可救药者外，不是采取排斥态度，而是采取规劝态度，使之翻然改进，弃旧图新。共产党员应是实事求是的模范，又是具有远见卓识的模范。因为只有实事求是，才能完成确定的任务；只有远见卓识，才能不失前进的方向。因此，共产党员又应成为学习的模范，他们每天都是民众的教师，但又每天都是民众的学生。只有向民众学习，向环境学习，向友党友军学习，了解了他们，才能对于工作实事求是，对于前途有远见卓识。在长期战争和艰难环境中，只有共产党员协同友党友军和人民大众中的一切先进分子，高度地发挥其先锋的模范的作用，才能动员全民族一切生动力量，为克服困难、战胜敌人、建设新中国而奋斗。

团结全民族和反对民族中的奸细分子

为要克服困难，战胜敌人，建设新中国，只有巩固和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发动全民族中的一切生动力量，这是唯一无二的方针。但是我们的民族统一战线中已经存在着起破坏作用的奸细分子，这就是那些汉奸、托派、

亲日派分子。共产党员应该随时注意那些奸细分子，用真凭实据揭发他们的罪恶，劝告人民不要上他们的当。共产党员必须提高对于民族奸细分子的政治警觉性。共产党员必须明白，揭发和清除奸细，是和扩大和巩固民族统一战线不能分离的。只顾一方面，忘记另一方面，是完全错误的。

扩大共产党和防止奸细混入

为了克服困难，战胜敌人，建设新中国，共产党必须扩大自己的组织，向着真诚革命、信仰党的主义、拥护党的政策、并愿意服从纪律、努力工作的广大工人农民和青年积极分子开门，使党成为一个伟大的群众性的党。在这里，关门主义倾向是不能容许的。但是在同时，对于奸细混入的警觉性也决不可少。日本帝国主义的特务机关，时刻企图破坏我们的党，时刻企图利用暗藏的汉奸、托派、亲日派、腐化分子、投机分子，装扮积极面目，混入我们的党里来。对于这些分子的警惕和严防，一刻也不应该放松。不可因为怕奸细而把自己的党关起门来，大胆地发展党是我们已经确定了方针。但是在同时，又不可因为大胆发展而疏忽对于奸细分子和投机分子乘机侵入的警戒。只顾一方面，忘记另一方面，就会犯错误。“大胆发展而又不让一个坏分子侵入”，这才是正确的方针。

坚持统一战线和坚持党的独立性

坚持民族统一战线才能克服困难，战胜敌人，建设新中国，这是毫无疑问的。但是在同时，必须保持加入统一战线中的任何党派在思想上、政治上和组织上的独立性，不论是国民党也好，共产党也好，其他党派也好，都是这样。三民主义中的民权主义，在党派问题上说来，就是容许各党派互相联合，又容许各党派独立存在。如果只谈统一性，否认独立性，就是背弃民权主义，不但我们共产党不能同意，任何党派也是不能同意的。没有问题，统一战线中的独立性，只能是相对的，而不是绝对的；如果认为它是绝对的，就会破坏团结对敌的总方针。但是决不能抹杀这种相对的独立性，无论在思想上也好，在政治上也好，在组织上也好，各党必须有相对的独立性，即是说有相对的自由权。如果被人抹杀或自己抛弃这种相对的自由权，那就也会破坏团结对敌的总方针。这是每个共产党员，同时也是每个友党党员，应该明白的。

阶级斗争和民族斗争的关系也是这样。在抗日战争中，一切必须服从抗日的利益，这是确定的原则。因此，阶级斗争的利益必须服从于抗日战争的利益，而不能违抗抗日战争的利益。但是阶级和阶级斗争的存在是一个事实；有些人否认这种事实，否认阶级斗争的存在，这是错误的。企图否认阶级斗争存在的理论是完全错误的理

论。我们不是否认它，而是调节它。我们提倡的互助互让政策，不但适用于党派关系，也适用于阶级关系。为了团结抗日，应实行一种调节各阶级相互关系的恰当的政策，既不应使劳苦大众毫无政治上和生活上的保证，同时也应顾到富有者的利益，这样去适合团结对敌的要求。只顾一方面，不顾另一方面，都将不利于抗日。

照顾全局，照顾多数及 和同盟者一道工作

共产党员在领导群众同敌人作斗争的时候，必须有照顾全局，照顾多数及和同盟者一道工作的观点。共产党员必须懂得以局部需要服从全局需要这一个道理。如果某项意见在局部的情形看来是可行的，而在全局的情形看来是不可行的，就应以局部服从全局。反之也是一样，在局部的情形看来是不可行的，而在全局的情形看来是可行的，也应以局部服从全局。这就是照顾全局的观点。共产党员决不可脱离群众的多数，置多数人的情况于不顾，而率领少数先进队伍单独冒进；必须注意组织先进分子和广大群众之间的密切联系。这就是照顾多数的观点。在一切有愿意和我们合作的民主党派和民主人士存在的地方，共产党员必须采取和他们一道商量问题和一道工作的态度。那种独断专行，把同盟者置之不理的态度，是不对的。一个好的共产党员，必须善于照顾全局，

善于照顾多数，并善于和同盟者一道工作。我们过去在这些方面存在着很大的缺点，必须注意改进。

干部政策

中国共产党是在一个几万万人的大民族中领导伟大革命斗争的党，没有多数才德兼备的领导干部，是不能完成其历史任务的。十七年来，我们党已经培养了不少的领导人材，军事、政治、文化、党务、民运各方面，都有了我们的骨干，这是党的光荣，也是全民族的光荣。但是，现有的骨干还不足以支撑斗争的大厦，还须广大地培养人材。在中国人民的伟大的斗争中，已经涌出并正在继续涌出很多的积极分子，我们的责任，就在于组织他们，培养他们，爱护他们，并善于使用他们。政治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的因素。因此，有计划地培养大批的新干部，就是我们的战斗任务。

不但要关心党的干部，还要关心非党的干部。党外存在着很多的人材，共产党不能把他们置之度外。去掉孤傲习气，善于和非党干部共事，真心诚意地帮助他们，用热烈的同志的态度对待他们，把他们的积极性组织到抗日和建国的伟大事业中去，这是每一个共产党员的责任。

必须善于识别干部。不但要看干部的一时一事，而且要看干部的全部历史和全部工作，这是识别干部的主

要方法。

必须善于使用干部。领导者的责任，归结起来，主要地是出主意、用干部两件事。一切计划、决议、命令、指示等等，都属于“出主意”一类。使这一切主意之实行，必须团结干部，推动他们去做，属于“用干部”一类。在这个使用干部的问题上，我们民族历史中从来就有两个对立的路线：一个是“任人唯贤”的路线，一个是“任人唯亲”的路线。前者是正派的路线，后者是不正派的路线。共产党的干部政策，应是以能否坚决地执行党的路线，服从党的纪律，和群众有密切的联系，有独立的工作能力，积极肯干，不谋私利为标准，这就是“任人唯贤”的路线。过去张国焘⁽²⁾的干部政策与此相反，实行“任人唯亲”，拉拢私党，组织小派别，结果叛党而去，这是一个大教训。鉴于张国焘的和类似张国焘的历史教训，在干部政策问题上坚持正派的公道的作风，反对不正派的不公道的作风，借以巩固党的统一团结，这是中央和各级领导者的重要的责任。

必须善于爱护干部。爱护的办法是：第一，指导他们。这就是让他们放手工作，使他们敢于负责；同时，又适时地给以指示，使他们能在党的政治路线下发挥其创造性。第二，提高他们。这就是给以学习的机会，教育他们，使他们在理论上在工作能力上提高一步。第三，检查他们的工作，帮助他们总结经验，发扬成绩，纠正错误。有委托而无检查，及至犯了严重的错误，方才加以注意，不

是爱护干部的办法。第四，对于犯错误的干部，一般地应采取说服的方法，帮助他们改正错误。只有对犯了严重错误而又不接受指导的人们，才应当采取斗争的方法。在这里，耐心是必要的；轻易地给人们戴上“机会主义”的大帽子，轻易地采用“开展斗争”的方法，是不对的。第五，照顾他们的困难。干部有疾病、生活、家庭等项困难问题者，必须在可能限度内用心给以照顾。这些就是爱护干部的方法。

党的纪律

鉴于张国焘严重地破坏纪律的行为，必须重申党的纪律：（一）个人服从组织；（二）少数服从多数；（三）下级服从上级；（四）全党服从中央。谁破坏了这些纪律，谁就破坏了党的统一。经验证明：有些破坏纪律的人，是由于他们不懂得什么是党的纪律；有些明知故犯的人，例如张国焘，则利用许多党员的无知以售其奸。因此，必须对党员进行有关党的纪律的教育，即使一般党员能遵守纪律，又使一般党员能监督党的领袖人物也一起遵守纪律，避免再发生张国焘事件。为使党内关系走上正轨，除了上述四项最重要的纪律外，还须制定一种较详细的党内法规，以统一各级领导机关的行动。

党的民主

处在伟大斗争面前的中国共产党，要求整个党的领导机关，全党的党员和干部，高度地发挥其积极性，才能取得胜利。所谓发挥积极性，必须具体地表现在领导机关、干部和党员的创造能力，负责精神，工作的活跃，敢于和善于提出问题、发表意见、批评缺点，以及对于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从爱护观点出发的监督作用。没有这些，所谓积极性就是空的。而这些积极性的发挥，有赖于党内生活的民主化。党内缺乏民主生活，发挥积极性的目的就不能达到。大批能干人材的创造，只有在民主生活中才有可能。由于我们的国家是一个小生产的家长制占优势的国家，又在全国范围内至今还没有民主生活，这种情况反映到我们党内，就产生了民主生活不足的现象。这种现象，妨碍着全党积极性的充分发挥。同时，也就影响到统一战线中、民众运动中民主生活的不足。为此缘故，必须在党内施行有关民主生活的教育，使党员懂得什么是民主生活，什么是民主制和集中制的关系，并如何实行民主集中制。这样才能做到：一方面，确实扩大党内的民主生活；又一方面，不至于走到极端民主化，走到破坏纪律的自由放任主义。

在我们军队中的党组织，也须增加必要的民主生活，以便提高党员的积极性，增强军队的战斗力。但是军队

党组织的民主应少于地方党组织的民主。无论在军队或在地方，党内民主都应是着巩固纪律和增强战斗力，而不是削弱这种纪律和战斗力。

扩大党内民主，应看作是巩固党和发展党的必要的步骤，是使党在伟大斗争中生动活跃，胜任愉快，生长新的力量，突破战争难关的一个重要的武器。

我们的党已经从两条战线斗争中 巩固和壮大起来

十七年来，我们的党，一般地已经学会了使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斗争的武器，从两方面反对党内的错误思想，一方面反对右倾机会主义，又一方面反对“左”倾机会主义。

在党的六届五中全会以前^[3]，我们党反对了陈独秀^[4]的右倾机会主义和李立三同志的“左”倾机会主义^[5]。由于这两次党内斗争的胜利，使党获得了伟大的进步。五中全会以后，又有过两次有历史意义的党内斗争，这就是在遵义会议^[6]上的斗争和开除张国焘出党的斗争。

遵义会议纠正了在第五次反“围剿”斗争中所犯的“左”倾机会主义性质的严重的原则错误，团结了党和红军，使得党中央和红军主力胜利地完成了长征，转到了抗日的前进阵地，执行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新政策。由

于巴西会议⁽⁷⁾和延安会议⁽⁸⁾（反对张国焘路线的斗争是从巴西会议开始而在延安会议完成的）反对了张国焘的右倾机会主义，使得全部红军会合一起，全党更加团结起来，进行了英勇的抗日斗争。这两种机会主义错误都是在国内革命战争中产生的，它们的特点是在战争中的错误。

这两次党内斗争所得的教训在什么地方呢？在于：（一）由于不认识中国革命战争中的特点而产生的、表现于第五次反“围剿”斗争中的严重的原则错误，包含着不顾主客观条件的“左”的急性病倾向，这种倾向极端地不利于革命战争，同时也不利于任何革命运动。（二）张国焘的机会主义，则是革命战争中的右倾机会主义，其内容是他的退却路线、军阀主义和反党行为的综合。只有克服了它，才使得本质很好而且作了长期英勇斗争的红军第四方面军的广大的干部和党员，从张国焘的机会主义统制之下获得解放，转到中央的正确路线方面来。（三）十年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伟大的组织工作，不论是军事建设工作也好，政府工作也好，民众工作也好，党的建设工作也好，是有大的成绩的，没有这种组织工作和前线的英勇战斗相配合，要支持当时的残酷的反对蒋介石的斗争是不可能的。然而在后一个时期内，党的干部政策和组织政策方面，是犯了严重的原则性的错误的，这表现在宗派倾向、惩办主义和思想斗争中的过火政策。这是过去立三路线的残余未能肃清的结果，也是当时政治

上的原则错误的结果。这些错误，也因遵义会议得到了纠正，使党转到了正确的干部政策和正确的组织原则方面来了。至于张国焘的组织路线，则是完全离开了共产党的一切原则，破坏了党的纪律，从小组织活动一直发展到反党反中央反国际的行为。中央对于张国焘的罪恶的路线错误和反党行为，曾经尽了一切可能的努力去克服它，并企图挽救张国焘本人。但是到了张国焘不但坚持地不肯改正他的错误，采取了两面派的行为，而且在后来实行叛党，投入国民党的怀抱的时候，党就不得不坚决地开除他的党籍。这一处分，不但获得了全党的拥护，而且获得了一切忠实于民族解放事业的人们的拥护。共产国际也批准了这一处分，并指出：张国焘是一个逃兵和叛徒。

以上这些教训和成功，给了我们今后团结全党，巩固思想上、政治上和组织上的一致，胜利地进行抗日战争的必要的前提。我们的党已经从两条战线斗争中巩固和壮大起来了。

当前的两条战线斗争

在今后的抗日形势中，从政治上反对右的悲观主义，将是头等重要的；但是在同时，反对“左”的急性病，也仍然要注意。在统一战线问题上，在党的组织问题上和在民众的组织问题上，则须继续反对“左”的关门主义倾向，

以便实现和各抗日党派的合作，发展共产党和发展民众运动；但是在同时，无条件的合作，无条件的发展，这种右倾机会主义的倾向也要注意反对，否则也就会妨碍合作，妨碍发展，而变为投降主义的合作和无原则的发展了。

两条战线的思想斗争必须切合于具体对象的情况，决不应主观地看问题，决不应使过去那种“乱戴帽子”的坏习惯继续存在。

在反倾向的斗争中，反对两面派的行为，是值得严重地注意的。因为两面派行为的最大的危险性，在于它可能发展到小组织行动；张国焘的历史就是证据。阳奉阴违，口是心非，当面说得好听，背后又在捣鬼，这就是两面派行为的表现。必须提高干部和党员对于两面派行为的注意力，才能巩固党的纪律。

学 习

一般地说，一切有相当研究能力的共产党员，都要研究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理论，都要研究我们民族的历史，都要研究当前运动的情况和趋势；并经过他们去教育那些文化水准较低的党员。特殊地说，干部应当着重地研究这些，中央委员和高级干部尤其应当加紧研究。指导一个伟大的革命运动的政党，如果没有革命理论，没有历史知识，没有对于实际运动的深刻的了解，要取得胜利是不可能的。

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理论，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理论。不应当把他们的理论当作教条看待，而应当看作行动的指南。不应当只是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词句，而应当把它当成革命的科学来学习。不但应当了解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他们研究广泛的真实生活和革命经验所得出的关于一般规律的结论，而且应当学习他们观察问题和解决问题的立场和方法。我们党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修养，现在已较过去有了一些进步，但是还很不普遍，很不深入。我们的任务，是领导一个几万万人口的大民族，进行空前的伟大的斗争。所以，普遍地深入地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的任务，对于我们，是一个亟待解决并须着重地致力才能解决的大问题。我希望从我们这次中央全会之后，来一个全党的学习竞赛，看谁真正地学到了一点东西，看谁学的更多一点，更好一点。在担负主要领导责任观点上说，如果我们党有一百个至二百个系统地而不是零碎地、实际地而不是空洞地学会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同志，就会大大地提高我们党的战斗力量，并加速我们战胜日本帝国主义的工作。

学习我们的历史遗产，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给以批判的总结，是我们学习的另一任务。我们这个民族有数千年的历史，有它的特点，有它的许多珍贵品。对于这些，我们还是小学生。今天的中国是历史的中国的一个发展，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者，我们不应割断历史。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

份珍贵的遗产。这对于指导当前的伟大的运动，是有重要的帮助的。共产党员是国际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但是马克思主义必须和我国的具体特点相结合并通过一定的民族形式才能实现。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伟大力量，就在于它是和各个国家具体的革命实践相联系的。对于中国共产党说来，就是要学会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应用于中国的具体的环境。成为伟大中华民族的一部分而和这个民族血肉相联的共产党员，离开中国特点来谈马克思主义，只是抽象的空洞的马克思主义。因此，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必须有的中国的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成为全党亟待了解并亟须解决的问题。洋八股必须废止，空洞抽象的调头必须少唱，教条主义必须休息，而代之以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把国际主义的内容和民族形式分离起来，是一点也不懂国际主义的人们的做法，我们则要把二者紧密地结合起来。在这个问题上，我们队伍中存在着的一些严重的错误，是应该认真地克服的。

当前的运动的特点是什么？它有什么规律性？如何指导这个运动？这些都是实际的问题。直到今天，我们还没有懂得日本帝国主义的全部，也还没有懂得中国的全部。运动在发展中，又有新的东西在前头，新东西是层出不穷的。研究这个运动的全面及其发展，是我们要时刻注意的大课题。如果有人拒绝对于这些作认真的过细

的研究，那他就不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

学习的敌人是自己的满足，要认真学习一点东西，必须从不自满开始。对自己，“学而不厌”，对人家，“诲人不倦”，我们应取这种态度。

团结和胜利

中国共产党内部的团结，是团结全国人民争取抗日胜利和建设新中国的最基本的条件。经过了十七年锻炼的中国共产党，已经学到了如何团结自己的许多方法，已经老练得多了。这样，我们就能在全国人民中形成一个坚强的核心，争取抗日的胜利和建设一个新中国。同志们，只要我们能团结，这个目的就一定能够达到。

注 释

〔1〕一九三一年九月十八日，日本驻在中国东北境内的所谓“关东军”进攻沈阳。驻沈阳和东北其他地方的中国军队（东北军），执行蒋介石的“绝对不抵抗”的命令，使日军迅速地占领了辽宁、吉林、黑龙江等省。中国人民习惯上称日本帝国主义的这次侵略行动为“九一八事变”。

〔2〕张国焘，中国革命的叛徒。早年投机革命，参加中国共产党。他在党内错误极多，造成了极大的罪恶。其最著者为一九三五年反对红军北上，主张红军向四川、西康（原来是一个省，一九五五年撤消）向少数民族区域退却的失败主义和取消主义，并且进行公开的反党反中央的背叛活动，自立伪中央，破坏党和红军的统一，使红军第四方面军蒙受了重大的损失。红军第四方面军及其广大干部由于毛泽东同志和党中央的耐心教育，迅速地回到了党中央的正确领导之下，并在后来的斗争中起了光荣的作用；但

张国焘本人则终于不可救药，于一九三八年春季，只身逃出陕甘宁边区，并投入了国民党特务集团。

〔3〕指从一九二七年八月党的第五届中央委员会的政治局紧急会议，到一九三四年一月党的第六届中央委员会的第五次全体会议这一段时间。

〔4〕陈独秀原为北京大学教授，因编辑《新青年》杂志出名。陈独秀是中国共产党的创建人之一，由于他在五四运动时代的声名以及党在初创时期的幼稚，当了党的总书记。在一九二四年至一九二七年革命的最后一个时期，党内以陈独秀为代表的右倾思想，形成了投降主义的路线。当时的“投降主义分子，自愿地放弃对于农民群众、城市小资产阶级和中等资产阶级的领导权，尤其是放弃对于武装力量的领导权，使那次革命遭到了失败”（《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载《毛泽东选集》第四卷）。一九二七年革命失败后，陈独秀及其他一小部分投降主义者，对于革命前途悲观失望，变成了取消主义者，采取了托洛茨基主义的反动立场，并和托洛茨基分子相结合，成立了反党的小组织，因而在一九二九年十一月被驱逐出党。陈独秀死于一九四二年。

〔5〕李立三同志的“左”倾机会主义，是指一九三〇年六月以后约四个月时间内以当时中国共产党中央主要领导者李立三同志为代表的“左”倾机会主义路线，通称为“立三路线”。立三路线的特点，就是违反党的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方针，否认革命需要准备群众的力量和革命发展的不平衡，认为毛泽东同志在长时期中用主要注意力创造农村根据地，以农村包围城市，以根据地来推动全国革命高潮的思想，是所谓“极端错误的”“农民意识的地方观念与保守观念”，而主张全国各地都要准备马上起义。李立三同志在这种错误路线下定出了立即组织全国各中心城市武装起义的冒险计划。立三路线同时不承认世界革命的不平衡性，认为中国革命的总爆发必将引起世界革命的总爆发，而中国革命又必须在世界革命的总爆发中才能成功；也不承认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长期性，认为一省数省首先胜利的开始即是实行社会主义转变的开始，并因此规定了若干不适合时宜的“左”倾冒险政策。毛泽东同志反对这一个错误的路线，全党广大的干部和党员也要求纠正这一个路线。李立三同志本人，在一九三〇年九月党的六届三中全会上承认了当时被指出的错误，接着就离开了中央的领导地位。因为立三同志在长时期中改正了自己的错误观点，所以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又选他做中央委员。

〔6〕这次会议是一九三五年一月在贵州省的遵义城召开的。会议集中

全力纠正了当时具有决定意义的军事上和组织上的错误，结束了机会主义路线在党中央的统治，确立了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党中央的新的领导，是中国共产党内最有历史意义的转变。

〔7〕巴西会议，是一九三五年八月在巴西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巴西是四川省西北和甘肃省东南交界处的一个地方，该地位于四川松潘县城的西北。这时，张国焘率领一部分红军和中央分裂，不服从中央的命令，并企图危害中央。中央在这次会议上决定脱离危险区域，并率领服从命令的红军向陕北前进。张国焘则率领被其欺骗的红军南下天全、芦山、大小金川及阿坝区域，另立“中央”，揭出叛党旗帜。

〔8〕延安会议，是一九三七年四月在延安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的扩大会议。这时以前，张国焘所率红军的广大的干部和战士已经认识了张国焘的欺骗，北向陕甘边区进发，但一部在中途又在错误的领导下西进甘州、凉州、肃州区域，被敌人消灭大半，剩下一小部到达新疆，后来也回到陕甘边区；另一部则早已到达了陕甘边区，与中央红军会合。张国焘本人也到了陕北，参加了这次延安会议。这个会议对于张国焘的机会主义和叛党行为，作了系统的总结。张国焘表面上表示服从，实际上准备最后叛党。

选自《毛泽东著作选读(甲种本)》

毛 泽 东

《共产党人》发刊词

(一九三九年十月四日)

中央很早就计划出版一个党内的刊物，现在算是实现了。为了建设一个全国范围的、广大群众性的、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完全巩固的布尔什维克化的中国共产党，这样一个刊物是必要的。在当前的时机中，这种必要性更加明显。当前时机中的特点，一方面，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的投降危险、分裂危险和倒退危险日益发展着；又一方面，是我们党已经走出了狭隘的圈子，变成了全国性的大党。而党的任务是动员群众克服投降危险、分裂危险和倒退危险，并准备对付可能的突然事变，使党和革命不在可能的突然事变中，遭受出乎意料的损失。在这种时机，这样一个党内刊物的出版，实在是十分必要的了。

这个党内刊物定名为《共产党人》。它的任务是什么呢？它将写些什么东西呢？它和别的党报有些什么不同呢？

它的任务就是：帮助建设一个全国范围的、广大群众性的、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完全巩固的布尔什维克化的

中国共产党。为了中国革命的胜利，迫切地需要建设这样一个党，建设这样一个党的主观客观条件也已经大体具备，这件伟大的工程也正在进行之中。帮助进行这件伟大的工程，不是一般党报所能胜任的，必须有专门的党报，这就是《共产党人》出版的原因。

在某种程度上说来，我们的党已经是一个全国性的党，也已经是一个群众性的党；而且就其领导骨干说来，就其党员的某些成份说来，就其总路线说来，就其革命工作说来，也已经是一个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都巩固的和布尔什维克化的党。

那末，现在提出新的任务的理由何在呢？

理由就在：我们现在有大批的新党员所形成的很多的新组织，这些新组织还不能说是广大群众性的，还不是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都巩固的，还不是布尔什维克化的。同时，对于老党员，也发生了提高水平的问题，对于老组织，也发生了在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进一步巩固和进一步布尔什维克化的问题。党所处的环境，党所负的任务，现在和过去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有很大的不同，现在的环境是复杂得多，现在的任务是艰巨得多了。

现在是民族统一战线的时期，我们同资产阶级建立了统一战线；现在是抗日战争的时期，我们党的武装在前线上配合友军同敌人进行残酷的战争；现在是我们党发展成为全国性的大党的时期，党已经不是从前的样子了。如果把这些情况联系起来看，就懂得我们提出“建设一个

全国范围的、广大群众性的、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完全巩固的布尔什维克化的中国共产党”，是怎样一个光荣而又严重的任务了。

我们现在要建设这样一个党，究竟应该怎样进行呢？解决这个问题，是同我们党的历史，是同我们党的十八年斗争史，不能分离的。

我们党的历史，从一九二一年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那个时候起，到现在，已经整整十八年了。十八年中，党经历了许多伟大的斗争。党员、党的干部、党的组织，在这些伟大斗争中，锻炼了自己。他们经历过伟大的革命胜利，也经历过严重的革命失败。同资产阶级建立过民族统一战线，又由于这种统一战线的破裂，同大资产阶级及其同盟者进行过严重的武装斗争。最近三年，则又处于同资产阶级建立民族统一战线的时期中。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的发展道路，是在这样同中国资产阶级的复杂关联中走过的。这是一个历史的特点，殖民地半殖民地革命过程中的特点，而为任何资本主义国家的革命史中所没有的。再则，由于中国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发展不平衡的国家，半封建经济占优势而又土地广大的国家；这就不但规定了中国现阶段革命的性质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性质，革命的主要对象是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基本的革命的动力是无产阶级、农民阶级和城市小资产阶级，而在一定的时期中，一定的程度上，还有民族资产阶级的参加；并且规定了中国

革命斗争的主要形式是武装斗争。我们党的历史，可以说就是武装斗争的历史。斯大林同志说过：“在中国，是武装的革命反对武装的反革命。这是中国革命的特点之一，也是中国革命的优点之一。”^{〔1〕}这是说得非常之对的。这一特点，这一半殖民地的中国的特点，也是各个资本主义国家的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史中所没有的，或是同那些国家不相同的。这样：（一）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建立或被迫分裂革命的民族统一战线，（二）主要的革命形式是武装斗争，——就成了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过程中的两个基本特点。这里，我们没有把党同农民阶级和党同城市小资产阶级的关系作为基本特点，这是因为：第一，这种关系，世界各国的共产党原则上都是一样的；第二，在中国，只要一提到武装斗争，实质上即是农民战争，党同农民战争的密切关系即是党同农民的关系。

由于这两个基本特点，恰是由于这些基本特点，我们党的建设过程，我们党的布尔什维克化的过程，就处在特殊的情况中。党的失败和胜利，党的后退和前进，党的缩小和扩大，党的发展和巩固，都不能不联系于党同资产阶级的关系和党同武装斗争的关系。当我们党的政治路线是正确地处理同资产阶级建立统一战线或被迫着分裂统一战线的问题时，我们党的发展、巩固和布尔什维克化就前进一步；而如果是不正确地处理同资产阶级的关系时，我们党的发展、巩固和布尔什维克化就会要后退一步。同样，当我们党正确地处理革命武装斗争问题时，我们党

的发展、巩固和布尔什维克化就前进一步；而如果是不能正确地处理这个问题时，那末，我们党的发展、巩固和布尔什维克化也就会要后退一步。十八年来，党的建设过程，党的布尔什维克化的过程，是这样同党的政治路线密切地联系着，是这样同党对于统一战线问题、武装斗争问题之正确处理或不正确处理密切地联系着的。这一论断，很明显地，已经被十八年党的历史所证明了。倒转来说，党更加布尔什维克化，党就能、党也才能更正确地处理党的政治路线，更正确地处理关于统一战线问题和武装斗争问题。这一论断，也是很明显地被十八年来的党的历史所证明了。

所以，统一战线问题，武装斗争问题，党的建设问题，是我们党在中国革命中的三个基本问题。正确地理解了这三个问题及其相互关系，就等于正确地领导了全部中国革命。而在十八年党的历史中，凭借我们丰富的经验，失败和成功、后退和前进、缩小和发展的深刻的和丰富的经验，我们已经能够对这三个问题做出正确的结论来了。就是说，我们已经能够正确地处理统一战线问题，又正确地处理武装斗争问题，又正确地处理党的建设问题。也就是说，十八年的经验，已使我们懂得：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党的建设，是中国共产党在中国革命中战胜敌人的三个法宝，三个主要的法宝。这是中国共产党的伟大成绩，也是中国革命的伟大成绩。

在这里，让我们对于这三个法宝，三个问题，分别地

大略地说一下吧。

十八年中，中国无产阶级同中国资产阶级和其他阶级的统一战线，是在三种不同的情况、三个不同的阶段中间发展着的，这就是一九二四年至一九二七年第一次大革命的阶段，一九二七年至一九三七年土地革命战争的阶段和今天的抗日战争的阶段。三个阶段的历史，证明了下列的规律：（一）由于中国最大的压迫是民族压迫，在一定的时期中，一定的程度上，中国民族资产阶级是能够参加反帝国主义和反封建军阀的斗争的。因此，无产阶级在这种一定的时期内，应该同民族资产阶级建立统一战线，并尽可能地保持之。（二）又由于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在经济上、政治上的软弱性，在另一种历史环境下，它就会动摇变节。因此，中国革命统一战线的内容不能始终一致，而是要发生变化的。在某一时期有民族资产阶级参加在内，而在另一时期则民族资产阶级并不参加在内。（三）中国的带买办性的大资产阶级，是直接为帝国主义服务并为它们所豢养的阶级。因此，中国的带买办性的大资产阶级历来都是革命的对象。但是，由于中国的带买办性的大资产阶级的各个集团是以不同的帝国主义为背景的，在各个帝国主义间的矛盾尖锐化的时候，在革命的锋芒主要地是反对某一个帝国主义的时候，属于别的帝国主义系统的大资产阶级集团也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和一定时期内参加反对某一个帝国主义的斗争。在这种一定的时期内，中国无产阶级为了削弱敌人和加强自

己的后备力量，可以同这样的大资产阶级集团建立可能的统一战线，并在有利于革命的一定条件下尽可能地保持之。（四）在买办性的大资产阶级参加统一战线并和无产阶级一道向共同敌人进行斗争的时候，它仍然是很反动的，它坚决地反对无产阶级及其政党在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的发展，而要加以限制，而要采取欺骗、诱惑、“溶解”和打击等等破坏政策，并以这些政策作为它投降敌人和分裂统一战线的准备。（五）无产阶级的坚固的同盟者是农民。（六）城市小资产阶级也是可靠的同盟者。这些规律的正确性，不但在第一次大革命时期和土地革命时期证明了，而且在目前的抗日战争中也在证明着。因此，无产阶级的政党在同资产阶级（尤其是大资产阶级）组织统一战线的问题上，必须实行坚决的、严肃的两条战线斗争。一方面，要反对忽视资产阶级在一定时期中一定程度上参加革命斗争的可能性的错误。这种错误，把中国的资产阶级和资本主义国家的资产阶级看做一样，因而忽视同资产阶级建立统一战线并尽可能保持这个统一战线的政策，这就是“左”倾关门主义。另一方面，则要反对把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纲领、政策、思想、实践等等看做一样的东西，忽视它们之间的原则差别的错误。这种错误，忽视资产阶级（尤其是大资产阶级）不但在极力影响小资产阶级和农民，而且还在极力影响无产阶级和共产党，力求消灭无产阶级和共产党在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的独立性，力求把无产阶级和共产党变成资产阶

级及其政党的尾巴，力求使革命果实归于资产阶级的一群一党的事实；忽视资产阶级（尤其是大资产阶级）一到革命同他们一群一党的私利相冲突时，他们就实行叛变革命的事实。如果忽视了这一方面，这就是右倾机会主义。过去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的特点，就是引导无产阶级适合资产阶级一群一党的私利，这也就是第一次大革命失败的主观原因。中国资产阶级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中的这种二重性，对于中国共产党的政治路线和党的建设的影响是非常之大的，不了解中国资产阶级的这种二重性，就不能了解中国共产党的政治路线和党的建设。中国共产党的政治路线的重要一部分，就是同资产阶级联合又同它斗争的政治路线。中国共产党的党的建设的重要一部分，就是在同资产阶级联合又同它斗争的中间发展起来和锻炼出来的。这里所谓联合，就是同资产阶级的统一战线。所谓斗争，在同资产阶级联合时，就是在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的“和平”的“不流血”的斗争；而在被迫着同资产阶级分裂时，就转变为武装斗争。如果我们党不知道在一定时期中同资产阶级联合，党就不能前进，革命就不能发展；如果我们党不知道在联合资产阶级时又同资产阶级进行坚决的、严肃的“和平”斗争，党在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就会瓦解，革命就会失败；又如果我们党在被迫着同资产阶级分裂时不同资产阶级进行坚决的、严肃的武装斗争，同样党也就会瓦解，革命也就会失败。所有这些，都是在过去十八年的历史中证明了的。

中国共产党的武装斗争，就是在无产阶级领导之下的农民战争。它的历史，也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参加北伐战争。这时，我们党虽已开始懂得武装斗争的重要性，但还没有彻底了解其重要性，还没有了解武装斗争是中国革命的主要斗争形式。第二阶段，是土地革命战争。这时，我们党已经建立了独立的武装队伍，已经学会了独立的战争艺术，已经建立了人民政权和根据地。我们党已经能够把武装斗争这个主要斗争形式同其他许多的必要的斗争形式直接或间接地配合起来，就是说，把武装斗争同工人的斗争，同农民的斗争（这是主要的），同青年的、妇女的、一切人民的斗争，同政权的斗争，同经济战线上的斗争，锄奸战线上的斗争，思想战线上的斗争，等等斗争形式，在全国范围内或者直接地或者间接地配合起来。而这种武装斗争，就是在无产阶级领导之下的农民土地革命斗争。第三个阶段，就是现在的抗日战争阶段。在这个阶段中，我们能够运用过去第一阶段中尤其是第二阶段中的武装斗争的经验，能够运用武装斗争形式和其他各种必要的斗争形式互相配合的经验。这种武装斗争的总概念，在目前就是游击战争^{〔2〕}。游击战争是什么呢？它就是在落后的国家中，在半殖民地的大国中，在长时期内，人民武装队伍为了战胜武装的敌人、创造自己的阵地所必须依靠的因而也是最好的斗争形式。到目前为止，我们党的政治路线和党的建设，是密切地联系于这一斗争形式的。离开了武装斗争，离开了

游击战争，就不能了解我们的政治路线，也就不能了解我们的党的建设。我们的政治路线的重要一部分就是武装斗争。十八年来，我们党是逐步学会了并坚持了武装斗争。我们懂得，在中国，离开了武装斗争，就没有无产阶级的地位，就没有人民的地位，就没有共产党的地位，就没有革命的胜利。十八年来，我们党的发展、巩固和布尔什维克化，是在革命战争中进行的，没有武装斗争，就不会有今天的共产党。这个拿血换来的经验，全党同志都不要忘记。

党的建设的过程，党的发展、巩固和布尔什维克化的过程，也同样是三个阶段的特点的。第一阶段是党的幼年时期。在这个阶段的初期和中期，党的路线是正确的，党员群众和党的干部的革命积极性是非常之高的，因此获得了第一次大革命的胜利。然而这时的党终究还是幼年的党，是在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和党的建设三个基本问题上都没有经验的党，是对于中国的历史状况和社会状况、中国革命的特点、中国革命的规律都懂得不多的党，是对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中国革命的实践还没有完整的、统一的了解的党。因此，党的领导机关中占统治地位的成份，在这一阶段的末期，在这一阶段的紧要关头中，没有能够领导全党巩固革命的胜利，受了资产阶级的欺骗，而使革命遭到失败。在这一阶段中，党的组织是发展了，但是没有巩固，没有能够使党员、党的干部在思想上、政治上坚定起来。新党员非常之多，但是没有给

予必要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教育。工作经验也不少，但是不能够很好地总结起来。党内混入了大批的投机分子，但是没有清洗出去。党处于敌人和同盟者的阴谋诡计的包围中，但是没有警觉性。党内涌出了很多的活动分子，但是没有来得及造成党的中坚骨干。党的手里有了一批革命武装，但是不能掌握住。所有这些情形，都是由于没有经验，缺乏深刻的革命认识，还不善于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中国革命的实践相结合。这就是党的建设的第一阶段。第二阶段，即土地革命战争的阶段。由于有了第一阶段的经验，由于对于中国的历史状况和社会状况、中国革命的特点、中国革命的规律的进一步的了解，由于我们的干部更多地领会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更多地学会了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中国革命的实践相结合，我们党就能够进行了胜利的十年土地革命斗争。资产阶级虽然叛变了，但是党能够紧紧地依靠着农民。党的组织不但重新发展了，而且得到了巩固。敌人虽然天天在暗害我们的党，但是党驱逐了暗害分子。大批干部重新在党内涌出，而且变成了党的中心骨干。党开辟了人民政权的道路，因此也就学会了治国安民的艺术。党创造了坚强的武装部队，因此也就学会了战争的艺术。所有这些，都是党的重大进步和重大成功。然而，一部分同志曾在这个伟大斗争中跌下了或跌下过机会主义的泥坑，这仍然是因为他们不去虚心领会过去的经验，对于中国的历史状况和社会状况、中国革命的特点、中国

革命的规律不了解，对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中国革命的实践没有统一的理解而来的。因此，党的领导机关的一部分人，没有能够在这一整个阶段中掌握住正确的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党和革命在一个时期遭受过李立三同志“左”倾机会主义的危害，而在另一个时期，又遭受过革命战争中的“左”倾机会主义和白区工作中的“左”倾机会主义^{〔3〕}的危害。只在到了遵义会议（一九三五年一月在贵州遵义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以后，党才彻底地走上了布尔什维克化的道路，奠定了后来战胜张国焘右倾机会主义和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基础。这就是党的发展过程的第二个阶段。党的发展过程的第三个阶段，就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阶段。这个阶段，已经过去了三年，这三年的斗争，是有非常伟大的意义的。党凭借着过去两个革命阶段中的经验，凭借着党的组织力量和武装力量，凭借着党在全国人民中间的很高的政治信仰，凭借着党对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中国革命的实践之更加深入的更加统一的理解，就不但建立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且进行了伟大的抗日战争。党的组织已经从狭小的圈子中走了出来，变成了全国性的大党。党的武装力量，也在同日寇的斗争中重新壮大起来和进一步坚强起来了。党在全国人民中的影响，更加扩大了。这些都是伟大的成功。然而，大批的新党员还没有受到教育，很多的新组织还没有巩固，他们同老党员和老组织之间，还存在着很大的区别。大批的新党员、新干部还没有

足够的革命经验。他们对于中国的历史状况和社会状况、中国革命的特点、中国革命的规律还不懂得或懂得不多。他们对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革命实践的完全的统一的理解，还相距很远。在过去发展党的组织的工作中，虽然中央着重地提出了“大胆发展而又不让一个坏分子侵入”的口号，但实际上是混进了许多投机分子和敌人的暗害分子。统一战线虽然建立了并坚持了三年之久，可是资产阶级特别是大资产阶级却时时刻刻在企图破坏我们的党，大资产阶级投降派和顽固派所指挥的严重的磨擦斗争在全国进行着，反共之声喧嚣不已。大资产阶级投降派和顽固派，并想以此作为投降日本帝国主义、分裂统一战线和拉了中国向后倒退的准备。大资产阶级在思想上企图“溶解”共产主义，在政治上、组织上企图取消共产党，取消边区，取消党的武装力量。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的任务，无疑是克服这种投降、分裂和倒退的危险，尽可能地保持民族统一战线，保持国共合作，而争取继续抗日、继续团结和继续进步；同时，准备对付可能的突然事变，使党和革命不在可能的突然事变中遭受意外的损失。为达此目的，就要巩固党的组织，巩固党的武装力量，并动员全国人民，进行反投降、反分裂、反倒退的坚决的斗争。这种任务的完成，依靠全党的努力，依靠全体党员、党的干部、党的各地各级组织实行不屈不挠再接再厉的斗争。我们相信，有了十八年经验的中国共产党，在它的有经验的老党员、老干部和带着新鲜血液富有

朝气的新党员、新干部相互协力的情况下，在它的经历过风浪的布尔什维克化的中央和地方组织相互协力的情况下，在它的坚强的武装力量和进步的人民群众相互协力的情况下，是可能达到这些目的的。

这就是我们党在十八个年头中的主要的经历和主要的问题。

十八年的经验告诉我们，统一战线和武装斗争，是战胜敌人的两个基本武器。统一战线，是实行武装斗争的统一战线。而党的组织，则是掌握统一战线和武装斗争这两个武器以实行对敌冲锋陷阵的英勇战士。这就是三者的相互关系。

我们今天要怎样建设我们的党？要怎样才能建设一个“全国范围的、广大群众性的、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完全巩固的布尔什维克化的中国共产党”？这个问题，考察一下我们党的历史，就会懂得；把党的建设问题同统一战线问题、同武装斗争问题联系起来看一下，把党的建设问题同联合资产阶级又同它作斗争的问题、同八路军新四军坚持抗日游击战争和建立抗日根据地的问题联系起来看一下，就会懂得。

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中国革命的实践之统一的理解，集中十八年的经验和当前的新鲜经验传达到全党，使党铁一样地巩固起来，而避免历史上曾经犯过的错误——这就是我们的任务。

注 释

〔1〕引自斯大林《论中国革命的前途》（一九二六年十一月三十日）。

〔2〕毛泽东同志在这里说中国革命的武装斗争的总概念，就是游击战争，是总结了从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至抗日战争初期的中国革命战争的经验。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长时间内，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武装斗争都是游击战争。这个时期的后一阶段，随着红军力量的成长，游击战曾经转变为带游击性的运动战（这种运动战，按照毛泽东同志的规定，是提高了的游击战争）。但在抗日战争期间，根据敌情的变化，这种带游击性的运动战又转变为游击战争。在抗日战争的初期，党内犯右倾机会主义错误的同志轻视党所领导的游击战争，而把自己的希望寄托于国民党军队的作战。毛泽东同志曾在《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论持久战》和《战争和战略问题》等著作中，驳斥了那种观点，并在本文中把长时期内中国革命的武装斗争采取游击战争形式的经验，作了理论上的总结。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武装斗争，到了抗日战争的后期，特别是在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由于革命力量的新成长和敌情的新变化，战争的主要形式就由游击战争转变为正规战争；而在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的后期，更发展为使用大量重武器并包括攻坚战的大兵团作战了。

〔3〕一九三〇年九月举行的党的六届三中全会，以及其后一时期的党中央，对于停止立三路线作了许多有积极作用的措施。但在六届三中全会以后，党内一部分没有实际革命斗争经验的同志，以陈绍禹（王明）秦邦宪（博古）为首，却起来反抗中央的措施。他们在当时发表的名为《两条路线》又名《为中共更加布尔什维克化而斗争》的小册子中，特别强调地宣称当时党内主要的危险不是“左”倾机会主义，而是所谓“右倾机会主义”，把“批评”立三路线的“右”当作其活动的资本。他们提出了一个在新的形态下，继续、恢复或发展立三路线及其他“左”倾思想和“左”倾政策的新的政治纲领，而与毛泽东同志的正确路线相对立。这个新的“左”倾错误路线在党内的统治，是从一九三一年一月间党的六届四中全会起，到一九三五年一月党中央在贵州遵义召集的政治局会议结束这一错误路线的领导而开始了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中央的新领导时为止。这次“左”倾错误路线在党内

统治的时间特别长久(四年),给予党和革命的损失特别重大,其恶果,就是中国共产党、中国红军和红军的根据地都损失了百分之九十左右,使数千万革命根据地的人民受了国民党的摧残,推迟了中国革命的进展。犯过这个“左”倾路线错误的同志,在长期体验中,绝大多数都已经认识了和改正了自己的错误,并且做了许多有益于党和人民的工作。这些同志和其他广大同志在一起,在共同的政治认识的基础上,在毛泽东同志的领导下,互相团结起来了。

选自《毛泽东著作选读(甲种本)》

毛 泽 东

纪 念 白 求 恩

(一九三九年十二月二十一日)

白求恩同志⁽¹⁾是加拿大共产党员，五十多岁了，为了帮助中国的抗日战争，受加拿大共产党和美国共产党的派遣，不远万里，来到中国。去年春上到延安，后来到五台山⁽²⁾工作，不幸以身殉职。一个外国人，毫无利己的动机，把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当作他自己的事业，这是什么精神？这是国际主义的精神，这是共产主义的精神，每一个中国共产党员都要学习这种精神。列宁主义认为：资本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要拥护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的解放斗争，殖民地半殖民地的无产阶级要拥护资本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的解放斗争，世界革命才能胜利⁽³⁾。白求恩同志是实践了这一条列宁主义路线的。我们中国共产党员也要实践这一条路线。我们要和一切资本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联合起来，要和日本的、英国的、美国的、德国的、意大利的以及一切资本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联合起来，才能打倒帝国主义，解放我们的民族和人民，解放世界的民族和人民。这就是我们的国际主义，这就是我们

用以反对狭隘民族主义和狭隘爱国主义^{〔4〕}的国际主义。

白求恩同志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精神，表现在他对工作的极端的负责任，对同志对人民的极端的热忱。每个共产党员都要学习他。不少的人对工作不负责任，拈轻怕重，把重担子推给人家，自己挑轻的。一事当前，先替自己打算，然后再替别人打算。出了一点力就觉得了不起，喜欢自吹，生怕人家不知道。对同志对人民不是满腔热忱，而是冷冷清清，漠不关心，麻木不仁。这种人其实不是共产党员，至少不能算一个纯粹的共产党员。从前线回来的人说到白求恩，没有一个不佩服，没有一个不为他的精神所感动。晋察冀边区^{〔5〕}的军民，凡亲身受过白求恩医生的治疗和亲眼看过白求恩医生的工作的，无不为之感动。每一个共产党员，一定要学习白求恩同志的这种真正共产主义者的精神。

白求恩同志是个医生，他以医疗为职业，对技术精益求精；在整个八路军医务系统中，他的医术是很高明的。这对于一班见异思迁^{〔6〕}的人，对于一班鄙薄技术工作以为不足道、以为无出路的人，也是一个极好的教训。

我和白求恩同志只见过一面。后来他给我来过许多信。可是因为忙，仅回过他一封信，还不知他收到没有。对于他的死，我是很悲痛的。现在大家纪念他，可见他的精神感人之深。我们大家要学习他毫无自私自利之心的精神。从这点出发，就可以变为大有利于人民的人。一个人能力有大小，但只要有这点精神，就是一个高尚的

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

注 释

〔1〕 诺尔曼·白求恩，加拿大共产党党员，著名的医生。一九三六年德意法西斯匪徒侵犯西班牙时，他曾经亲赴前线为反法西斯的西班牙人民服务。中国的抗日战争爆发，他率领一个医疗队，于一九三八年初来到中国，同年三、四月间到达延安，不久又转赴晋察冀边区。白求恩同志以高度的国际主义精神和忘我的工作热忱，为八路军伤病员服务将近两年。因为在一次为伤员施行急救手术时中毒，经过医治无效，于一九三九年十一月十二日在河北唐县逝世。

〔2〕 五台山是山西、察哈尔(原来是一个省，一九五二年撤消)、河北三省边境的山脉。一九三七年十月，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八路军，开始以五台山区为中心，建立晋察冀抗日根据地。

〔3〕 参看斯大林《论列宁主义基础》第六部分《民族问题》。

〔4〕 狭隘(ài 音爱)民族主义和狭隘爱国主义，是资产阶级认识、处理国际关系和民族关系的一种思想表现，是同无产阶级的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相对立的。社会主义国家、各国无产阶级和它的政党，如果受了狭隘民族主义和狭隘爱国主义的影响，就会只顾本国、本民族的局部利益，不考虑整个国际无产阶级的革命利益，甚至把本国、本民族的利益和国际无产阶级的利益对立起来，不支持别国人民的革命斗争，不支持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的民族解放运动，有的甚至支持本国资产阶级，去反对和侵略别的国家。

〔5〕 抗日战争时期敌后重要抗日根据地之一，包括当时的山西(晋)、察哈尔(察)、河北(冀)、热河(原来是一个省，一九五五年撤消)、辽宁五省的各一部分。

〔6〕 见异思迁：没有一定的见解，常常改变原来的主意。这里是指不安心工作，革命事业心不强。

选自《毛泽东著作选读(乙种本)》

毛 泽 东

整顿党的作风*

(一九四二年二月一日)

党校今天开学,我庆祝这个学校的成功。

今天我想讲一点关于我们的党的作风的问题。

为什么要有革命党?因为世界上有压迫人民的敌人存在,人民要推翻敌人的压迫,所以要有革命党。就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时代说来,就需要一个如共产党这样的革命党。如果没有共产党这样的革命党,人民要想推翻敌人的压迫,简直是不可能的。我们是共产党,我们要领导人民打倒敌人,我们的队伍就要整齐,我们的步调就要一致,兵要精,武器要好。如果不具备这些条件,那末,敌人就不会被我们打倒。

现在我们的党还有什么问题呢?党的总路线是正确的,是没有问题的,党的工作也是有成绩的。党有几十万党员,他们在领导人民,向着敌人作艰苦卓绝的斗争。这是大家看见的,是不能怀疑的。

* 这是毛泽东同志在中共中央党校开学典礼会上的演说。

那末，究竟我们的党还有什么问题没有呢？我讲，还是有问题的，而且就某种意义上讲，问题还相当严重。

什么问题呢？就是有几样东西在一些同志的头脑中还显得不大正确，不大正派。

这就是说，我们的学风还有些不正的地方，我们的党风还有些不正的地方，我们的文风也有些不正的地方。所谓学风有些不正，就是说有主观主义的毛病。所谓党风有些不正，就是说有宗派主义的毛病。所谓文风有些不正，就是说有党八股^{〔1〕}的毛病。这些作风不正，并不象冬天刮的北风那样，满天都是。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党八股，现在已不是占统治地位的作风了，这不过是一股逆风，一股歪风，是从防空洞里跑出来的。（笑声）但是我们党内还有这样的一种风，是不好的。我们要把产生这种歪风的洞塞死。我们全党都要来做这个塞洞工作，我们党校也要做这个工作。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党八股，这三股歪风，有它们的历史根源，现在虽然不是占全党统治地位的东西，但是它们还在经常作怪，还在袭击我们，因此，有加以抵制之必要，有加以研究分析说明之必要。

反对主观主义以整顿学风，反对宗派主义以整顿党风，反对党八股以整顿文风，这就是我们的任务。

我们要完成打倒敌人的任务，必须完成这个整顿党内作风的任务。学风和文风也都是党的作风，都是党风。只要我们党的作风完全正派了，全国人民就会跟我们学。党外有这种不良风气的人，只要他们是善良的，就会跟我

们学，改正他们的错误，这样就会影响全民族。只要我们共产党的队伍是整齐的，步调是一致的，兵是精兵，武器是好武器，那末，任何强大的敌人都是能被我们打倒的。

现在我来讲一讲主观主义。

主观主义是一种不正派的学风，它是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它是和共产党不能并存的。我们要的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学风。所谓学风，不但是学校的学风，而且是全党的学风。学风问题是领导机关、全体干部、全体党员的思想方法问题，是我们对待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态度问题，是全党同志的工作态度问题。既然是这样，学风问题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就是第一个重要的问题。

现在有些糊涂观念，在许多人中间流行着。例如关于什么是理论家，什么是知识分子，什么是理论和实际联系等等问题的糊涂观念。

我们首先要问，我们党的理论水平究竟是高还是低呢？近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书籍翻译的多了，读的人也多了。这是很好的事。但是否就可以说我们党的理论水平已经是提得很高了呢？确实，我们的理论水平是比较过去高了一些。但是按照中国革命运动的丰富内容来说，理论战线就非常之不相称，二者比较起来，理论方面就显得非常之落后。一般地说来，我们的理论还不能够和革命实践相平行，更不去说理论应该跑到实践的前面去。我们还没有把丰富的实际提高到应有的理论程度。我们还没有对革命实践的一切问题，或重大问题，加以考

察，使之上升到理论的阶段。你们看，中国的经济、政治、军事、文化，我们究有多少人创造了可以称为理论的理论，算得科学形态的、周密的而不是粗枝大叶的理论呢？特别是在经济理论方面，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从鸦片战争到现在，已经一百年了，但是还没有产生一本合乎中国经济发展的实际的、真正科学的理论书。象在中国经济问题方面，能不能说理论水平已经高了呢？能不能说我党已经有了象样的经济理论家呢？实在不能说。我们读了许多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书籍，能不能就算是有了理论家呢？不能这样说。因为马克思列宁主义是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他们根据实际创造出来的理论，从历史实际和革命实际中抽出来的总结论。我们如果仅仅读了他们的著作，但是没有进一步地根据他们的理论来研究中国的历史实际和革命实际，没有企图在理论上思考中国的革命实践，我们就不能妄称为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家。如果我们身为中国共产党员，却对于中国问题熟视无睹，只能记诵马克思主义书本上的个别的结论和个别的原理，那末，我们在理论战线上的成绩就未免太坏了。如果一个人只知背诵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学或哲学，从第一章到第十章都背得烂熟了，但是完全不能应用，这样是不是就算得一个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家呢？这还是不能算理论家的。我们所要的理论家是什么样的人呢？是要这样的理论家，他们能够依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正确地解释历史中和革命中所发生的实际

问题，能够在中国的经济、政治、军事、文化种种问题上给予科学的解释，给予理论的说明。我们要的是这样的理论家。假如要作这样的理论家，那就要能够真正领会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实质，真正领会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真正领会列宁斯大林关于殖民地革命和中国革命的学说，并且应用了它去深刻地、科学地分析中国的实际问题，找出它的发展规律，这样才是我们真正需要的理论家。

现在我们党的中央做了决定，号召我们的同志学会应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认真地研究中国的历史，研究中国的经济、政治、军事和文化，对每一问题要根据详细的材料加以具体的分析，然后引出理论性的结论来。这个责任是担在我们的身上。

我们党校的同志不应当把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当成死的教条。对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要能够精通它、应用它，精通的目的全在于应用。如果你能应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观点，说明一个两个实际问题，那就要受到称赞，就算有了几分成绩。被你说明的东西越多，越普遍，越深刻，你的成绩就越大。现在我们的党校也要定这个规矩，看一个学生学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以后怎样看中国问题，有看得清楚的，有看不清楚的，有会看的，有不会看的，这样来分优劣，分好坏。

其次讲一讲所谓“知识分子”的问题。因为我们中国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文化不发达，所以对于知

识分子觉得特别宝贵。党中央在两年多以前作过一个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决定〔2〕，要争取广大的知识分子，只要他们是革命的，愿意参加抗日的，一概采取欢迎态度。我们尊重知识分子是完全应该的，没有革命知识分子，革命就不会胜利。但是我们晓得，有许多知识分子，他们自以为很有知识，大摆其知识架子，而不知道这种架子是不好的，是有害的，是阻碍他们前进的。他们应该知道一个真理，就是许多所谓知识分子，其实是比较地最无知识的，工农分子的知识有时倒比他们多一点。于是有人说：“哈！你弄颠倒了，乱说一顿。”（笑声）但是，同志，你别着急，我讲的多少有点道理。

什么是知识？自从有阶级的社会存在以来，世界上的知识只有两门，一门叫做生产斗争知识，一门叫做阶级斗争知识。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就是这两门知识的结晶，哲学则是关于自然知识和社会知识的概括和总结。此外还有什么知识呢？没有了。我们现在看看一些学生，看看那些同社会实践活动完全脱离关系的学校里面出身的学生，他们的状况是怎么样呢？一个人从那样的小学一直读到那样的大学，毕业了，算有知识了。但是他有的只是书本上的知识，还没有参加任何实际活动，还没有把自己学得的知识应用到生活的任何部门里去。象这样的人是否可以算得一个完全的知识分子呢？我以为很难，因为他的知识还不完全。什么是比较完全的知识呢？一切比较完全的知识都是由两个阶段构成的：第一阶段是

感性知识，第二阶段是理性知识，理性知识是感性知识的高级发展阶段。学生们的书本知识是什么知识呢？假定他们的知识都是真理，也是他们的前人总结生产斗争和阶级斗争的经验写成的理论，不是他们自己亲身得来的知识。他们接受这种知识是完全必要的，但是必须知道，就一定的情况说来，这种知识对于他们还是片面性的，这种知识是人家证明了，而在他们则还没有证明的。最重要的，是善于将这些知识应用到生活和实际中去。所以我劝那些只有书本知识但还没有接触实际的人，或者实际经验尚少的人，应该明白自己的缺点，将自己的态度放谦虚一些。

有什么办法使这种仅有书本知识的人变为名副其实的知识分子呢？唯一的办法就是使他们参加到实际工作中去，变为实际工作者，使从事理论工作的人去研究重要的实际问题。这样就可以达到目的。

我这样说，难免有些人要发脾气。他们说：“照你这样解释，那末，马克思也算不得知识分子了。”我说：不对。马克思不但参加了革命的实际运动，而且进行了革命的理论创造。他从资本主义最单纯的因素——商品开始，周密地研究了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结构。商品这个东西，千百万人，天天看它，用它，但是熟视无睹。只有马克思科学地研究了它，他从商品的实际发展中作了巨大的研究工作，从普遍的存在中找出完全科学的理论来。他研究了自然，研究了历史，研究了无产阶级革命，创造了

辩证唯物论、历史唯物论和无产阶级革命的理论。这样，马克思就成了一个代表人类最高智慧的最完全的知识分子，他和那些仅有书本知识的人有根本的区别。马克思在实际斗争中进行了详细的调查研究，概括了各种东西，得到的结论又拿到实际斗争中去加以证明，这样的工作就叫做理论工作。我们党内需要许多同志学做这样的工作。我们党内现在有大批的同志，可以学习从事于这样的理论研究工作，他们大都是聪明有为的人，我们要看重他们。但是他们的方针要对，过去犯过的错误他们不应重复。他们必须抛弃教条主义，必须不停止在现成书本的字句上。

真正的理论在世界上只有一种，就是从客观实际抽出来又在客观实际中得到了证明的理论，没有任何别的东西可以称得起我们所讲的理论。斯大林曾经说过，脱离实际的理论是空洞的理论^{〔3〕}。空洞的理论是没有用的，不正确的，应该抛弃的。对于好谈这种空洞理论的人，应该伸出一个指头向他刮脸皮。马克思列宁主义是从客观实际产生出来又在客观实际中获得了证明的最正确最科学最革命的真理；但是许多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人却把它看成是死的教条，这样就阻碍了理论的发展，害了自己，也害了同志。

另一方面，我们从事实际工作的同志，如果误用了他们的经验，也是要出毛病的。不错，这样的人往往经验很多，这是很可宝贵的；但是如果他们就以自己的经验为满

足，那也很危险。他们须知自己的知识是偏于感性的或局部的，缺乏理性的知识和普遍的知识，就是说，缺乏理论，他们的知识也是比较地不完全。而要把革命事业做好，没有比较完全的知识是不行的。

这样看来，有两种不完全的知识，一种是现成书本上的知识，一种是偏于感性和局部的知识，这二者都有片面性。只有使二者互相结合，才会产生好的比较完全的知识。

但是，我们的工农干部要学理论，必须首先学文化。没有文化，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就学不进去。学好了文化，随时都可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我幼年没有进过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学校，学的是“子曰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4〕一套，这种学习的内容虽然陈旧了，但是对我也有好处，因为我识字便是从这里学来的。何况现在不是学的孔夫子，学的是新鲜的国语、历史、地理和自然常识，这些文化课学好了，到处有用。我们党中央现在着重要求工农干部学习文化，因为学了文化以后，政治、军事、经济那一门都可学。否则工农干部虽有丰富经验，却没有学习理论的可能。

由此看来，我们反对主观主义，必须使上述两种人各向自己缺乏的方面发展，必须使两种人互相结合。有书本知识的人向实际方面发展，然后才可以不停止在书本上，才可以不犯教条主义的错误。有工作经验的人，要向理论方面学习，要认真读书，然后才可以使经验带上条理

性、综合性，上升成为理论，然后才可以不把局部经验误认为即是普遍真理，才可不犯经验主义的错误。教条主义、经验主义，两者都是主观主义，是从不同的两极发生的東西。

所以，我们党内的主观主义有两种：一种是教条主义，一种是经验主义。他们都是只看到片面，没有看到全面。如果不注意，如果不知道这种片面性的缺点，并且力求改正，那就容易走上错误的道路。

但是在这两种主观主义中，现在在我们党内还是教条主义更为危险。因为教条主义容易装出马克思主义的面孔，吓唬工农干部，把他们俘虏起来，充作自己的用人，而工农干部不易识破他们；也可以吓唬天真烂漫的青年，把他们充当俘虏。我们如果把教条主义克服了，就可以使有书本知识的干部，愿意和有经验的干部相结合，愿意从实际事物的研究，可以产生许多理论和经验结合的良好工作者，可以产生一些真正的理论家。我们如果把教条主义克服了，就可以使有经验的同志得着良好的先生，使他们的经验上升成为理论，而避免经验主义的错误。

除了对于“理论家”和“知识分子”存在着糊涂观念而外，还有天天念的一句“理论和实际联系”，在许多同志中间也是一个糊涂观念。他们天天讲“联系”，实际上却是讲“隔离”，因为他们并不去联系。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和中国革命实际，怎样互相联系呢？拿一句通俗的话来

讲，就是“有的放矢”。“矢”就是箭，“的”就是靶，放箭要对准靶。马克思列宁主义和中国革命的关系，就是箭和靶的关系。有些同志却在那里“无的放矢”，乱放一通，这样的人就容易把革命弄坏。有些同志则仅仅把箭拿在手里搓来搓去，连声赞曰：“好箭！好箭！”却老是不愿意放出去。这样的人就是古董鉴赏家，几乎和革命不发生关系。马克思列宁主义之箭，必须用了去射中国革命之的。这个问题不讲明白，我们党的理论水平永远不会提高，中国革命也永远不会胜利。

我们的同志必须明白，我们学马克思列宁主义不是为着好看，也不是因为它有什么神秘，只是因为它是领导无产阶级革命事业走向胜利的科学。直到现在，还有不少人，把马克思列宁主义书本上的某些个别字句看作现成的灵丹圣药，似乎只要得了它，就可以不费气力地包医百病。这是一种幼稚者的蒙昧，我们对这些人应该作启蒙运动。那些将马克思列宁主义当宗教教条看待的人，就是这种蒙昧无知的人。对于这种人，应该老实地对他说，你的教条一点什么用处也没有。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曾经反复地讲，我们的学说不是教条而是行动的指南。这些人偏偏忘记这句最重要最重要的话。中国共产党人只有在他们善于应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善于应用列宁斯大林关于中国革命的学说，进一步地从中国的历史实际和革命实际的认真研究中，在各方面作出合乎中国需要的理论性的创造，才叫做理

论和实际相联系。如果只是口头上讲联系，行动上又不实行联系，那末，讲一百年也还是无益的。我们反对主观地片面地看问题，必须攻破教条主义的主观性和片面性。

关于反对主观主义以整顿全党的学风的问题，今天讲的就是这些。

现在我来讲一讲宗派主义的问题。

由于二十年的锻炼，现在我们党内并没有占统治地位的宗派主义了。但是宗派主义的残余是还存在的，有对党内的宗派主义残余，也有对党外的宗派主义残余。对内的宗派主义倾向产生排内性，妨碍党内的统一和团结；对外的宗派主义倾向产生排外性，妨碍党团结全国人民的事业。铲除这两方面的祸根，才能使党在团结全党同志和团结全国人民的伟大事业中畅行无阻。

什么是党内宗派主义的残余呢？主要的有下面几种：

首先就是闹独立性。一部分同志，只看见局部利益，不看见全体利益，他们总是不适当地特别强调他们自己所管的局部工作，总希望使全体利益去服从他们的局部利益。他们不懂得党的民主集中制，他们不知道共产党不但要民主，尤其要集中。他们忘记了少数服从多数，下级服从上级，局部服从全体，全党服从中央的民主集中制。张国焘是向党中央闹独立性的，结果闹到叛党，做特务去了。现在讲的，虽然不是这种极端严重的宗派主义，但是这种现象必须预防，必须将各种不统一的现象完全

除去。要提倡顾全大局。每一个党员，每一种局部工作，每一项言论或行动，都必须以全党利益为出发点，绝对不许可违反这个原则。

闹这类独立性的人，常常跟他们的个人第一主义分不开，他们在个人和党的关系问题上，往往是不正确的。他们在口头上虽然也说尊重党，但他们在实际上却把个人放在第一位，把党放在第二位。这种人闹什么东西呢？闹名誉，闹地位，闹出风头。在他们掌管一部分事业的时候，就要闹独立性。为了这些，就要拉拢一些人，排挤一些人，在同志中吹吹拍拍，拉拉扯扯，把资产阶级政党的庸俗作风也搬进共产党里来了。这种人的吃亏在于不老实。我想，我们应该是老老实实在地办事；在世界上要办成几件事，没有老实态度是根本不行的。什么人是不老实的人？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是老实人，科学家是老实人。什么人是不老实的人？托洛茨基、布哈林、陈独秀、张国焘是大不老实的人，为个人利益为局部利益闹独立性的人也是不老实的人。一切狡猾的人，不照科学态度办事的人，自以为得计，自以为很聪明，其实都是最蠢的，都是没有好结果的。我们党校的学生一定要注意这个问题。我们一定要建设一个集中的统一的党，一切无原则的派别斗争，都要清除干净。要使我们全党的步调整齐一致，为一个共同目标而奋斗，我们一定要反对个人主义和宗派主义。

外来干部和本地干部必须团结，必须反对宗派主义

倾向。因为许多抗日根据地是八路军新四军到后才创立的，许多地方工作是外来干部去后才发展的，外来干部和本地干部的关系，必须加以很好的注意。我们的同志必须懂得，在这种条件下，只有外来干部和本地干部完全团结一致，只有本地干部大批地生长了，并提拔起来了，根据地才能巩固，我党在根据地内才能生根，否则是不可能的。外来干部和本地干部各有长处，也各有短处，必须互相取长补短，才能有进步。外来干部比较本地干部，对于熟悉情况和联系群众这些方面，总要差些。拿我来说，就是这样。我到陕北已经五六年了，可是对于陕北的情况的了解，对于和陕北人民的联系，和一些陕北同志比较起来就差得多。我们到山西、河北、山东以及其他抗日根据地的同志，一定要注意这个问题。不但如此，即在一个根据地内部，因为根据地内的各个区域有发展先后之不同，干部中也有外来本地之别。比较先进区域的干部到比较落后的区域去，对于当地，也是一种外来干部，也要十分注意扶助本地干部的问题。就一般情形说来，凡属外来干部负领导责任的地方，如果和本地干部的关系弄得不好，那末，这个责任主要地应该放在外来干部的身上。担负主要领导责任的同志，其责任就更大些。现在各地对这个问题的注意还很不够，有些人轻视本地干部，讥笑本地干部，他们说：“本地人懂得什么，土包子！”这种人完全不懂得本地干部的重要性，他们既不了解本地干部的长处，也不了解自己的短处，采取了不正确的宗派主义的态

度。一切外来干部一定要爱护本地干部，经常帮助他们，而不许可讥笑他们，打击他们。自然，本地干部也必须学习外来干部的长处，必须去掉那些不适当的狭隘的观点，以求和外来干部完全不分彼此，打成一片，而避免宗派主义倾向。

军队工作干部和地方工作干部的关系也是如此。两者必须完全团结一致，必须反对宗派主义的倾向。军队干部必须帮助地方干部，地方干部也必须帮助军队干部。如有纠纷，应该双方互相原谅，而各对自己作正确的自我批评。在军队干部事实上居于领导地位的地方，在一般的情形之下，如果和地方干部的关系弄不好，那末，主要的责任应该放在军队干部的身上。必须使军队干部首先懂得自己的责任，以谦虚的态度对待地方干部，才能使根据地的战争工作和建设工作得到顺利进行的条件。

几部分军队之间、几个地方之间、几个工作部门之间的关系，也是如此。必须反对只顾自己不顾别人的本位主义的倾向。谁要是对于别人的困难不管，别人要调他所属的干部不给，或以坏的送人，“以邻为壑”，全不为别部、别地、别人想一想，这样的人就叫做本位主义者，这就是完全失掉了共产主义的精神。不顾大局，对别部、别地、别人漠不关心，就是这种本位主义者的特点。对于这样的人，必须加重教育，使他们懂得这就是一种宗派主义的倾向，如果发展下去，是很危险的。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老干部和新干部的关系问题。抗

战以来，我党有广大的发展，大批新干部产生了，这是很好的现象。斯大林同志在联共十八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中说：“老干部通常总是不多，比所需要的数量少，而且由于宇宙自然法则的关系，他们已部分地开始衰老死亡下去。”他在这里讲了干部状况，又讲了自然科学。我们党如果没有广大的新干部同老干部一致合作，我们的事业就会中断。所以一切老干部应该以极大的热忱欢迎新干部，关心新干部。不错，新干部是有缺点的，他们参加革命还不久，还缺乏经验，他们中的有些人还不免带来旧社会不良思想的尾巴，这就是小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思想的残余。但是这些缺点是可以从教育中从革命锻炼中逐渐地去掉的。他们的长处，正如斯大林说过的，是对于新鲜事物有锐敏的感觉，因而有高度的热情和积极性，而在这一点上，有些老干部则正是缺乏的⁽⁵⁾。新老干部应该是彼此尊重，互相学习，取长补短，以便团结一致，进行共同的事业，而防止宗派主义的倾向。在老干部负主要领导责任的地方，在一般情形之下，如果老干部和新干部的关系弄得不好，那末，老干部就应该负主要的责任。

以上所讲的局部和全体的关系，个人和党的关系，外来干部和本地干部的关系，军队干部和地方干部的关系，军队和军队、地方和地方、这一工作部门和那一工作部门之间的关系，老干部和新干部的关系，都是党内的相互关系。在这种种方面，都应该提高共产主义精神，防止宗派主义倾向，使我们的党达到队伍整齐，步调一致的目的，

以利战斗。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我们整顿党的作风，必须彻底地解决这个问题。宗派主义是主观主义在组织关系上的一种表现；我们如果不要主观主义，要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实事求是的精神，就必须扫除党内宗派主义的残余，以党的利益高于个人和局部的利益为出发点，使党达到完全团结统一的地步。

宗派主义的残余，在党内关系上是应该消灭的，在党外关系上也是应该消灭的。其理由就是：单是团结全党同志还不能战胜敌人，必须团结全国人民才能战胜敌人。中国共产党在团结全国人民的事业上，二十年来做了艰苦的伟大的工作；抗战以来，这个工作的成绩更加伟大。但这并不是说，我们所有的同志对待人民群众都有了正确的作风，都没有了宗派主义的倾向。不是的。在一部分同志中，确实还有宗派主义的倾向，有些人并且很严重。我们的许多同志，喜欢对党外人员妄自尊大，看人家不起，藐视人家，而不愿尊重人家，不愿了解人家的长处。这就是宗派主义的倾向。这些同志，读了几本马克思主义的书籍之后，不是更谦虚，而是更骄傲了，总是说人家不行，而不知自己实在是一知半解。我们的同志必须懂得一条真理：共产党员和党外人员相比较，无论何时都是占少数。假定一百个人中有一个共产党员，全中国四亿五千万人中就有四百五十万共产党员。即使达到这样大的数目，共产党员也还是只占百分之一，百分之九十九都是非党员。我们有什么理由不和非党人员合作呢？对于

一切愿意同我们合作以及可能同我们合作的人，我们只有同他们合作的义务，绝无排斥他们的权利。一部分党员却不懂得这个道理，看不起愿意同我们合作的人，甚至排斥他们。这是没有任何根据的。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给了我们这样的根据吗？没有。相反地，他们总是谆谆告诫我们，要密切联系群众，而不要脱离群众。中国共产党中央给了我们这个根据吗？没有。中央的一切决议案中，没有一个决议说是我们可以脱离群众使自己孤立起来。相反地，中央总是叫我们密切联系群众，而不要脱离群众。所以，一切脱离群众的行为，并没有任何的根据，只是我们一部分同志自己造出来的宗派主义思想在那里作怪。因为这种宗派主义在一部分同志中还很严重，还在障碍党的路线的实行，所以我们要针对这个问题在党内进行广大的教育。首先要使我们的干部真正懂得这个问题的严重性，使他们懂得共产党员如果不同党外干部、党外人员互相联合，敌人就一定不能打倒，革命的目的就一定不能达到。

一切宗派主义思想都是主观主义的，都和革命的实际需要不相符合，所以反对宗派主义和反对主观主义的斗争，应当同时并进。

关于党八股的问题，今天不能讲了，准备在另外一个会议上来讨论。党八股是藏垢纳污的东西，是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的一种表现形式。它是害人的，不利于革命的，我们必须肃清它。

我们要反对主观主义，就要宣传唯物主义，就要宣传辩证法。但是我们党内还有许多同志，他们并不注重宣传唯物主义，也不注重宣传辩证法。有些同志听凭别人宣传主观主义，也安之若素。这些同志自以为相信马克思主义，但是，他们却不努力宣传唯物主义，听了或看了主观主义的东西也不想一想，也不发议论。这种态度不是共产党员的态度。这使得我们许多同志蒙受了主观主义思想的毒害，发生麻木的现象。所以我们要在党内发动一个启蒙运动，使我们同志的精神从主观主义、教条主义的蒙蔽中间解放出来，号召同志们对于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党八股加以抵制。这些东西好象日货，因为只有我们的敌人愿意我们保存这些坏东西，使我们继续受蒙蔽，所以我们应该提倡抵制，就象抵制日货⁽⁶⁾一样。一切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党八股的货色，我们都要抵制，使它们在市场上销售困难，不要让它们利用党内理论水平低，出卖自己那一套。为此目的，就要同志们提高嗅觉，就要同志们对于任何东西都用鼻子嗅一嗅，鉴别其好坏，然后才决定欢迎它，或者抵制它。共产党员对任何事情都要问一个为什么，都要经过自己头脑的周密思考，想一想它是否合乎实际，是否真有道理，绝对不应盲从，绝对不应提倡奴隶主义。

最后，我们反对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党八股，有两条宗旨是必须注意的：第一是“惩前毖后”，第二是“治病救人”。对以前的错误一定要揭发，不讲情面，要以科学的态

度来分析批判过去的坏东西，以便使后来的工作慎重些，做得好些。这就是“惩前毖后”的意思。但是我们揭发错误、批判缺点的目的，好象医生治病一样，完全是为了救人，而不是为了把人整死。一个人发了阑尾炎，医生把阑尾割了，这个人就救出来了。任何犯错误的人，只要他不讳疾忌医，不固执错误，以至于达到不可救药的地步，而是老老实实，真正愿意医治，愿意改正，我们就要欢迎他，把他的毛病治好，使他变为一个好同志。这个工作决不是痛快一时，乱打一顿，所能奏效的。对待思想上的毛病和政治上的毛病，决不能采用鲁莽的态度，必须采用“治病救人”的态度，才是正确有效的方法。

趁着今天党校开学的机会，我讲了这许多话，希望同志们加以考虑。（热烈的鼓掌）

注 释

〔1〕八股文是十五世纪到十九世纪中国封建皇朝考试制度所规定的一种特殊文体，是完全没有内容、专讲形式的一种文字玩弄。这种文章的每一个段落都要死守在固定的格式里面，连字数都有一定的限制，人们只是按照题目的字义敷衍成文。“党八股”，是指在革命队伍中某些人所写的文章，这种文章对于事物不加分析，只是胡乱搬用一些革命的名词和术语，言之无物，空话连篇，也和上述的八股文一样。

〔2〕指一九三九年十二月中共中央关于吸收知识分子的决定。即《毛泽东选集》第二卷所载《大量吸收知识分子》一文。

〔3〕见斯大林《论列宁主义基础》（一九二四年四——五月）一文的第三部分《理论》。

〔4〕这是孔子和他的弟子们的语录《论语》的开头一句话。

〔5〕见斯大林《在第十八次党代表大会上关于联共（布）中央工作的总结报告》（一九三九年三月十日）第三部分第二节。

〔6〕抵制日货是中国人民在二十世纪上半叶所常常采取的反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一种斗争方法。例如在一九一九年五四爱国运动时期，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变之后，以及在抗日战争期间，中国人民都曾进行过抵制日货的运动。

选自《毛泽东著作选读（甲种本）》

毛 泽 东

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

(一九四二年五月)

引 言

(一九四二年五月二日)

同志们！今天邀集大家来开座谈会，目的是要和大家交换意见，研究文艺工作和一般革命工作的关系，求得革命文艺的正确发展，求得革命文艺对其他革命工作的更好的协助，借以打倒我们民族的敌人，完成民族解放的任务。

在我们为中国人民解放的斗争中，有各种的战线，就中也可以说有文武两个战线，这就是文化战线和军事战线。我们要战胜敌人，首先要依靠手里拿枪的军队。但是仅仅有这种军队是不够的，我们还要有文化的军队，这是团结自己、战胜敌人必不可少的一支军队。“五四”以来，这支文化军队就在中国形成，帮助了中国革命，使中国的封建文化和适应帝国主义侵略的买办文化的地盘逐渐缩小，其力量逐渐削弱。到了现在，中国反动派只能提

出所谓“以数量对质量”的办法来和新文化对抗，就是说，反动派有的是钱，虽然拿不出好东西，但是可以拚命出得多。在“五四”以来的文化战线上，文学和艺术是一个重要的有成绩的部门。革命的文学艺术运动，在十年内战时期有了大的发展。这个运动和当时的革命战争，在总的方向上是一致的，但在实际工作上却没有互相结合起来，这是因为当时的反动派把这两支兄弟军队从中隔断了缘故。抗日战争爆发以后，革命的文艺工作者来到延安和各个抗日根据地的多起来了，这是很好的事。但是到了根据地，并不是说就已经和根据地的人民群众完全结合了。我们要把革命工作向前推进，就要使这两者完全结合起来。我们今天开会，就是要使文艺很好地成为整个革命机器的一个组成部分，作为团结人民、教育人民、打击敌人、消灭敌人的有力的武器，帮助人民同心同德地和敌人作斗争。为了这个目的，有些什么问题应该解决的呢？我以为有这样一些问题，即文艺工作者的立场问题，态度问题，工作对象问题，工作问题和学习问题。

立场问题。我们是站在无产阶级的和人民群众的立场。对于共产党员来说，也就是要站在党的立场，站在党性和党的政策的立场。在这个问题上，我们的文艺工作者中是否还有认识不正确或者认识不明确的呢？我看是有的。许多同志常常失掉了自己的正确的立场。

态度问题。随着立场，就发生我们对于各种具体事物所采取的具体态度。比如说，歌颂呢，还是暴露呢？这

就是态度问题。究竟那种态度是我们需要的？我说两种都需要，问题是在对什么人。有三种人，一种是敌人，一种是统一战线中的同盟者，一种是自己人，这第三种人就是人民群众及其先锋队。对于这三种人需要有三种态度。对于敌人，对于日本帝国主义和一切人民的敌人，革命文艺工作者的任务是在暴露他们的残暴和欺骗，并指出他们必然要失败的趋势，鼓励抗日军民同心同德，坚决地打倒他们。对于统一战线中各种不同的同盟者，我们的态度应该是有联合，有批评，有各种不同的联合，有各种不同的批评。他们的抗战，我们是赞成的；如果有成绩，我们也是赞扬的。但是如果抗战不积极，我们就应该批评。如果有人要反共反人民，要一天一天走上反动的道路，那我们就要坚决反对。至于对人民群众，对人民的劳动和斗争，对人民的军队，人民的政党，我们当然应该赞扬。人民也有缺点的。无产阶级中还有许多人保留着小资产阶级的思想，农民和城市小资产阶级都有落后的思想，这些就是他们在斗争中的负担。我们应该长期地耐心地教育他们，帮助他们摆脱背上的包袱，同自己的缺点错误作斗争，使他们能够大踏步地前进。他们在斗争中已经改造或正在改造自己，我们的文艺应该描写他们的这个改造过程。只要不是坚持错误的人，我们就不应该只看到片面就去错误地讥笑他们，甚至敌视他们。我们所写的东西，应该是使他们团结，使他们进步，使他们同心同德，向前奋斗，去掉落后的东西，发扬革命的东西，而决不是

相反。

工作对象问题，就是艺术作品给谁看的问题。在陕甘宁边区⁽¹⁾，在华北华中各抗日根据地，这个问题和在国民党统治区不同，和在抗战以前的上海更不同。在上海时期，革命艺术作品的接受者是以一部分学生、职员、店员为主。在抗战以后的国民党统治区，范围曾有过一些扩大，但基本上也还是以这些人为主，因为那里的政府把工农兵和革命艺术互相隔绝了。在我们的根据地就完全不同。艺术作品在根据地的接受者，是工农兵以及革命的干部。根据地也有学生，但这些学生和旧式学生也不相同，他们不是过去的干部，就是未来的干部。各种干部，部队的战士，工厂的工人，农村的农民，他们识了字，就要看书、看报，不识字的，也要看戏、看画、唱歌、听音乐，他们就是我们艺术作品的接受者。即拿干部说，你们不要以为这部分人数目少，这比在国民党统治区出一本书的读者多得多。在那里，一本书一版平常只有两千册，三版也才六千册；但是根据地的干部，单是在延安能看书的就有一万多。而且这些干部许多都是久经锻炼的革命家，他们是从全国各地来的，他们也要到各地去工作，所以对于这些人做教育工作，是有重大意义的。我们的文艺工作者，应该向他们好好做工作。

既然艺术工作的对象是工农兵及其干部，就发生一个了解他们熟悉他们的问题。而为要了解他们，熟悉他们，为要在党政机关，在农村，在工厂，在八路军新四军里

面，了解各种人，熟悉各种人，了解各种事情，熟悉各种事情，就需要做很多的工作。我们的文艺工作者需要做自己的文艺工作，但是这个了解人熟悉人的工作却是第一位的工作。我们的文艺工作者对于这些，以前是一种什么情形呢？我说以前是不熟，不懂，英雄无用武之地。什么是不熟？人不熟。文艺工作者同自己的描写对象和作品接受者不熟，或者简直生疏得很。我们的文艺工作者不熟悉工人，不熟悉农民，不熟悉士兵，也不熟悉他们的干部。什么是不懂？语言不懂，就是说，对于人民群众的丰富的生动的语言，缺乏充分的知识。许多文艺工作者由于自己脱离群众、生活空虚，当然也就不熟悉人民的语言，因此他们的作品不但显得语言无味，而且里面常常夹着一些生造出来的和人民的语言相对立的不三不四的词句。许多同志爱说“大众化”，但是什么叫做大众化呢？就是我们的文艺工作者的思想感情和工农兵大众的思想感情打成一片。而要打成一片，就应当认真学习群众的语言。如果连群众的语言都有许多不懂，还讲什么文艺创造呢？英雄无用武之地，就是说，你的一套大道理，群众不赏识。在群众面前把你的资格摆得越老，越象个“英雄”，越要出卖这一套，群众就越不买你的账。你要群众了解你，你要和群众打成一片，就得下决心，经过长期的甚至是痛苦的磨练。在这里，我可以说一说我自己感情变化的经验。我是个学生出身的人，在学校养成了一种学生习惯，在一大群肩不能挑手不能提的学生面前做一

点劳动的事，比如自己挑行李吧，也觉得不象样子。那时，我觉得世界上干净的人只有知识分子，工人农民总是比较脏的。知识分子的服装，别人的我可以穿，以为是干净的；工人农民的衣服，我就不愿意穿，以为是脏的。革命了，同工人农民和革命军的战士在一起了，我逐渐熟悉他们，他们也逐渐熟悉了我。这时，只是在这时，我才根本地改变了资产阶级学校所教给我的那种资产阶级的和小资产阶级的感情。这时，拿未曾改造的知识分子和工人农民比较，就觉得知识分子不干净了，最干净的还是工人农民，尽管他们手是黑的，脚上有牛屎，还是比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都干净。这就叫做感情起了变化，由一个阶级变到另一个阶级。我们知识分子出身的文艺工作者，要使自己的作品为群众所欢迎，就得把自己的思想感情来一个变化，来一番改造。没有这个变化，没有这个改造，什么事情都是做不好的，都是格格不入的。

最后一个问题是学习，我的意思是说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和学习社会。一个自命为马克思主义的革命作家，尤其是党员作家，必须有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知识。但是现在有些同志，却缺少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比如说，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基本观点，就是存在决定意识，就是阶级斗争和民族斗争的客观现实决定我们的思想感情。但是我们有些同志却把这个问题弄颠倒了，说什么一切应该从“爱”出发。就说爱吧，在阶级社会里，也只有阶级的爱，但是这些同志却要追求什么超阶级的爱，抽象

的爱，以及抽象的自由、抽象的真理、抽象的人性等等。这是表明这些同志是受了资产阶级的很深的影响。应该很彻底地清算这种影响，很虚心地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文艺工作者应该学习文艺创作，这是对的，但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是一切革命者都应该学习的科学，文艺工作者不能是例外。文艺工作者要学习社会，这就是说，要研究社会上的各个阶级，研究它们的相互关系和各自状况，研究它们的面貌和它们的心理。只有把这些弄清楚了，我们的文艺才能有丰富的内容和正确的方向。

今天我就只提出这几个问题，当作引子，希望大家在这些问题及其他有关的问题上发表意见。

结 论

（一九四二年五月二十三日）

同志们！我们这个会在一个月里开了三次。大家为了追求真理，进行了热烈的争论，有党的和非党的同志几十个人讲了话，把问题展开了，并且具体化了。我认为这是对整个文学艺术运动很有益处的。

我们讨论问题，应当从实际出发，不是从定义出发。如果我们按照教科书，找到什么是文学、什么是艺术的定义，然后按照它们来规定今天文艺运动的方针，来评判今天所发生的各种见解和争论，这种方法是不正确的。我们是马克思主义者，马克思主义叫我们看问题不要从抽

象的定义出发，而要从客观存在的事实出发，从分析这些事实中找出方针、政策、办法来。我们现在讨论文艺工作，也应该这样做。

现在的事实是什么呢？事实就是：中国的已经进行了五年的抗日战争；全世界的反法西斯战争；中国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在抗日战争中的动摇和对于人民的高压政策；“五四”以来的革命文艺运动——这个运动在二十三年中对于革命的伟大贡献以及它的许多缺点；八路军新四军的抗日民主根据地，在这些根据地里面大批文艺工作者和八路军新四军以及工人农民的结合；根据地的文艺工作者和国民党统治区的文艺工作者的环境和任务的差别；目前在延安和各抗日根据地的文艺工作中已经发生的争论问题。——这些就是实际存在的不可否认的事实，我们就要在这些事实的基础上考虑我们的问题。

那末，什么是我们的问题的中心呢？我以为，我们的问题基本上是一个为群众的问题和一个如何为群众的问题。不解决这两个问题，或这两个问题解决得不适当，就会使得我们的文艺工作者和自己的环境、任务不协调，就使得我们的文艺工作者从外部从内部碰到一连串的问题。我的结论，就以这两个问题为中心，同时也讲到一些与此有关的其他问题。

第一个问题：我们的文艺是为什么人的？

这个问题，本来是马克思主义者特别是列宁所早已解决了的。列宁还在一九〇五年就已着重指出过，我们的文艺应当“为千千万万劳动人民服务”〔2〕。在我们各个抗日根据地从事文学艺术工作的同志中，这个问题似乎是已经解决了，不需要再讲的了。其实不然。很多同志对这个问题并没有得到明确的解决。因此，在他们的情绪中，在他们的作品中，在他们的行动中，在他们对于文艺方针问题的意见中，就不免或多或少地发生和群众的需要不相符合，和实际斗争的需要不相符合的情形。当然，现在和共产党、八路军、新四军在一起从事于伟大解放斗争的大批的文化人、文学家、艺术家以及一般文艺工作者，虽然其中也可能有些人是暂时的投机分子，但是绝大多数却都是在为着共同事业努力工作着。依靠这些同志，我们的整个文学工作，戏剧工作，音乐工作，美术工作，都有了很大的成绩。这些文艺工作者，有许多是抗战以后开始工作的；有许多在抗战以前就做了多时的革命工作，经历过许多辛苦，并用他们的工作和作品影响了广大群众的。但是为什么还说即使这些同志中也有对于文艺是为什么人的问题没有明确解决的呢？难道他们还有主张革命文艺不是为着人民大众而是为着剥削者压迫者的吗？

诚然，为着剥削者压迫者的文艺是有的。文艺是地主阶级的，这是封建主义的文艺。中国封建时代统治阶级的文学艺术，就是这种东西。直到今天，这种文艺在

中国还有颇大的势力。文艺是为资产阶级的，这是资产阶级的文艺。象鲁迅所批评的梁实秋^[3]一类人，他们虽然在口头上提出什么文艺是超阶级的，但是他们在实际上是主张资产阶级的文艺，反对无产阶级的文艺的。文艺是为帝国主义者的，周作人、张资平^[4]这批人就是这样，这叫做汉奸文艺。在我们，文艺不是为上述种种人，而是为人民的。我们曾说，现阶段的中国新文化，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文化。真正人民大众的东西，现在一定是无产阶级领导的。资产阶级领导的东西，不可能属于人民大众。新文化中的新文学新艺术，自然也是这样。对于中国和外国过去时代所遗留下来的丰富的文学艺术遗产和优良的文学艺术传统，我们是要继承的，但是目的仍然是为了人民大众。对于过去时代的文艺形式，我们也并不拒绝利用，但这些旧形式到了我们手里，给了改造，加进了新内容，也就变成革命的为人民服务的东西了。

那末，什么是人民大众呢？最广大的人民，占全人口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民，是工人、农民、兵士和城市小资产阶级。所以我们的文艺，第一是为工人的，这是领导革命的阶级。第二是为农民的，他们是革命中最广大最坚决的同盟军。第三是为武装起来了的工人农民即八路军、新四军和其他人民武装队伍的，这是革命战争的主力。第四是为城市小资产阶级劳动群众和知识分子的，他们也是革命的同盟者，他们是能够长期地和我们合作的。这

四种人，就是中华民族的最大部分，就是最广大的人民大众。

我们的文艺，应该为着上面说的四种人。我们要为这四种人服务，就必须站在无产阶级的立场上，而不能站在小资产阶级的立场上。在今天，坚持个人主义的小资产阶级立场的作家是不可能真正地为革命的工农兵群众服务的，他们的兴趣，主要是放在少数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上面。而我们现在有一部分同志对于文艺为什么人的问题不能正确解决的关键，正在这里。我这样说，不是在理论上。在理论上，或者说在口头上，我们队伍中没有一个人把工农兵群众看得比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还不重要的。我是说在实际上，在行动上。在实际上，在行动上，他们是否对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比对工农兵还更看得重要些呢？我以为是这样。有许多同志比较地注重研究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分析他们的心理，着重地去表现他们，原谅并辩护他们的缺点，而不是引导他们和自己一道去接近工农兵群众，去参加工农兵群众的实际斗争，去表现工农兵群众，去教育工农兵群众。有许多同志，因为他们自己是从小资产阶级出身，自己是知识分子，于是就只在知识分子的队伍中找朋友，把自己的注意力放在研究和描写知识分子上面。这种研究和描写如果是站在无产阶级立场上的，那是应该的。但他们并不是，或者不完全是。他们是站在小资产阶级立场，他们是把自己的作品当作小资产阶级的自我表现来创作的，我们在相当多

的文学艺术作品中看见这种东西。他们在许多时候，对于小资产阶级出身的知识分子寄予满腔的同情，连他们的缺点也给以同情甚至鼓吹。对于工农兵群众，则缺乏接近，缺乏了解，缺乏研究，缺乏知心朋友，不善于描写他们；倘若描写，也是衣服是劳动人民，面孔却是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他们在某些方面也爱工农兵，也爱工农兵出身的干部，但有些时候不爱，有些地方不爱，不爱他们的感情，不爱他们的姿态，不爱他们的萌芽状态的文艺（墙报、壁画、民歌、民间故事等）。他们有时也爱这些东西，那是为着猎奇，为着装饰自己的作品，甚至是为着追求其中落后的东西而爱的。有时就公开地鄙弃它们，而偏爱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乃至资产阶级的东西。这些同志的立足点还是在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方面，或者换句文雅的话说，他们的灵魂深处还是一个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王国。这样，为什么人的问题他们就还是没有解决，或者没有明确地解决。这不光是讲初来延安不久的人，就是到过前方，在根据地、八路军、新四军做过几年工作的人，也有许多是没有彻底解决的。要彻底地解决这个问题，非有十年八年的长时间不可。但是时间无论怎样长，我们却必须解决它，必须明确地彻底地解决它。我们的文艺工作者一定要完成这个任务，一定要把立足点移过来，一定要在深入工农兵群众、深入实际斗争的过程中，在学习马克思主义和学习社会的过程中，逐渐地移过来，移到工农兵这方面来，移到无产阶级这方面来。只

有这样，我们才能有真正为工农兵的文艺，真正无产阶级的文艺。

为什么人的问题，是一个根本的问题，原则的问题。过去有些同志间的争论、分歧、对立和不团结，并不是在这个根本的原则的问题上，而是在一些比较次要的甚至是无原则的问题上。而对于这个原则问题，争论的双方倒是没有什么分歧，倒是几乎一致的，都有某种程度的轻视工农兵、脱离群众的倾向。我说某种程度，因为一般地说，这些同志的轻视工农兵、脱离群众，和国民党的轻视工农兵、脱离群众，是不同的；但是无论如何，这个倾向是有的。这个根本问题不解决，其他许多问题也就不易解决。比如说文艺界的宗派主义吧，这也是原则问题，但是要去掉宗派主义，也只有把为工农，为八路军、新四军，到群众中去的口号提出来，并加以切实的实行，才能达到目的，否则宗派主义问题是断然不能解决的。鲁迅曾说：“联合战线是以有共同目的为必要条件的。……我们战线不能统一，就证明我们的目的不能一致，或者只为了小团体，或者还其实只为了个人。如果目的都在工农大众，那当然战线也就统一了。”〔5〕这个问题那时上海有，现在重庆也有。在那些地方，这个问题很难彻底解决，因为那些地方的统治者压迫革命文艺家，不让他们有到工农兵群众中去的自由。在我们这里，情形就完全两样。我们鼓励革命文艺家积极地亲近工农兵，给他们以到群众中去的完全自由，给他们以创作真正革命文艺的完全自由。

所以这个问题在我们这里，是接近于解决的了。接近于解决不等于完全的彻底的解决；我们说要学习马克思主义和学习社会，就是为着完全地彻底地解决这个问题。我们说的马克思主义，是要在群众生活群众斗争里实际发生作用的活的马克思主义，不是口头上的马克思主义。把口头上的马克思主义变成为实际生活里的马克思主义，就不会有宗派主义了。不但宗派主义的问题可以解决，其他的许多问题也都可以解决了。

二

为什么人服务的问题解决了，接着的问题就是如何去服务。用同志们的话来说，就是：努力于提高呢，还是努力于普及呢？

有些同志，在过去，是相当地或是严重地轻视了和忽视了普及，他们不适当地太强调了提高。提高是应该强调的，但是片面地孤立地强调提高，强调到不适当的程度，那就错了。我在前面说的没有明确地解决为什么人的问题的事实，在这一点上也表现出来了。并且，因为没有弄清楚为什么人，他们所说的普及和提高就都没有正确的标准，当然更找不到两者的正确关系。我们的文艺，既然基本上是为工农兵，那末所谓普及，也就是向工农兵普及，所谓提高，也就是从工农兵提高。用什么东西向他们普及呢？用封建地主阶级所需要、所便于接受的东西吗？用资产阶级所需要、所便于接受的东西吗？用小资

产阶级知识分子所需要、所便于接受的东西吗？都不行，只有用工农兵自己所需要、所便于接受的东西。因此在教育工农兵的任务之前，就先有一个学习工农兵的任务。提高的问题更是如此。提高要有一个基础。比如一桶水，不是从地上去提高，难道是从空中去提高吗？那末所谓文艺的提高，是从什么基础上去提高呢？从封建阶级的基础吗？从资产阶级的基础吗？从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基础吗？都不是，只能是从工农兵群众的基础上去提高。也不是把工农兵提到封建阶级、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高度”去，而是沿着工农兵自己前进的方向去提高，沿着无产阶级前进的方向去提高。而这里也就提出了学习工农兵的任务。只有从工农兵出发，我们对于普及和提高才能有正确的了解，也才能找到普及和提高的正确关系。

一切种类的文学艺术的源泉究竟是从何而来的呢？作为观念形态的文艺作品，都是一定的社会生活在人类头脑中的反映的产物。革命的文艺，则是人民生活在革命作家头脑中的反映的产物。人民生活中本来存在着文学艺术原料的矿藏，这是自然形态的东西，是粗糙的东西，但也是最生动、最丰富、最基本的东西；在这点上说，它们使一切文学艺术相形见绌，它们是一切文学艺术的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唯一的源泉。这是唯一的源泉，因为只能有这样的源泉，此外不能有第二个源泉。有人说，书本上的文艺作品，古代的和外国的文艺作品，不也是源

泉吗？实际上，过去的文艺作品不是源而是流，是古人和外国人根据他们彼时彼地所得到的人民生活中的文学艺术原料创造出来的东西。我们必须继承一切优秀的文学艺术遗产，批判地吸收其中一切有益的东西，作为我们从此时此地的人民生活中的文学艺术原料创造作品时候的借鉴。有这个借鉴和没有这个借鉴是不同的，这里有文野之分，粗细之分，高低之分，快慢之分。所以我们决不可拒绝继承和借鉴古人和外国人，那怕是封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东西。但是继承和借鉴决不可以变成替代自己的创造，这是决不能替代的。文学艺术中对于古人和外国人的毫无批判的硬搬和模仿，乃是最没有出息的最害人的文学教条主义和艺术教条主义。中国的革命的文学家艺术家，有出息的文学家艺术家，必须到群众中去，必须长期地无条件地全心全意地到工农兵群众中去，到火热的斗争中去，到唯一的最广大最丰富的源泉中去，观察、体验、研究、分析一切人，一切阶级，一切群众，一切生动的生活形式和斗争形式，一切文学和艺术的材料，然后才有可能进入创作过程。否则你的劳动就没有对象，你就只能做鲁迅在他的遗嘱里所谆谆嘱咐他的儿子万不可做的那种空头文学家，或空头艺术家〔6〕。

人类的社会生活虽是文学艺术的唯一源泉，虽是较之后者有不可比拟的生动丰富的内容，但是人民还是不满足于前者而要求后者。这是为什么呢？因为虽然两者都是美，但是文艺作品中反映出来的生活却可以而且应

该比普通的实际生活更高，更强烈，更有集中性，更典型，更理想，因此就更带普遍性。革命的文艺，应当根据实际生活创造出各种各样的人物来，帮助群众推动历史的前进。例如一方面是人们受饿、受冻、受压迫，一方面是剥削人、人压迫人，这个事实到处存在着，人们也看得很平淡；文艺就把这种日常的现象集中起来，把其中的矛盾和斗争典型化，造成文学作品或艺术作品，就能使人民群众惊醒起来，感奋起来，推动人民群众走向团结和斗争，实行改造自己的环境。如果没有这样的文艺，那末这个任务就不能完成，或者不能有力地迅速地完成。

什么是文艺工作中的普及和提高呢？这两种任务的关系是怎样的呢？普及的东西比较简单浅显，因此也比较容易为目前广大人民群众所迅速接受。高级的作品比较细致，因此也比较难于生产，并且往往比较难于在目前广大人民群众中迅速流传。现在工农兵面前的问题，是他们正在和敌人作残酷的流血斗争，而他们由于长时期的封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统治，不识字，无文化，所以他们迫切要求一个普遍的启蒙运动，迫切要求得到他们所急需的和容易接受的文化知识和文艺作品，去提高他们的斗争热情和胜利信心，加强他们的团结，便于他们同心同德地去和敌人作斗争。对于他们，第一步需要还不是“锦上添花”，而是“雪中送炭”。所以在目前条件下，普及工作的任务更为迫切。轻视和忽视普及工作的态度是错误的。

但是，普及工作和提高工作是不能截然分开的。不但一部分优秀的作品现在也有普及的可能，而且广大群众的文化水平也是在不断地提高着。普及工作若是永远停止在一个水平上，一月两月三月，一年两年三年，总是一样的货色，一样的“小放牛”〔7〕，一样的“人、手、口、刀、牛、羊”〔8〕，那末，教育者和被教育者岂不都是半斤八两？这种普及工作还有什么意义呢？人民要求普及，跟着也就要求提高，要求逐年逐月地提高。在这里，普及是人民的普及，提高也是人民的提高。而这种提高，不是从空中提高，不是关门提高，而是在普及基础上的提高。这种提高，为普及所决定，同时又给普及以指导。就中国范围来说，革命和革命文化的发展不是平衡的，而是逐渐推广的。一处普及了，并且在普及的基础上提高了，别处还没有开始普及。因此一处由普及而提高的好经验可以应用于别处，使别处的普及工作和提高工作得到指导，少走许多弯路。就国际范围来说，外国的好经验，尤其是苏联的经验，也有指导我们的作用。所以，我们的提高，是在普及基础上的提高；我们的普及，是在提高指导下的普及。正因为这样，我们所说的普及工作不但不是妨碍提高，而且是给目前的范围有限地提高工作以基础，也是给将来的范围大为广阔地提高工作准备必要的条件。

除了直接为群众所需要的提高以外，还有一种间接为群众所需要的提高，这就是干部所需要的提高。干部是群众中的先进分子，他们所受的教育一般都比群众所

受的多些；比较高级的文学艺术，对于他们是完全必要的，忽视这一点是错误的。为干部，也完全是为群众，因为只有经过干部才能去教育群众、指导群众。如果违背了这个目的，如果我们给予干部的并不能帮助干部去教育群众、指导群众，那末，我们的提高工作就是无的放矢，就是离开了为人民大众的根本原则。

总起来说，人民生活中的文学艺术的原料，经过革命作家的创造性的劳动而形成观念形态上的为人民大众的文学艺术。在这中间，既有从初级的文艺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为被提高了的群众所需要、或首先为群众中的干部所需要的高级文艺，又有反转来在这种高级文艺指导之下的、往往为今日最广大群众所最先需要的初级的文艺。无论高级的或初级的，我们的文学艺术都是为人民大众的，首先是为工农兵的，为工农兵而创作，为工农兵所利用的。

我们既然解决了提高和普及的关系问题，则专门家和普及工作者的关系问题也就可以随着解决了。我们的专门家不但是为了干部，主要地还是为了群众。我们的文学专门家应该注意群众的墙报，注意军队和农村中的通讯文学。我们的戏剧专门家应该注意军队和农村中的小剧团。我们的音乐专门家应该注意群众的歌唱。我们的美术专门家应该注意群众的美术。一切这些同志都应该和在群众中做文艺普及工作的同志们发生密切的联系，一方面帮助他们，指导他们，一方面又向他们学习，从

他们吸收由群众中来的养料，把自己充实起来，丰富起来，使自己的专门不致成为脱离群众、脱离实际、毫无内容、毫无生气的空中楼阁。我们应该尊重专门家，专门家对于我们的事业是很可宝贵的。但是我们应该告诉他们，一切革命的文学家艺术家只有联系群众，表现群众，把自己当作群众的忠实的代言人，他们的工作才有意义。只有代表群众才能教育群众，只有做群众的学生才能做群众的先生。如果把自己看作群众的主人，看作高踞于“下等人”头上的贵族，那末，不管他们有多大的才能，也是群众所不需要的，他们的工作是没有前途的。

我们的这种态度是不是功利主义的？唯物主义者并不一般地反对功利主义，但是反对封建阶级的、资产阶级的、小资产阶级的功利主义，反对那种口头上反对功利主义、实际上抱着最自私最短视的功利主义的伪善者。世界上没有什么超功利主义，在阶级社会里，不是这一阶级的功利主义，就是那一阶级的功利主义。我们是无产阶级的革命的功利主义者，我们是以占全人口百分之九十以上的最广大群众在目前利益和将来利益的统一为出发点的，所以我们是最广和最远为目标的革命的功利主义者，而不是只看到局部和目前的狭隘的功利主义者。例如，某种作品，只为少数人所偏爱，而为多数人所不需要，甚至对多数人有害，硬要拿来上市，拿来向群众宣传，以求其个人的或狭隘集团的功利，还要责备群众的功利主义，这就不但侮辱群众，也太无自知之明了。任何一种东

西，必须能使人民群众得到真实的利益，才是好的东西。就算你的“阳春白雪”吧，这暂时既然是少数人享用的东西，群众还是在那里唱“下里巴人”〔9〕，那末，你不去提高它，只顾骂人，那就怎样骂也是空的。现在是“阳春白雪”和“下里巴人”统一的问题，是提高和普及统一的问题。不统一，任何专门家的最高级的艺术也不免成为最狭隘的功利主义；要说这也是清高，那只是自封为清高，群众是不会批准的。

在为工农兵和怎样为工农兵的基本方针问题解决之后，其他的问题，例如，写光明和写黑暗的问题，团结问题等，便都一齐解决了。如果大家同意这个基本方针，则我们的文学艺术工作者，我们的文学艺术学校，文学艺术刊物，文学艺术团体和一切文学艺术活动，就应该依照这个方针去做。离开这个方针就是错误的；和这个方针有些不相符合的，就须加以适当的修正。

三

我们的文艺既然是为人民大众的，那末，我们就可以进而讨论一个党内关系问题，党的文艺工作和党的整个工作的关系问题，和另一个党外关系的问题，党的文艺工作和非党的文艺工作的关系问题——文艺界统一战线问题。

先说第一个问题。在现在世界上，一切文化或文学艺术都是属于一定的阶级，属于一定的政治路线的。为

艺术的艺术，超阶级的艺术，和政治并行或互相独立的艺术，实际上是不存在的。无产阶级的文学艺术是无产阶级整个革命事业的一部分，如同列宁所说，是整个革命机器中的“齿轮和螺丝钉”〔10〕。因此，党的文艺工作，在党的整个革命工作中的位置，是确定了的，摆好了的；是服从党在一定革命时期内所规定的革命任务的。反对这种摆法，一定要走到二元论或多元论，而其质就象托洛茨基那样：“政治——马克思主义的；艺术——资产阶级的。”我们不赞成把文艺的重要性过分强调到错误的程度，但也不赞成把文艺的重要性估计不足。文艺是从属于政治的，但又反过来给予伟大的影响于政治。革命文艺是整个革命事业的一部分，是齿轮和螺丝钉，和别的更重要的部分比较起来，自然有轻重缓急第一第二之分，但它是对于整个机器不可缺少的齿轮和螺丝钉，对于整个革命事业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如果连最广义最普通的文学艺术也没有，那革命运动就不能进行，就不能胜利。不认识这一点，是不对的。还有，我们所说的文艺服从于政治，这政治是指阶级的政治、群众的政治，不是所谓少数政治家的政治。政治，不论革命的和反革命的，都是阶级对阶级的斗争，不是少数个人的行为。革命的思想斗争和艺术斗争，必须服从于政治的斗争，因为只有经过政治，阶级和群众的需要才能集中地表现出来。革命的政治家们，懂得革命的政治科学或政治艺术的政治专门家们，他们只是千千万万的群众政治家的领袖，他们的任务在于把群

众政治家的意见集中起来，加以提炼，再使之回到群众中去，为群众所接受，所实践，而不是闭门造车，自作聪明，只此一家，别无分店的那种贵族式的所谓“政治家”，——这是无产阶级政治家同腐朽了的资产阶级政治家的原则区别。正因为这样，我们的文艺的政治性和真实性才能够完全一致。不认识这一点，把无产阶级的政治和政治家庸俗化，是不对的。

再说文艺界的统一战线问题。文艺服从于政治，今天中国政治的第一个根本问题是抗日，因此党的文艺工作者首先应该在抗日这一点上和党外的一切文学家艺术家（从党的同情分子、小资产阶级的艺术家到一切赞成抗日的资产阶级地主阶级的艺术家）团结起来。其次，应该在民主一点上团结起来；在这一点上，有一部分抗日的文艺家就不赞成，因此团结的范围就不免要小一些。再次，应该在文艺界的特殊问题——艺术方法艺术作风一点上团结起来；我们是主张社会主义的现实主义的，又有一部分人不赞成，这个团结的范围会更小些。在一个问题上有团结，在另一个问题上就有斗争，有批评。各个问题是彼此分开而又联系着的，因而就在产生团结的问题比如抗日的问题上也同时有斗争，有批评。在一个统一战线里面，只有团结而无斗争，或者只有斗争而无团结，实行如过去某些同志所实行过的右倾的投降主义、尾巴主义，或者“左”倾的排外主义、宗派主义，都是错误的政策。政治上如此，艺术上也是如此。

在文艺界统一战线的各种力量里面，小资产阶级文艺家在中国是一个重要的力量。他们的思想和作品都有很多缺点，但是他们比较地倾向于革命，比较地接近于劳动人民。因此，帮助他们克服缺点，争取他们到为劳动人民服务的战线上来，是一个特别重要的任务。

四

文艺界的主要的斗争方法之一，是文艺批评。文艺批评应该发展，过去在这方面工作做得很不够，同志们指出这一点是对的。文艺批评是一个复杂的问题，需要许多专门的研究。我这里只着重谈一个基本的批评标准问题。此外，对于有些同志所提出的一些个别的问题和一些不正确的观点，也来略为说一说我的意见。

文艺批评有两个标准，一个是政治标准，一个是艺术标准。按照政治标准来说，一切利于抗日和团结的，鼓励群众同心同德的，反对倒退、促成进步的东西，便都是好的；而一切不利于抗日和团结的，鼓动群众离心离德的，反对进步、拉着人们倒退的东西，便都是坏的。这里所说的好坏，究竟是看动机（主观愿望），还是看效果（社会实践）呢？唯心论者是强调动机否认效果的，机械唯物论者是强调效果否认动机的，我们和这两者相反，我们是辩证唯物主义的动机和效果的统一论者。为大众的动机和被大众欢迎的效果，是分不开的，必须使二者统一起来。为个人的和狭隘集团的动机是不好的，有为大众的动机但

无被大众欢迎、对大众有益的效果，也是不好的。检验一个作家的主观愿望即其动机是否正确，是否善良，不是看他的宣言，而是看他的行为（主要是作品）在社会大众中产生的效果。社会实践及其效果是检验主观愿望或动机的标准。我们的文艺批评是不要宗派主义的，在团结抗日的大原则下，我们应该容许包含各种各色政治态度的文艺作品的存在。但是我们的批评又是坚持原则立场的，对于一切包含反民族、反科学、反大众和反共的观点的文艺作品必须给以严格的批判和驳斥；因为这些所谓文艺，其动机，其效果，都是破坏团结抗日的。按着艺术标准来说，一切艺术性较高的，是好的，或较好的；艺术性较低的，则是坏的，或较坏的。这种分别，当然也要看社会效果。文艺家几乎没有不以为自己的作品是美的，我们的批评，也应该容许各种各色艺术品的自由竞争；但是按照艺术科学的标准给以正确的批判，使较低级的艺术逐渐提高成为较高级的艺术，使不适合广大群众斗争要求的艺术改变到适合广大群众斗争要求的艺术，也是完全必要的。

又是政治标准，又是艺术标准，这两者的关系怎么样呢？政治并不等于艺术，一般的宇宙观也并不等于艺术创作和艺术批评的方法。我们不但否认抽象的绝对不变的政治标准，也否认抽象的绝对不变的艺术标准，各个阶级社会中的各个阶级都有不同的政治标准和不同的艺术标准。但是任何阶级社会中的任何阶级，总是以政治标

准放在第一位，以艺术标准放在第二位的。资产阶级对于无产阶级的文学艺术作品，不管其艺术成就怎样高，总是排斥的。无产阶级对于过去时代的文学艺术作品，也必须首先检查它们对待人民的态度如何，在历史上有无进步意义，而分别采取不同态度。有些政治上根本反动的东西，也可能有某种艺术性。内容愈反动的作品而又愈带艺术性，就愈能毒害人民，就愈应该排斥。处于没落时期的一切剥削阶级的文艺的共同特点，就是其反动的政治内容和其艺术的形式之间所存在的矛盾。我们的要求则是政治和艺术的统一，内容和形式的统一，革命的政治内容和尽可能完美的艺术形式的统一。缺乏艺术性的艺术品，无论政治上怎样进步，也是没有力量的。因此，我们既反对政治观点错误的艺术品，也反对只有正确的政治观点而没有艺术力量的所谓“标语口号式”的倾向。我们应该进行文艺问题上的两条战线斗争。

这两种倾向，在我们的许多同志的思想中是存在着的。许多同志有忽视艺术的倾向，因此应该注意艺术的提高。但是现在更成为问题的，我以为还是在政治方面。有些同志缺乏基本的政治常识，所以发生了各种糊涂观念。让我举一些延安的例子。

“人性论。”有没有人性这种东西？当然有的。但是只有具体的人性，没有抽象的人性。在阶级社会里就是只有带着阶级性的人性，而没有什么超阶级的人性。我们主张无产阶级的人性，人民大众的人性，而地主阶级资

产阶级则主张地主阶级资产阶级的人性，不过他们口头上不这样说，却说成为唯一的人性。有些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所鼓吹的人性，也是脱离人民大众或者反对人民大众的，他们的所谓人性实质上不过是资产阶级的个人主义，因此在他们眼中，无产阶级的人性就不合于人性。现在延安有些人们所主张的作为所谓文艺理论基础的“人性论”，就是这样讲，这是完全错误的。

“文艺的基本出发点是爱，是人类之爱。”爱可以是出发点，但是还有一个基本出发点。爱是观念的东西，是客观实践的产物。我们根本上不是从观念出发，而是从客观实践出发。我们的知识分子出身的文艺工作者爱无产阶级，是社会使他们感觉到和无产阶级有共同的命运的结果。我们恨日本帝国主义，是日本帝国主义压迫我们的结果。世上决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至于所谓“人类之爱”，自从人类分化成为阶级以后，就没有过这种统一的爱。过去的一切统治阶级喜欢提倡这个东西，许多所谓圣人贤人也喜欢提倡这个东西，但是无论谁都没有真正实行过，因为它在阶级社会里是不可能实行的。真正的人类之爱是会有的，那是在全世界消灭了阶级之后。阶级使社会分化为许多对立体，阶级消灭后，那时就有了整个的人类之爱，但是现在还没有。我们不能爱敌人，不能爱社会的丑恶现象，我们的目的是消灭这些东西。这是人们的常识，难道我们的文艺工作者还有不懂得的么？

“从来的艺术作品都是写光明和黑暗并重，一半对一半。”这里包含着许多糊涂观念。艺术作品并不是从来都这样。许多小资产阶级作家并没有找到过光明，他们的作品就只是暴露黑暗，被称为“暴露文学”，还有简直是专门宣传悲观厌世的。相反地，苏联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文学就是以写光明为主。他们也写工作中的缺点，也写反面的人物，但是这种描写只能成为整个光明的陪衬，并不是所谓“一半对一半”。反动时期的资产阶级文艺家把革命群众写成暴徒，把他们自己写成神圣，所谓光明和黑暗是颠倒的。只有真正革命的文艺家才能正确地解决歌颂和暴露的问题。一切危害人民群众的黑暗势力必须暴露之，一切人民群众的革命斗争必须歌颂之，这就是革命文艺家的基本任务。

“从来文艺的任务就在于暴露。”这种讲法和前一种一样，都是缺乏历史科学知识的见解。从来的文艺并不单在于暴露，前面已经讲过。对于革命的文艺家，暴露的对象，只能是侵略者、剥削者、压迫者及其在人民中所遗留的恶劣影响，而不能是人民大众。人民大众也是有缺点的，这些缺点应当用人民内部的批评和自我批评来克服，而进行这种批评和自我批评也是文艺的最重要任务之一。但这不应该说是什么“暴露人民”。对于人民，基本上是一个教育和提高他们的问题。除非是反革命文艺家，才有所谓人民是“天生愚蠢的”，革命群众是“专制暴徒”之类的描写。

“还是杂文时代，还要鲁迅笔法。”鲁迅处在黑暗势力统治下面，没有言论自由，所以用冷嘲热讽的杂文形式作战，鲁迅是完全正确的。我们也需要尖锐地嘲笑法西斯主义、中国的反动派和一切危害人民的事物，但在给革命文艺家以充分民主自由、仅仅不给反革命分子以民主自由的陕甘宁边区和敌后的各抗日根据地，杂文形式就不应该简单地和鲁迅的一样。我们可以大声疾呼，而不要隐晦曲折，使人民大众不易看懂。如果不是对于人民的敌人，而是对于人民自己，那末，“杂文时代”的鲁迅，也不曾嘲笑和攻击革命人民和革命政党，杂文的写法也和对于敌人的完全两样。对于人民的缺点是需要批评的，我们在前面已经说过了，但必须是真正站在人民的立场上，用保护人民、教育人民的满腔热情来说话。如果把同志当作敌人来对待，就是使自己站在敌人的立场上去了。我们是否废除讽刺？不是的，讽刺是永远需要的。但是有几种讽刺：有对付敌人的，有对付同盟者的，有对付自己队伍的，态度各有不同。我们并不一般地反对讽刺，但是必须废除讽刺的乱用。

“我是不歌功颂德的；歌颂光明者其作品未必伟大，刻画黑暗者其作品未必渺小。”你是资产阶级文艺家，你就不歌颂无产阶级而歌颂资产阶级；你是无产阶级文艺家，你就不歌颂资产阶级而歌颂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二者必居其一。歌颂资产阶级光明者其作品未必伟大，刻画资产阶级黑暗者其作品未必渺小，歌颂无产阶级光明

者其作品未必不伟大，刻画无产阶级所谓“黑暗”者其作品必定渺小，这难道不是文艺史上的事实吗？对于人民，这个人类世界历史的创造者，为什么不应该歌颂呢？无产阶级，共产党，新民主主义，社会主义，为什么不应该歌颂呢？也有这样的一种人，他们对于人民的事业并无热情，对于无产阶级及其先锋队的战斗和胜利，抱着冷眼旁观的态度，他们所感到兴趣而要不疲倦地歌颂的只有他自己，或者加上他所经营的小集团里的几个角色。这种小资产阶级的个人主义者，当然不愿意歌颂革命人民的功德，鼓舞革命人民的斗争勇气和胜利信心。这样的人不过是革命队伍中的蠹虫，革命人民实在不需要这样的“歌者”。

“不是立场问题；立场是对的，心是好的，意思是懂得的，只是表现不好，结果反而起了坏作用。”关于动机和效果的辩证唯物主义观点，我在前面已经讲过了。现在要问：效果问题是不是立场问题？一个人做事只凭动机，不问效果，等于一个医生只顾开药方，病人吃死了多少他是不管的。又如一个党，只顾发宣言，实行不实行是不管的。试问这种立场也是正确的吗？这样的心，也是好的吗？事前顾及事后的效果，当然可能发生错误，但是已经有了事实证明效果坏，还是照老样子做，这样的心也是好的吗？我们判断一个党、一个医生，要看实践，要看效果；判断一个作家，也是这样。真正的好心，必须顾及效果，总结经验，研究方法，在创作上就叫做表现的手法。真正

的好心，必须对于自己工作的缺点错误有完全诚意的自我批评，决心改正这些缺点错误。共产党人的自我批评方法，就是这样采取的。只有这种立场，才是正确的立场。同时也只有在这种严肃的负责的实践过程中，才能一步一步地懂得正确的立场是什么东西，才能一步一步地掌握正确的立场。如果不在实践中向这个方向前进，只是自以为是，说是“懂得”，其实并没有懂得。

“提倡学习马克思主义就是重复辩证唯物论的创作方法的错误，就要妨害创作情绪。”学习马克思主义，是要我们用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的观点去观察世界，观察社会，观察文学艺术，并不是要我们在文学艺术作品中写哲学讲义。马克思主义只能包括而不能代替文艺创作中的现实主义，正如它只能包括而不能代替物理科学中的原子论、电子论一样。空洞干燥的教条公式是要破坏创作情绪的，但是它不但破坏创作情绪，而且首先破坏了马克思主义。教条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并不是马克思主义，而是反马克思主义的。那末，马克思主义就不破坏创作情绪了吗？要破坏的，它决定地要破坏那些封建的、资产阶级的、小资产阶级的、自由主义的、个人主义的、虚无主义的、为艺术而艺术的、贵族式的、颓废的、悲观的以及其他种种非人民大众非无产阶级的创作情绪。对于无产阶级艺术家，这些情绪应不应该破坏呢？我以为是应该的，应该彻底地破坏它们，而在破坏的同时，就可以建设起新东西来。

五

我们延安文艺界中存在着上述种种问题，这是说明一个什么事实呢？说明这样一个事实，就是文艺界中还严重地存在着作风不正的东西，同志们中间还有很多的唯心论、教条主义、空想、空谈、轻视实践、脱离群众等等的缺点，需要有一个切实的严肃的整风运动。

我们有许多同志还不大清楚无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区别。有许多党员，在组织上入了党，思想上并没有完全入党，甚至完全没有入党。这种思想上没有入党的人，头脑里还装着许多剥削阶级的脏东西，根本不知道什么是无产阶级思想，什么是共产主义，什么是党。他们想：什么无产阶级思想，还不是那一套？他们那里知道要得到这一套并不容易，有些人就是一辈子也没有共产党员的气味，只有离开党完事。因此我们的党，我们的队伍，虽然其中的大部分是纯洁的，但是为要领导革命运动更好地发展，更快地完成，就必须从思想上组织上认真地整顿一番。而为要从组织上整顿，首先需要在思想上整顿，需要展开一个无产阶级对非无产阶级的思想斗争。延安文艺界现在已经展开了思想斗争，这是很必要的。小资产阶级出身的人们总是经过种种方法，也经过文学艺术的方法，顽强地表现他们自己，宣传他们自己的主张，要求人们按照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面貌来改造党，改造世界。在这种情形下，我们的工作，就是要向他们大喝一

声，说：“同志”们，你们那一套是不行的，无产阶级是不能迁就你们的，依了你们，实际上就是依了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就有亡党亡国的危险。只能依谁呢？只能依照无产阶级先锋队的面貌改造党，改造世界。我们希望文艺界的同志们认识这一场大论战的严重性，积极起来参加这个斗争，使每个同志都健全起来，使我们的整个队伍在思想上和组织上都真正统一起来，巩固起来。

因为思想上有许多问题，我们有许多同志也就不大能真正区别革命根据地和国民党统治区，并由此弄出许多错误。同志们很多是从上海亭子间^{〔11〕}来的；从亭子间到革命根据地，不但是经历了两种地区，而且是经历了两个历史时代。一个是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统治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一个是无产阶级领导的革命的新民主主义的社会。到了革命根据地，就是到了中国历史几千年来空前未有的人民大众当权的时代。我们周围的人物，我们宣传的对象，完全不同了。过去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因此，我们必须和新的群众相结合，不能有任何迟疑。如果同志们在新的群众中间，还是象我上次说的“不熟，不懂，英雄无用武之地”，那末，不但下乡要发生困难，不下乡，就在延安，也要发生困难的。有的同志想：我还是为“大后方”^{〔12〕}的读者写作吧，又熟悉，又有“全国意义”。这个想法，是完全不正确的。“大后方”也是要变的，“大后方”的读者，不需要从革命根据地的作家听那些早已听厌了的老故事，他们希望革命根据地的作家告诉

他们新的人物，新的世界。所以愈是为革命根据地的群众而写的作品，才愈有全国意义。法捷耶夫的《毁灭》^{〔13〕}，只写了一支很小的游击队，它并没有想去投合旧世界读者的口味，但是却产生了全世界的影响，至少在中国，象大家所知道的，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中国是向前的，不是向后的，领导中国前进的是革命的根据地，不是任何落后倒退的地方。同志们在整风中间，首先要认识这一个根本问题。

既然必须和新的群众的时代相结合，就必须彻底解决个人和群众的关系问题。鲁迅的两句诗，“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14〕}，应该成为我们的座右铭。“千夫”在这里就是说敌人，对于无论什么凶恶的敌人我们决不屈服。“孺子”在这里就是说无产阶级和人民群众。一切共产党员，一切革命家，一切革命的文艺工作者，都应该学鲁迅的榜样，做无产阶级和人民群众的“牛”，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知识分子要和群众结合，要为群众服务，需要一个互相认识的过程。这个过程可能而且一定会发生许多痛苦，许多磨擦，但是只要大家有决心，这些要求是能够达到的。

今天我所讲的，只是我们文艺运动中的一些根本方向问题，还有许多具体问题需要今后继续研究。我相信，同志们是有决心走这个方向的。我相信，同志们在整风过程中，在今后长期的学习和工作中，一定能够改造自己和自己作品的面貌，一定能够创造出许多为人民大

众所热烈欢迎的优秀作品，一定能够把革命根据地的文艺运动和全中国的文艺运动推进到一个光辉的新阶段。

注 释

〔1〕陕甘宁边区原为一九三一年以后在陕北革命游击战争中逐步发展起来的革命根据地。中央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成为中共中央所在地和革命的中心根据地。一九三七年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建立以后，陕甘宁红色区域改名为陕甘宁边区，共辖延安、鄜县、甘泉、延川、延长、安定（今子长）、安塞、志丹、靖边、神木、府谷、定边、柛邑（现改为旬邑）、淳化、环县、庆阳、合水、镇原、宁县、正宁、盐池、绥德、清涧、吴堡、米脂、葭县（现改为佳县）等二十余县。

〔2〕见列宁《党的组织和党的文学》（一九〇五年十一月十三日）一文。列宁在这篇论文中描写无产阶级文学的特征说：“这将是自由的文学，因为不是贪欲也不是野心，而是社会主义思想和对劳动人民的同情将招集一批又一批新的力量到它的队伍里来。这将是自由的文学，因为它将不是替饱食终日的贵妇人服务，不是替百无聊赖和胖得发愁的‘几万上等人’服务，而是为千千万万劳动人民服务，这些劳动人民是国家的精华，国家的力量，国家的未来。这将是自由的文学，它要用社会主义无产阶级的经验和活生生的工作去丰富人类革命思想的最高成就，它要创造过去的经验（完成了社会主义从原始空想形式的发展的科学社会主义）和现在的经验（工人同志们当前的斗争）之间经常的相互作用。”

〔3〕梁实秋是反革命的国家社会党的党员。他在长时期中宣传美国反动资产阶级的文艺思想，坚持反对革命，咒骂革命文艺。

〔4〕周作人、张资平在一九三七年日本占领北平、上海后，先后投降日寇。

〔5〕见《鲁迅全集》第四卷《二心集》：《对于左翼作家联盟的意见》。

〔6〕见《鲁迅全集》第六卷《且介亭杂文末编》《附集》：《死》。

〔7〕《小放牛》，一出流行的中国小歌舞剧，全剧只有两个角色，男角是

牧童，女角是乡村小姑娘，以互相对答的方式表现剧的内容。抗日战争初期，有人利用这个歌舞剧的形式，变动其原来的词句，宣传抗日，一时颇为流行。

〔8〕“人、手、口、刀、牛、羊”，这是笔画比较简单的汉字，旧时小学国语课本都把这些字编在第一册的最初几课里。

〔9〕《阳春白雪》、《下里巴人》，都是公元前三世纪楚国的歌曲。《阳春白雪》属于较高级的音乐，《下里巴人》属于较低级的音乐。《文选》：《宋玉对楚王问》记载一个故事，说有人在楚都唱歌，唱《阳春白雪》时，“国中属而和者（跟着唱的），不过数十人”；但唱《下里巴人》时，“国中属而和者数千人”。

〔10〕见列宁《党的组织和党的文学》一文。他说：“文学事业应当成为无产阶级总的事业的一部分，成为一个统一的、伟大的、由整个工人阶级全体觉悟的先锋队所开动的社会民主主义的机器的‘齿轮和螺丝钉’。”

〔11〕亭子间是上海楼房中的一种小房间，位置在房子后部的楼梯中侧，狭小黑暗，因此租金比较低廉。贫苦的文艺作家、知识分子和机关小职员，多半租这种房间居住。

〔12〕抗日战争时期，抗日前线是在华北、华东、华中、华南，人们通常把国民党统治的、没有被日本侵略军占领的中国西南、西北部叫做“大后方”。

〔13〕法捷耶夫（一九〇一年——一九五六年），苏联名作家。他所作的小说《毁灭》于一九二七年出版，内容是描写苏联内战时期由西伯利亚工人、农民和革命知识分子所组成的一支游击队和反革命匪帮进行斗争的故事，曾由鲁迅译为汉文。

〔14〕见《鲁迅全集》第七卷《集外集》：《自嘲》。

选自《毛泽东著作选读（甲种本）》

毛泽东

学习和时局*

(一九四四年四月十二日)

—

去年冬季开始，我党高级干部学习了党史中的两条路线问题。这次学习使广大高级干部的政治水平大大地提高了。在这次学习中，同志们提出了许多问题，中央政治局曾对其中的几个重要问题作了结论。这些结论是：

(一)关于研究历史经验应取何种态度问题。中央认为应使干部对于党内历史问题在思想上完全弄清楚，同

-
- 中国共产党中央领导机关和高级干部在一九四二年到一九四四年间，对于党的历史特别是党在一九三一年初到一九三四年底时期的历史所进行的讨论，大大地帮助了党内思想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基础上的统一。一九三五年一月党中央在贵州省遵义城所召集的扩大的政治局会议虽然纠正了从一九三一年初到一九三四年底的“左”倾错误路线，改变了党中央的领导机关的成份，确立了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领导，把党的路线转到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正确轨道上，但是在党的很多干部中间，对于过去的错误路线的性

时对于历史上犯过错误的同志在作结论时应取宽大的方针，以便一方面，彻底了解我党历史经验，避免重犯错误；又一方面，能够团结一切同志，共同工作。我党历史上，曾经有过反对陈独秀错误路线和李立三错误路线的大斗争，这些斗争是完全应该的。但其方法有缺点：一方面，没有使干部在思想上彻底了解当时错误的原因、环境和改正此种错误的详细办法，以致后来又可能重犯同类性质的错误；另一方面，太着重了个人的责任，未能团结更多的人共同工作。这两个缺点，我们应引以为鉴戒。这次处理历史问题，不应着重于一些个别同志的责任方面，而应着重于当时环境的分析，当时错误的内容，当时错误的社会根源、历史根源和思想根源，实行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借以达到既要弄清思想又要团结同志这样两个目的。对于人的处理问题取慎重态度，既不含糊敷衍，又不损害同志，这是我们的党兴旺发达的标志之一。

(二)对于任何问题应取分析态度，不要否定一切。例如对于四中全会^{〔1〕}至遵义会议时期中央的领导路线

质却没有作过彻底的清算。为着进一步地提高党的干部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党中央政治局在一九四二年到一九四三年这个时间内，曾经几次进行了关于党的历史的讨论；随后又在一九四三年到一九四四年这个时期内，领导全党高级干部进行同样的讨论。这个讨论为一九四五年召集的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作了重要的准备，使那次大会达到了中国共产党前所未有的思想上政治上的一致。《学习和时局》就是毛泽东同志在延安高级干部会议上对于这个讨论所作的讲演。

问题，应作两方面的分析：一方面，应指出那个时期中央领导机关所采取的政治策略、军事策略和干部政策在其主要方面都是错误的；另一方面，应指出当时犯错误的同志在反对蒋介石、主张土地革命和红军斗争这些基本问题上，和我们之间是没有争论的。即在策略方面也要进行分析。例如在土地问题上，当时的错误是实行了地主不分田、富农分坏田的过左政策，但在没收地主土地分给无地和少地的农民这一点上，则是和我们一致的。列宁说，对于具体情况作具体的分析，是“马克思主义的最本质的东西、马克思主义的活的灵魂”〔2〕。我们许多同志缺乏分析的头脑，对于复杂事物，不愿作反复深入的分析研究，而爱作绝对肯定或绝对否定的简单结论。我们报纸上分析文章的缺乏，党内分析习惯的还没有完全养成，都表示这个毛病的存在。今后应该改善这种状况。

（三）关于党的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的讨论。应该指出，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的路线是基本上正确的，因为它确定了现时革命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性质，确定了当时形势是处在两个革命高潮之间，批判了机会主义和盲动主义，发布了十大纲领〔3〕等，这些都是正确的。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亦有缺点，例如没有指出中国革命的极大的长期性和农村根据地在中国革命中的极大的重要性，以及还有其他若干缺点或错误。但无论如何，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在我党历史上是起了进步作用的。

(四)关于一九三一年上海临时中央及在其后由此临时中央召开的五中全会^[4]是否合法的问题。中央认为是合法的,但应指出其选举手续不完备,并以此作为历史教训。

(五)关于党内历史上的宗派问题。应该指出,我党历史上存在过并且起了不良作用的宗派,经过遵义会议以来的几次变化,现在已经不存在了。这次党内两条路线的学习,指出这种宗派曾经在历史上存在过并起了不良作用,这是完全必要的。但是如果以为经过一九三五年一月的遵义会议,一九三八年十月的第六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一九四一年九月的政治局扩大会议^[5],一九四二年的全党整风和一九四三年冬季开始的对于党内历史上两条路线斗争的学习,这样许多次党内斗争的变化之后,还有具备原来的错误的政治纲领和组织形态的那种宗派存在,则是不对的。过去的宗派现在已经没有了。目前剩下的,只是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思想形态的残余,我们继续深入地进行整风学习,就可以将它们克服过来。目前在我们党内严重地存在和几乎普遍地存在的乃是带着盲目性的山头主义倾向^[6]。例如由于斗争历史不同、工作地域不同(这一根据地 and 那一根据地的不同,敌占区、国民党统治区和革命根据地的不同)和工作部门不同(这一部分军队和那一部分军队的不同,这一种工作和那一种工作的不同)而产生的各部分同志间互相不了解、不尊重、不团结的现象,看来好似平常,实

则严重地妨碍着党的统一和妨碍着党的战斗力的增强。山头主义的社会历史根源，是中国小资产阶级的特别广大和长期被敌人分割的农村根据地，而党内教育不足则是其主观原因。指出这些原因，说服同志们去掉盲目性，增加自觉性，打通同志间的思想，提倡同志间的互相了解、互相尊重，以实现全党大团结，是我们当前的重要任务。

以上所说的问题，如能在全党获得明确的理解，则不但可以保证这次党内学习一定得到成功，而且将保证中国革命一定得到胜利。

二

目前时局有两个特点，一是反法西斯阵线的增强和法西斯阵线的衰落；二是在反法西斯阵线内部人民势力的增强和反人民势力的衰落。前一个特点是很明显的，容易被人们看见。希特勒不久就会被打败，日寇也已处在衰败过程中。后一个特点，比较地还不明显，还不容易被一般人看见，但是它已在欧洲、在英美、在中国一天一天显露出来。

中国人民势力的增强，要以我党为中心来说明。

我党在抗日时期的发展，可分为三个阶段。一九三七年至一九四〇年为第一个阶段。在此阶段的头两年内，即在一九三七年和一九三八年，日本军阀重视国民党，轻

视共产党，故用其主要力量向国民党战线进攻，对它采取以军事打击为主、以政治诱降为辅的政策，而对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根据地则不重视，以为不过是少数共产党人在那里打些游击仗罢了。但是自一九三八年十月日本帝国主义者占领武汉以后，他们即已开始改变这个政策，改为重视共产党，轻视国民党；改为以政治诱降为主、以军事打击为辅的政策去对付国民党，而逐渐转移其主力来对付共产党。因为这时日本帝国主义者感觉国民党已不可怕，共产党则是可怕的了。国民党在一九三七年和一九三八年内，抗战是比较努力的，同我党的关系也比较好，对于人民抗日运动虽有许多限制，但也允许有较多的自由。自从武汉失守以后，由于战争失败和仇视共产党这种情绪的发展，国民党就逐渐反动，反共活动逐渐积极，对日抗战逐渐消极。共产党在一九三七年，因为在内战时期受了挫折的结果，仅有四万左右有组织的党员和三万多人的军队，因此为日本军阀所轻视。但到一九四〇年，党员已发展到八十万，军队已发展到近五十万，根据地人口包括一面负担粮税和两面负担粮税的〔7〕，约达一万万。几年内，我党开辟了一个广大的解放区战场，以至于能够停止日寇主力向国民党战场作战略进攻至五年半之久，将日军主力吸引到自己周围，挽救了国民党战场的危机，支持了长期的抗战。但在此阶段内，我党一部分同志，犯了一种错误，这种错误就是轻视日本帝国主义（因此不注意战争的长期性和残酷性，主张以大兵团的运动战为主，而

轻视游击战争)，依赖国民党，缺乏清醒的头脑和缺乏独立的政策（因此产生对国民党的投降主义，对于放手发动群众建立敌后抗日民主根据地和大量扩大我党领导的军队等项政策，发生了动摇）。同时，我党吸收了广大数目的新党员，他们还没有经验；一切敌后根据地也都是新创的，还没有巩固起来。这一阶段内，由于时局开展和党与军队的发展，党内又生长了一种骄气，许多人以为自己了不得了。在这一阶段内，我们曾经克服了党内的右倾偏向，执行了独立政策，不但打击了日本帝国主义，创立了根据地，发展了八路军新四军，而且打退了国民党的第一次反共高潮。

一九四一年和一九四二年为第二阶段。日本帝国主义者为准准备和执行反英美的战争，将他们在武汉失守以后已经改变了的方针，即由对国民党为主的方针改为对共产党为主的方针，更加强调起来，更加集中其主力于共产党领导的一切根据地的周围，进行连续的“扫荡”战争，残酷的“三光”政策，着重地打击我党，致使我党在一九四一年和一九四二年这两年内处于极端困难的地位。这一阶段内，我党根据地缩小了，人口降到五千万以下，八路军也缩小到三十多万，干部损失很多，财政经济极端困难。同时，国民党又认为他们已经闲出手来，千方百计地反对我党，发动了第二次反共高潮，和日本帝国主义配合着进攻我们。但是这种困难地位教育了共产党人，使我们学到了很多東西。我们学会了如何反对敌人的“扫荡”

战争、“蚕食”政策〔8〕、“治安强化”运动〔9〕、“三光”政策和自首政策；我们学会了或开始学会了统一战线政权的“三三制”政策、土地政策、整顿三风、精兵简政、统一领导、拥政爱民、发展生产等项工作，克服了许多缺点，并且把第一阶段内许多人自以为了不得的那股骄气也克服下去了。这一阶段内，我们虽然受了很大的损失，但是我们站住脚了，一方面打退了日寇的进攻，一方面又打退了国民党的第二次反共高潮。因为国民党的反共和我们不得不同国民党的反共政策作自卫斗争的这些情况，党内又生长了一种过左的偏向，例如以为国共合作就要破裂，因而过分地打击地主，不注意团结党外人士等。但是这些过左偏向，也被我们克服过来了。我们指出了在反磨擦斗争中的有理有利有节的原则，指出了在统一战线中又团结又斗争和以斗争求团结的必要，保持了国内和根据地内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一九四三年到现在为第三阶段。我们的各项政策更为见效，特别是整顿三风和发展生产这样两项工作，发生了根本性质的效果，使我党在思想基础和物质基础两方面，立于不败之地。此外，我们又在去年学会了或开始学会了审查干部和反对特务的政策。在这种情形下，我们根据地的面积又扩大了，根据地的人口，包括一面负担和两面负担的，又已上升到八千余万，军队又有了四十七万，民兵二百二十七万，党员发展到了九十多万。

一九四三年，日本军阀对中国的政策没有什么变化，还是以打击共产党为主。从一九四一年至今这三年多以来，百分之六十以上的在华日军是压在我党领导的各个抗日根据地身上。三年多以来，国民党留在敌后的数十万军队经不起日本帝国主义的打击，约有一半投降了敌人，约有一半被敌人消灭，残存的和撤走的为数极少。这些投降敌人的国民党军队反过来进攻我党，我党又要担负抗击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伪军。国民党只担负抗击不到百分之四十的日军和不到百分之十的伪军。从一九三八年十月武汉失守起，整整五年半时间，日本军阀没有举行过对国民党战场的战略进攻，只有几次较大的战役行动（浙赣、长沙、鄂西、豫南、常德），也是早出晚归，而集中其主要注意力于我党领导的抗日根据地。在此情况下，国民党采取上山政策和观战政策，敌人来了招架一下，敌人退了袖手旁观。一九四三年国民党的国内政策更加反动，发动了第三次反共高潮，但是又被我们打退了。

一九四三年，直至今年春季，日寇在太平洋战线逐渐失利，美国的反攻增强了，西方的希特勒在苏联红军严重打击之下有摇摇欲倒之势。为救死计，日本帝国主义想到要打通平汉、粤汉两条铁路；又以其对重庆国民党的诱降政策还没有得到结果，有给它以再一次打击之必要，故有在今年大举进攻国民党战线的计划。河南战役^[10]已打了一个多月。敌人不过几个师团，国民党几十万军队

不战而溃，只有杂牌军还能打一下。汤恩伯部官脱离兵，军脱离民，混乱不堪，损失三分之二以上。胡宗南派到河南的几个师，也是一触即溃。这种情况，完全是几年来国民党厉行反动政策的结果。自武汉失守以来的五年半中，共产党领导的解放区战场担负了抗击日伪主力的重担，这在今后虽然可能发生某些变化，但这种变化也只能是暂时的，因为国民党在五年半以来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反动政策下所养成的极端腐化状态，今后必将遭到严重的挫败，到了那时，我党抗击敌伪的任务又将加重了。国民党以五年半的袖手旁观，得到了丧失战斗力的结果。共产党以五年半的苦战奋斗，得到了增强战斗力的结果。这一种情况，将决定今后中国的命运。

同志们可以看见，一九三七年七月起至现在止，这七年内，在我党领导下的人民民主力量曾经历了上升、下降、再上升三种情况。我党抗击了日寇的残酷进攻，建立了广大的革命根据地，大大地发展了党和军队，打退了国民党的三次大规模的反共高潮，克服了党内发生的右的和“左”的错误思想，全党学得了许多可宝贵的经验。这些就是我们七年工作的总结。

现在的任务是要准备担负比较过去更为重大的责任。我们要准备不论在何种情况下把日寇打出中国去。为使我党能够担负这种责任，就要使我党我军和我们的根据地更加发展和更加巩固起来，就要注意大城市和交通要道的工作，要把城市工作和根据地工作提到同等重

要的地位。

关于根据地工作，第一阶段内有大的发展，但是不巩固，因此在第二阶段内一受到敌人的严重打击，就缩小了。在第二阶段内，一切我党领导的抗日根据地都受到了严格的锻炼，比起第一阶段来好得多了；干部和党员的思想政策的水平，大进一步，没有学会的东西，学会得更多了。但是思想的打通和政策的学习还需要时间，我们还有许多没有学会的东西。我党力量还不够强大，党内还不够统一，还不够巩固，因此还不能担负比较目前更为巨大的责任。今后的问题就是在继续抗战中使我党我军和我们的根据地更加发展和更加巩固，这就是为着将来担负巨大工作的第一个必要的思想准备和物质准备。没有这种准备，我们就不能把日寇赶出去，就不能解放全中国。

关于大城市和交通要道的工作，我们一向是做得很差的。如果现在我们还不争取在大城市和交通要道中被日本帝国主义压迫的千百万劳动群众和市民群众围绕在我党的周围，并准备群众的武装起义，我们的军队和农村根据地就会得不到城市的配合而遇到种种困难。我们十多年来是处在农村中，提倡熟悉农村和建设农村根据地，这是必要的。党的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决定的准备城市起义的任务，没有也不可能在这十多年中间去实行。但是现在不同了，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决议要在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以后实行了。我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不

久就可能开会，这次代表大会将要讨论加强城市工作和争取全国胜利的问题。

这几天陕甘宁边区召开工业会议，是有重大意义的。一九三七年边区还只有七百个工厂工人，一九四二年有了七千人，现在有了一万二千人。切不可轻视这样的数目字。我们要在根据地内学习好如何管理大城市的工商业和交通机关，否则到了那时将无所措手足。准备大城市和交通要道的武装起义，并且学习管理工商业，这是第二个必要的思想准备和物质准备。没有这种准备，我们也就不能把日寇赶出去，也就不能解放全中国。

三

为了争取新的胜利，要在党的干部中间提倡放下包袱和开动机器。所谓放下包袱，就是说，我们精神上的许多负担应该加以解除。有许多的东西，只要我们对它们陷入盲目性，缺乏自觉性，就可能成为我们的包袱，成为我们的负担。例如：犯过错误，可以使人觉得自己反正是犯了错误的，从此萎靡不振；未犯错误，也可以使人觉得自己是未犯过错误的，从此骄傲起来。工作无成绩，可以使人悲观丧气；工作有成绩，又可以使人趾高气扬。斗争历史短的，可以因其短而不负责任；斗争历史长的，可以因其长而自以为是。工农分子，可以自己的光荣出身傲视知识分子；知识分子，又可以自己有某些知识傲视工农分

子。各种业务专长，都可以成为高傲自大轻视旁人的资本。甚至年龄也可以成为骄傲的工具：青年人可以因为自己聪明能干而看不起老年人，老年人又可以因为自己富有经验而看不起青年人。对于诸如此类的东西，如果没有自觉性，那它们就会成为负担或包袱。有些同志高高在上，脱离群众，屡犯错误，背上了这类包袱是一个重要的原因。所以，检查自己背上的包袱，把它放下来，使自己的精神获得解放，实在是联系群众和少犯错误的必要前提之一。我党历史上曾经有过几次表现了大的骄傲，都是吃了亏的。第一次是在一九二七年上半年。那时北伐军到了武汉，一些同志骄傲起来，自以为了不得，忘记了国民党将要袭击我们。结果犯了陈独秀路线的错误，使这次革命归于失败。第二次是在一九三〇年。红军利用蒋冯阎大战^{〔11〕}的条件，打了一些胜仗，又有一些同志骄傲起来，自以为了不得。结果犯了李立三路线的错误，也使革命力量遭到一些损失。第三次是在一九三一年。红军打破了第三次“围剿”，接着全国人民在日本进攻面前发动了轰轰烈烈的抗日运动，又有一些同志骄傲起来，自以为了不得。结果犯了更严重的路线错误，使辛苦地聚集起来的革命力量损失了百分之九十左右。第四次是在一九三八年。抗战起来了，统一战线建立了，又有一些同志骄傲起来，自以为了不得，结果犯了和陈独秀路线有某些相似的错误。这一次，又使得受这些同志的错误思想影响最大的那些地方的革命工作，遭到了很大的损失。

全党同志对于这几次骄傲，几次错误，都要引为鉴戒。近日我们印了郭沫若论李自成的文章〔12〕，也是叫同志们引为鉴戒，不要重犯胜利时骄傲的错误。

所谓开动机器，就是说，要善于使用思想器官。有些人背上虽然没有包袱，有联系群众的长处，但是不善于思索，不愿用脑筋多想苦想，结果仍然做不成事业。再有一些人则因为自己背上有了包袱，就不肯使用脑筋，他们的聪明被包袱压缩了。列宁斯大林经常劝人要善于思索，我们也要这样劝人。脑筋这个机器的作用，是专门思想的。孟子说：“心之官则思。”〔13〕他对脑筋的作用下了正确的定义。凡事应该用脑筋好好想一想。俗话说：“眉头一皱，计上心来。”就是说多想出智慧。要去掉我们党内浓厚的盲目性，必须提倡思索，学会分析事物的方法，养成分析的习惯。这种习惯，在我们党内是太不够了。如果我们既放下了包袱，又开动了机器，既是轻装，又会思索，那我们就会胜利。

注 释

〔1〕四中全会是指一九三一年一月中国共产党第六届中央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

〔2〕见《列宁全集》第二十五卷《共产主义》一文。在该文中列宁批评匈牙利共产党员贝拉·贡说：“他抛开了马克思主义的最本质的东西、马克思主义的活的灵魂；具体地分析具体的情况。”

〔3〕在一九二八年七月间举行的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规

定了下列的十大政纲：一、推翻帝国主义的统治；二、没收外国资本的企业和银行；三、统一中国，承认民族自决权；四、推翻军阀国民党的政府；五、建立工农兵代表会议政府；六、实行八小时工作制，增加工资、失业救济与社会保险等；七、没收一切地主阶级的土地，耕地归农；八、改善兵士生活，给兵士以土地和工作；九、取消一切苛捐杂税，实行统一的累进税；十、联合世界无产阶级和苏联。

〔4〕五中全会是指一九三四年一月中国共产党第六届中央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

〔5〕这个会议曾经检讨了党在历史上特别是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政治路线问题。

〔6〕山头主义的倾向是一种小团体主义的倾向，主要是在长期的游击战争中，农村革命根据地的分散和彼此间不接触的情况下产生的。这些根据地开始多半是建立在山岳地区，一个集团好象一个山头，所以这种错误倾向被称为山头主义。

〔7〕这里所说的一面负担粮税的地区，是指根据地的比较巩固的地区，那里的人民只向抗日民主政府负担粮税；两面负担粮税的地区，是指根据地的边缘地区和游击区，在那些地区因为敌人可以经常来骚扰，人民除向抗日民主政府负担粮税外，还经常被迫向敌伪政权缴纳一些粮税。

〔8〕这是日本帝国主义对抗日根据地大规模进攻失败以后所实施的一种方法，即由迅速“鲸吞”的方法，改为长期的逐渐的“蚕食”方法。日本帝国主义企图用稳扎稳打、逐步分割的步骤，缩小抗日根据地，扩大它的占领区。

〔9〕一九四一年三月间，华北的日寇和汉奸提出所谓“治安强化运动”的口号。所谓“治安强化”，就是实行搜查，举办保甲制度，调查户口，组织伪军，以镇压抗日力量。

〔10〕一九四四年三月，日寇发动河南战役，使用兵力五、六万人。国民党军蒋鼎文、汤恩伯、胡宗南部四十万人，在日寇面前望风崩溃，郑州、洛阳等三十八县相继陷落，汤恩伯部损失兵员二十万人。

〔11〕蒋冯阎大战，指发生在陇海、津浦两路沿线的蒋介石同冯玉祥、阎锡山的大规模军阀战争。战争于一九三〇年五月开始，至十月结束，历时半年，双方死伤三十万人。

〔12〕一九四四年郭沫若作《甲申三百年祭》一文，纪念明朝末年李自成

领导的农民起义胜利的三百周年。文中说明一六四四年李自成的农民起义军进入北京以后,因为若干首领们生活腐化,发生宗派斗争,以致在一六四五年陷于失败。这篇文章先在重庆《新华日报》发表,后来在延安和各解放区印成单行本。

〔13〕引自《孟子》卷十一《告子上》。

选自《毛泽东选集》第3卷

毛 泽 东

论 联 合 政 府(节选)

(一九四五年四月二十四日)

全党团结起来,为实现 党的任务而斗争⁽¹⁾

同志们,我们已经了解了我们的任务和我们为完成这些任务所采取的政策,那末,我们应该用怎样的工作态度去执行这些政策和完成这些任务呢?

目前国际国内的形势,在我们和中国人民面前显示了光明的前途,具备了前所未有的有利条件,这是显然的,毫无疑义的。但是同时,依然存在着严重的困难条件。谁要是只看见光明一面,不看见困难一面,谁就会不能很好地为实现党的任务而斗争。

我们的党和中国人民一道,不论在整个党的二十四年历史中,在八年抗日战争中,为中国人民创造了巨大的力量,我们的工作成绩是很显然的,毫无疑义的。但是同时,我们的工作中依然存在着缺点。谁要是只看见成绩一面,不看见缺点一面,谁也就不会很好地为实现党的任

务而斗争。

中国共产党自从一九二一年诞生以来，在其二十四年的历史中，经历了三次的伟大斗争，这就是北伐战争、土地革命战争和现在还在进行中的抗日战争。我们的党从它一开始，就是一个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为基础的党，这是因为这个主义是全世界无产阶级的最正确最革命的科学思想的结晶。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一经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就使中国革命的面目为之一新，产生了新民主主义的整个历史阶段。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思想武装起来的中国共产党，在中国人民中产生了新的工作作风，这主要的就是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作风，和人民群众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作风以及自我批评的作风。

反映了全世界无产阶级实践斗争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在它同中国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的革命斗争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时候，就成为中国人民百战百胜的武器。中国共产党正是这样做了。我们党的发展和进步，是从同一切违反这个真理的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作坚决斗争的过程中发展和进步起来的。教条主义脱离具体的实践，经验主义把局部经验误认为普遍真理，这两种机会主义的思想都是违背马克思主义的。我们党在自己的二十四年奋斗中，克服了和正在克服着这些错误思想，使得我们的党在思想上极大地巩固了。我们党现在已有了一百二十一万党员。其中绝大多数是在抗日时

期入党的，在他们之中存在着各种不纯正的思想。在抗日以前入党的党员中，也有这种情形。几年来的整风工作收到了巨大的成效，使这些不纯正的思想受到了很多的纠正。今后应当继续这种工作，以“惩前毖后、治病救人”〔2〕的精神，更大地展开党内的思想教育。必须使各级党的领导骨干都懂得，理论和实践这样密切地相结合，是我们共产党人区别于其他任何政党的显著标志之一。因此，掌握思想教育，是团结全党进行伟大政治斗争的中心环节。如果这个任务不解决，党的一切政治任务是不能完成的。

我们共产党人区别于其他任何政党的又一个显著的标志，就是和最广大的人民群众取得最密切的联系。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一刻也不脱离群众；一切从人民的利益出发，而不是从个人或小集团的利益出发；向人民负责和向党的领导机关负责的一致性；这些就是我们的出发点。共产党人必须随时准备坚持真理，因为任何真理都是符合于人民利益的；共产党人必须随时准备修正错误，因为任何错误都是不符合于人民利益的。二十四年的经验告诉我们，凡属正确的任务、政策和工作作风，都是和当时当地的群众要求相适合，都是联系群众的；凡属错误的任务、政策和工作作风，都是和当时当地的群众要求不相适合，都是脱离群众的。教条主义、经验主义、命令主义、尾巴主义、宗派主义、官僚主义、骄傲自大的工作态度等项弊病之所以一定不好，一定要不得，如果什么人

有了这类弊病一定要改正，就是因为它们脱离群众。我们的代表大会应该号召全党提起警觉，注意每一个工作环节上的每一个同志，不要让他脱离群众。教育每一个同志热爱人民群众，细心地倾听群众的呼声；每到一地，就和那里的群众打成一片，不是高居于群众之上，而是深入于群众之中；根据群众的觉悟程度，去启发和提高群众的觉悟，在群众出于内心自愿的原则之下，帮助群众逐步地组织起来，逐步地展开为当时当地内外环境所许可的一切必要的斗争。在一切工作中，命令主义是错误的，因为它超过群众的觉悟程度，违反了群众的自愿原则，害了急性病。我们的同志不要以为自己了解了的东西，广大群众也和自己一样都了解了。群众是否已经了解并且是否愿意行动起来，要到群众中去考察才会知道。如果我们这样做，就可以避免命令主义。在一切工作中，尾巴主义也是错误的，因为它落后于群众的觉悟程度，违反了领导群众前进一步的原则，害了慢性病。我们的同志不要以为自己还不了解的东西，群众也一概不了解。许多时候，广大群众跑到我们的前头去了，迫切地需要前进一步了，我们的同志不能做广大群众的领导者，却反映了一部分落后分子的意见，并且将这种落后分子的意见误认为广大群众的意见，做了落后分子的尾巴。总之，应该使每个同志明了，共产党人的一切言论行动，必须以合乎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最大利益，为最广大人民群众所拥护为最高标准。应该使每一个同志懂得，只要我们依靠人民，坚

决地相信人民群众的创造力是无穷无尽的，因而信任人民，和人民打成一片，那就任何困难也能克服，任何敌人也不能压倒我们，而只会被我们所压倒。

有无认真的自我批评，也是我们和其他政党互相区别的显著的标志之一。我们曾经说过，房子是应该经常打扫的，不打扫就会积满了灰尘；脸是应该经常洗的，不洗也就会灰尘满面。我们同志的思想，我们党的工作，也会沾染灰尘的，也应该打扫和洗涤。“流水不腐，户枢不蠹”^{〔3〕}，是说它们在不停的运动中抵抗了微生物或其他生物的侵蚀。对于我们，经常地检讨工作，在检讨中推广民主作风，不惧怕批评和自我批评，实行“知无不言，言无不尽”^{〔4〕}，“言者无罪，闻者足戒”^{〔5〕}，“有则改之，无则加勉”^{〔6〕}这些中国人民的有益的格言，正是抵抗各种政治灰尘和政治微生物侵蚀我们同志的思想和我们党的肌体的唯一有效的方法。以“惩前毖后，治病救人”为宗旨的整风运动之所以发生了很大的效力，就是因为我们在这个运动中展开了正确的而不是歪曲的、认真的而不是敷衍的批评和自我批评。以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最大利益为出发点的中国共产党人，相信自己的事业是完全合乎正义的，不惜牺牲自己个人的一切，随时准备拿出自己的生命去殉我们的事业，难道还有什么不适合人民需要的思想、观点、意见、办法，舍不得丢掉的吗？难道我们还欢迎任何政治的灰尘、政治的微生物来玷污我们的清洁的面貌和侵蚀我们的健全的肌体吗？无数革命先烈为了人民

的利益牺牲了他们的生命，使我们每个活着的人想起他们就心里难过，难道我们还有什么个人利益不能牺牲，还有什么错误不能抛弃吗？

同志们，我们的大会闭幕之后，我们就要上战场去，根据大会的决议，为着最后地打败日本侵略者和建设新中国而奋斗。为达此目的，我们要和全国人民团结起来。我重说一遍，不管什么阶级，什么政党，什么社会集团或个人，只要是赞成打败日本侵略者和建设新中国的，我们就要加以联合。为达此目的，我们要把我们党的一切力量在民主集中制的组织和纪律的原则之下，坚强地团结起来。不论什么同志，只要他是愿意服从党纲、党章和党的决议的，我们就要和他团结。我们的党，在北伐战争时期，不超过六万党员，后来大部分被当时的敌人打散了；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不超过三十万党员，后来大部分也被当时的敌人打散了。现在我们有了一百二十多万党员，这一回无论如何不要被敌人打散。只要我们能吸取三个时期的经验，采取谦虚态度，防止骄傲态度，在党内，和全体同志更好地团结起来，在党外，和全国人民更好地团结起来，就可以保证，不但不会被敌人打散，相反地，一定要把日本侵略者及其忠实走狗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消灭掉，并且在消灭他们之后，把一个新民主主义的中国建设起来。

三次革命的经验，尤其是抗日战争的经验，给了我们和中国人民这样一种信心：没有中国共产党的努力，没有

中国共产党人做中国人民的中流砥柱^{〔7〕}，中国的独立和解放是不可能的，中国的工业化和农业近代化也是不可能的。

同志们，有了三次革命经验的中国共产党，我坚决相信，我们是能够完成我们的伟大政治任务的。

成千成万的先烈，为着人民的利益，在我们的前头英勇地牺牲了，让我们高举起他们的旗帜，踏着他们的血迹前进吧！

一个新民主主义的中国不久就要诞生了，让我们迎接这个伟大的日子吧！

注 释

〔1〕这是《论联合政府》的第五部分。《论联合政府》是毛泽东同志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政治报告。这个报告的全文载《毛泽东选集》第三卷。

〔2〕惩(chéng 音成)：警戒。毖(bì 音必)：慎重。毛泽东同志在《整顿党的作风》一文中对“惩前毖后、治病救人”作过如下解释：“对以前的错误一定要揭发，不讲情面，要以科学的态度来分析批判过去的坏东西，以使使后来的工作慎重些，做得好些。这就是‘惩前毖后’的意思。但是我们揭发错误、批判缺点的目的，好象医生治病一样，完全是为了救人，而不是为了把人整死。一个人发了阑尾炎，医生把阑尾割了，这个人就救出来了。任何犯错误的人，只要他不讳疾忌医，不固执错误，以至于达到不可救药的地步，而是老老实实，真正愿意医治，愿意改正，我们就要欢迎他，把他的毛病治好，使他变为一个好同志。这个工作决不是痛快一时，乱打一顿，所能奏效的。对待思想上的毛病和政治上的毛病，决不能采用鲁莽的态度，必须采用‘治病救人’的态度，才是正确有效的方法。”

〔3〕户枢(shū 音书)：门轴。蠹(dù 音渡)：被虫蛀蚀。流水不腐，户枢

不蠹；流动着的水，不会腐臭；经常转动的门轴，不会被虫蛀蚀。

〔4〕知无不言，言无不尽：知道什么就说什么，一点不顾忌；知道多少就说多少，一点不保留。

〔5〕言者无罪，闻者足戒：对别人提出的意见，不应该抱怨和责备，而应该虚心听取，用来警戒自己。

〔6〕有则改之，无则加勉：受批评的人如果确有别人指出的缺点和错误，就努力改正；如果没有这些缺点和错误，也应该把别人的批评意见用来勉励自己。

〔7〕砥(dǐ 音底)柱是黄河中的一座小石岛，在河南省三门峡东面。这里水势很急，砥柱却一直在激流当中挺立着。所以从前人们常用“中流砥柱”来比喻斗志坚强、不屈不挠的人。

选自《毛泽东著作选读(乙种本)》

毛 泽 东

关于健全党委制*

(一九四八年九月二十日)

党委制是保证集体领导、防止个人包办的党的重要制度。近查有些(当然不是一切)领导机关,个人包办和个人解决重要问题的习气甚为浓厚。重要问题的解决,不是由党委会议做决定,而是由个人做决定,党委委员等于虚设。委员间意见分歧的事亦无由解决,并且听任这些分歧长期地不加解决。党委委员间所保持的只是形式上的一致,而不是实质上的一致。此种情形必须加以改

-
- * 这是毛泽东同志为中共中央起草的一个决定。关于这个文件的意义,邓小平同志一九五六年九月十六日在党的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所作的《关于修改党的章程的报告》说:“在我们党内,从长时期以来,由党的集体而不由个人决定重大的问题,已经形成一个传统。违背集体领导原则的现象虽然在党内经常发生,但是这种现象一经发现,就受到党中央的批判和纠正。中央在一九四八年九月关于健全党委制的决定,对于加强党的集体领导,尤其起了重大的作用。……这个决定在全党实行了,并且直到现在仍然保持着它的效力。……这个决定的重要意义,在于它总结了党内认真实行集体领导的成功的经验,促使那些把集体领导变为有名无实的组织纠正自己的错误,并且扩大了实行集体领导的范围。”

变。今后从中央局至地委，从前委至旅委以及军区（军分会或领导小组）、政府党组、民众团体党组、通讯社和报社党组，都必须建立健全的党委会议制度，一切重要问题（当然不是无关重要的小问题或者已经会议讨论解决只待执行的问题）均须交委员会讨论，由到会委员充分发表意见，做出明确决定，然后分别执行。地委、旅委以下的党委亦应如此。高级领导机关的部（例如宣传部、组织部）、委（例如工委、妇委、青委）、校（例如党校）、室（例如研究室），亦应有领导分子的集体会议。当然必须注意每次会议时间不可太长，会议次数不可太频繁，不可沉溺于细小问题的讨论，以免妨碍工作。在会议之前，对于复杂的和有分歧意见的重要问题，又须有个人商谈，使委员们有思想准备，以免会议决定流于形式或不能做出决定。委员会又须分别为常委会和全体会两种，不可混在一起。此外，还须注意，集体领导和个人负责，二者不可偏废。军队在作战时和情况需要时，首长有临机处置之权。

选自《毛泽东选集》第4卷

毛 泽 东

党委会的工作方法*

(一九四九年三月十三日)

一、党委书记要善于当“班长”。党的委员会有一二十个人，象军队的一个班，书记好比是“班长”。要把这个班带好，的确不容易。目前各中央局、分局都领导很大的地区，担负很繁重的任务。领导工作不仅要决定方针政策，还要制定正确的工作方法。有了正确的方针政策，如果在工作方法上疏忽了，还是要发生问题。党委要完成自己的领导任务，就必须依靠党委这“一班人”，充分发挥他们的作用。书记要当好“班长”，就应该很好地学习和研究。书记、副书记如果不注意向自己的“一班人”作宣传工作和组织工作，不善于处理自己和委员之间的关系，不去研究怎样把会议开好，就很难把这“一班人”指挥好。如果这“一班人”动作不整齐，就休想带领千百万人去作战，去建设。当然，书记和委员之间的关系是少数服从多数，这同班长和战士之间的关系是不一样的。这里不过

* 这是毛泽东同志在党的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所作的结论的一部分。

是一个比方。

二、要把问题摆到桌面上来。不仅“班长”要这样做，委员也要这样做。不要在背后议论。有了问题就开会，摆到桌面上来讨论，规定它几条，问题就解决了。有问题而不摆到桌面上来，就会长期不得解决，甚至一拖几年。“班长”和委员还要能互相谅解。书记和委员，中央和各中央局，各中央局和区党委之间的谅解、支援和友谊，比什么都重要。这一点过去大家不注意，七次代表大会以来，在这方面大有进步，友好团结关系大大增进了。今后仍然应该不断注意。

三、“互通情报”。就是说，党委各委员之间要把彼此知道的情况互相通知、互相交流。这对于取得共同的语言是很重要的。有些人不是这样做，而是象老子说的“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¹⁾，结果彼此之间就缺乏共同的语言。我们有些高级干部，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理论问题上也有不同的语言，原因是学习还不够。现在党内的语言比较一致了，但是，问题还没有完全解决。例如，在土地改革中，对什么是“中农”和什么是“富农”，就还有不同的了解。

四、不懂得和不了解的东西要问下级，不要轻易表示赞成或反对。有些文件起草出来压下暂时不发，就是因为其中还有些问题没有弄清楚，需要先征求下级的意见。我们切不可强不知以为知，要“不耻下问”⁽²⁾，要善于倾听下面干部的意见。先做学生，然后再做先生；先向

下面干部请教，然后再下命令。各中央局、各前委处理问题的时候，除军事情况紧急和事情已经弄清楚者外，都应该这样办。这不会影响自己的威信，而只会增加自己的威信。我们做出的决定包括了下面干部提出的正确意见，他们当然拥护。下面干部的话，有正确的，也有不正确的，听了以后要加以分析。对正确的意见，必须听，并且照它做。中央领导之所以正确，主要是由于综合了各地供给的材料、报告和正确的意见。如果各地不来材料，不提意见，中央就很难正确地发号施令。对下面来的错误意见也要听，根本不听是不对的；不过听了而不照它做，并且要给以批评。

五、学会“弹钢琴”。弹钢琴要十个指头都动作，不能有的动，有的不动。但是，十个指头同时都按下去，那也不成调子。要产生好的音乐，十个指头的动作要有节奏，要互相配合。党委要抓紧中心工作，又要围绕中心工作而同时开展其他方面的工作。我们现在管的方面很多，各地、各军、各部门的工作，都要照顾到，不能只注意一部分问题而把别的丢掉。凡是有问题的地方都要点一下，这个方法我们一定要学会。钢琴有人弹得好，有人弹得不好，这两种人弹出来的调子差别很大。党委的同志必须学好“弹钢琴”。

六、要“抓紧”。就是说，党委对主要工作不但一定要“抓”，而且一定要“抓紧”。什么东西只有抓得很紧，毫不放松，才能抓住。抓而不紧，等于不抓。伸着巴掌，当

然什么也抓不住。就是把手握起来，但是不握紧，样子象抓，还是抓不住东西。我们有些同志，也抓主要工作，但是抓而不紧，所以工作还是不能做好。不抓不行，抓而不紧也不行。

七、胸中有“数”。这是说，对情况和问题一定要注意到它们的数量方面，要有基本的数量的分析。任何质量都表现为一定的数量，没有数量也就没有质量。我们有许多同志至今不懂得注意事物的数量方面，不懂得注意基本的统计、主要的百分比，不懂得注意决定事物质量的数量界限，一切都是胸中无“数”，结果就不能不犯错误。例如，要进行土地改革，对于地主、富农、中农、贫农各占人口多少，各有多少土地，这些数字就必须了解，才能据以定出正确的政策。对于何谓富农，何谓富裕中农，有多少剥削收入才算富农，否则就算富裕中农，这也必须找出一个数量的界限。在任何群众运动中，群众积极拥护的有多少，反对的有多少，处于中间状态的有多少，这些都必须有个基本的调查，基本的分析，不可无根据地、主观地决定问题。

八、“安民告示”。开会要事先通知，象出安民告示一样，让大家知道要讨论什么问题，解决什么问题，并且早作准备。有些地方开干部会，事前不准备好报告和决议草案，等开会的人到了才临时凑合，好象“兵马已到，粮草未备”，这是不好的。如果没有准备，就不要急于开会。

九、“精兵简政”。讲话、演说、写文章和写决议案，都

应当简明扼要。会议也不要开得太长。

十、注意团结那些和自己意见不同的同志一道工作。不论在地方上或部队里，都应该注意这一条。对党外人士也是一样。我们都是从五湖四海汇集拢来的，我们不仅要善于团结和自己意见相同的同志，而且要善于团结和自己意见不同的同志一道工作。我们当中还有犯过很大错误的人，不要嫌这些人，要准备和他们一道工作。

十一、力戒骄傲。这对领导者是一个原则问题，也是保持团结的一个重要条件。就是没有犯过大错误，而且工作有了很大成绩的人，也不要骄傲。禁止给党的领导者祝寿，禁止用党的领导者的名字作地名、街名和企业的名字，保持艰苦奋斗作风，制止歌功颂德现象。

十二、划清两种界限。首先，是革命还是反革命？是延安还是西安⁽³⁾？有些人不懂得要划清这种界限。例如，他们反对官僚主义，就把延安说得好似“一无是处”，而没有把延安的官僚主义同西安的官僚主义比较一下，区别一下。这就从根本上犯了错误。其次，在革命的队伍中，要划清正确和错误、成绩和缺点的界限，还要弄清它们中间什么是主要的，什么是次要的。例如，成绩究竟是三分还是七分？说少了不行，说多了也不行。一个人的工作，究竟是三分成绩七分错误，还是七分成绩三分错误，必须有个根本的估计。如果是七分成绩，那末就应该对他的工作基本上加以肯定。把成绩为主说成错误为主，那就完全错了。我们看问题一定不要忘记划清这两种界限：

革命和反革命的界限，成绩和缺点的界限。记着这两条界限，事情就好办，否则就会把问题的性质弄混淆了。自然，要把界限划好，必须经过细致的研究和分析。我们对于每一个人和每一件事，都应该采取分析研究的态度。

我和政治局的同志觉得，要有以上这些方法，才能把党委的工作搞好。除了开好代表大会以外，党的各级委员会要把自己的领导工作做好，是极为重要的。我们一定要讲究工作方法，把党委的领导工作提高一步。

注 释

〔1〕 见《老子》第八十章。原文是：“邻国相望，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

〔2〕 见《论语·公冶长第五》。原文是：“敏而好学，不耻下问。”

〔3〕 延安从一九三七年一月至一九四七年三月是中共中央的所在地，西安则是国民党反动派在西北的统治中心，毛泽东同志以此来比喻革命和反革命。

选自《毛泽东选集》第4卷

毛 泽 东

反对官僚主义、命令主义和违法乱纪*

(一九五三年一月五日)

反对官僚主义、反对命令主义、反对违法乱纪这件事，应当唤起我们各级领导机关的注意。

我党在“三反”中基本上解决了中央、大行政区、省市和专区四级许多工作人员中的贪污和浪费两个问题，也基本上解决了许多领导者和被领导的机关人员相脱离的这一部分官僚主义的问题；但对于不了解人民群众的痛苦，不了解离开自己工作机关稍为远一点的下情，不了解县区乡三级干部中存在着许多命令主义和违法乱纪的坏人坏事，或者虽然对于这些坏人坏事有一些了解，但是熟视无睹，不引起义愤，不感觉问题的严重，因而不采取积极办法去支持好人，惩治坏人，发扬好事，消灭坏事，这样一方面的官僚主义，则在许多地区、许多方面和许多部门，还是基本上没有解决。即如处理人民来信一事，据报，有的省人民政府就积压了七万多件没有处理，省以下各级

* 这是毛泽东同志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党内指示。

党政组织积压了多少人民来信，则我们还不知道，可以想象是不少的。这些人民来信大都是有问题要求我们给他们解决的，其中许多是控告干部无法无天的罪行而应当迅速处理的。

官僚主义和命令主义，在我们的党和政府，不但在目前是一个大问题，就是在一个很长的时期内还将是一个大问题。就其社会根源来说，这是反动统治阶级对待人民的反动作风（反人民的作风，国民党的作风）的残余在我们党和政府内的反映的问题。就我们党政组织的领导任务和领导方法来说，这是交代工作任务与交代政策界限、交代工作作风没有联系在一起的问题，即没有和工作任务一道，同时将政策界限和工作作风反复地指示给下级干部的问题。这是对各级干部特别是对县区乡三级干部没有审查，或者审查工作做得不好的问题。这是对县区乡三级尚未开展整党工作，尚未在整党中开展反命令主义和清除违法乱纪分子的斗争的问题。这是在我们专区以上的高级机关工作人员中至今还存在着不了解和不关心人民群众的痛苦，不了解和不关心基层组织情况这样一种官僚主义尚未向它开展斗争和加以肃清的问题。如果我们的领导任务有所加强，我们的领导方法有所改进，则危害群众的官僚主义和命令主义就可以逐步减少，就可以使我们的许多党政组织较早地远离国民党作风。而混在我们党政组织中的许多坏人就可以早日清除，目前存在的许多坏事就可以早日消灭。

因此，请你们在一九五三年结合整党建党及其他工作，从处理人民来信入手，检查一次官僚主义、命令主义和违法乱纪分子的情况，并向他们展开坚决的斗争。凡典型的官僚主义、命令主义和违法乱纪的事例，应在报纸上广为揭发。其违法情形严重者必须给以法律的制裁，如是党员必须执行党纪。各级党委应有决心将为群众所痛恨的违法乱纪分子加以惩处和清除出党政组织，最严重者应处极刑，以平民愤，并借以教育干部和人民群众。但在开展反坏人坏事的广泛斗争达到了一个适当阶段的时候，就应将各地典型的好人好事加以调查分析和表扬，使全党都向这些好的典型看齐，发扬正气，压倒邪气。我们相信，各地这种典型的好人好事是一定不少的。

选自《毛泽东选集》第5卷

毛 泽 东

反对党内的资产阶级思想*

(一九五三年八月十二日)

这次会议开得很好，周总理的结论也作得好。

现在我们可以看出，在“三反”“五反”运动之后，党内有两种性质的错误。一种是一般性的错误，如“五多”，大家都可能犯，什么时候都可能犯。“五多”的错误也可以变成“五少”的错误。另一种是原则性的错误，如资本主义倾向。这是资产阶级思想在党内的反映，是违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问题。

“三反”“五反”运动，是对党内资产阶级思想的很大打击。但是，当时仅仅给了贪污浪费这方面的资产阶级思想以基本打击，而对在路线问题上反映出来的资产阶级思想并没有解决。这种资产阶级思想，不仅财经工作中有，而且政法、文教和其他工作中也有，中央同志中和地方同志中都有。

对于财经工作中的错误，从去年十二月薄一波同志

* 这是毛泽东同志在一九五三年夏季全国财经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提出“公私一律平等”的新税制开始，到这次会议，都给了严肃的批评。新税制发展下去，势必离开马克思列宁主义，离开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向资本主义发展。

过渡时期，是向社会主义发展，还是向资本主义发展？按照党的总路线，是要过渡到社会主义。这是要经过相当长期的斗争的。新税制的错误跟张子善^{〔1〕}的问题不同，是思想问题，是离开了党的总路线的问题。要在党内开展反对资产阶级思想的斗争。就思想状况来说，党内有三种人：有的同志是坚定的，没有动摇的，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有一部分同志，基本上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但夹杂着一些非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少数人是不好的，是非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在对薄一波错误思想的批判中，有人说，薄一波的错误是小资产阶级个人主义，这是不妥当的。主要应当批判他有利于资本主义，不利于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思想。这样的批判才是对的。我们说过，“左”倾机会主义错误，是小资产阶级狂热性在党内的反映，那是在和资产阶级决裂时期发生的。在和资产阶级合作的三个时期，就是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抗日战争时期和目前这个时期，都是资产阶级思想影响了党内一部分人，他们动摇了。薄一波的错误，就是在这种情况下犯的。

薄一波的错误，并不是孤立的，不仅在中央有，在大区和省市两级也有。各大区和省市要开一次会，根据七届二中全会的决议和这次会议的结论，检查自己的工作，

借以教育干部。

最近，我去武汉、南京走了一趟，知道了很多情况，很有益处。我在北京，差不多听不到什么，以后还要出外走走。中央领导机关是一个制造思想产品的工厂，如果不了解下情，没有原料，也没有半成品，怎么能够制造出产品？有的东西，地方上已经制成成品，中央领导机关就可以在全国加以推广。比如老“三反”和新“三反”⁽²⁾，都是地方上先搞的。中央各部乱发指示。本来中央各部发出的东西，应当是上品，现在是次品，并且有大量产品根本没有使用价值，大批报废。大区和省市的领导机关，是制造思想产品的地方工厂，也要出上品。

薄一波的错误，是资产阶级思想的反映。它有利于资本主义，不利于社会主义和半社会主义，违背了七届二中全会的决议。

我们依靠谁？是依靠工人阶级，还是依靠资产阶级？七届二中全会的决议早已讲清楚了：“必须全心全意地依靠工人阶级”。决议还说，在恢复和发展生产的问题上，必须确定：国营工业生产第一，私营工业生产第二，手工业生产第三。重点是工业，工业中的重点是重工业，这是国营的。在我国目前的五种经济成份中，国营经济是领导成份。资本主义工商业要逐渐引向国家资本主义。

二中全会决议讲，在发展生产的基础上，改善工人和劳动人民的生活。有资产阶级思想的人，不注意这一点，薄一波就是代表。我们的重点必须放在发展生产上，但

发展生产和改善人民生活二者必须兼顾。福利不可不谋，不可多谋，不谋不行。现在，不顾人民生活，不顾人民死活的干部还不少。贵州有一个团曾经占了农民的大量田地，这是严重侵犯人民利益的行为。不顾人民生活是不对的，但是重点还是要放在生产建设上。

关于利用、限制和改造资本主义经济的问题，二中全会也讲得很清楚。决议上说，对私人资本主义经济，要从活动范围、税收政策、市场价格、劳动条件等方面加以限制，不能任其泛滥。社会主义经济和资本主义经济是领导和被领导的关系。限制和反限制，是新民主主义国家内部阶级斗争的主要形式。现在，新税制讲“公私一律平等”，这就违背了国营经济是领导成份的路线。

关于个体的农业经济和手工业经济实行合作化的问题，二中全会决议分明说：“这种合作社是以私有制为基础的在无产阶级领导的国家政权管理之下的劳动人民群众的集体经济组织。中国人民的文化落后和没有合作社传统，使得我们的合作社运动的推广和发展大感困难；但是可以组织，必须组织，必须推广和发展。单有国营经济而没有合作社经济，我们就不可能领导劳动人民的个体经济逐步地走上集体化，就不可能由新民主主义国家发展到将来的社会主义国家，就不可能巩固无产阶级在国家政权中的领导权。”这是一九四九年三月的决议，但是相当多的同志不注意，当作新闻，其实是旧闻。薄一波写了《加强党在农村中的政治工作》的文章，他说：个体农民

经过互助合作到集体化的道路，“是一种完全的空想，因为目前的互助组是以个体经济为基础的，它不能在这样的基础上逐渐发展到集体农场，更不能经由这样的道路在全体规模上使农业集体化。”这是违反党的决议的。

现在有两种统一战线，两种联盟。一种是工人阶级和农民的联盟，这是基础。一种是工人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的联盟。农民是劳动者，不是剥削者，工人阶级和农民的联盟是长期的。但是，工人阶级和农民是有矛盾的。我们应当按照自愿的原则，把农民由个体所有制逐步引导到集体所有制。将来国有制和集体所有制也是有矛盾的。这都是非对抗性的矛盾。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是对抗性的矛盾。

资产阶级一定要腐蚀人，用糖衣炮弹打人。资产阶级的糖衣炮弹，有物质的，也有精神的。精神的糖衣炮弹打中了一个靶子，就是薄一波。他的错误，是受了资产阶级思想的影响。宣传新税制的社论，资产阶级拍掌，薄一波高兴了。关于新税制，他事先征求了资产阶级的意见，和资产阶级订了君子协定，却没有向中央报告。当时商业部、供销合作总社不赞成，轻工业部也不满意。财经贸易系统的一百一十万干部和职工，绝大多数是好的，有少数人是不好的。这些不好的人又可以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反革命分子，应当清除；一部分是犯错误的革命者，包括党员和非党工作人员，应当用批评教育的方法来改造他们。

为了保证社会主义事业的成功，必须在全党，首先在中央、大区和省市这三级党政军民领导机关中，反对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倾向，即反对党内的资产阶级思想。各大区和省市要在适当时机召集有地委书记、专员参加的会议，展开批评讨论，讲清楚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的问题。

为了保证社会主义事业的成功，必须实行集体领导，反对分散主义，反对主观主义。

我们现在要反对主观主义，既反对盲目冒进的主观主义，也反对保守的主观主义。过去，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犯过主观主义的错误，有右的也有“左”的。陈独秀、张国焘是右的，王明是先“左”后右。延安整风的时候，集中反了教条主义，附带反了经验主义，二者都是主观主义。理论与实际不结合，革命就不能胜利。整风解决了这个问题。我们采取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是正确的。这次对薄一波实行坚决的彻底的批评，是为了使犯错误的人改正错误，为了保证社会主义的胜利进行。现在是社会主义革命时期，也有主观主义。急躁冒进或保守，都是不按实际情况办事，都是主观主义。不反掉主观主义，革命和建设就不会成功。民主革命时期，对主观主义的错误，用整风的办法解决了，团结了全党执行正确路线的同志和犯过错误的同志，大家从延安出发，奔赴各个战场，全党一个劲，取得了全国胜利。现在，干部比较成熟了，水平提高了，希望不要用很长的时期，基本上把

领导工作中的主观主义反掉，努力使主观与客观相适合。

所有这些问题的解决，关键是巩固集体领导，反对分散主义。我们历来是反对分散主义的。一九四一年二月二日，中央给各中央局、各将领发出指示，规定凡有全国意义的通电、宣言和对内指示，必须事先请示中央。五月间，中央发布了关于统一各根据地对外宣传的指示。同年七月一日，在纪念党成立二十周年的时候，中央发布了关于增强党性的决定，着重反对分散主义。一九四八年，中央发的反对分散主义的指示更多了。一月七日，中央发出了关于建立报告制度的指示；三月，又发了补充指示。同年九月，政治局会议作了关于向中央请示报告制度的决议。九月二十日，中央作了关于健全党委制的决定。一九五三年三月十日，为了避免政府各部门脱离党中央领导的危险，中央作了关于加强对政府工作领导的决定。

集中与分散是经常矛盾的。进城以来，分散主义有发展。为了解决这个矛盾，一切主要的和重要的问题，都要先由党委讨论决定，再由政府执行。比如，在天安门建立人民英雄纪念碑，拆除北京城墙这些大问题，就是经中央决定，由政府执行的。次要的问题，可以由政府部门的党组去办，一切问题都由中央包下来就不行。反对分散主义，是最得人心的，因为党内大多数同志是关心集体领导的。对待集体领导的态度，党内有三种人：第一种人关心集体领导。第二种人不甚关心，认为党委对他最好不

管，管也可以。“最好不管”是缺乏党性，“管也可以”是还有党性。我们要抓他“管也可以”，对缺乏党性要说服教育。不然，各部都各搞各的，中央管不了各部，部长管不了司局长，处长管不了科长，谁也管不了谁，于是王国甚多，八百诸侯。第三种人是极少数，他们坚决反对集体领导，认为最好永远不管。在关于增强党性的决定中，强调要严格实行民主集中制的纪律，少数服从多数，个人服从组织，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这是多数服从少数，这个少数是代表多数的）。有意见请提，破坏党的团结是最没有脸的。只有靠集体的政治经验和集体的智慧，才能保证党和国家的正确领导，保证党的队伍的不可动摇的团结一致。

在这次会议上，刘少奇说有那么一点错误，小平同志也说有那么一点错误。无论任何人，犯了错误都要检讨，都要受党的监督，受各级党委的领导，这是完成党的任务的主要条件。全国有很多人，是靠无政府状态吃饭。薄一波就是这样的人。他在政治上思想上有些腐化，批评他是完全必要的。

最后一点，要提倡谦虚、学习和坚忍的精神。

要坚忍。如抗美援朝，我们打痛了美帝国主义，打得它相当怕。这对我们建设有利，是我们建设的重要条件。最重要的是，我们的军队受到了锻炼，兵勇、干智。当然，我们牺牲了人，用了钱，付出了代价。但是我们就是不怕牺牲，不干则已，一干就干到底。胡宗南进攻陕甘宁边

区，我们的县城只剩下一个，但我们并没有退出边区，吃树叶就吃树叶，就是要有一股狠劲。

要学习，不要骄傲，不能看不起人。鹅蛋看不起鸡蛋，黑色金属看不起稀有金属，这种看不起人的态度是不科学的。中国是大国，党是大党，也没有理由看不起小国小党。对兄弟国家人民要永远保持学习的态度，要有真正的国际主义精神。在对外贸易方面，有些人骄傲，妄自尊大，这是不对的。要在全党特别要在出国人员进行教育。要苦学苦干，在十五年或者更长的时间内，基本上完成社会主义工业化和社会主义改造。那时，我国强大了，也要谦虚，永远保持学习的态度。

七届二中全会有几条规定没有写在决议里面。一曰不作寿。作寿不会使人长寿。主要是要把工作做好。二曰不送礼。至少党内不要送。三曰少敬酒。一定场合可以。四曰少拍掌。不要禁止，出于群众热情，也不泼冷水。五曰不以人名作地名。六曰不要把中国同志和马、恩、列、斯平列。这是学生和先生的关系，应当如此。遵守这些规定，就是谦虚态度。

总之，要坚持谦虚、学习和坚忍的精神，坚持集体领导的制度，完成社会主义的改造，达到社会主义的胜利。

注 释

〔1〕张子善，曾担任中共天津地委书记，由于受资产阶级腐蚀，堕落成
为大贪污犯，在“三反”运动中被判处死刑。

〔2〕老“三反”，指一九五一年开展的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反对官僚主义的斗争。新“三反”，指一九五三年开展的反对官僚主义、反对命令主义、反对违法乱纪的斗争。

选自《毛泽东选集》第5卷

毛 泽 东

在中国共产党
全国代表会议上的讲话

(一九五五年三月)

开 幕 词

(一九五五年三月二十一日)

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各位代表同志们：

我们这次全国代表会议有三个议事日程：第一，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和关于这个计划的报告；第二，关于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的报告；第三，关于成立中央监察委员会。

中央委员会根据列宁关于过渡时期的学说，总结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的经验，在我国国民经济恢复阶段将要结束的时候，即一九五二年，提出了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这个总路线就是在大约三个五年计划的期间内，逐步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同时对于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逐步实现社会主义改造，以求达到在我国建成社会主义社会的目的。党的总路线以及

党为着实现这个总路线而采取的各项重要的政策和办法，已经在事实上被证明是正确的。依靠全党同志和全国人民的努力，我们的工作是有很大成绩的。但是我们在工作中也有缺点和错误。我们的许多办法不可能在一切方面都规定得很恰当，这应当在实行中根据新的经验加以补充和修正。

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是实现党的总路线的一个重大的步骤。这次党的全国代表会议应该根据实际经验，认真地讨论这个计划草案，使它的内容能够比较妥当，而成为切实可行的计划。

在我们这样一个大国里面，情况是复杂的，国民经济原来又很落后，要建成社会主义社会，并不是轻而易举的事。我们可能经过三个五年计划建成社会主义社会，但要建成为一个强大的高度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国家，就需要有几十年的艰苦努力，比如说，要有五十年的时间，即本世纪的整个下半世纪。我们的任务要求我们必须很好地处理我国人民内部的关系——特别是工人阶级和农民之间的关系，很好地处理我国各民族之间的关系；同时，必须很好地继续发展同伟大的先进社会主义国家苏联和各人民民主国家的亲密合作，也要发展同资本主义世界一切爱好和平的国家和人民的合作。

我们经常说，不要因为我们的工作有成绩就骄傲自满起来，应该保持谦虚态度，向先进国家学习，向群众学习，在同志间也要互相学习，以求少犯错误。在这次党代

表会议上，我感觉仍然需要重复地将这些话说一遍。鉴于高岗、饶漱石的反党事件，骄傲自满情绪在我们党内确实是存在着，在有些同志的身上这种情绪还是严重的，不克服这种情绪，就会妨碍我们建设社会主义社会这个伟大任务的完成。

同志们都知道，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的出现，不是偶然的现象，它是我国现阶段激烈阶级斗争的一种尖锐的表现。这个反党联盟的罪恶目的，是要分裂我们的党，用阴谋方法夺取党和国家的最高权力，而为反革命的复辟开辟道路。全党在中央委员会团结一致的领导下，已经把这个反党联盟彻底地粉碎了，我们的党因此更加团结起来和巩固起来了。这是我们在为社会主义事业而奋斗中的一个重大的胜利。

对于我们的党说来，高岗、饶漱石事件是一个重要的教训，全党应该引为鉴戒，务必使党内不要重复出现这样的事件。高岗、饶漱石在党内玩弄阴谋，进行秘密活动，在同志背后进行挑拨离间，但在公开场合则把他们的活动伪装起来。他们的这种活动完全是地主阶级和资产阶级在历史上常常采取的那一类丑恶的活动。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上说过：“共产党人认为隐秘自己的观点与意图是可耻的事。”我们是共产党人，更不待说是党的高级干部，在政治上都要光明磊落，应该随时公开说出自己的政治见解，对于每一个重大的政治问题表示自己或者赞成或者反对的态度，而绝对不可以学高岗、饶漱

石那样玩弄阴谋手段。

为着建成社会主义社会这一个目的，中央委员会认为有必要在这个时候按照党章成立中央监察委员会，代替过去的纪律检查委员会，借以在新的激烈的阶级斗争时期加强党的纪律，加强对各种违法乱纪现象的斗争，特别是防止象高、饶反党联盟这一类严重危害党的利益的事件重复发生。

鉴于种种历史教训，鉴于个人的智慧必须和集体的智慧相结合才能发挥较好的作用和使我们在工作中少犯错误，中央和各级党委必须坚持集体领导的原则，继续反对个人独裁和分散主义两种偏向。必须懂得，集体领导和个人负责这样两个方面，不是互相对立的，而是互相结合的。而个人负责，则和违反集体领导原则的个人独裁，是完全不同的两件事。

目前的国际条件对我们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是有利的。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是强大的，内部是团结的；而帝国主义阵营则是虚弱的，在它们那里有不可克服的重重矛盾和危机。虽然是这样，但是我们应该了解：帝国主义势力还是在包围着我们，我们必须准备应付可能的突然事变。今后帝国主义如果发动战争，很可能象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那样，进行突然的袭击。因此，我们在精神和物质上都要有所准备，当着突然事变发生的时候，才不至于措手不及。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国内反革命残余势力的活动还很猖獗，我们必须有计划地、有分

析地、实事求是地再给他们几个打击，使暗藏的反革命力量更大地削弱下来，借以保证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安全。如果我们在上述两方面都做了适当的措施，就可能避免敌人给我们的重大危害，否则我们可能要犯错误。

同志们！我们现在是处在新的历史时期。一个六万万人口的东方国家举行社会主义革命，要在这个国家里改变历史方向和国家面貌，要在大约三个五年计划期间内使国家基本上工业化，并且要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完成社会主义改造，要在大约几十年内追上或赶上世界上最强大的资本主义国家，这是决不会不遇到困难，如同我们在民主革命时期所曾经遇到过的许多困难那样，也许还会要遇到比过去更大的困难。但是，同志们，我们共产党人是以不怕困难著名的。我们在战术上必须重视一切困难。对于每一个具体的困难，我们都要采取认真对待的态度，创造必要的条件，讲究对付的方法，一个一个地、一批一批地将它们克服下去。根据我们几十年的经验，我们遇到的每一个困难，果然都被克服下去了。种种困难，遇到共产党人，它们就只好退却，真是“高山也要低头，河水也要让路”。这里就得出一条经验，它叫我们可以藐视困难。这说的是在战略方面，是在总的方面。不管任何巨大的困难，我们一眼就看透了它的底子。所谓困难，无非是社会的敌人和自然界给予我们的。我们知道，帝国主义、国内反革命分子以及他们在我

们党内的代理人，等等，都不过是垂死的力量，而我们则是新生的力量，真理是在我们方面。对于他们，我们从来就是不可战胜的。只要想一想我们自己的历史，就会懂得这个道理。我们在一九二一年刚刚建党的时候，只有几十个人，那样渺小，后来发展起来，居然把国内的强大敌人给打倒了。自然界这个敌人也是有办法制服它的。不论在自然界和在社会上，一切新生力量，就其性质来说，从来就是不可战胜的。而一切旧势力，不管它们的数量如何庞大，总是要被消灭的。因此，我们可以藐视而且必须藐视人世遭逢的任何巨大的困难，把它们放在“不在话下”的位置。这就是我们的乐观主义。这种乐观主义是有科学根据的。只要我们更多地懂得马克思列宁主义，更多地懂得自然科学，一句话，更多地懂得客观世界的规律，少犯主观主义错误，我们的革命工作和建设工作，是一定能够达到目的的。

结 论

（一九五五年三月三十一日）

同志们：

大家发言已经完了。我就下面的几个问题讲几句话：关于这次会议的评价，五年计划，高饶问题，目前形势，八大大会。

一 关于这次代表会议的评价

绝大多数同志认为，这次会议开得很好，是从延安整风以来的又一次整风会议，发扬了民主，开展了批评与自我批评，使得我们互相了解更多了，思想更加统一了，使得我们有了共同的认识。本来我们是有共同认识的，但是在若干问题上，我们中间还是有不同意见的，经过这一次会议，统一了我们的认识。在这个基础上，在这个思想的、政治的以及许多政策的共同认识的基础上，就可以使我们党更好地团结起来了。正如恩来同志所说，如果说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同它以前一个时期全党的思想、政治上的整风，奠定了我们党的统一思想的基础，在这个基础上取得了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这种民主革命的胜利，那末，这一次会议就会使我们取得社会主义的胜利。

这次会议证明，我们党的水平是大为提高了，不但比十年前的七次大会时期大进了一步，而且比一九四九年的二中全会、一九五〇年的三中全会时期大进了一步。这个情况是好的，这次会议表明我们是进步了的。

我们进入了这样一个时期，就是我们现在所从事的、所思考的、所钻研的，是钻社会主义工业化，钻社会主义改造，钻现代化的国防，并且开始要钻原子能这样的历史的新时期。全党同志钻得有深有浅，在座的同志也是这样。象医生一样，有的能够开刀，有的不行。有的打针能

够打静脉，有的就不能，只能打皮下。有一些医生连皮下都不敢动手，就在那个皮上面。虽然有些同志没有钻进去，但大多数同志是在钻，看样子有许多人是钻进去了，就是有一点内行的味道了。在这一次会议上，我们也可以看到这样的情况。这是极大的好事。因为现在我们面临的是新问题：社会主义工业化、社会主义改造、新的国防、其他各方面的新的工作。适合这种新的情况钻进去，成为内行，这是我们的任务。所以必须对那些钻不进去的人，浮在皮面上的人进行教育，使他们都成为内行。

反对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的斗争，将促使我们党大进一步。

我们要在党内外五百万知识分子和各级干部中，宣传并使他们获得辩证唯物论，反对唯心论，我们将会组成一支强大的理论队伍，而这是我们极为需要的，这又是一件大好事。

我们要作出计划，组成这么一支强大的理论队伍，有几百万人读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基础，即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反对各种唯心论和机械唯物论。我们现在有许多做理论工作的干部，但还没有组成理论队伍，尤其是还没有强大的理论队伍。而没有这支队伍，对我们全党的事业，对我国的社会主义工业化、社会主义改造、现代化国防、原子能的研究，是不行的，是不能解决问题的。因此，我劝同志们要学哲学。有相当多的人，对哲学没有兴趣，他们没有学哲学的习惯。可以先看小册子、短篇文

章，从那里引起兴趣，然后再看七、八万字的，然后再看那个几十万字一本的书。马克思主义有几门学问：马克思主义的哲学，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学，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阶级斗争学说，但基础的东西是马克思主义哲学。这个东西没有学通，我们就没有共同的语言，没有共同的方法，扯了许多皮，还扯不清楚。有了辩证唯物论的思想，就省得许多事，也少犯许多错误。

二 关于第一个五年计划

同志们认为，在讨论五年计划的时候，大多数同志的发言很好，大家是满意的。其中有一部分发言特别好，他们讲透了问题，有点专家的味道了。但是，中央各部门的发言中间，有一部分内容较差，分析和批判不够；地方同志发言中间，也有一部分是较差的，分析和批判是不够的。另有一种情况，就是在有些同志发言中间，对严重的浪费问题以及别的错误，只是揭露了现状，没有说明如何处理。对于这些发言，有些同志不满意。我以为这些不满意是有理由的。

我希望，所有的省委书记、市委书记、地委书记以及中央各部门的负责同志，都要奋发努力，在提高马克思列宁主义水平的基础上，使自己成为精通政治工作和经济工作的专家。一方面要搞好政治思想工作，一方面要搞好经济建设。对于经济建设，我们要真正学懂。

这次会上，地方要求中央解决的许多问题，凡是中央

已经有了规定的，应当积极解决。其他的问题，由秘书处会同提议的同志，研究解决办法，报告中央处理。

中央各部门要求地方协作的事也不少。中央部门在各地方办的事业，要请地方党委给以监督和帮助，特别是在政治思想工作方面。地方党委有责任帮助中央在地方所办的事业去完成任务。所以，不仅地方对中央有要求，中央对地方也有要求。只有中央各部门和地方党委齐心协力，分工合作，第一个五年计划才能够完满地实现。

三 关于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

第一点，有人问：究竟有没有这个联盟？或者不是联盟，而是两个独立国，两个单干户？有的同志说，没有看到文件，他们是联盟总得有一个协定，协定要有文字。文字协定那的确是没有，找不到。我们说，高岗、饶漱石是有一个联盟的。这是从一些什么地方看出来的呢？一、是从财经会议期间高岗、饶漱石的共同活动看出来的。二、是从组织会议期间饶漱石同张秀山配合进行反党活动看出来的。三、是从饶漱石的话里看出来的。饶漱石说，“今后中央组织部要以郭峰为核心”。组织部是饶漱石为部长，高岗的心腹郭峰去作核心。那很好嘛！团结得很密切嘛！四、是从高岗、饶漱石到处散布安子文私拟的一个政治局委员名单这件事看出来的。在这件事上，安子文是受了警告处分的。高岗、饶漱石等人把这个名单散布给所有参加组织会议的人，而且散布到南方各省，

到处这么散布，居心何在？五、是从高岗两次向我表示保护饶漱石，饶漱石则到最后还要保护高岗这件事看出来的。高岗说饶漱石现在不得了了，要我来解围。我说，你为什么代表饶漱石说话？我在北京，饶漱石也在北京，他为什么要你代表，不直接来找我呢？在西藏还可以打电报嘛，就在北京嘛，他有脚嘛。第二次是在揭露高岗的前一天，高岗还表示要保护饶漱石。饶漱石直到最后还要保护高岗，他要给高岗申冤。在揭露高岗的中央会议上，我说，北京有两个司令部，一个是以我为首的司令部，就是刮阳风，烧阳火，一个是以别人为司令的司令部，叫做刮阴风，烧阴火，一股地下水。究竟是政出一门，还是政出多门？从上面这许多事看来，他们是有一个反党联盟的，不是两个互不相关的独立国和单干户。

至于说，因为没有明文协定，有的同志就发生疑问，说恐怕不是联盟吧。这是把阴谋分子组成的反党联盟同一般公开的正式的政治联盟和经济联盟等同起来了，看作一样的事情了。他们是搞阴谋嘛！搞阴谋，还要订个文字协定吗？如果说，没有文字协定就不是联盟，那末高岗、饶漱石两个反党集团内部怎么办呢？高岗跟张秀山、张明远、赵德尊、马洪、郭峰之间，也没有订条约嘛！我们也没有看见他们的文字协定嘛！那末连他们这个反党集团也否定了！还有饶漱石跟向明、扬帆之间，也没有看见他们的条约嘛！所以，说没有明文协定就不能认为是联盟，这种意见是不对的。

第二点，受高、饶影响的同志和没有受他们影响的同志，各自应当采取什么态度？受影响的，有浅有深。有些是一般性的，被他们扫了一翅膀；少数几位同志是比较深的，同他们谈了许多问题，在下面有所活动，替他们传播。这两者是有区别的。但是，所有这些人，不管有浅有深，大多数同志在这个会议上都已经表示了态度。有的表示得很好，受到全场的欢迎。有的表示得还好，受到大部分同志的欢迎，但是有缺点。有的表示得不够充分，今天作了补充。有的全文讲得还好，但是有某些部分不妥当。不管怎么样，这几种人总之已经有所表示了，我们应当一律表示欢迎，总算有所表示嘛！还有个别同志要求发言，没有来得及，他们可以用书面向中央写一个报告。还没有讲的人，问题不严重，就是被扫了一翅膀的，知道一些事情，他没有讲。至于已经发了言的人，是不是也还有一些是留了尾巴的？那末现在我们决定，不论是关于五年计划还是关于高饶反党联盟问题，所有的发言、报告，都可以拿回去修改，字斟句酌，在五天之内，把那些没有讲完全的，或讲得不妥的，再加以修改。不要因为在这一次会议上没有讲妥，我们就抓住他的小辫子，将来使他下不去。你还可以修改，以你最后修改的稿子为准。

对这些同志，我们应当采取这样的态度，就是希望他们改正错误，对他们不但要看，而且要帮。就是讲，不但要看他们改不改，而且要帮他们改。人是要有帮助的。荷花虽好，也要绿叶扶持。一个篱笆要打三个桩，一个好

汉要有三个帮。单干是不好的，总是要有人帮，在这样的问题上尤其要有人帮。看是要看的，看他们改不改，但单是看是消极的，还要帮助他们。对受了影响的人，不管有深有浅，我们一律欢迎他们改正，不但要看，而且要帮。这就是对待犯错误同志的积极态度。

没有受影响的同志，不要骄傲，谨防害病。这一点极为重要。前面讲的那些同志，可能有些是上当，有些是陷进去比较深，因为犯了错误，他们可能有所警觉，以后不再犯这类错误。害了一次病，取得了免疫力。种了一次牛痘，起预防作用。但是也不能保险，还可能害天花。所以，最好是三年五年再种一次牛痘，就是开我们这种会。其他的同志就不要骄傲，谨防犯错误。高岗、饶漱石为什么对这些人没有惹呢？有几种情形：第一种是他们认为是他们的敌人的人，当然不去传播；第二种是他们看不起的人，认为无足轻重，现在不必去传播，将来“天下大定”了，那些人自然跟着过来的；第三种是他们不敢惹的人，那些人大概是免疫力比较强，他们一看就不对头，虽然这些同志并不被认为是他们的敌人，也不是无足轻重，但是他们不敢去惹；第四种，就是时间来不及。这个瘟疫散播也要时间，再有一年的工夫不揭露，有些人那就难保。所以不要逞英雄：你看，你们不是惹了一点骚吗，而我可干净啦！再有一年不揭露，保管有不少的人是要受他们影响的。

我认为，以上就是受高、饶影响的和没有受影响的两

部分同志应当注意的地方。

第三点，在原则性的问题上，在同志之间，对于违反党的原则的言论、行动，应当经常注意保持一个距离。他们那些话，他们那些行动，不符合党的原则，我们又看不惯，在这一部分问题、这一部分情况上，就不要打成一片。对其他的问题，符合党的原则的，比如五年计划，关于高饶反党联盟的决议、报告，以及各种正确的政策，正确的党内法规，这样一些言论、行动，当然要积极支持，打成一片。对不符合党的原则的，就应当保持一个距离，就是说，要划清界限，立即挡回去。不能因为是老朋友，老上司，老部下，老同事，同学，同乡等而废去这个距离。在这次高饶反党事件中，以及在过去党内的路线斗争中，都有过许多这样的经验：只要你以为关系太老了，太深了，不好讲，不保持一个距离，不挡回去，不划清界限，你就越陷越深，他们那个“鬼”就要缠住你。所以，应当表示态度，应当坚持原则。

第四点，有些同志说，“知道高、饶一些坏事情，但是没有看出他们的阴谋”。我说分两种情况：一种是听到高岗、饶漱石讲了许多不符合党的原则的话，甚至高岗、饶漱石还同他们商量过一些反党活动问题，那就应当看出来。一种是普通知道他们一些坏事情，而没有看出阴谋，这是奇怪的，那是很难看出的。中央也是到了一九五三年才发现他们的反党阴谋。经过财经会议、组织会议，以及财经会议以前的种种问题，看到他们不正常。财经会

议期间，发现了他们的不正常活动，每一次都给他们顶了回去。所以，以后他们就完全转入秘密了。对这个阴谋、阴谋家、阴谋集团，我们是到一九五三年秋冬才发现的。对于高岗、饶漱石，长期没有看出他们是坏人。这种事情过去也有过。井冈山时期有几个叛变分子，我们就从来没有想到他们会叛变。恐怕你们各位都有这种经验。

我们应当从这里得出一条经验，就是不要被假象所迷惑。我们有的同志容易被假象所迷惑。一切事物，它的现象同它的本质之间是有矛盾的。人们必须通过对现象的分析和研究，才能了解到事物的本质，因此需要有科学。不然，用直觉一看就看出本质来，还要科学干什么？还要研究干什么？所以要研究，就是因为现象同本质之间有矛盾。但假象跟一般现象有区别，因为它是假象。所以得出一条经验，就是尽可能不要被假象所迷惑。

第五点，骄傲情绪的危险。不要逞英雄。事业是多数人做的，少数人的作用是有限的。应当承认少数人的作用，就是领导者、干部的作用，但是，没有什么了不起的作用，有了不起的作用的还是群众。干部与群众的正确关系是，没有干部也不行，但是，事情是广大群众做的，干部起一种领导作用，不要夸大干部的这种作用。没有你就不得了吗？历史证明，各种事实证明，没有你也行。比如没有高岗、饶漱石是不是不得了呢？那还不是也行吗！没有托洛茨基，没有张国焘，没有陈独秀，还不是也行吗！这些都是坏人。孔夫子早已没有了，我们中国有了共产

党，总比孔夫子高明一点吧，可见没有孔夫子事情还做得好一些嘛！至于好人呢，没有你也可以。没有你，地球就不转了吗？地球还是照样地转，事业还是照样地进行，也许还要进行得好些。

有两种人：一种是老资格，在座的不少，资格很老；一种是新生力量，这是年轻的人。这两种人中间那一种人更有希望呢？恩来同志今天也讲了这个问题，当然是新生力量更有希望。有些同志，因为自己是老革命，就骄傲起来，这是很不应当的。比较起来，如果说允许骄傲的话，倒是青年人值得骄傲一下。四、五十岁以上的人，年纪越大，经验越多，就应当更谦虚。让青年人看到我们确实是有经验的：“这些前辈，确是有点经验，不要看轻他们，你看他们那么谦虚。”四、五十岁的人了，因为得了许多经验，反倒骄傲起来，那岂不是不象样子？青年人就要发议论：“你们那些经验就等于没有，还不是跟小孩子一样。”小孩子有点骄傲情绪，那是比较合理的。上了年纪的人，有了这么多经验，还骄傲，把尾巴翘得那样高，可以不必。俗语说：“夹紧尾巴做人。”人本来是没有尾巴的，为什么要夹紧尾巴呢？好比那个狗，有翘尾巴的时候，有夹尾巴的时候。大概是打了几棍子的时候它就夹紧尾巴，大概是有了几批成绩的时候它的尾巴就翘起来了。我希望，我们所有的同志，首先是老同志，不要翘尾巴，而要夹紧尾巴，戒骄戒躁，永远保持谦虚进取的精神。

第六点，戒“左”戒右。有人说，“‘左’比右好”，许多

同志都这么说。其实，也有许多人在心里说，“右比‘左’好”，但不讲出来，只有诚实的人才讲出来。有这么两种意见。什么叫“左”？超过时代，超过当前的情况，在方针政策上、在行动上冒进，在斗争的问题上、在发生争论的问题上乱斗，这是“左”，这个不好。落在时代的后面，落在当前情况的后面，缺乏斗争性，这是右，这个也不好。我们党内不但有喜欢“左”的，也有不少喜欢右的，或者中间偏右，都是不好的。我们要进行两条战线的斗争，既反对“左”，也反对右。

关于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问题，我就讲这么几点意见。

四 关于目前形势

国际形势，国内形势，党内形势，这三种形势怎样呢？是光明面占优势，还是黑暗面占优势呢？应当肯定，不论国际、国内、党内形势，都是光明面占优势，黑暗面占劣势。在我们这个会场上也是如此。不要因为有很多人作了自我批评，以为就黑暗了。这些同志是着重讲了他们的缺点错误，没有讲他们的长处，那一年参加革命，那里又打了胜仗，那里有工作成绩，这些话都没有讲。专看他们这一篇检讨，那末就黑暗了。其实，这是一面，在很多同志身上，这是次要的一面。这跟高岗、饶漱石和张、张、赵、马、郭五虎将不同，他们不能适用这个估计：光明面占优势。高岗有什么光明面占优势呀？他是全部黑暗，天

昏地黑，日月无光。至于我们的同志那就不同，略有黑暗，这个东西可以洗干净，用肥皂多洗几回。

为什么要提出准备对付突然事变，准备对付反革命复辟，准备对付高饶事件的重复发生呢？这是说，从最坏的可能性着想，总不吃亏。不论任何工作，我们都要从最坏的可能性来想，来部署。无非是这些坏得不得了的事：帝国主义者发动新的世界大战，蒋介石又来坐北京，高饶反党联盟一类的事件重新发生，而且不只一个，而是十个，一百个。尽管有那么多，我们都先准备好了，就不怕了。你有十个，也只有五双，没有什么了不起，我们都估计到了。帝国主义拿来吓唬我们的原子弹和氢弹，也没有什么可怕。世界上的事情，总是一物降一物，有一个东西进攻，也有一个东西降它。看《封神榜》就知道，那有一个“法宝”是不能破的呀？那样多的“法宝”都破了。我们相信，只要依靠人民，世界上就没有攻不破的“法宝”。

五 为胜利召开党的第八次 全国代表大会而斗争

中央决定一九五六年下半年，召开党的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有三个议事日程：（一）中央委员会的工作报告；（二）修改党章；（三）选举新的中央委员会。明年七月以前要完成代表的选举及文件的准备工作。要求在这一年多的时间内，各方面的工作：经济、文教、军事、党务、政治思想、群众团体、统一战线、少数民族工作，都要大进

一步。

我顺便讲一讲少数民族工作的问题。要反对大汉族主义。不要以为只是汉族帮助了少数民族，而少数民族也极大地帮助了汉族。有些同志总是在那里吹，我们可帮助了你们，就没有看到没有少数民族是不行的。我国百分之五十到百分之六十的地方，是什么人住的？是汉族住的，还是什么人住的？百分之五十到百分之六十的地方是少数民族居住的。那里物产丰富，有很多宝贝。现在，我们帮助少数民族很少，有些地方还没有帮助，而少数民族倒是帮助了汉族。有些少数民族，需要我们先去帮助他们，然后他们才能帮助我们。少数民族在政治上极大地帮助了汉族，他们加入了中华民族这个大家庭，就是在政治上帮助了汉族。少数民族和汉族团结在一起了，全国人民都高兴。所以，少数民族在政治上、经济上、国防上，都对整个国家、整个中华民族有很大的帮助。那种以为只有汉族帮助了少数民族，少数民族没有帮助汉族，以及那种帮助了一点少数民族，就自以为了不起的观点，是错误的。

我们讲在这一年中各方面的工作要大进一步，就是要把已经揭露出来的缺点、错误加以改正。不要在这次会上许了愿，到明年召开“八大”时还照样有那么多缺点、错误，原封未动。所以要为召开“八大”而奋斗者，就是要把缺点、错误改正，比如铺张浪费、大屋顶这样一些东西，认真地负责地改一下。不要在这里许了愿，一回去大家

就把两脚一伸睡起觉来了。

有人建议一年或者两年开一次这样的会议，使同志之间互相监督，我认为可以考虑。谁监督我们这些人呢？互相监督是好办法，可以促进党和国家的事业迅速进步。是迅速进步，不是慢慢地进步。党的代表大会，十年没有开了。当然头五年不应当开，因为兵荒马乱，又开了“七大”，后五年可以开而没有开。没有开也有好处：高饶问题搞清楚再开，不然他们要利用“八大”大做文章。同时，我们的五年计划也上了轨道，过渡时期总路线也提出来了，又经过这次代表会议使大家在思想上更加统一了，为召开党的第八次代表大会准备了条件。在党的第八次代表大会上，不要每个人去检讨一篇，但对我们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还是要作公开的批评和自我批评。不实行马克思主义的这一条是不行的。

批评要尖锐。这次有些批评，我觉得不那么尖锐，总是怕得罪人的样子。你不那样尖锐，不切实刺一下，他就不痛，他就不注意。要有名有姓，那一个部门，要指出来。你没有搞好，我是不满意的，得罪了你就得罪了你。怕得罪人，无非是怕丧失选举票，还怕工作上不好相处。你不投我的票，我就吃不了饭？没有那回事。其实，你讲出来了，把问题尖锐地摆在桌面上，倒是好相处了。不要把棱角磨掉。牛为什么要长两只角呢？牛之所以长两只角，是因为要斗争，一为防御，二为进攻。我常跟同志讲，你头上长“角”没有？你们各位同志可以摸一摸。我看有些

同志是长了“角”的，有些同志长了“角”但不那样尖锐，还有些同志根本没有长“角”。我看，还是长两只“角”好，因为这是合乎马克思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有一条，叫做批评和自我批评。

所以，定期召开会议，进行批评和自我批评，这是一种同志间互相监督，促使党和国家事业迅速进步的好办法。建议各省、市委同志们考虑，你们是不是也可以这样做？你们不是学中央吗？我看这一点是可以学的。

最后，我请同志们注意，也请全党同志注意：

为在一九五六年胜利地召开党的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而斗争！

为胜利地完成第一个五年计划而斗争！

选自《毛泽东选集》第5卷

毛泽东

增强党的团结，继承党的传统*

(一九五六年八月三十日)

今天开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的预备会议。预备会议要开十几天，要作的主要事情，一是准备大会文件，二是进行中央委员会的预选，三是准备大会发言稿。

现在我讲几点意见。

第一点，关于大会的目的和宗旨。这次大会要解决什么问题，达到什么目的？总的说来，就是总结“七大”以来的经验，团结全党，团结国内外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为建设伟大的社会主义中国而奋斗。

关于总结经验，我们的经验是很丰富的，但是不能够罗列很多事情，而是要抓住重点，从实际出发，根据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加以总结。这样总结，会给我们全党一个推动力，使我们的工作比过去做得更好些。

我们党是一个伟大的、光荣的、正确的党，这是全世界公认的。过去有些外国同志怀疑：究竟你们搞些什么

* 这是毛泽东同志在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预备会议第一次会议上的讲话。

事情？有许多人不了解我们对待民族资产阶级的政策，也不太了解我们的整风运动。现在，我了解的人更多了，可以说一般是了解了。当然，还会有些人不了解。在国内，甚至在党内，也还会有些人不了解，认为“七大”以来的路线不见得那么正确。但是，事实摆在面前，我们进行了两个革命：一个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夺取全国政权；一个是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实行社会主义改造，建设社会主义国家。“七大”以来的十一年，我们的成绩是很大的，全国承认，全世界承认，甚至连外国资产阶级也不得不承认。两个革命证明，从“七大”到现在，党中央的路线是正确的。

十月革命推翻了资产阶级，这在世界上是个新鲜事情。对这个革命，国际资产阶级不管三七二十一，骂的多，总是说不好。俄国资产阶级是个反革命阶级，那个时候，国家资本主义这一套他不干，他怠工，破坏，拿起枪来打。俄国无产阶级没有别的办法，只好干掉他。这就惹火了各国资产阶级，他们就骂人。我们这里对待民族资产阶级比较缓和一点，他就舒服一点，觉得还有些好处。现在艾森豪威尔、杜勒斯不让美国的新闻记者到中国来，实际上就是承认我们的政策有这个好处。如果我们这里是一塌糊涂，他们就会放那些人来，横直是写骂人文章。他们就是怕写出来的文章不专门骂人，还讲一点好话，那个事情就不好办。

过去说中国是“老大帝国”，“东亚病夫”，经济落后，

文化也落后，又不讲卫生，打球也不行，游水也不行，女人是小脚，男人留辫子，还有太监，中国的月亮也不那么很好，外国的月亮总是比较清爽一点，总而言之，坏事不少。但是，经过这六年的改革，我们把中国的面貌改变了。我们的成绩是谁也否认不了的。

领导我们革命事业的核心是我们的党。这次大会总结经验，首先要使全党更加团结。我们党，到六月为止，有一千零七十三万党员。对这一千多万党员，要进行广大的教育工作，说服工作，团结工作，使他们在人民中间更好地起核心的作用。单有党还不行，党是一个核心，它必须要有群众。我们的各项具体工作，包括工业、农业、商业、文化教育等等工作，百分之九十不是党员做的，而是非党员做的。所以，要好好团结群众，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一道工作。过去，在团结全党和团结党外人士方面，我们还有许多毛病。我们要在这次大会上和大会以后进行宣传教育，把这方面的工作好好加以改进。

在国际上，我们要团结全世界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首先是团结苏联，团结兄弟党、兄弟国家和人民，还要团结所有爱好和平的国家和人民，借重一切有用的力量。这次有五十几个国家的共产党的代表来参加我们的大会，这是很好的事。过去我们没有取得全国政权，没有两个革命的胜利，没有建设的成就，现在不同了。外国同志对我们是比较尊重的。

我们团结党内外、国内外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目的

是为了什么呢？是为了建设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我们这样的国家，可以而且应该用“伟大的”这几个字。我们的党是伟大的党，我们的人民是伟大的人民，我们的革命是伟大的革命，我们的建设事业是伟大的建设事业。六亿人口的国家，在地球上只有一个，就是我们。过去人家看我们不起是有理由的。因为你没有什么贡献，钢一年只有几十万吨，还拿在日本人手里。国民党蒋介石专政二十二年，一年只搞到几万吨。我们现在也还不多，但是搞起一点来了，今年是四百多万吨，明年突破五百万吨，第二个五年计划要超过一千万吨，第三个五年计划就可能超过两千万吨。我们要努力实现这个目标。虽然世界上差不多有一百个国家，但是超过两千万吨钢的国家只有几个。所以，我们这个国家建设起来，是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将完全改变过去一百多年落后的那种情况，被人家看不起的那种情况，倒霉的那种情况，而且会赶上世界上最强大的资本主义国家，就是美国。美国只有一亿七千万人口，我国人口比它多几倍，资源也丰富，气候条件跟它差不多，赶上是可能的。应不应该赶上呢？完全应该。你六亿人口干什么呢？在睡觉呀？是睡觉应该，还是做工作应该？如果说做工作应该，人家一亿七千万人口有一万万吨钢，你六亿人口不能搞它两万万吨、三万万吨钢呀？你赶不上，那你就没有理由，那就不那么光荣，也就不那么十分伟大。美国建国只有一百八十年，它的钢在六十年前也只有四百万吨，我们比它落后六十

年。假如我们再有五十年、六十年，就完全应该赶上它。这是一种责任。你有那么多人，你有那么一块大地方，资源那么丰富，又听说搞了社会主义，据说是具有优越性，结果你搞了五、六十年还不能超过美国，你象个什么样子呢？那就要从地球上开除你的球籍！所以，超过美国，不仅有可能，而且完全有必要，完全应该。如果不是这样，那我们中华民族就对不起全世界各民族，我们对人类的贡献就不大。

第二点，关于继承党的传统。这次大会应当继续发扬我们党在思想方面和作风方面的优良传统，把主观主义、宗派主义这两个东西切实反一下，此外，还要反对官僚主义。官僚主义那个东西我今天不讲，只讲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这两个东西，扫了又发生，发生了又要扫。

所谓犯错误，就是那个主观犯错误，那个思想不对头。我们看到的批评斯大林错误的许多文章，就是没有提到这个问题，或者很少提到这个问题。斯大林为什么犯错误呢？就是在一部分问题上他的主观跟客观实际不相符合。现在我们的工作中还经常有许多这样的事情。主观主义就是不从客观实际出发，不从现实可能性出发，而是从主观愿望出发。我们这次大会的文件所规定的东西，所讲的东西，要尽可能符合和接近中国的实际。同时，要根据我们过去的经验，批评那些不符合实际的观点，批评这个主观主义，打击这个主观主义。这个任务，早几年我们就开始提出来了。现在，我们反对的是社会主义革

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中的主观主义。过去，在民主革命中，我们受主观主义的害时间很长，受了很大的惩罚，根据地差不多丧失干净，革命力量丧失百分之九十以上，一直到这个时候我们才开始觉悟。经过延安整风，着重调查研究，从实际出发，才把这个问题搞清楚。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一定要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如果不结合，那就不行。这就是说，理论与实践要统一。理论与实践的统一，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最基本的原则。按照辩证唯物论，思想必须反映客观实际，并且在客观实践中得到检验，证明是真理，这才算是真理，不然就不算。我们这几年的工作是有成绩的，但是主观主义的毛病到处都有。不仅现在有，将来还会有。主观主义永远都会有，一万年，一万万年，只要人类不毁灭，总是有的。有主观主义，总要犯错误。

还有另外一个东西，叫宗派主义。一个地方有一个地方的全局，一个国家有一个国家的全局，一个地球有一个地球的全局。现在地球以外不去讲，因为交通路线还没有打通。如果发现火星或者金星上有人，那个时候我们再来交涉关于团结他们，建立统一战线的问题。现在我们是讲党内、国内和全世界的团结问题。我们的原则，就是不管你什么人，外国的党，外国的非党人士，只要是对世界和平和人类进步事业有一点用处的，我们就应该团结。首先是要团结几十个共产党，团结苏联。因为苏联发生了一些错误，这方面讲得多了，吹得多了，似乎那

种错误不得了，这种观察是不妥的。任何一个民族，不可能不犯错误，何况苏联是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经历又那么长久，不发生错误是不可能的。苏联发生的错误，象斯大林的错误，它的位置是什么呢？是部分性质的，暂时性质的，虽然听说有些什么东西有二十年了，但总是暂时的，部分的，是可以纠正的。苏联那个主流，那个主要方面，那个大多数，是正确的。俄国产生了列宁主义，经过十月革命变成了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它建设了社会主义，打胜了法西斯，变成了一个强大的工业国。它有许多东西我们可以学。当然，是要学习先进经验，不是学习落后经验。我们历来提的口号是学习苏联先进经验，谁要你去学习落后经验呀？有一些人，不管三七二十一，连苏联人放的屁都是香的，那也是主观主义。苏联人自己都说是臭的嘛！所以，要加以分析。我们说过，对斯大林要三七开。他们的主要的、大量的东西，是好的，有用的；部分的东西是错误的。我们也有部分的东西是不好的，我们自己就要丢掉，更不要别国来学这些坏事。但是，坏事也算一种经验，也有很大的作用。我们就有陈独秀、李立三、王明、张国焘、高岗、饶漱石这些人，他们是我们的教员。此外，我们还有别的教员。在国内来说，最好的教员是蒋介石。我们说不服的人，蒋介石一教，就说得服了。蒋介石用什么办法来教呢？他是用机关枪、大炮、飞机来教。还有帝国主义这个教员，它教育了我们六亿人民。一百多年来，几个帝国主义强国压迫我们，教育了

我们。所以，坏事有个教育作用，有个借鉴作用。

反对宗派主义，特别值得谈一下的，就是要团结那些跟自己作过斗争的人。他跟你打过架，把你打倒在地，你吃了亏，脸上无光，而你并不那么坏，却封你一个“官”，叫机会主义者。至于打得对的，那就应该打，你本来是机会主义，为什么不应该打呢？我这里是讲打得不对的，斗争得不对的。如果那些人后头改变了态度，承认打你打错了，封你为机会主义王国的国王是不妥的，只要有这一条就行了。如果个别的人还不承认，可不可以等待呢？也可以等待。所谓团结，就是团结跟自己意见分歧的，看不起自己的，不尊重自己的，跟自己闹过别扭的，跟自己作过斗争的，自己在他面前吃过亏的那一部分人。至于那个意见相同的，已经团结了，就不发生团结的问题了。问题就是那个还没有团结的。所谓还没有团结的，就是那些意见不相同的，或者缺点大的。比如，现在我们党里头，有许多组织上入了党而思想上还没有入党的人，他虽然没有跟你打过架，交过手，但是因为他思想上还没有入党，于是乎做的事情就势必不很妥当，有些缺点，或者做出一些坏事。对这一部分人，要团结他们，教育他们，帮助他们。从前我讲过，对于任何有缺点的人，犯过错误的人，不仅要看他改不改，而且要帮助他改，一为看，二为帮。如果只是看，站在那里不动，看你怎么样，你搞得再好那也好，你搞得不好该你遭殃。这种态度是一种消极的态度，不是积极的态度。马克思主义者应该采取积极的

态度，不但要看，还应该帮。

第三点，关于中央委员会的选举。刚才小平同志讲，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的名额为一百五十到一百七十人。七届中委是七十七人，这次加一倍多一点，这样恐怕比较妥当。等几年，比如等五年，那个时候再来扩大，恐怕是比较有利。现在，很多很有用的人才是在抗日战争时期培养起来的，这就是所谓“三八式”的干部。他们是我们现在工作的很重要的基础，没有他们不行。但是这部分干部人数很多，如果要安排，这届中委的名额就要增加到好几百人。所以这次就不考虑安排了。中央提的一百五十到一百七十这个人数究竟妥当不妥当，究竟多少为好，请同志们考虑。

应该肯定，上届中委是做了工作的，没有辜负七次代表大会的委托。在十一年间，他们正确地领导了中国的民主革命，正确地领导了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没有出大毛病，并且同各种各样的机会主义的东西作斗争，同错误的东西作斗争，克服了各种不利于革命、不利于建设的因素。他们是有成绩的，其中也包括一些犯错误的同志。这是讲中央委员会的整体。至于个别同志，就不能那么估计。特别是王明，他在七次大会的时候，为了应付起见，写了一个书面声明，承认中央路线正确，承认七大政治报告，愿意服从大会的决定。但是，后头我跟他谈话，他又翻了，他忘记那个东西了。他回去一想，第二天又说，我写过这个东西，是承认了错误的。我说，你

那个时候承认，如果现在不承认了，你也可以撤回去。他又不撤回去。后头，在二中全会上，我们希望他讲一讲他自己的错误，但是他讲别的东西，只讲我们这些人怎么好怎么好。我们说，你这些话可以不讲，你讲一讲你王明有些什么错误，他不干。他答应在二中全会以后写反省。但是后头他又说，他有病，用不得脑筋，一动手写，他那个病就来了。也许他是故意这样，那也难说。他一直害病，这次大会也不能出席。是不是选举他呢？还有李立三同志选不选？谅解李立三的人比较多一些，谅解王明的人就比较少。象小平同志讲的，我们如果选举他们，意义还是跟七次大会选举他们一样。七次大会的时候，就有很多代表不愿意选他们（不仅是王明，还有相当几个同志）。当时我们说，如果采取这个方针，我们就要犯错误。我们不选举犯错误的人，为什么叫做犯错误呢？因为那是照他们的办法办事。他们的办法，就是不管你是真犯错误，假犯错误，一经宣布你是机会主义，就不要了。如果我们也照这样办，我们就是走他们的路线，就是走王明路线，或者立三路线。这样的事情不干，让我们走王明路线，立三路线，不干。他们搞的党内关系就是那样一种关系，对犯过错误的，或者跟他们作过斗争的，骂过他们是机会主义的，他们都不要。他们把自己封为百分之百的布尔什维克，后头一查，他们是百分之百的机会主义，而我们这些被他们封为“机会主义者”的，倒是多少有点马克思主义。

这里，最基本的道理，就是他们不是孤立的个人，而是代表小资产阶级里头相当大的一部分人。中国是一个小资产阶级群众广大的国家。小资产阶级中间有相当大一部分人是动摇的。比如富裕中农，大家看到，无论在那个革命中间，他们总是动摇的，不坚定的，高兴起来可以发狂，悲观起来可以垂头丧气。他的眼睛经常看到的是他那一点小财产，无非是一两匹牲口呀，一辆大车呀，十几亩地呀。他们患得患失，生怕失掉这些东西。这种人跟贫农不同。中国的贫农在北方占百分之五十，在南方占百分之七十。我们党，拿成份来说，基本上是工人和贫农组成的，即无产阶级和半无产阶级组成的。半无产阶级也是小资产阶级，但是它的坚定性要比中农好得多。我们党也吸收了一部分知识分子，在一千多万党员里头，大中小知识分子大概占一百万。这一百万知识分子，说他代表帝国主义不好讲，代表地主阶级不好讲，代表官僚资产阶级不好讲，代表民族资产阶级也不好讲，归到小资产阶级范畴比较适合。他们主要代表小资产阶级范畴里那一部分人呢？就是城市和农村中生产资料比较多的那一部分人，如富裕中农。这一部分知识分子党员，前怕龙后怕虎，经常动摇，主观主义最多，宗派主义不少。我们选举王明路线和立三路线这两位代表人物是表示什么呢？这是表示我们对待这种犯思想错误的人，跟对待反革命分子和分裂派（象陈独秀、张国焘、高岗、饶漱石那些人）有区别。他们搞主观主义、宗派主义是明火执仗，敲

锣打鼓，拿出自己的政治纲领来征服人家。王明有政治纲领，李立三也有政治纲领。当然，陈独秀也有政治纲领，但他搞托派，搞分裂，在党外搞反党活动。张国焘搞阴谋，搞分裂，跑到国民党那里去了。所以，王明、李立三的问题，不单是他们个人的问题，重要的是有它的社会原因。这种社会原因在我们党内的反映，就是党内有相当一部分人遇到重要关头就要动摇。这种动摇分子就是机会主义。所谓机会主义，就是这里有利就干这件事，那里有利就干那件事，没有一定的原则，没有一定的章程，没有一定的方向，他今天是这样，明天又是那样。比如王明就是如此，从前“左”得不得了，后头又右得不得了。

七次大会的时候，我们说服了那些同志，选举了王明、李立三。那末，“七大”以后这十一年来，我们有什么损失没有？毫无损失，并没有因为选举了王明、李立三，我们的革命就不胜利了，或者迟胜利几个月。

是不是选举了他们，犯错误的人得到奖励呢？犯错误的人当了中央委员，那我们大家一齐犯错误好了，横直有当中央委员的机会，会不会这样呢？也不会这样。你看，我们七十几个中央委员，他们并不故意犯几个错误以便再当中央委员。没有当中央委员的，“三八式”以前也好，“三八式”也好，“三八式”以后也好，会不会就学王明、李立三，也搞两条路线，变成四条路线，以便争取当中央委员呢？不会，没有人这样，而是鉴于他们的错误，自己更谨慎一些。

还有，从前有所谓“早革命不如迟革命，革命不如不革命”那么一种话，那末，选举他们，党内会不会发生正确不如错误、小错误不如大错误这样的问题呢？王明、李立三犯路线错误，要选他们当中央委员，结果就要正确的人或者犯小错误的人空出两个位置来，让他们登台。这样的安排是不是世界上最不公道的呢？从这一点看，那是很不公道的：你看，正确的或者犯小错误的人要把位置让给那个犯大错误的人，这是很明显的的不公道，这里头没有什么公道。如果这样来比，应该承认，是所谓正确不如错误，小错误不如大错误。但是，从另外一点看，就不是这样。他们犯路线错误是全国著名，全世界著名的，选举他们的道理就是他们出了名。你有什么办法呀，他们是出了名的，你那个不犯错误的和犯小错误的名声没有他们大。在我们这个有广大小资产阶级的国家，他们是旗帜。选举他们，许多人就会这么说：共产党还是等待他们的，宁可让出两个位置来给他们，以便他们好改正错误。他们改不改是另一个问题，那个问题很小，只是他们两个人。问题是我们这个社会有这么多小资产阶级，我们党内有这么多小资产阶级动摇分子，知识分子中间有许多这样动摇的人，他们要看这个榜样。他们看到这两面旗帜还在，他们就舒服了，他们就睡得着觉了，他们就高兴了。你把这两面旗帜一倒，他们就恐慌了。所以，不是王明、李立三不改不改的问题，他们改或者不改关系不大，关系大的是党内成百万容易动摇的出身于小资产阶级的成

份，特别是知识分子，看我们对王明、李立三是怎样一种态度。正如我们在土地改革中间对待富农一样，我们不动富农，中农就安心。如果我们“八大”对他们两位采取的态度还是同“七大”的态度一样，那我们党就可以得到一种利益，得到一种好处，就是对于改造全国广大的小资产阶级比较容易些。这在全世界也有影响。在外国对犯错误的人采取我们这个态度的很少，可以说没有。

我们这次大会的预备会议，从今天算起，只有十几天的时间，但是安排得好，是完全可以把准备工作做好的。我们相信，这次大会是可以开好的，代表们的水平是能够保证这次大会开好的。但是要兢兢业业，大家努力。

选自《毛泽东选集》第5卷

毛 泽 东

坚持艰苦奋斗，密切联系群众*

(一九五七年三月)

—

我们党现在准备开展一次整风运动。整风是用批评和自我批评解决党内矛盾的一种方法，也是解决党同人民之间的矛盾的一种方法。这次整风，就是整顿三风，整顿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要经过整风，把我们党艰苦奋斗的传统好好发扬起来。因为革命胜利了，有一部分同志，革命意志有些衰退，革命热情有些不足，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精神少了，过去跟敌人打仗时的那种拚命精神少了，而闹地位，闹名誉，讲究吃，讲究穿，比薪水高低，争名夺利，这些东西多起来了。听说去年评级的时候，就有些人闹得不象样子，痛哭流涕。人不是长着两只眼睛吗？两只眼睛里面有水，叫眼泪。评级评得跟

* 这里的(一)是毛泽东同志一九五七年三月十八日在济南党员干部会议上讲话的一部分，(二)是毛泽东同志一九五七年三月十九日在南京党员干部会议上讲话的一部分。

他不对头的时候，就双泪长流。在打蒋介石的时候，抗美援朝的时候，土地改革的时候，镇压反革命的时候，他一滴眼泪也不出，搞社会主义他一滴眼泪也不出，一触动到他个人的利益，就双泪长流。听说还有三天不吃饭的事情。我说，三天不吃饭，没有什么要紧，一个星期不吃饭就有点危险了。总而言之，争名誉，争地位，比较薪水，比较吃穿，比较享受，这么一种思想出来了。为个人的利益而绝食，而流泪，这也算是一种人民内部的矛盾。有一出戏，叫《林冲夜奔》^{〔1〕}，唱词里说：“男儿有泪不轻弹，只因未到伤心处。”我们现在有些同志，他们也是男儿（也许还有女儿），他们是男儿有泪不轻弹，只因未到评级时。这个风也要整一下吧。有泪不轻弹是对的，伤心处是什么？就是工人阶级、广大劳动人民危急存亡的时候，那个时候可以弹几滴眼泪。至于你那个什么级，就是评得不对，你也要吞下去，眼泪不要往外头流，要往里头流。世界上是有许多不公道的事情，那个级可能评得不对，那也无须闹，无关大局，只要有饭吃就行。革命党嘛，以饿不死人为原则。人没有饿死，就要做革命工作，就要奋斗。一万年以后，也要奋斗。共产党就是要奋斗，就是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不要半心半意或者三分之二的心三分之二的意为人民服务。革命意志衰退的人，要经过整风重新振作起来。

二

我们要保持过去革命战争时期的那么一股劲，那么一股革命热情，那么一种拚命精神，把革命工作做到底。什么叫拚命？《水浒传》上有那么一位，叫拚命三郎石秀，就是那个“拚命”。我们从前干革命，就是有一种拚命精神。每一个人有一条生命，或者六十岁，或者七十岁，或者八十岁、九十岁，看你有多长的命。只要你还能工作就多多少少应当工作。而工作的时候就要有一股革命热情，就要有一种拚命精神。有些同志缺乏这种热情，缺乏这种精神，停滞下来了。这种现象不好，应当对这些同志进行教育。

全党都要加强政治思想工作。今天军队的同志到会的很多。军队里头怎么样？平时的政治工作跟战时的政治工作是不是有些不同？在战时，要密切联系群众，要官兵打成一片，军民打成一片。这时候，我们有一些缺点，人民还谅解我们。现在是平时，又不打仗，就是训练，如果不坚持密切联系群众，人民对我们的缺点很自然地就难于原谅了。现在实行了军衔制度^[2]和其他一些制度，但是，上级跟下级还是要打成一片，干部跟士兵还是要打成一片，还是要准许下级批评上级，士兵批评干部。比如开个党代表大会，给他们一个批评的机会。陈毅同志在“三反”的时候讲得好，他说，我们发号施令多少年都可

以，现在让下级批评我们一下，批评一个星期，可不可以？他的意思是说，应当是可以的。我赞成这个话，就是让下级批评我们一个星期。在大家批评之前，先准备一下，作一点报告，讲一讲自己有什么缺点，无非是一二三四，有那么几条。然后同志们发言，补充一些，批评一下。群众是公道的，他们不会把我们的历史丢掉。连排长也要给战士们一个批评的机会，最好一年有这么一回，开这么几天的批评会。军队里头的这种民主，我们曾经搞过，结果是有益的。不要因为有了军衔制度和其他一些制度，而使上下级、官兵、军民、军队同地方的密切关系受到损害。毫无疑问，上下级的关系应当密切，应当是一种同志的关系。干部跟战士的关系应当密切，应当打成一片。军队跟人民、跟地方党政组织的关系，也应当是密切的。

我们的同志应当注意，不要靠官，不要靠职位高，不要靠老资格吃饭。说资格老，多少年革命，这个资格也是可靠的，但同时我们不要靠它。你资格老，几十年，那是真的。可是，你有一天办了一些糊涂事，讲了一篇混账话，人民还是不谅解你。尽管你过去做过多少好事，职位有多么高，你今天的事情办得不好，解决得不对，对人民有损害，这一点人民就不能原谅。因此，我们的同志不要靠老资格吃饭，要靠解决问题正确吃饭。靠正确，不靠资格。靠资格吃不了饭，索性不靠它，等于还是什么官都没有做，就是不摆老爷架子，不摆官僚架子，把架子收起来，跟人民见面，跟下级见面。这一条，我们的干部要注意，

特别是老干部要注意。一般来说，新干部没有这种包袱，比较自由。老干部对新干部要处在平等的地位。有很多东西，老干部不如新干部，要向他们学习。

注 释

〔1〕《林冲夜奔》是明朝人写的昆曲《宝剑记》中的一折。

〔2〕军衔制度在一九五五年九月开始实行，一九六五年五月取消。

选自《毛泽东选集》第5卷

毛泽东

打退资产阶级右派的进攻*

(一九五七年七月九日)

三月间，我在这个地方同党内的一些干部讲过一次话。从那个时候到现在，一百天了。这一百天，时局有很大的变化。我们同资产阶级右派打了一仗，人民的觉悟有所提高，而且是相当大的提高。当时我们就料到这些事情了。比如，我在这里说过，人家批评起来，就是说火一烧起来，岂不是疼吗？要硬着头皮顶住。人这个地方叫头，头有一张皮，叫头皮。硬着头皮顶住，就是你批评我，我就硬着头皮听，听一个时期，然后加以分析，加以答复，说得对的就接受，说得不对的加以批评。

我们总要相信，全世界也好，我们中国也好，多数人是好人。所谓多数人，不是百分之五十一的人，而是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在我国六亿人口中，工人、农民是我们的基本群众。共产党里，青年团里，民主党派里，学生和知识分子里，多数人总是好人。他们的心总是善良的，是

* 这是毛泽东同志在上海干部会议上的讲话。

诚实的，不是狡猾的，不是别有用心的。应当承认这一点。这是每一次运动都证明了的。比如这一次，拿学生来说，北京大学有七千多人，右派只有百分之一、二、三。什么叫百分之一、二、三呢？就是坚决的骨干分子，经常闹的，闹得天翻地覆的，始终只有五十几个人，不到百分之一。另外百分之一、二的人，是为他们拍掌的，拥护他们的。

放火烧身可不容易。现在听说你们这个地方有些同志后悔了，感到没有放得厉害。我看上海放得差不多了，就是有点不够，有点不过瘾，早知这么妙，何不大放特放呢？让那些毒草长嘛，让那些牛鬼蛇神出台嘛，你怕他干什么呢？三月份那个时候我就讲不要怕。我们党里头有些同志，就是怕天下大乱。我说，这些同志是忠心耿耿，为党为国，就是没有看见大局面，就是没有估计到大多数人，即百分之九十几的人是好人。不要怕群众，他们是跟我们一块的。他们可以骂我们，但是他们不用拳头打我们。右派只有极少数，象刚才讲的北京大学，只有百分之一、二、三。这是讲学生。讲到教授、副教授，那就不同一些，大概有百分之十左右的右派。左派也有百分之十左右。这两方面旗鼓相当。中间派占百分之八十左右。有什么可怕呢？我们有些同志，就有那么一些怕，又怕房子塌下来，又怕天塌下来。从古以来，只有“杞人忧天”^{〔1〕}，就是那个河南人怕天塌下来。除了他以外，从来就没有人怕天塌下来的。至于房子，我看这个房子不会塌下来，刚刚

砌了不好久嘛，怎么那么容易塌下来呢？

总而言之，无论什么地方，百分之九十几的人是我们的朋友、同志，不要怕。怎么怕群众呢？怕群众是没有道理的。什么叫领导人物呢？小组长、班长、支部书记、学校里头的校长、党委书记，都是领导人物，还有柯庆施同志，我也算一个。我们这些人总是有那么一点政治资本，就是替人民多少做了一点事。现在把火放起来烧，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是希望把我们的同志烧好。我们每一个同志，都有一点毛病，那有没有毛病的呢？“人非圣贤，孰能无过”，总要讲错一点话，办错一点事，就是什么官僚主义之类。这些东西往往是不自觉的。

要定期“放火”。以后怎么搞呀？你们觉得以后是一年烧一次，还是三年烧一次？我看至少是象闰年、闰月一样，三年一闰，五年再闰，一个五年计划里头至少搞两次。孙悟空在太上老君的八卦炉里头一锻炼就更好了。孙悟空不是很厉害的人物吗？人家说是“齐天大圣”呀，还要在八卦炉里头烧一烧。不是讲锻炼吗？锻者就是锤打，炼就是在高炉里头炼铁，平炉里头炼钢。钢炼出来要锻。现在锻要拿汽锤锻。那个锻可厉害哩！我们人也要锻炼。有些同志，你问他赞成不赞成锻炼，那他是很赞成的，“啊，我有缺点，很想去锻炼一下”。人人都说要锻炼一番。平常讲锻炼，那舒服得很，真正要锻炼了，真正要拿汽锤给他一锻，他就不干了，吓倒了。这一回就是一次锻炼。一个时期天昏地黑，日月无光。就是两股风来吹：一

是大多数好人，他们贴大字报，讲共产党有缺点，要改；另外是极少数右派，他们是攻击我们的。两方面进攻的是一个方向。但是多数人的进攻是应当的，攻得对。这对我们是一种锻炼。右派的进攻，对我们也是一种锻炼。真正讲锻炼，这一回还是要感谢右派。对我们党，对广大群众，对工人阶级、农民、青年学生以及民主党派，右派给的教育最大。每一个城市都有一些右派，这些右派是要打倒我们的。对这些右派，现在我们正在围剿。

我们的革命是人民的革命，是无产阶级领导的六亿人民的革命，是人民的事业。民主革命是人民的事业，社会主义革命是人民的事业，社会主义建设是人民的事业。那末，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好不好？有没有成绩？成绩是主要的，还是错误是主要的？右派否定人民事业的成绩。这是第一条。第二条，走那一个方向呢？走这边就是社会主义，走那边就是资本主义。右派就是要倒转这个方向，走资本主义道路。第三条，要搞社会主义，谁人来领导？是无产阶级领导，还是资产阶级领导？是共产党领导，还是那些资产阶级右派来领导？右派说不要共产党领导。我看这一回是一次大辩论，就是在这三个问题上的大辩论。辩论一次好。这些问题没有辩论过。

民主革命是经过长期辩论的。从清朝末年起，到辛亥革命、反袁世凯、北伐战争、抗日战争，都是经过辩论的。要不要抗日？一派人是唯武器论，说中国的枪不够，

不能抗；另外一派人说不怕，还是人为主，武器不如人，还是可以打。后头接着来的解放战争，也是经过辩论的。重庆的谈判，重庆的旧政协，南京的谈判，都是辩论。蒋介石对我们的意见，对人民的意见，一概都不听，他要打仗。打的结果，他打输了。所以，那一场民主革命是经过辩论的，经过长时期精神准备的。

社会主义革命来得急促。在六、七年之内，资本主义所有制和小生产者个体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就基本上完成了。但是人的改造，虽然也改造了一些，那就还差。社会主义改造有两方面：一方面是制度的改造，一方面是人的改造。制度不单是所有制，而且有上层建筑，主要是政权机关、意识形态。比如报纸，这是属于意识形态范围的。有人说，报纸没有阶级性，报纸不是阶级斗争的工具。这种话就讲得不对了。至少在帝国主义消灭以前，报纸，各种意识形态的东西，都是要反映阶级关系的。学校教育，文学艺术，都是意识形态，都是上层建筑，都是有阶级性的。自然科学分两个方面，就自然科学本身来说，是没有阶级性的，但是谁人去研究和利用自然科学，是有阶级性的。大学里，一个中文系，一个历史系，唯心论最多。办报纸的，唯心论最多。你们不要以为只是社会科学方面唯心论多，自然科学方面也有许多唯心论。搞自然科学的许多人，世界观是唯心论的。你要说水是什么东西构成的，那他们是唯物论，水是两种元素构成的，他们是照那个实际情形办事的。你要讲社会怎么改造，那他

们是唯心论。我们说整风是要整好共产党，他们中间一些人说要消灭共产党。这一回暴露了这么一些情形。

右派进攻的时候，我们的政策是这样，就是只听不说。有那么几个星期，硬着头皮，把耳朵扯长一点，就听，话是一句不说。而且不通知团员，不通知党员，也不通知支部书记，不通知支部委员会，让他们混战一场，各人自己打主意。学校的党委、总支里头混进来一些敌人，清华大学党委的委员里就有敌人。你这里一开会，他就告诉敌人了，这叫做“起义分子”。不是有起义将军吗？这是“起义文人”。这一件事，敌人和我们两方面都高兴。在敌人方面，看见共产党员“起义”了，共产党要“崩溃”了，他们很高兴。这一回崩溃了多少呀？上海不晓得，北京学校的党员大概是崩溃了百分之五，团员崩溃得多一点，也许百分之十，或者还多一点。这种崩溃，我说是天公地道。百分之十也好，百分之二十也好，百分之三十也好，百分之四十也好，总而言之，崩溃了我就高兴得很。你满脑子资产阶级思想，满脑子唯心论，你钻进共产党、青年团里头，名为共产主义，实际上是反共产主义，或者是动摇分子。所以，在我们方面，看见“起义”的，我们也高兴。那一年清党、清团清得这么干净呀？他自己跑出去了，不要我们清理。但是，现在的情况变了，反过来了。我们把右派一包围，许多跟右派有联系但并非右派的人起来一揭露，他不“起义”了。现在右派不好混了，有一些右派起义了。我三月在这里讲话以后，一百天工夫，时局起了这

样大的变化。

这次反右派斗争的性质，主要是政治斗争。阶级斗争有各种形式，这次主要是政治斗争，不是军事斗争，不是经济斗争。思想斗争的成份有没有呢？有，但是我看政治斗争占主要成份。思想斗争主要还在下一阶段，那要和风细雨。共产党整风，青年团整风，是思想斗争。要提高一步，真正学点马克思主义。要真正互相帮助。有什么缺点，主观主义有一点没有呀？官僚主义有一点没有呀？我们要真正用脑筋想一想，写一点笔记，搞那么几个月，把马克思主义水平、政治水平和思想水平提高一步。

反击右派也许还要几十天，还要个把月。右派言论这样在报纸上登，今年登一年，明年登一年，后年登一年，那也不好办事。右派就那么多，右派言论登的差不多了，也没有那么多东西登嘛。以后就阴登一点，阳登一点，有就登一点，没有就不登。我看七月还是反击右派紧张的一个月。右派最喜欢急风暴雨，最不喜欢和风细雨。我们不是提倡和风细雨吗？他们说，和风细雨，黄梅雨天天下，秧烂掉，就要闹饥荒，不如急风暴雨。你们上海不是有那么一个人写了一篇文章叫《乌“昼”啼》吗？那个“乌鸦”他提此一议。他们还说，你们共产党就不公道，你们从前整我们就是急风暴雨，现在你们整自己就和风细雨了。其实，我们从前搞思想改造，包括批评胡适、梁漱溟，我们党内下的指示都是要和风细雨的。世界上的事情总是曲折的。比如走路，总是这么弯弯曲曲走的。莫

千山你们去过没有呀？上下都是一十八盘。社会的运动总是采取螺旋形前进的。现在，右派还要挖，不能松劲，还是急风暴雨。因为他们来了个急风暴雨，这好象是我们报复他们。这个时候，右派才晓得和风细雨的好处。他看见那里有一根草就想抓，因为他要沉下去了。好比黄浦江里将要淹死的人一样，那怕是一根稻草，他都想抓。我看，那个“乌鸦”现在是很欢迎和风细雨了。现在是暴雨天，过了七月，到了八月那个时候就可以和风细雨了，因为没有多少东西挖了嘛。

右派是很好的反面教员。我们中国历来如此，有正面的教员，有反面的教员。人需要正反两方面的教育。日本帝国主义是我们第一个大好的反面教员。从前还有清政府，有袁世凯，有北洋军阀，后头有蒋介石，都是我们很好的反面教员。没有他们，中国人民教育不过来，单是共产党来当正面教员还不够。现在也是一样。我们有许多话他们不听。所谓不听，是什么人不听呢？是许多中间人士不听，特别是右派不听。中间人士将信将疑。右派根本不听，许多话我们都跟他们讲了的，但是他们不听，另外搞一套。比如我们主张“团结——批评——团结”，他们就不听。我们说肃反成绩是主要的，他们又不听。我们讲要民主集中制，要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民主专政，他们又不听。我们讲要联合社会主义各国和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民，他们也不听。总而言之，这些东西都讲过的，他们都不听。还有一条他们特别不听的，就是说

毒草要锄掉。牛鬼蛇神让它出来，然后展览，展览之后，大家说牛鬼蛇神不好，要打倒。毒草让它出来，然后锄掉，锄倒可以作肥料。这些话讲过没有呢？还不是讲过吗？毒草还是要出来。农民每年都跟那些草讲，就是每年都要锄它几次，那个草根本不听，它还要长。锄了一万年，草还要长，一万万年，还是要长。右派不怕锄，因为我讲话那个时候，不过是讲要锄草，并没有动手锄；而且他们认为自己并非毒草，是香花，我们这些人是毒草，他们并不是应当锄掉的，而要把我们锄掉。他们就没有想到，他们正是那些应当锄掉的东西。

现在就是辩论我上边讲过的那三个问题。社会主义革命来得急促，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没有经过充分辩论，党内没有充分辩论，社会上也没有充分辩论。象牛吃草一样，先是呼噜呼噜吞下去，有个袋子装起来，然后又回过头来慢慢嚼。我们在制度方面，首先是生产资料所有制，第二是上层建筑，政治制度也好，意识形态也好，进行了社会主义革命，但是没有展开充分辩论。这回经过报纸，经过座谈会，经过大会，经过大字报，就是展开辩论。

大字报是个好东西，我看要传下去。孔夫子的《论语》传下来了，“五经”、“十三经”传下来了，“二十四史”都传下来了。这个大字报不传下去呀？我看一定要传下去。比如将来工厂里头整风要不要大字报呀？我看用大字报好，越多越好。大字报是没有阶级性的，等于语言没有阶

级性一样。白话没有阶级性，我们这些人演说讲白话，蒋介石也讲白话。现在都不讲文言了，不是讲“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无产阶级讲白话，资产阶级也讲白话。无产阶级可以用大字报，资产阶级也可以用大字报。我们相信，多数人是站在无产阶级这一边的。因此，大字报这个工具有利于无产阶级，不利于资产阶级。一个时候，两三个星期，天昏地黑，日月无光，好象是利于资产阶级。我们讲硬着头皮顶住，也就是那两三个星期，睡不着觉，吃不下饭。你们不是讲锻炼吗？有几个星期睡不着觉，吃不下饭，这就是锻炼，并非要把你塞到高炉里头去烧。

有许多中间人士动摇一下，这也很好。动摇一下，他们得到了经验。中间派的特点就是动摇，不然为什么叫中间派？这一头是无产阶级，那一头是资产阶级，还有许多中间派，两头小中间大。但是，中间派归根结底是好人，他们是无产阶级的同盟军。资产阶级也想争取他们作同盟军，一个时候他们也有点象。因为中间派也批评我们，但他们是好心的批评。右派看见中间派批评我们，就来捣乱了。在你们上海，就是什么王造时，陆诒，陈仁炳，彭文应，还有一个吴茵，这么一些右派人物出来捣乱。右派一捣乱，中间派就搞糊涂了。右派的老祖宗就是章伯钧、罗隆基、章乃器，发源地都是在北京。北京那个地方越乱越好，乱得越透越好。这是一条经验。

刚才讲大字报，这是个方式的问题，是取一种什么形

式作战的问题。大字报是作战的武器之一，象步枪、短枪、机关枪这类轻武器。至于飞机、大炮，那大概是《文汇报》之类吧，还有《光明日报》，也还有一些别的报纸。有一个时期，共产党的报纸也登右派言论。我们下了命令，所有右派言论，要照原样登出来。我们运用这种方式，以及其他各种方式，使广大群众从正反两面受到了教育。比如《光明日报》、《文汇报》的工作人员，这次得了很深刻的教育。他们过去分不清什么叫无产阶级报纸，什么叫资产阶级报纸，什么叫社会主义报纸，什么叫资本主义报纸。一个时候，他们的右派领导人把报纸办成资产阶级报纸。这些右派领导人仇恨无产阶级，仇恨社会主义。他们不是把学校引到无产阶级方向，而是要引到资产阶级方向。

资产阶级和旧社会过来的知识分子，要不要改造？他们非常之怕改造，说改造就出那么一种感，叫做“自卑感”，越改就越卑。这是一种错误的说法。应当是越改造越自尊，应当是自尊心，因为是自己觉悟到需要改造。那些人的“阶级觉悟”很高，他们认为他们本身不要改造，相反要改造无产阶级。他们要按照资产阶级的面貌来改造世界，而无产阶级要按照无产阶级的面貌来改造世界。我看，多数人，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经过踌躇、考虑、不大愿意、摇摆这么一些过程，总归是要走到愿意改造。越改造就越觉得需要改造。共产党还在改造，整风就是改造，将来还要整风。你说整了这次风就不整了？整了这

次风就没有官僚主义了？只要过两三年，他都忘记了，那个官僚主义又来了。人就有那么一条，他容易忘记。所以，过一个时候就要整整风。共产党还要整风，资产阶级和旧社会过来的知识分子就不要整风？不要改造？那就更需要整风，更需要改造。

现在各民主党派不是在整风吗？整个社会要整一整风。把风整一整，有什么不好？又不是整那些鸡毛蒜皮，而是整大事，整路线问题。现在民主党派整风的重点是整路线问题，整资产阶级右派的反革命路线。我看整得对。现在共产党整风的重点不是整路线问题，是整作风问题。而民主党派现在作风问题在其次，主要是走那条路线的问题。是走章伯钧、罗隆基、章乃器、陈仁炳、彭文应、陆诒、孙大雨那种反革命路线，还是走什么路线？首先要把这个问题搞清楚，要把我讲的这三个问题搞清楚：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成绩，几亿人民作的事情究竟好不好？是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要搞社会主义的话，要那一个党来领导？是要章罗同盟领导，还是要共产党来领导？来它一个大辩论，把路线问题搞清楚。

共产党也有个路线问题，对于那些“起义分子”，共产党、青年团里头的右派，是个路线问题。教条主义现在不是个路线问题，因为它没有形成。我们党的历史上有几次教条主义路线问题，因为它形成制度，形成政策，形成纲领。现在的教条主义没有形成制度、政策、纲领，它是

有那么一些硬性的东西，现在这么一锤子，火这样烧一下，也软了一点。各个机关、学校、工厂的领导人，不是在“下楼”吗？他们不要那个国民党作风和老爷习气了，不做官当老爷了。合作社主任跟群众一起耕田，工厂厂长、党委书记到车间里头去，同工人一起劳动，官僚主义大为减少。这个风将来还要整。要出大字报，开座谈会，把应当改正的，应当批评的问题都分类解决。再就是要提高一步，学一点马克思主义。

我相信，我们中国人多数是好人，我们中华民族是个好民族。我们这个民族是很讲道理的，很热情的，很聪明的，很勇敢的。我希望造成这么一种局面：就是又集中统一，又生动活泼，就是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两方面都有，不只是一方面，不是只有纪律，只有集中，把人家的嘴巴都封住，不准人家讲话，本来不对的也不准批评。应当提倡讲话，应当是生动活泼的。凡是善意提出批评意见的，言者无罪，不管你怎么尖锐，怎么痛骂一顿，没有罪，不受整，不给你小鞋穿。小鞋子那个东西穿了不舒服。现在要给什么人小鞋子穿呢？现在我们给右派穿。给右派一点小鞋穿是必要的。

不要怕群众，要跟群众在一起。有些同志怕群众跟怕水一样。你们游水不游水呀？我就到处提倡游水。水是个好东西。你只要每天学一小时，不间断，今天也去，明天也去，有一百天，我保管你学会游水。第一不要请先生，第二不要拿橡皮圈，你搞那个橡皮圈就学不会。“但

是我这条命要紧呀，我不会呀！”你先在那个浅水的地方游嘛。如果说学一百天，你在那个浅水的地方搞三十天，你就学会了。只要学会了，那末你到长江也好，到太平洋也好，一样的，就是一种水，就是那么一个东西。有人说在游泳池淹下去还可以马上把你提起来，死不了，在长江里头游水可不得了，水流得那么急，沉下去了到那里去找呀？拿这一条理由来吓人。我说这是外行人讲的话。我们的游泳英雄，游泳池里头的教员、教授，原先不敢下长江，现在都敢了。你们黄浦江现在不是也有人游吗？黄浦江、长江是一个钱不花的游泳池。打个比喻，人民就象水一样，各级领导者，就象游水的一样，你不要离开水，你要顺那个水，不要逆那个水。不要骂群众，群众是不能骂的呀！工人群众，农民群众，学生群众，民主党派的多数成员，知识分子的多数，你不能骂他们，不能跟群众对立，总要跟群众一道。群众也可能犯错误。他犯错误的时候，我们要好好讲道理，好好讲他不听，就等一下，有机会又讲。但是不要脱离他，等于我们游水一样不要脱离水。刘备得了孔明，说是“如鱼得水”，确有其事，不仅小说上那么写，历史上也那么写，也象鱼跟水的关系一样。群众就是孔明，领导者就是刘备。一个领导，一个被领导。

智慧都是从群众那里来的。我历来讲，知识分子是最无知识的。这是讲得透底。知识分子把尾巴一翘，比孙行者的尾巴还长。孙行者七十二变，最后把尾巴变成个旗杆，那么长。知识分子翘起尾巴来可不得了呀！“老

子就是不算天下第一，也算天下第二”。“工人、农民算什么呀？你们就是‘阿斗’，又不认得几个字”。但是，大局问题，不是知识分子决定的，最后是劳动者决定的，而且是劳动者中最先进的部分，就是无产阶级决定的。

无产阶级领导资产阶级，还是资产阶级领导无产阶级？无产阶级领导知识分子，还是知识分子领导无产阶级？知识分子应当成为无产阶级的知识分子，没有别的出路。“皮之不存，毛将焉附”〔2〕，过去知识分子这个“毛”是附在五张“皮”上，就是吃五张皮的饭。第一张皮，是帝国主义所有制。第二张皮，是封建主义所有制。第三张皮，是官僚资本主义所有制。民主革命不是要推翻三座大山吗？就是打倒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第四张皮，是民族资本主义所有制。第五张皮，是小生产所有制，就是农民和手工业者的个体所有制。过去的知识分子是附在前三张皮上，或者附在后两张皮上，附在这些皮上吃饭。现在这五张皮还有没有？“皮之不存”了。帝国主义跑了，他们的产业都拿过来了。封建主义所有制消灭了，土地都归农民，现在又合作化了。官僚资本主义企业收归国有了。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业实行公私合营了，基本上（还没有完全）变成社会主义的了。农民和手工业者的个体所有制变为集体所有制了，尽管这个制度现在还不巩固，还要几年才能巩固下来。这五张皮都没有了，但是它还影响“毛”，影响这些资本家，影响这些知识分子。他们脑筋里头老是记得那几张皮，做梦也记得。

从旧社会、旧轨道过来的人，总是留恋那种旧生活、旧习惯。所以，人的改造，时间就要更长些。

现在，知识分子附在什么皮上呢？是附在公有制的皮上，附在无产阶级身上。谁给他饭吃？就是工人、农民。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劳动者请的先生，你给他们的子弟教书，又不听主人的话，你要教你那一套，要教八股文，教孔夫子，或者教资本主义那一套，教出一些反革命，工人阶级是不干的，就要辞退你，明年就下聘书了。

一百天以前我在这个地方讲过，从旧社会来的知识分子，现在没有基础了，他丧失了原来的社会经济基础，就是那五张皮没有了，他除非落在新皮上。有些知识分子现在是十五个吊桶打水，七上八下。他在空中飞，上不着天，下不着地。我说，这些人叫“梁上君子”。他在那个梁上飞，他要回去，那边空了，那几张皮没有了，老家回不去了。老家没有了，他又不甘心情愿附在无产阶级身上。你要附在无产阶级身上，就要研究一下无产阶级的思想，要跟无产阶级有点感情，要跟工人、农民交朋友。他不，他也晓得那边空了，但是还是想那个东西。我们现在就是劝他们觉悟过来。经过这一场大批判，我看他们多少会觉悟的。

那些中间状态的知识分子应当觉悟，尾巴不要翘得太高，你那个知识是有限的。我说，这种人是知识分子，又不是知识分子，叫半知识分子比较妥当。因为你的知识只有那么多，讲起大道理来就犯错误。现在不去讲那

些右派知识分子，那是反动派。中间派知识分子犯的的错误就是动摇，看不清楚方向，一个时候迷失方向。你那么多的知识，为什么犯错误呀？你那么厉害，尾巴翘得那么高，为什么动摇呀？墙上一莛草，风吹两边倒。可见你知识不太多。在这个方面，知识多的是工人，是农民里头的半无产阶级。什么孙大雨那一套，他们一看就知道不对。你看谁人知识高呀？还是那些不大识字的人，他们知识高。决定大局，决定大方向，要请无产阶级。我就是这么一个人，要办什么事，要决定什么大计，就非问问工农群众不可，跟他们谈一谈，跟他们商量，跟接近他们的干部商量，看能行不能行。这就要到各地方跑一跑。蹲在北京可不得了，北京是什么东西都不出的呀！那里没有原料。原料都是从工人、农民那里拿来的，都是从地方拿来的。中共中央好比是个加工厂，它拿这些原料加以制造，而且要制作得好，制作得不好就犯错误。知识来源于群众。什么叫正确解决人民内部矛盾？就是实事求是，群众路线。归根到底就是群众路线四个字。不要脱离群众，我们跟群众的关系，就象鱼跟水的关系，游泳者跟水的关系一样。

对右派是不是要一棍子打死？打他几棍子是很有必要的。你不打他几棍子他就装死。对这种人，你不攻一下，不追一下？攻是必要的。但是我们的目的是攻得他回头。我们用各种方法切实攻，使他们完全孤立，那就有可能争取他们，不说全部，总是可以争取一些人变过来。

他们是知识分子，有些是大知识分子，争取过来是有用的。争取过来，让他们多少做一点事。而且这一回他们帮了大忙，当了反面教员，从反面教育了人民。我们并不准备把他们抛到黄浦江里头去，还是用治病救人这样的态度。也许有一些人是不愿意过来的。象孙大雨这种人，如果他顽固得很，不愿意改，也就算了。我们现在有许多事情要办，如果天天攻，攻他五十年，那怎么得了呀！有那么一些人不肯改，那你就带到棺材里头去见阎王。你对阎王说，我是五张皮的维护者，我很有“骨气”，共产党、人民群众斗争我，我都不屈服，我都抵抗过来了。但是你晓得，现在的阎王也换了。这个阎王，第一是马克思，第二是恩格斯，第三是列宁。现在分两个地狱，资本主义世界的阎王大概还是老的，社会主义世界就是这些人当阎王。我看顽固不化的右派，一百年以后也是要受整的。

注 释

〔1〕见《列子·天瑞》。

〔2〕见《左传·僖公十四年》。

选自《毛泽东选集》第5卷

毛 泽 东

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一九六二年一月三十日)

同志们，我现在讲几点意见。(热烈鼓掌)一共讲六点，中心是讲一个民主集中制的问题，同时也讲到一些其他问题。

第一点，这次会议的开会方法。

这次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到会的有七千多人。在这次会议开始的时候，几位同志准备了一个报告稿子。这个稿子，还没有经过中央政治局讨论，我就向他们建议，不要先开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了，立即发给参加大会的同志们，请大家评论，提意见。同志们，你们有各方面的人、各地方的人，有各个省委、地委、县委的人，有企业党委的人，有中央各部门的人，你们当中的多数人是比较接近下层的，你们应当比我们中央常委、中央政治局和中央书记处的同志更加了解情况和问题。还有，你们站在各种不同的岗位，可以从各种的角度提出问题。因此，要请你们提意见。报告稿子发给你们了，果然议论纷纷，除

了同意中央提出的基本方针以外，还提出许多意见。后来又组织了二十一个人的起草委员会，这里面有各中央局的负责同志参加，经过八天讨论，写出了书面报告的第二稿。应当说，报告第二稿是中央集中了七千多人议论的结果。如果没有你们的意见，这个第二稿不可能写成。在第二稿里面，第一部分和第二部分有很大的修改，这是你们的功劳。听说大家对第二稿的评价不坏，认为它是比较好的。如果不是采用这种方法，而是采用通常那种开会的方法，就是先来一篇报告，然后进行讨论，大家举手赞成，那就不可能做到这样好。

这是一个开会的方法问题。先把报告草稿发下去，请到会的人提意见，加以修改，然后再作报告。报告的时候不是照着本子念，而是讲一些补充意见，作一些解释。这样，就更能充分地发扬民主，集中各方面的智慧，对各种不同的看法有所比较，会也开得活泼一些。我们这次会议是要总结十二年的工作经验，特别是要总结最近四年来的工作经验，问题很多，意见也会很多，宜于采取这种方法。是不是所有的会议都可以采用这种方法呢？那也不是。采用这种方法，要有充裕的时间。我们的人民代表大会的会议，有时也许可以采用这种方法。省委、地委、县委的同志们，你们以后召集会议，如果有条件的話，也可以采用这种方法。当然，你们的工作忙，一般地不能用很长的时间去开会，但是在有条件的時候，不妨试一试看。

这个方法是一个什么方法呢？是一个民主集中制的方法，是一个群众路线的方法。先民主，后集中，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领导同群众相结合。这是我讲的第一点。

第二点，民主集中制问题。

看起来，我们有些同志，对于马克思、列宁所说的民主集中制，还不理解。有些同志已经是老革命了，“三八式”的，或者别的什么式的，总之已经作了几十年的共产党员，但是他们还不懂得这个问题。他们怕群众，怕群众讲话，怕群众批评。那有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怕群众的道理呢？有了错误，自己不讲，又怕群众讲。越怕，就越有鬼。我看不应当怕。有什么可怕的呢？我们的态度是：坚持真理，随时修正错误。我们工作中的是和非的问题，正确和错误的问题，这是属于人民内部矛盾问题。解决人民内部矛盾，不能用咒骂，也不能用拳头，更不能用刀枪，只能用讨论的方法，说理的方法，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方法，一句话，只能用民主的方法，让群众讲话的方法。

不论党内党外，都要有充分的民主生活，就是说，都要认真实行民主集中制。要真正把问题敞开，让群众讲话，那怕是骂自己的话，也要让人家讲。骂的结果，无非是自己倒台，不能做这项工作了，降到下级机关去做工作，或者调到别的地方去做工作，那又有什么不可以呢？一个人为什么只能上升不能下降呢？为什么只能做这个地方的工作而不能调到别个地方去呢？我认为这种下降和调

动,不论正确与否,都是有益处的,可以锻炼革命意志,可以调查和研究许多新鲜情况,增加有益的知识。我自己就有这一方面的经验,得到很大的益处。不信,你们不妨试试看。司马迁说过:“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兵法修列。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抵贤圣发愤之所为作也。”这几句话当中,所谓文王演周易,孔子作春秋,究竟有无其事,近人已有怀疑,我们可以不去理它,让专门家去解决吧,但是司马迁是相信有其事的。文王拘,仲尼厄,则确有其事。司马迁讲的这些事情,除左丘失明一例以外,都是指当时上级领导对他们作了错误处理的。我们过去也错误地处理过一些干部,对这些人不论是全部处理错了的,或者是部分处理错了的,都应当按照具体情况,加以甄别和平反。但是,一般地说,这种错误处理,让他们下降,或者调动工作,对他们的革命意志总是一种锻炼,而且可以从人民群众中吸取许多新知识。我在这里申明,我不是提倡对干部,对同志,对任何人,可以不分青红皂白,作出错误处理,象古代人拘文王,厄孔子,放逐屈原,去掉孙膑的膝盖骨那样。我不是提倡这样做,而是反对这样做的。我是说,人类社会的各个历史阶段,总是有这样处理错误的事实。在阶级社会,这样的事实多得很。在社会主义社会,也在所难免。不论在正确路线领导的时期,还是在错误路线领导的时期,都在所难免。不过有一个区别。在

正确路线领导的时期，一发现有错误处理的，就能甄别、平反，向他们赔礼道歉，使他们心情舒畅，重新抬起头来。而在错误路线领导的时期，则不可能这样做，只能由代表正确路线的人们，在适当的时机，通过民主集中制的方法，起来纠正错误。至于由于自己犯了错误，经过同志们的批评和上级的鉴定，作出正确处理，因而下降或者调动工作的人，这种下降或者调动，对于他们改正错误，获得新的知识，会有益处，那就不待说了。

现在有些同志，很怕群众开展讨论，怕他们提出同领导机关、领导者意见不同的意见。一讨论问题，就压抑群众的积极性，不许人家讲话。这种态度非常恶劣。民主集中制是上了我们的党章的，上了我们的宪法的，他们就是不实行。同志们，我们是干革命的，如果真正犯了错误，这种错误是不利于党的事业，不利于人民的事业的，就应当征求人民群众和同志们的意见，并且自己作检讨。这种检讨，有的时候，要有若干次。一次不行，大家不满意，再来第二次；还不满意，再来第三次；一直到大家没有意见了，才不再作检讨。有的省委就是这样做的。有一些省比较主动，让大家讲话。早的，在一九五九年就开始作自我批评，晚的，也在一九六一年开始作自我批评。还有一些省是被迫作检讨的，象河南、甘肃、青海。另外一些省，有人反映，好象现在才刚刚开始作自我批评。不管是主动的，被动的，早作检讨，晚作检讨，只要正视错误，肯承认错误，肯改正错误，肯让群众批评，只要采取了这种

态度，都应当欢迎。

批评和自我批评是一种方法，是解决人民内部矛盾的方法，而且是唯一的方法。除此以外，没有别的方法。但是，如果没有充分的民主生活，没有真正实行民主集中制，就不可能实行批评和自我批评这种方法。

我们现在不是有许多困难吗？不依靠群众，不发动群众和干部的积极性，就不可能克服困难。但是，如果不向群众和干部说明情况，不向群众和干部交心，不让他们说出自己的意见，他们还对你感到害怕，不敢讲话，就不可能发动他们的积极性。我在一九五七年这样说过，要造成“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那样一种政治局面”。党内党外都应当有这样的政治局面。没有这样的政治局面，群众的积极性是不可能发动起来的。克服困难，没有民主不行。当然没有集中更不行，但是，没有民主就没有集中。

没有民主，不可能有正确的集中，因为大家意见分歧，没有统一的认识，集中制就建立不起来。什么叫集中？首先是要集中正确的意见。在集中正确意见的基础上，做到统一认识，统一政策，统一计划，统一指挥，统一行动，叫做集中统一。如果大家对问题还不了解，有意见还没有发表，有气还没有出，你这个集中统一怎么建立得起来呢？没有民主，就不可能正确地总结经验。没有民主，意见不是从群众中来，就不可能制定出好的路线、方

针、政策和办法。我们的领导机关，就制定路线、方针、政策和办法这一方面说来，只是一个加工工厂。大家知道，工厂没有原料就不可能进行加工。没有数量上充分的和质量上适当的原料，就不可能制造出好的成品来。如果没有民主，不了解下情，情况不明，不充分搜集各方面的意见，不使上下通气，只由上级领导机关凭着片面的或者不真实的材料决定问题，那就难免不是主观主义的，也就不可能达到统一认识，统一行动，不可能实现真正的集中。我们这次会议的主要议题，不是要反对分散主义，加强集中统一吗？如果离开充分发扬民主，这种集中，这种统一，是真的还是假的？是实的还是空的？是正确的还是错误的？当然只能是假的、空的、错误的。

我们的集中制，是建立在民主基础上的集中制。无产阶级的集中，是在广泛民主基础上的集中。各级党委是执行集中领导的机关。但是，党委的领导，是集体领导，不是第一书记个人独断。在党委会内部只应当实行民主集中制。第一书记同其他书记和委员之间的关系是少数服从多数。拿中央常委或者政治局来说，常常有这样的事情，我讲的话，不管是对的还是不对的，只要大家不赞成，我就得服从他们的意见，因为他们是多数。听说现在有一些省委、地委、县委，有这样的情况：一切事情，第一书记一个人说了就算数。这是很错误的。那有一个人说了就算数的道理呢？我这是指的大事，不是指有了决议之后的日常工作。只要是大事，就得集体讨论，认真

地听取不同的意见，认真地对于复杂的情况和不同的意见加以分析。要想到事情的几种可能性，估计情况的几个方面，好的和坏的，顺利的和困难的，可能办到的和不可能办到的。尽可能地慎重一些，周到一些。如果不是这样，就是一人称霸。这样的第一书记，应当叫做霸王，不是民主集中制的“班长”。从前有个项羽，叫做西楚霸王，他就不爱听别人的不同意见。他那里有个范增，给他出过些主意，可是项羽不听范增的话。另外一个人叫刘邦，就是汉高祖，他比较能够采纳各种不同的意见。有个知识分子名叫酈食其，去见刘邦。初一报，说是读书人，孔夫子这一派的。回答说，现在军事时期，不见儒生。这个酈食其就发了火，他向管门房的人说，你给我滚进去报告，老子是高阳酒徒，不是儒生。管门房的人进去照样报告了一篇。好，请。请了进去，刘邦正在洗脚，连忙起来欢迎。酈食其因为刘邦不见儒生的事，心中还有火，批评了刘邦一顿。他说，你究竟要不要取天下，你为什么轻视长者！这时候，酈食其已经六十多岁了，刘邦比他年轻，所以他自称长者。刘邦一听，向他道歉，立即采纳了酈食其夺取陈留县的意见。此事见《史记》酈生陆贾列传。刘邦是在封建时代被历史家称为“豁达大度，从谏如流”的英雄人物。刘邦同项羽打了好几年仗，结果刘邦胜了，项羽败了，不是偶然的。我们现在有些第一书记，连封建时代的刘邦都不如，倒有点象项羽。这些同志如果不改，最后要垮台的。不是有一出戏叫《霸王别姬》吗？这些同志

如果总是不改，难免有一天要“别姬”就是了。（笑声）我为什么要讲得这样厉害呢？是想讲得挖苦一点，对一些同志戳得痛一点，让这些同志好好地想一想，最好有两天睡不着觉。他们如果睡得着觉，我就不高兴，因为他们还没有被戳痛。

我们有些同志，听不得相反的意见，批评不得。这是很不对的。在我们这次会议中间，有一个省，会本来是开得生动活泼的，省委书记到那里一坐，鸦雀无声，大家不讲话了。这位省委书记同志，你坐在那里去干什么呢？为什么不坐到自己房子里想一想问题，让人家去纷纷议论呢？平素养成了这样一种风气，当着你的面不敢讲话，那末，你就应当回避一下。有了错误，一定要作自我批评，要让人家讲话，让人批评。去年六月十二号，在中央北京工作会议的最后一天，我讲了自己的缺点和错误。我说，请同志们传达到各省、各地方去。事后知道，许多地方没有传达。似乎我的错误就可以隐瞒，而且应当隐瞒。同志们，不能隐瞒。凡是中央犯的错误，直接的归我负责，间接的我也有份，因为我是中央主席。我不是要别人推卸责任，其他一些同志也有责任，但是第一个负责的应当是我。我们的省委书记，地委书记，县委书记，直到区委书记，企业党委书记，公社党委书记，既然作了第一书记，对于工作中的缺点错误，就要担起责任。不负责任，怕负责任，不许人讲话，老虎屁股摸不得，凡是采取这种态度的人，十个就有十个要失败。人家总是要讲的，你老

虎屁股真是摸不得吗？偏要摸！

在我们国家，如果不充分发扬人民民主和党内民主，不充分实行无产阶级的民主制，就不可能有真正的无产阶级的集中制。没有高度的民主，不可能有高度的集中，而没有高度的集中，就不可能建立社会主义经济。我们的国家，如果不建立社会主义经济，那会是一种什么状况呢？就会变成修正主义的国家，变成实际上是资产阶级的国家，无产阶级专政就会转化为资产阶级专政，而且会是反动的、法西斯式的专政。这是一个十分值得警惕的问题，希望同志们好好想一想。

没有民主集中制，无产阶级专政不可能巩固。在人民内部实行民主，对人民的敌人实行专政，这两个方面是分不开的，把这两个方面结合起来，就是无产阶级专政，或者叫人民民主专政。我们的口号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无产阶级怎样实行领导呢？经过共产党来领导。共产党是无产阶级的先进部队。无产阶级团结一切赞成、拥护和参加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阶级和阶层，对反动阶级，或者说，对反动阶级的残余，实行专政。在我国内，人剥削人的制度已经消灭，地主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经济基础已经消灭，现在反动阶级已经没有过去那么厉害了，比如说，已经没有一九四九年人民共和国建立的时候那么厉害了，也没有一九五七年资产阶级右派猖狂进攻的时候那么厉害了。所以我们说是反动阶级的残余。但是，对于这个

残余，千万不可轻视，必须继续同他们作斗争。已经被推翻的反动阶级，还企图复辟。在社会主义社会，还会产生新的资产阶级分子。整个社会主义阶段，存在着阶级和阶级斗争。这种阶级斗争是长期的、复杂的，有时甚至是很激烈的。我们的专政工具不能削弱，还应当加强。我们的公安系统是掌握在正确的同志的手里的。也可能有个别地方的公安部门，是掌握在坏人手里。还有一些作公安工作的同志，不依靠群众，不依靠党，在肃反工作中不是执行在党委领导下通过群众肃反的路线，只依靠秘密工作，只依靠所谓专业工作。专业工作是需要，对于反革命分子，侦查、审讯是完全必要的，但是，主要是实行党委领导下的群众路线，特别是对于整个反动阶级的专政，必须依靠群众，依靠党。对于反动阶级实行专政，这并不是说把一切反动阶级的分子统统消灭掉，而是要改造他们，用适当的方法改造他们，使他们成为新人。没有广泛的人民民主，无产阶级专政不能巩固，政权会不稳。没有民主，没有把群众发动起来，没有群众的监督，就不可能对反动分子和坏分子实行有效的专政，也不可能对他们进行有效的改造，他们就会继续捣乱，还有复辟的可能。这个问题应当警惕，也希望同志们好好想一想。

第三点，我们应当联合那一些阶级？压迫那一些阶级？这是一个根本立场问题。

工人阶级应当联合农民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爱国的民族资产阶级，首先要联合的是农民阶级。知识分子，

例如科学家、工程技术人员、教授、教员、作家、艺术家、演员、医务工作者、新闻工作者，他们不是一个阶级，他们或者附属于资产阶级或者附属于无产阶级。对于知识分子，是不是只有革命的我们才去团结呢？不是的。只要他们爱国，我们就要团结他们，并且要让他们好好工作。工人，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分子，爱国的知识分子，爱国的资本家和其他爱国的民主人士，这些人占了全人口的百分之九十五以上。这些人，在我们人民民主专政下面，都属于人民的范围。在人民的内部，要实行民主。

人民民主专政要压迫的是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坏分子和反共的右派分子。反革命分子、坏分子和反共的右派分子，他们代表的阶级是地主阶级和反动的资产阶级。这些阶级和坏人，大约占全人口的百分之四、五。这些人是我们强迫改造的。他们是人民民主专政的专政对象。

我们站在那一边？站在占全人口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人民群众一边，还是站在占全人口百分之四、五的地、富、反、坏、右一边呢？必须站在人民群众这一边，绝不能站到人民敌人那一边去。这是一个马克思列宁主义者的根本立场问题。

在国内是如此，在国际范围内也是如此。各国的人民，占人口总数的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民大众，总是要革命的，总是会拥护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他们不会拥护修正主义，有些人暂时拥护，将来终究会抛弃它。他们总会

逐步地觉醒起来，总会反对帝国主义和各国的反动派，总会反对修正主义。一个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必须坚定地站在占世界人口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民大众这一边。

第四点，关于认识客观世界的问题。

人对客观世界的认识，由必然王国到自由王国的飞跃，要有一个过程。例如对于在中国如何进行民主革命的问题，从一九二一年党的建立直到一九四五年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一共二十四年，我们全党的认识才完全统一起来。中间经过一次全党范围的整风，从一九四二年春天到一九四五年夏天，有三年半的时间。那是一次细致的整风，采用的方法是民主的方法，就是说，不管什么人犯了错误，只要认识了、改正了，就好了，而且大家帮助他认识，帮助他改正，叫做“惩前毖后，治病救人”，“从团结的愿望出发，经过批评或者斗争，分清是非，在新的基础上达到新的团结”。“团结——批评——团结”这个公式，就是在那个时候产生的。那次整风帮助全党同志统一了认识。对于当时的民主革命应当怎么办，党的总路线和各项具体政策应当怎么定，这些问题，都是在那个时期，特别是在整风之后，才得到完全解决的。

从党的建立到抗日时期，中间有北伐战争和十年土地革命战争。我们经过了两次胜利，两次失败。北伐战争胜利了，但是到一九二七年，革命遭到了失败。土地革命战争曾经取得了很大的胜利，红军发展到三十万人，后

来又遭到挫折，经过长征，这三十万人缩小到两万多人，到陕北以后补充了一点，还是不到三万人，就是说，不到三十万人的十分之一。究竟是那三十万人的军队强些，还是这不到三万人的军队强些？我们受了那样大的挫折，吃过那样大的苦头，就得到锻炼，有了经验，纠正了错误路线，恢复了正确路线，所以这不到三万人的军队，比起过去那个三十万人的军队来，要更强些。在会议报告里说，最近四年，我们的路线是正确的，成绩是主要的，我们在实际工作中犯过一些错误，吃了苦头，有了经验了，因此我们更强了，而不是更弱了。情形正是这样。在民主革命时期，经过胜利、失败，再胜利、再失败，两次比较，我们才认识了中国的客观世界。在抗日战争前夜和抗日战争时期，我写了一些论文，例如《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论持久战》、《新民主主义论》、《〈共产党人〉发刊词》，替中央起草过一些关于政策、策略的文件，都是革命经验的总结。那些论文和文件，只有在那个时候才能产生，在以前不可能，因为没有经过大风大浪，没有两次胜利和两次失败的比较，还没有充分的经验，还不能充分认识中国革命的规律。

中国这个客观世界，整个地说来，是由中国人认识的，不是在共产国际管中国问题的同志们认识的。共产国际的这些同志就不了解或者说不很了解中国社会，中国民族，中国革命。对于中国这个客观世界，我们自己在很长时间内都认识不清楚，何况外国同志呢？

在抗日时期，我们才制定了合乎情况的党的总路线和一整套具体政策。这时候，中国民主革命这个必然王国才被我们认识，我们才有了自由。到这个时候，我们已经干了二十来年的革命。过去那么多年的革命工作，是带着很大的盲目性的。如果有人，有那一位同志，比如说中央的任何同志，比如说我自己，对于中国革命的规律，在一开始的时候就完全认识了，那是吹牛，你们切记不要信，没有那回事。过去，特别是开始时期，我们只是一股劲儿要革命，至于怎么革法，革些什么，那些先革，那些后革，那些要到下一阶段才革，在一个相当长的时间内，都没有弄清楚，或者说没有完全弄清楚。我讲我们中国共产党人在民主革命时期艰难地但是成功地认识中国革命规律这一段历史情况的目的，是想引导同志们理解这样一件事：对于建设社会主义的规律的认识，必须有一个过程。必须从实践出发，从没有经验到有经验，从有较少的经验，到有较多的经验，从建设社会主义这个未被认识的必然王国，到逐步地克服盲目性、认识客观规律、从而获得自由，在认识上出现一个飞跃，到达自由王国。

对于社会主义建设，我们还缺乏经验。我向好几个国家的兄弟党的代表团谈过这个问题。我说，对于建设社会主义经济，我们没有经验。

这个问题，我也向一些资本主义国家的新闻记者谈过，其中有一个美国人叫斯诺。他老要来中国，一九六〇

年让他来了。我同他谈过一次话。我说：“你知道，对于政治、军事，对于阶级斗争，我们有一套经验，有一套方针、政策和办法；至于社会主义建设，过去没有干过，还没有经验。你会说，不是已经干了十一年了吗？是干了十一年了，可是还缺乏知识，还缺乏经验，就算开始有了一点，也还不多。”斯诺要我讲讲中国建设的长期计划。我说：“不晓得。”他说：“你讲话太谨慎。”我说：“不是什么谨慎不谨慎，我就是不晓得呀，就是没有经验呀。”同志们，也真是不晓得，我们确实还缺少经验，确实还没有这样一个长期计划。一九六〇年，那正是我们碰了许多钉子的时候。一九六一年，我同蒙哥马利谈话，也说到上面那些意见。他说：“再过五十年，你们就了不起了。”他的意思是说，过了五十年我们会壮大起来，而且会“侵略”人家，五十年内还不会。他的这种看法，一九六〇年他来中国的时候就对我说过。我说：“我们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我们的国家是社会主义国家，不是资本主义国家，因此，一百年，一万年，我们也不会侵略别人。至于建设强大的社会主义经济，在中国，五十年不行，会要一百年，或者更多的时间。在你们国家，资本主义的发展，经过了好几百年。十六世纪不算，那还是在中世纪。从十七世纪到现在，已经有三百六十多年。在我国，要建设起强大的社会主义经济，我估计要花一百多年。”十七世纪是什么时代呢？那是中国的明朝末年和清朝初年。再过一个世纪，到十八世纪的上半期，就是清朝乾隆时代，《红楼梦》的作者

曹雪芹就生活在那个时代，就是产生贾宝玉这种不满意封建制度的小说人物的时代。乾隆时代，中国已经有了一些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萌芽，但是还是封建社会。这就是出现大观园里那一群小说人物的社会背景。在那个时候以前，在十七世纪，欧洲的一些国家已经在发展资本主义了，经过三百多年，资本主义的生产力有了现在这个样子。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比较，有许多优越性，我们国家经济的发展，会比资本主义国家快得多。可是，中国的人口多、底子薄，经济落后，要使生产力很大地发展起来，要赶上和超过世界上最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没有一百多年的时间，我看是不行的。也许只要几十年，例如有些人所设想的五十年，就能做到。果然这样，谢天谢地，岂不甚好。但是我劝同志们宁肯把困难想得多一点，因而把时间设想得长一点。三百几十年建设了强大的资本主义经济，在我国，五十年内外到一百年内外，建设起强大的社会主义经济，那又有什么不好呢？从现在起，五十年内外到一百年内外，是世界上社会制度彻底变化的伟大时代，是一个翻天覆地的时代，是过去任何一个历史时代都不能比拟的。处在这样一个时代，我们必须准备进行同过去时代的斗争形式有着许多不同特点的伟大的斗争。为了这个事业，我们必须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具体实际、并且同今后世界革命的具体实际，尽可能好一些地结合起来，从实践中一步一步地认识斗争的客观规律。要准备着由于盲目性而遭受

到许多的失败和挫折，从而取得经验，取得最后的胜利。由这点出发，把时间设想得长一点，是有许多好处的，设想得短了反而有害。

在社会主义建设上，我们还有很大的盲目性。社会主义经济，对于我们来说，还有许多未被认识的必然王国。拿我来说，经济建设工作中间的许多问题，还不懂得。工业、商业，我就不大懂。对于农业，我懂得一点。但是也只是比较地懂得，还是懂得不多。要较多地懂得农业，还要懂得土壤学、植物学、作物栽培学、农业化学、农业机械，等等；还要懂得农业内部的各个分业部门，例如粮、棉、油、麻、丝、茶、糖、菜、烟、果、药、杂等等；还有畜牧业，还有林业。我是相信苏联威廉斯土壤学的，在威廉斯的土壤学著作里，主张农、林、牧三结合。我认为必须要有这种三结合，否则对于农业不利。所有这些农业生产方面的问题，我劝同志们，在工作之暇，认真研究一下，我也还想研究一点。但是到现时止，在这些方面，我的知识很少。我注意得较多的是制度方面的问题，生产关系方面的问题。至于生产力方面，我的知识很少。社会主义建设，从我们全党来说，知识都非常不够。我们应当在今后一段时间内，积累经验，努力学习，在实践中间逐步地加深对它的认识，弄清楚它的规律。一定要下一番苦功，要切切实实地去调查它，研究它。要下去蹲点，到生产大队、生产队，到工厂，到商店，去蹲点。调查研究，我们从前做得比较好，可是进城以后，不认真做了。一九六一年

我们又重新提倡，现在情况已经有所改变。但是，在领导干部中间，特别是在高级领导干部中间，有一些地方、部门和企业，至今还没有形成风气。有一些省委书记，到现在还没有下去蹲过点。如果省委书记不去，怎么能叫地委书记、县委书记下去蹲点呢。这个现象不好，必须改变过来。

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现在已经十二年了。这十二年分为前八年和后四年。一九五〇年到一九五七年底，是前八年。一九五八年到现在，是后四年。我们这次会议已经初步总结了过去工作的经验，主要是后四年的经验。这个总结，反映在会议报告里面。我们已经制定、或者正在制定、或者将要制定各个方面的具体政策。已经制定了的，例如农村公社六十条，工业企业七十条，高等教育六十条，科学研究工作十四条，这些条例草案已经在实行或者试行，以后还要修改，有些还可能大改。正在制定的，例如商业工作条例。将要制定的，例如中小学教育条例。我们的党政机关和群众团体的工作，也应当制定一些条例。军队已经制定了一些条例。总之，工、农、商、学、兵、政、党这七个方面的工作，都应当好好地总结经验，制定一整套的方针、政策和办法，使它们在正确的轨道上前进。

有了总路线还不够，还必须在总路线指导之下，在工、农、商、学、兵、政、党各个方面，有一整套适合情况的具体的方针、政策和办法，才有可能说服群众和干部，并

且把这些当作教材去教育他们，使他们有一个统一的认识和统一的行动，然后才有可能取得革命事业和建设事业的胜利，否则是不可能的。对于这一点，我们在抗日时期就有了深刻的认识。在那时候，我们这样做了，就使得干部和群众对于民主革命时期的一整套具体的方针、政策和办法，有了统一的认识，因而有了统一的行动，使当时的民主革命事业取得了胜利，这是大家知道的。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时期，头八年内，我们的革命任务，在农村是完成对封建主义的土地制度的改革和接着实现农业合作化；在城市是实现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在经济建设方面，那时候的任务是恢复经济和实现第一个五年计划。不论在革命方面和建设方面，那时候都有一条适合客观情况的、有充分说服力的总路线，以及在总路线指导下的一整套方针、政策和办法，因此教育了干部和群众，统一了他们的认识，工作也就比较做得好。这也是大家知道的。但是，那时候有这样一种情况，因为我们没有经验，在经济建设方面，我们只得照抄苏联，特别是在重工业方面，几乎一切都抄苏联，自己的创造性很少。这在当时是完全必要的，同时又是一个缺点，缺乏创造性，缺乏独立自主的能力。这当然不应当是长久之计。从一九五八年，我们就确立了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的方针。在一九五八年党的八大二次会议上，通过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在那一年又办起了人民公

社，提出了大跃进的口号。在提出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的一个相当时间内，我们还没有来得及、也没有可能规定一整套适合情况的具体的方针、政策和办法，因为经验还不足。在这种情形下，干部和群众，还得不到一整套的教材，得不到系统的政策教育，也就不可能真正有统一的认识和统一的行动。要经过一段时间，碰过一些钉子，有了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才有这样的可能。现在好了，有了这些东西了，或者正在制定这些东西。这样，我们就可以更加妥善地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在总路线指导之下，制定一整套的具体的方针、政策和办法，必须通过从群众中来的方法，通过作系统的周密的调查研究的方法，对工作中的成功经验和失败经验，作历史的考察，才能找出客观事物所固有的而不是人们主观臆造的规律，才能制定适合情况的各种条例。这件事很重要，请同志们注意到这点。

工、农、商、学、兵、政、党这七个方面，党是领导一切的。党要领导工业、农业、商业、文化教育、军队和政府。我们的党，一般说来是很好的。我们党员的成份，主要的是工人和贫苦农民。我们的绝大多数干部都是好的，他们都在辛辛苦苦地工作。但是，也要看到，我们党内还存在一些问题，不要想象我们党的情况什么都好。我们现在有一千七百万党员，这里面差不多有百分之八十的人是建国以后入党的，五十年代入党的。建国以前入党的只占百分之二十。在这百分之二十的人里面，一九三

〇年以前入党的，二十年代入党的，据前几年计算，有八百多人，这两年死了一些，恐怕只有七百多人了。不论在老的和新的党员里面，特别是在新党员里面，都有一些品质不纯和作风不纯的人。他们是个人主义者、官僚主义者、主观主义者，甚至是变了质的分子。还有些人挂着共产党员的招牌，但是并不代表工人阶级，而是代表资产阶级。党内并不纯粹，这一点必须看到，否则我们是要吃亏的。

上面是我讲的第四点。就是讲，我们对于客观世界的认识，要有一个过程。先是不认识或者不完全认识，经过反复的实践，在实践里面得到成绩，有了胜利，又翻过斤斗，碰了钉子，有了成功和失败的比较，然后才有可能逐步地发展成为完全的认识或者比较完全的认识。到那个时候，我们就比较主动了，比较自由了，就变成比较聪明一些的人了。自由是对必然的认识和对客观世界的改造。只有在认识必然的基础上，人们才有自由的活动。这是自由和必然的辩证规律。所谓必然，就是客观存在的规律性，在没有认识它以前，我们的行动总是不自觉的，带着盲目性的。这时候我们是一些蠢人。最近几年我们不是干过许多蠢事吗？

第五点，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这个问题，我只简单地讲几句。

不论在中国，在世界各国，总而言之，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终究是会拥护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在世界上，现

在还有许多人，在社会民主党的欺骗之下，在修正主义的欺骗之下，在帝国主义的欺骗之下，在各国反动派的欺骗之下，他们还不觉悟。但是，他们总会逐步地觉悟过来，总会拥护马克思列宁主义。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个真理，是不可抗拒的。人民群众总是要革命的。世界革命总是要胜利的。不准革命，象鲁迅所写的赵太爷、钱太爷、假洋鬼子不准阿Q革命那样，总是要失败的。

苏联是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共产党是列宁创造的党。虽然，苏联的党和国家的领导现在被修正主义者篡夺了，但是，我劝同志们坚决相信，苏联广大的人民、广大的党员和干部，是好的，是要革命的，修正主义的统治是不会长久的。无论什么时候，现在，将来，我们这一辈子，我们的子孙，都要向苏联学习，学习苏联的经验。不学习苏联，要犯错误。人们会问：苏联被修正主义者统治了，还要学吗？我们学习的是苏联的好人好事，苏联党的好经验，苏联工人、农民和联系劳动人民的知识分子的好经验。至于苏联的坏人坏事，苏联的修正主义者，我们应当看作反面教员，从他们那里吸取教训。

我们永远要坚持无产阶级的国际主义团结的原则，我们始终主张社会主义国家和世界共产主义运动一定要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础上巩固地团结起来。

国际修正主义者在不断地骂我们。我们的态度是，由他骂去。在必要的时候，给以适当的回答。我们这个党是被人家骂惯了的。从前骂的不说，现在呢，在国外，

帝国主义者骂我们，反动的民族主义者骂我们，各国反动派骂我们，修正主义者骂我们；在国内，蒋介石骂我们，地、富、反、坏、右骂我们。历来就是这么骂的，已经听惯了。我们是不是孤立的呢？我就不感觉孤立。我们在座的有七千多人，七千多人还孤立吗？（笑声）我们国家有六亿几千万人民，我国人民是团结的，六亿几千万人还孤立吗？世界各国人民群众已经或者将要同我们站到一起，我们会是孤立的吗？

最后一点，第六点，要团结全党和全体人民。

要把党内、党外的先进分子、积极分子团结起来，把中间分子团结起来，去带动落后分子，这样就可以使全党、全民团结起来。只有依靠这些团结，我们才能够做好工作，克服困难，把中国建设好。要团结全党、全民，这并不是说我们没有倾向性。有些人说共产党是“全民的党”，我们不这样看。我们的党是无产阶级政党，是无产阶级的先进部队，是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武装起来的战斗部队。我们是站在占总人口的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人民大众一边，绝不站在占总人口百分之四、五的地、富、反、坏、右那一边。在国际范围内也是这样，我们是同一切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一切革命人民、全体人民讲团结的，绝不同反共反人民的帝国主义者 and 各国反动派讲什么团结。只要有可能，我们也同这些人建立外交关系，争取在五项原则基础上和平共处。但是这些事，跟我们和各国人民的团结是不同范畴的两回事情。

要使全党、全民团结起来，就必须发扬民主，让人讲话。在党内是这样，在党外也是这样。省委的同志，地委的同志，县委的同志，你们回去，一定要让人讲话。在座的同志们要这样做，不在座的同志们也要这样做，一切党的领导人员都要发扬党内民主，让人讲话。界限是什么呢？一个是，遵守党的纪律，少数服从多数，全党服从中央。另一个是，不准组织秘密集团。我们不怕公开的反对派，只怕秘密的反对派，这种人，当面不讲真话，当面讲的尽是一些假的、骗人的话，真正的目的不讲出来。只要不是违反纪律的，只要不是搞秘密集团活动的，我们都允许他讲话，而且讲错了也不要处罚。讲错了话可以批评，但是要用道理说服人家。说而不服怎么办？让他保留意见。只要服从决议，服从多数人决定的东西，少数人可以保留不同的意见。在党内党外，容许少数人保留意见，是有好处的。错误的意见，让他暂时保留，将来他会改的。许多时候，少数人的意见，倒是正确的。历史上常常有这样的事情，起初，真理不是在多数人手里，而是在少数人手里。马克思、恩格斯手里有真理，可是他们在开始的时候是少数。列宁在很长一个时期内也是少数。我们党内也有这样的经验，在陈独秀统治的时候，在“左”倾路线统治的时候，真理都不在领导机关的多数人手里，而是在少数人手里。历史上的自然科学家，例如哥白尼、伽利略、达尔文，他们的学说曾经在一个长时间内不被多数人承认，反而被看作错误的东西，当时他们是少数。我们党在

一九二一年成立的时候，只有几十个党员，也是少数人，可是这几十个人代表了真理，代表了中国的命运。

有一个捕人、杀人的问题，我还想讲一下。在现在的时候，在革命胜利还只有十几年的时候，在被打倒了的反动阶级分子还没有被改造好，有些人并且企图阴谋复辟的时候，人总会要捕一点、杀一点的，否则不能平民愤，不能巩固人民的专政。但是，不要轻于捕人，尤其不要轻于杀人。有一些坏人，钻到我们队伍里面的坏分子，蜕化变质分子，这些人，骑在人民的头上拉屎拉尿，穷凶极恶，严重地违法乱纪。这是些小蒋介石。对于这种人得有个处理，罪大恶极的，也要捕一些，还要杀几个。因为对这样的人，完全不捕、不杀，不足以平民愤。这就是所谓“不可不捕，不可不杀”。但是绝不可以多捕、多杀。凡是可捕可不捕的，可杀可不杀的，都要坚决不捕、不杀。有个潘汉年，此人当过上海市副市长，过去秘密投降了国民党，是个CC派人物，现在关在班房里头，我们没有杀他。象潘汉年这样的人，只要杀一个，杀戒一开，类似的人都得杀。还有个王实味，是个暗藏的国民党探子。在延安的时候，他写过一篇文章，题名《野百合花》，攻击革命，诬蔑共产党。后头把他抓起来，杀掉了。那是保安机关在行军中间，自己杀的，不是中央的决定。对于这件事，我们总是提出批评，认为不应当杀。他当特务，写文章骂我们，又死不肯改，就把他放在那里吧，让他劳动去吧，杀了不好。人要少捕、少杀。动不动就捕人、杀人，会弄得人

人自危，不敢讲话。在这种风气下面，就不会有多少民主。

还不要给人乱戴帽子。我们有些同志惯于拿帽子压人，一张口就是帽子满天飞，吓得人不敢讲话。当然，帽子总是有的，会议报告里面不是就有许多帽子吗？“分散主义”不是帽子吗？但是，不要动不动就给人戴在头上，弄得张三分散主义，李四分散主义，什么人都是分散主义。帽子，最好由人家自己戴，而且要戴得合适，最好不要由别人去戴。他自己戴了几回，大家不同意他戴了，那就取消了。这样，就会有很好的民主空气。我们提倡不抓辫子、不戴帽子、不打棍子，目的就是要使人心里不怕，敢于讲意见。

对于犯了错误的人，对于那些不让人讲话的人，要采取善意帮助的态度。不要有这样的空气：似乎犯不得错误，一犯错误就不得了，一犯错误，从此不得翻身。一个人犯了错误，只要他真心愿意改正，只要他确实有了自我批评，我们就要表示欢迎。头一、二次自我批评，我们不要要求过高，检讨得还不彻底，不彻底也可以，让他再想一想，善意地帮助他。人是要有人帮助的。应当帮助那些犯错误的同志认识错误。如果人家诚恳地作了自我批评，愿意改正错误，我们就要宽恕他，对他采取宽大政策。只要他的工作成绩还是主要的，能力也还行，就还可以让他在那里继续工作。

我在这个讲话里批评了一些现象，批评了一些同志，

但是没有指名道姓，没有指出张三、李四来。你们自己心里有数。（笑声）我们这几年工作中的缺点、错误，第一笔账，首先是中央负责，中央又是我首先负责；第二笔账，是省委、市委、自治区党委的；第三笔账，是地委一级的；第四笔账，是县委一级的；第五笔账，就算到企业党委、公社党委了。总之，各有各的账。

同志们，你们回去，一定要把民主集中制健全起来。县委的同志，要引导公社党委把民主集中制健全起来。首先要建立和加强集体领导。不要再实行长期固定的“分片包干”的领导方法了，那个方法，党委书记和委员们各搞各的，不能有真正的集体讨论，不能有真正的集体领导。要发扬民主，要启发人家批评，要听人家的批评。自己要经得起批评。应当采取主动，首先作自我批评。有什么就检讨什么，一个钟头，顶多两个钟头，倾箱倒篋而出，无非是那么多。如果人家认为不够，请他提出来，如果说得对，我就接受。让人讲话，是采取主动好，还是被动好？当然是主动好。已经处在被动地位了怎么办？过去不民主，现在陷于被动，那也不要紧，就请大家批评吧。白天出气，晚上不看戏，白天晚上都请你们批评。（笑声）这个时候我坐下来，冷静地想一想，两三天晚上睡不着觉。想好了，想通了，然后诚诚恳恳地作一篇检讨。这不就好了吗？总之，让人讲话，天不会塌下来，自己也不会垮台。不让人讲话呢？那就难免有一天要垮台。

我今天的讲话就讲这一些。中心是讲了一个实行民

主集中制的问题，在党内、党外发扬民主的问题。我向同志们建议，仔细考虑一下这个问题。有些同志还没有民主集中制的思想，现在就要开始建立这个思想，开始认识这个问题。我们充分地发扬了民主，就能把党内、党外广大群众的积极性调动起来，就能使占总人口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人民大众团结起来。做到了这些，我们的工作就会越做越好，我们遇到的困难就会较快地得到克服，我们事业的发展就会顺利得多。（热烈鼓掌）

选自人民出版社单行本

毛 泽 东

加强相互学习，
克服固步自封、骄傲自满*

（一九六三年十二月十三日）

现将湖南省委李瑞山、华国锋两同志一九六三年十一月六日写的一个参观广东农业生产情况的报告以及附在上面的湖南省委一九六三年十二月七日写的一个指示，发给你们研究。中央认为，这种虚心学习外省、外市、外区优良经验的态度和办法，是很好的，是发展我国经济、政治、思想、文化、军事、党务的重要方法之一。固步自封，骄傲自满，对于自己所管区域的工作，不采取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分析方法（一分为二，既有成绩，也有缺点错误），只研究成绩一方面，不研究缺点错误一方面。只爱听赞扬的话，不爱听批评的话。对于外省、外市、外区、别的单位的工作，很少有兴趣组织得力高级中级干部去虚心认真地加以考察，以便和本省本市、本区本单位的情况结合起来，加以改进。永远限于本地区本单位这个

* 这是毛泽东同志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党内指示。

狭隘世界，不能打开自己的眼界，不知还有别的新天地，这叫做夜郎自大。对外国人、外地人以及中央派下去的人，只让看好的，不让看坏的。只向他们谈成绩，不向他们谈缺点及错误。要谈也谈得不深刻，敷衍几句了事。中央多次对同志们提出这个问题，认为一个共产党人必须具备对于成绩与缺点、真理与错误这个两分法的马克思主义辩证思想。事物（经济、政治、思想、文化、军事、党务等等）总是作为过程而向前发展的。而任何一个过程，都是由矛盾着的两个侧面互相联系又互相斗争而得到发展的。这应当是马克思主义者的普通常识。但是，中央和各地同志中，有许多人却很少认真地用这种观点去思索去工作。他们的头脑，长期存在着形而上学的思想方法而不能解脱。所谓形而上学，就是否认事物的对立统一、对立斗争（两分法）、矛盾着对立着的事物在一定条件下互相转化，走向它们的反面，这样一个真理。就是人们固步自封、骄傲自满，只见成绩，不见缺点，只愿听好话，不愿听批评话。自己不愿意批评（对自己的两分法），更怕别人批评。中央有几十个部，明明有几个工作成绩工作作风较好的部，例如石油部，别的部却视若无睹，永远不去那里考察研究请教一番。一个部所管企业事业，明明有许多厂矿、企业、事业、科学研究处所及其人员，工作做得较好，上面却不知道，因而也不能提倡人们向那些单位学习。同志们，中央在这里所说的犯有形而上学错误的同志是指一部分同志，不是指全部同志。但是，应当指

出，有大量的好同志却被那些高官厚禄、养尊处优、骄傲自满、固步自封、爱好资产阶级形而上学的同志们，亦即官僚主义者，所压住了，现在必须加以改革。凡不虚心地认真地对本地本单位本人作分析，对别地别单位别人作分析，拒绝马克思主义辩证分析方法的同志，要进行同志式的劝告和批评，以便把不良情况改变过来。把向别部、别省、别市、别区、别单位的好经验、好作风、好方法学过来这样一种方法，定为制度。这个问题是一个大问题，请你们加以讨论。以后还要在中央工作会议及中央全会上加以讨论。湖南省委过去在一个时期内，不作调查研究，主观主义地下达许多指示，往下灌的东西多，由下面反映上来的真实情况少，因而脱离群众，产生很大困难。从一九六一年起，他们开始改变了，以至情况大好起来。但是他们认为还是远不如广东和上海，所以他们派遣大批省、地、县三级干部，还有省和市的干部，组成两个考察团，分别到广东上海去学习。这一点，请你们注意研究，是否也可以这样办。中央认为，不但可以而且应当这样办。如有不同意见，请你们提出。

选自人民出版社单行本

共产主义者同盟章程⁽¹⁾

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

第一章 同盟

第一条 同盟的目的：推翻资产阶级政权，建立无产阶级统治，消灭旧的以阶级对抗为基础的资产阶级社会和建立没有阶级、没有私有制的新社会。

第二条 盟员的条件：

- (a) 生活方式和活动必须符合同盟的目的；
- (b) 具有革命毅力并努力进行宣传工作；
- (c) 承认共产主义；
- (d) 不得参加任何反共产主义的（政治的或民族的）团体并且必须把参加某团体的情况报告有关的领导机关；

(e) 服从同盟的一切决议；

(f) 保守同盟的一切机密；

(g) 必须获得一致通过，才能被接收入某一支部。

盟员如果不能遵守这些条件即行开除（见第八章）。

第三条 所有盟员都一律平等，他们都是兄弟，因而有义务在一切场合下互相帮助。

第四条 盟员皆有盟内代号。

第五条 同盟的组织机构是：支部、区部、总区部、中央委员会和代表大会。

第二章 支部

第六条 支部的组成至少三人至多二十人。

第七条 每个支部选举主席和副主席各一人。主席主持各种会议，副主席管理财务，主席缺席时由副主席代理主席职务。

第八条 接收新盟员须经支部事先同意，由支部主席和充当介绍人的盟员办理。

第九条 各地区的支部彼此不得相识或保持任何联系。

第十条 各支部均须有特别称号。

第十一条 任何一个盟员迁居时均须事先报告本支部的主席。

第三章 区部

第十二条 区部辖有两个以上十个以下支部。

第十三条 由这些支部的主席和副主席组成区部委

员会。区部委员会从委员中选出领导人。区部委员会同本区各支部和总区部保持联系。

第十四条 区部委员会是区内各支部的权力执行机关。

第十五条 各独立支部须加入已有的区部，或同其他各别的支部成立新的区部。

第四章 总区部

第十六条 本国或本省内的各区部隶属于一个总区部。

第十七条 由代表大会根据中央委员会的建议按省划分同盟各区部和指定总区部。

第十八条 总区部是本省各区部的权力执行机关。它同各该区部和中央委员会保持联系。

第十九条 新建立的区部加入邻近的总区部。

第二十条 总区部向最高权力机关——代表大会报告工作，在代表大会闭幕期间则向中央委员会报告工作。

第五章 中央委员会

第二十一条 中央委员会是全盟的权力执行机关，向代表大会报告工作。

第二十二条 中央委员会的成员不少于五人，由代

表大会指定为中央委员会所在地区的区部委员会选出。

第二十三条 中央委员会同各总区部保持联系，每三个月作一次关于全盟状况的报告。

第六章 一般规定

第二十四条 支部、区部委员会以及中央委员会至少每两周开会一次。

第二十五条 区部委员会和中央委员会的委员任期为一年，连选得连任，选举者可以随时撤换之。

第二十六条 每年9月进行选举。

第二十七条 区部委员会必须根据盟的意图对各支部所进行的讨论加以领导。

如中央委员会认为某些问题的讨论具有普遍的和直接的利害关系，可以提交全盟讨论。

第二十八条 盟员至少每三个月同所属区部委员会联系一次，支部每月联系一次。

每个区部至少每两个月向总区部报告一次本地区的工作进展情况，每个总区部至少每三个月向中央委员会报告一次本地区的工作进展情况。

第二十九条 同盟各级机关必须采取必要的措施来保证同盟的安全并加强其活动，按照章程独立负责进行活动，并立即把一切通知上级机关。

第七章 代表大会

第三十条 代表大会是全盟的立法机关。关于修改章程的一切提案均经总区部转交中央委员会，再由中央委员会提交代表大会。

第三十一条 每个区部都可派遣代表。

第三十二条 盟员不超过三十人的区部派代表一名，满六十人者派两名，满九十人者派三名，以此类推。各区部可以选举不属于本地区的盟员为自己的代表。

凡属上述情况，则各区部须赋予自己的代表以全权并给予详细的指示。

第三十三条 代表大会于每年8月举行。遇紧急情况中央委员会得召集非常代表大会。

第三十四条 每届代表大会指定本届中央委员会所在地，同时指定下届代表大会的开会地点。

第三十五条 中央委员会得出席代表大会，但无表决权。

第三十六条 代表大会于每次会议后除发指示信件外，还可以代表全党发表宣言。

第八章 反盟罪行

第三十七条 凡不遵守盟员条件者(见第二条)，视

情节轻重或暂令离盟或开除出盟。

凡开除出盟者不得再接收入盟。

第三十八条 开除盟籍的问题只能由代表大会决定。

第三十九条 区部或独立支部可以暂令各别盟员离盟，但必须立即报告上级机关备案。在这种情况下代表大会同样作为最高权力机关作出决定。

第四十条 被暂令离盟的盟员重新入盟问题，须由中央委员会根据区部的提议处理。

第四十一条 反盟的罪行由区部委员会审理；区部委员会还应督促判决的执行。

第四十二条 为了盟的利益必须对被暂令离盟者、被开除盟籍者和可疑者加以监视，使他们不能为害。有关这些人的阴谋活动必须立即通知有关支部。

第九章 盟的经费

第四十三条 代表大会为每个国家规定每一盟员应缴纳的最低盟费。

第四十四条 盟费半数上缴中央委员会，半数由区部或支部留用。

第四十五条 中央委员会的经费用作下列各项支出：

(一) 联络费用和组织费用。

(二)印发传单。

(三)中央委员会因执行某种任务所派代表的一切费用。

第四十六条 地方委员会的经费用作下列各项支出：

(一)联络费用。

(二)印发传单。

(三)在必要时派遣代表的一切费用。

第四十七条 凡支部和区部六个月不向中央委员会交盟费，中央委员会即令其暂时离盟。

第四十八条 区部委员会最迟不超过三个月向所属各支部报告收支情况。中央委员会向代表大会报告盟的经费分配情况和盟的收支情况。任何滥用盟的经费的行为都要受到最严厉的惩罚。

第四十九条 特别费用和召开代表大会的费用由特殊收入开支。

第十章 接收盟员

第五十条 支部主席向被接收入盟的盟员宣读和说明章程的第一条到第四十九条，要在简短的讲话中特别强调入盟者应尽的义务，然后向他发问：“那末，你愿意加入这个同盟吗？”如果后者回答：“愿意！”，那末主席就要他保证尽盟员的一切义务，然后宣布他为盟员并在下一

次会议上将他编入支部。

受 1847 年秋召开的第二届代表大会之委托公布。

秘书

主席

签名: 恩格斯

签名: 卡尔·沙佩尔

1847 年 12 月 8 日于伦敦

载于维尔穆特和施梯伯《19
世纪共产主义者的阴谋》
1853 年柏林版第 1 册附录

原文是德文

俄文译自该书附录

选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 4 卷第 572—577 页

注 释

〔1〕共产主义者同盟章程(马克思和恩格斯曾积极参与了该章程的起草工作)于 1847 年 6 月在同盟第一届代表大会上拟定。这个章程经过同盟各支部讨论后重新提交第二届代表大会审查,最后于 1847 年 12 月 8 日批准。

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

结 束 语

对布尔什维克党所经过的历史道路可以作出什么样的基本总结呢？

联共(布)的历史教导我们的是什么呢？

(一)首先,党的历史教导说,没有一个革命的无产阶级政党,没有一个消除了机会主义、对妥协主义者和投降主义者毫不调和、对资产阶级及其国家政权采取革命态度的党,无产阶级革命的胜利、无产阶级专政的胜利是不可能的。

党的历史教导说,把无产阶级弄到没有这样一个党,就是把它弄到没有革命的领导,而把它弄到没有革命的领导,就是使无产阶级革命事业遭到失败。

党的历史教导说,能够成为这样的党的,决不是通常那种西欧类型的社会民主党,那种在国内和平条件下熏陶出来、被机会主义分子牵着走、幻想“社会改良”而害怕社会革命的党。

党的历史教导说,能够成为这样的党的,只能是新型

的党，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党，主张社会革命的党，能够训练无产阶级去同资产阶级决战并组织无产阶级革命的胜利的党。

这样的党在苏联就是布尔什维克党。

斯大林同志说：“在革命前的时期，在比较和平发展的时期，第二国际各党是工人运动中的统治力量，议会斗争形式是基本的斗争形式，——在这种条件下，党没有而且不可能有它后来在公开的革命搏斗的条件下所具有的那种重大的和决定的意义。考茨基在第二国际遭受攻击时替它辩护说：第二国际各党是和平的工具，不是战争的工具，正因为如此，它们在战争时期，在无产阶级的革命发动时期，就没有力量采取什么重大措施。这是完全对的。但是这说明什么呢？说明第二国际各党对于无产阶级的革命斗争是不适用的，它们不是引导工人去夺取政权的无产阶级的战斗的党，而是迁就议会选举和议会斗争的选举机关。正因为如此，在第二国际机会主义者统治的时期，无产阶级的基本政治组织并不是党，而是议会党团。大家知道，事实上党在这个时期只是议会党团的附属品和服役者。几乎用不着证明，在这样的条件下，在这样的党的领导下，是谈不到训练无产阶级去进行革命的。

可是，新时期一到来，情形就根本改变了。新时期是公开的阶级冲突的时期，是无产阶级的革命发

动的时期，是无产阶级革命的时期，是直接准备力量去推翻帝国主义而由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的时期。这个时期在无产阶级面前提出种种新的任务：要按新的革命规范去改造党的全部工作，要用夺取政权的革命斗争精神去教育工人，要准备后备军并使他们跟上来，要和邻国的无产者结成联盟，要同殖民地和附属国的解放运动建立巩固的联系，如此等等。如果以为这些新任务可以用那些在议会制度的和平条件下教育出来的旧社会民主党的力量来解决，那就是使自己陷于绝望的境地，遭到不可避免的失败。肩负着这样的任务而仍然以旧的党为领导，那就是完全解除武装。几乎用不着证明，无产阶级是不能容忍这种情形的。

因此，必须有新的党，战斗的党，革命的党。这个党要有充分的勇气，能够引导无产者去夺取政权；这个党要有充分的经验，能够认清革命环境的复杂条件；这个党要有充分的机智，能够绕过横在前进道路上的一切暗礁。

没有这样的党，就休想推翻帝国主义，就休想争得无产阶级专政。

这个新的党就是列宁主义的党。”（斯大林《列宁主义问题》俄文第10版第62—63页）^①

^① 见斯大林《列宁主义问题》第72—74页。——译者注

(二)其次,党的历史教导说,工人阶级的党如果不掌握工人运动的先进理论,不掌握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就当不了本阶级的领导者,就当不了无产阶级革命的组织者和领导者。

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的力量,就在于它使党能判明局势,了解周围事变的内在联系,预察事变的进程,不仅洞察事变在目前怎样发展和向何处发展,而且洞察事变在将来怎样发展和向何处发展。

只有掌握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的党,才能信心百倍地前进,并引导工人阶级前进。

相反,没有掌握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的党,却不得不徘徊摸索,对自己的行动失去信心,没有能力引导工人阶级前进。

有人也许以为,掌握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只要做到用心熟读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著作中的某些结论和原理,学会及时引证这些结论和原理,就算不错了。他们是指望把熟读的结论和原理用于各种环境、用于实际生活的一切场合。但这样对待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是完全不正确的。决不能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看成是教条汇编、看成是教义问答、看成是信条,而把马克思主义者本身看成是一些咬文嚼字的人和书呆子。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是关于社会发展的科学,关于工人运动的科学,关于无产阶级革命的科学,关于共产主义社会建设的科学。它既是一种科学,就不会也不可能停留不前,而会不断发

展和不断完善。显然，它在自己的发展进程中不能不用新的经验和新的知识来丰富自己；它的某些原理和结论不能不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改变，不能不用适合于新的历史条件的新结论和新原理来代替。

掌握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决不是说要熟读它的一切公式和结论，抱住这些公式和结论的每一个字句不放。要掌握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首先必须学会把它的字句和实质区别开来。

掌握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是说要领会这个理论的实质，学会在无产阶级阶级斗争的各种条件下运用这个理论来解决革命运动的实际问题。

掌握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是说要善于用革命运动的新经验来丰富这个理论，善于用新原理和新结论来丰富这个理论，善于**发展和推进这个理论**，不怕根据这个理论的实质去用适合于新的历史形势的新原理和新结论来代替它的某些已经陈旧的原理和结论。

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不是教条，而是行动的指南。

在俄国第二次革命(1917年2月)以前，各国的马克思主义者都认为，议会制民主共和国是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对社会最适宜的政治组织形式。固然，马克思在十九世纪七十年代曾指出，无产阶级专政最适宜的形式不是议会制共和国，而是巴黎公社式的政治组织。但可惜马克思的这一指示没有在著作里得到进一步的发挥，于是就被人遗忘了。此外，恩格斯在1891年

对爱尔福特纲领草案的批判中所作的权威性声明，即“民主共和国……是无产阶级专政的特殊形式”^①，也无容置疑地表明马克思主义者继续认为民主共和国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治形式。恩格斯的这个原理后来成了所有马克思主义者——包括列宁在内——奉行的准则。但是，俄国1905年的革命，特别是1917年2月的革命，提出了工农代表苏维埃，即一个社会的新的政治组织形式。列宁从马克思主义理论出发，根据他对俄国两次革命经验的研究，得出结论说，无产阶级专政最好的政治形式不是议会制民主共和国，而是苏维埃共和国。根据这一点，列宁在1917年4月，即在从资产阶级革命向社会主义革命过渡的时期，提出了成立苏维埃共和国作为无产阶级专政最好的政治形式的口号。当时各国机会主义者都抱住议会制共和国不放，责备列宁离开了马克思主义、破坏了民主。但掌握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当然是列宁，而不是机会主义者，因为列宁向前推进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用新的经验丰富了这个理论，而机会主义者则把这个理论向后拉，把它的一个原理变成了教条。

如果列宁为马克思主义的字句所束缚，不敢用苏维埃共和国这一适合新的历史形势的新原理来代替恩格斯所表述的马克思主义的旧原理，那末党、我国革命和马克思主义会是什么情况呢？党就会在黑暗中徘徊，苏维埃

^①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第274页。——译者注

就会瓦解，我们就不会有苏维埃政权，马克思主义理论就会遭到严重的损害。无产阶级就会遭到失败，无产阶级的敌人就会获得胜利。

恩格斯和马克思在研究帝国主义以前的资本主义时得出结论说，社会主义革命不可能在单独一个国家内获得胜利，它只有在一切或大多数文明国家同时举行进攻的条件下才能获得胜利。这是在十九世纪中叶说的。这个结论后来成了所有马克思主义者奉行的准则。但是，到二十世纪初，帝国主义以前的资本主义已经转变成帝国主义阶段的资本主义，上升的资本主义已经变成垂死的资本主义。列宁从马克思主义理论出发，根据他对帝国主义阶段的资本主义的研究，得出结论说，恩格斯和马克思的旧公式已经不适合于新的历史形势，社会主义革命完全可能在单独一个国家内获得胜利。当时各国机会主义者都抱住恩格斯和马克思的旧公式不放，责备列宁离开了马克思主义。但掌握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当然是列宁，而不是机会主义者，因为列宁向前推进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用新的经验丰富了这个理论，而机会主义者则把这个理论向后拉，把它变成木乃伊。

如果列宁为马克思主义的字句所束缚，如果他在理论上没有足够的勇气抛开马克思主义的旧结论，而代之以关于社会主义能够在单独一个国家内获得胜利这一适合于新的历史形势的新结论，那末党、我国革命和马克思

主义会是什么情况呢？党就会在黑暗中徘徊，无产阶级革命就会失去领导，马克思主义理论就会开始衰退。无产阶级就会遭到失败，无产阶级的敌人就会获得胜利。

机会主义并不总是意味着直接否定马克思主义理论或它的某些原理和结论。机会主义有时还表现在企图抱住马克思主义中某些已经过时的原理不放，把它们变成教条，以便阻碍马克思主义向前发展，从而也阻碍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发展。

可以毫不夸大地说，恩格斯逝世后，最伟大的理论家列宁，以及继列宁之后的斯大林和列宁的其他学生，是唯一向前推进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用无产阶级阶级斗争新条件下的新经验丰富了这个理论的马克思主义者。

正因为列宁和列宁主义者向前推进了马克思主义理论，所以列宁主义是马克思主义的进一步发展，是无产阶级阶级斗争新条件下的马克思主义，是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的马克思主义，是社会主义在全世界六分之一的土地上获得胜利的时代的马克思主义。

如果布尔什维克党的先进干部没有掌握马克思主义理论，如果他们沒有学会把这个理论看作行动的指南，如果他们沒有学会向前推进马克思主义理论，用无产阶级阶级斗争的新经验来丰富这个理论，那末布尔什维克党就不会有 1917 年十月革命的胜利。

恩格斯在批评那些担负着美国工人运动领导工作的侨居美国的德国马克思主义者时写道：

“德国人一点不懂得把他们的理论变成能推动美国群众的杠杆；他们大部分连自己也不懂得这种理论，而用学理主义和教条主义的态度去对待它，认为只要把它背得烂熟，就足以应付一切。对他们来说，这是教条，而不是行动的指南。”（《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第1版第27卷第606页）^①

列宁批评加米涅夫和某些老布尔什维克在1917年4月，即在革命运动已经向前发展而要求过渡到社会主义革命的时候仍抱住工农革命民主专政的旧公式不放时写道：

“马克思和恩格斯总是说，我们的学说不是教条，而是行动的指南，他们公正地讥笑了只会背诵和简单重复‘公式’的人们，因为‘公式’至多只能指出一般的任务，而这些任务随着历史过程中每个特殊阶段的具体经济和政治环境必然有所改变。……现在必须弄清一个不容置辩的真理，就是马克思主义者必须考虑生动的实际生活，必须考虑现实的确切事实，而不应当抱住昨天的理论不放……”（《列宁全集》俄文第3版第20卷第100—101页）^②

（三）其次，党的历史教导说，如果不打垮那些在工人阶级队伍中进行活动、把工人阶级的落后阶层推进资产阶级怀抱、从而破坏工人阶级的统一的小资产阶级党派，

① 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456页。——译者注

② 见《列宁选集》第2版第3卷第24—26页。——译者注

那末无产阶级革命就不能获得胜利。

我们党的历史是同各小资产阶级党派——社会革命党、孟什维克、无政府主义者和民族主义者作斗争并把它们打垮的历史。不战胜这些党派，不把它们从工人阶级队伍中驱逐出去，就不能达到工人阶级的统一，而没有工人阶级的统一，就不能实现无产阶级革命的胜利。

如果不打垮这些起初主张保存资本主义、到十月革命后又企图恢复资本主义的党派，那就不能保持无产阶级专政，不能战胜外国武装干涉和建成社会主义。

一切为了欺骗人民而自称“革命”的和“社会主义”的党派的小资产阶级党派——社会革命党、孟什维克、无政府主义者和民族主义者，早在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前就已经成了反革命的政党，后来又变成了外国资产阶级间谍机关的代理人，变成了一帮特务、暗害分子、破坏分子、凶手和叛国者，这决不是偶然的。

列宁说：“在社会革命时代，只有依靠最革命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只有同其他一切党派进行无情的斗争，才能实现无产阶级的团结。”（《列宁全集》俄文第3版第26卷第50页）^①

（四）其次，党的历史教导说，工人阶级的党同自己队伍中的机会主义者作不调和的斗争，不打垮自己队伍中的投降主义者，就不能保持自己队伍的统一和纪律，就

^① 见《列宁全集》第31卷第472页。——译者注

担当不了无产阶级革命的组织和领导者，就担当不了社会主义新社会的建设者。

我们党内生活发展的历史，是同党内机会主义集团——“经济派”、孟什维克、托洛茨基派、布哈林派和民族主义倾向分子作斗争并把他们打垮的历史。

党的历史教导说，所有这些投降主义集团实质上都是孟什维主义在我们党内的代理人，是孟什维主义的仆从，是孟什维主义的继续。它们也同孟什维主义一样，起着在工人阶级中和党内传播资产阶级影响的作用。因此，消灭党内这些集团的斗争，就是消灭孟什维主义的斗争的继续。

如果不打败“经济派”和孟什维克，我们就不能把党建立起来并引导工人阶级去进行无产阶级革命。

如果不打败托洛茨基派和布哈林派，我们就不能为建成社会主义准备好必要的条件。

如果不打败形形色色的民族主义倾向分子，我们就不能用国际主义精神来教育人民，就不能保住苏联各族人民伟大友谊的旗帜，就不能把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建立起来。

也许有人以为，布尔什维克用了过多的时间去同党内机会主义分子作斗争，过高估计了党内机会主义分子的作用。但这是完全不正确的。决不能容忍自己队伍中有机会主义，正如不能容忍健全的机体上有脓疮一样。党是工人阶级的领导部队，是它的先头堡垒，是它的战斗

司令部。在工人阶级的领导司令部中，决不能容许信念不坚定者、机会主义者、投降主义者和叛徒有立足的余地。在自己的司令部中、在自己的堡垒中有投降主义者和叛徒而去同资产阶级作殊死斗争，就会陷于腹背受击的地位。不难理解，这样的斗争只会遭到失败的结局。堡垒是最容易从内部攻破的。为要达到胜利，首先必须在工人阶级的党内，在工人阶级的领导司令部下，在工人阶级的先头堡垒内，把投降主义者、逃兵、工贼和叛徒清除出去。

托洛茨基派、布哈林派和民族主义倾向分子反对列宁反对党，遭到了与孟什维克党和社会革命党同样的结局，即变成了法西斯间谍机关的代理人，变成了特务、暗害分子、凶手、破坏分子和叛国者，这决不是偶然的。

列宁说：“在自己的队伍里，有改良主义者，有孟什维克，就不能在无产阶级革命中取得胜利，就不能捍卫住无产阶级革命。这在原则上是很明显的。这是已经由俄国和匈牙利的经验具体证实了的。……在俄国……曾经有**很多次**处于困难的境地，当时如果让孟什维克、改良主义者、小资产阶级民主派留在我们党内……那末苏维埃制度就一定会被推翻的。”（《列宁全集》俄文第3版第25卷第462—463页）^①

斯大林同志说：“如果说我们党已经建立了自己

^① 见《列宁全集》第31卷第345—346页。——译者注

内部的统一和自己队伍的空前的团结，那末这首先是因为它及时清洗了机会主义的肮脏东西，从党内驱逐了取消派和孟什维克。无产阶级政党发展和巩固的道路就是把机会主义者和改良主义者、社会帝国主义者和沙文主义者、社会爱国主义者和社会主义和平主义者从党内清洗出去的道路。党是靠清洗自己队伍中的机会主义分子而巩固起来的。”（斯大林《列宁主义问题》俄文第10版第72页）①

（五）其次，党的历史教导说，如果党陶醉于胜利而开始骄傲起来，如果它不再注意自己工作中的缺点，如果它害怕承认自己的错误、害怕公开地老实地及时改正这些错误，那它就当不了工人阶级的领导者。

如果党不害怕批评和自我批评，如果它不掩盖自己工作中的错误和缺点，如果它用自己工作中的错误来教导和教育干部，如果它善于及时改正自己的错误，那它就会是不可战胜的。

如果党隐瞒自己的错误，掩饰老大难的问题，用虚假的表面上的一切满意来掩盖自己的缺点，不能容忍批评和自我批评，浸透自满情绪，一味妄自尊大，躺倒在功劳簿上，那它就会遭到灭亡。

列宁说：“一个政党对自己的错误所抱的态度，就是衡量这个党是否郑重，是否真正履行它对本阶

① 见斯大林《列宁主义问题》第84页。——译者注

级和劳动群众所负义务的一个最重要最可靠的尺度。公开承认错误，揭露错误的原因，分析产生错误的环境，仔细讨论改正错误的方法，——这才是一个郑重的党的标志，这就是党履行自己的义务，这才是教育和训练阶级，以至于群众。”（《列宁全集》俄文第3版第25卷第200页）^①

又说：

“过去一切灭亡了的革命政党所以灭亡，就是因为它们骄傲自大，不善于看到自己力量的所在，怕说出自己的弱点。而我们是不会灭亡的，因为我们不怕说出自己的弱点，并且能够学会克服弱点。”（《列宁全集》俄文第3版第27卷第260—261页）^②

（六）最后，党的历史教导说，工人阶级的党如果不同群众保持广泛的联系，不经常巩固这种联系，不善于倾听群众的呼声和了解他们的疾苦，没有不仅教导群众而且向群众学习的决心，那它就不能成为能够领导千百万工人阶级群众和全体劳动群众的真正群众性的党。

如果党善于象列宁所说那样“同最广大的劳动群众，首先是同无产阶级劳动群众，但同样也同非无产阶级劳动群众联系、接近，甚至可以说在某种程度上同他们打成一片”（《列宁全集》俄文第3版第25卷第174页）^③，那

① 见《列宁选集》第2版第4卷第213页。——译者注

② 见《列宁全集》第33卷第275页。——译者注

③ 见《列宁选集》第2版第4卷第182页。——译者注

它就会是不可战胜的。

如果党在自己的党的狭小圈子里闭关自守，如果它脱离群众，如果它蒙上了官僚主义的灰尘，那它就会遭到灭亡。

斯大林同志说：“当布尔什维克保持同广大人民群众的联系时，他们将是不可战胜的，——这可以认为是一个规律。相反地，布尔什维克只要一脱离群众和失去同群众的联系，只要一染上官僚主义的毛病，他们就会丧失任何力量，而变成空架子。

在古代希腊人的神话中，有一个著名的英雄名叫安泰，据神话说，他是海神波赛东和地神盖娅的儿子。他对生育、抚养和教导他成人的母亲是非常依恋的。没有哪一个英雄能同这个安泰抗衡。大家公认他是无敌的英雄。他的力量在什么地方呢？他的力量就在于，每当他同敌人决斗而遇到困难时，便往地上一靠，就是说，往生育和抚养他成人的母亲身上一靠，就取得了新的力量。可是他毕竟有一个弱点，就是怕别人用什么方法使他离开地面。敌人注意到他的这个弱点，于是时刻暗中窥伺他。后来有一个敌人利用了他的弱点，就战胜了他。这个敌人名叫海格力斯。可是，他是怎样战胜安泰的呢？原来这个敌人使安泰离开了地面，把他举到空中，使他无法再靠近地面，这样就在空中把他扼死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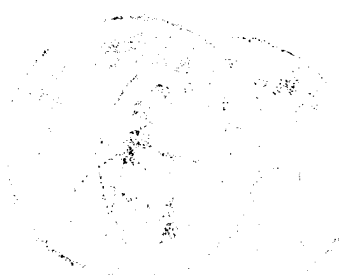
我认为，布尔什维克很象希腊神话中的英雄安

泰。布尔什维克也同安泰一样，其所以强大，就是因为他们同自己的母亲，即同那生育、抚养和教导他们成人的群众保持联系。只要他们同自己的母亲、同人民保持联系，他们就有一切把握，始终是不可战胜的。

这就是布尔什维克领导不可战胜的关键。”（斯大林《论党的工作缺点》）

以上就是布尔什维克党所经过的历史道路的基本教训。

选自《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
（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388—
399页



内部发行

书号 1001·1158

定价 1.10 元

A-1
000135
C2V4